

陈独秀著作选编

1919—1922

第二卷

主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著作选编

1919–1922

第二卷

主　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一封无受信人姓名的信[①]

敝报[②]承先生提倡，感谢得很。鄙人根本上虽不信仰宗教，然比较现行各种宗教，妄以基督教为最优：且以其对于中国社会，有“团结国民”“破除迷信”二种优点。先生既是基督教徒，当能发挥基督救世的宗旨，救济我们被内外两种强权压迫不敢反抗的国民。先生既是基督教徒，当能发挥基督博爱的宗旨，力辟那“不仕无义”的儒教，消极自了的佛教（佛教虽有觉他的教义，但是意在出世，对于世法，正是消极），妖魔鬼怪的道教，救济我们腐败堕落的社会。

大学风潮[③]，报纸上虽然说得很热闹，但是毫无根据，不过是几个冒充古文家的老头儿[④]，冒充剧评家的小孩子[⑤]，在背地里勾串起来蠕

---

① 这封残笺录自周天度《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一文，文中写道：“受信人姓名不详，似为北京大学某一新派教员；信末未署年月日，根据内容推断，约写于 1919 年春间。”本件注释均为原注。载《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② “敝报”，当指 1918 年 12 月创刊的《每周评论》。

③ “大学风潮”，指 1918 年底和 1919 年初，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并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引起旧势力的仇恨，军阀和社会上的封建顽固势力，开始向新文化运动反扑，并利用陈独秀在私生活方面的某些缺点，对新文化运动大肆进行攻击。当时社会上风传军阀政府要弹劾并撤换蔡元培，解散北京大学，驱逐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几个鼓吹新思潮的人。

④ “几个冒充古文家的老头儿”，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林纾 1919 年 2、3 月间，先后在《新申报》发表了《荆生》和《妖梦》的文言小说，诋毁新文化运动，指望“伟丈夫”荆生（暗指北洋皖系军阀头目之一的徐树铮）来镇压新文化运动。他还发表了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他支持新文化运动。马其昶攻击《新潮》和《新青年》杂志“非圣乱经”、“邪说横行”，怂恿当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对北大进行干预，惩处蔡元培和陈独秀等新派人物。

⑤ “冒充剧评家的小孩子”，指张厚载，又名张缪子，是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兼任《神州日报》记者。此人崇拜旧文化，尤其酷爱旧戏，经常在报纸上写些剧评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不满，曾就旧剧问题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展开论争。林纾是张厚载的中学老师，在新旧斗争中，张厚载站在林纾一边。林纾的《荆生》、《妖梦》小说，都是经由他手转寄《新申报》的。他还里应外合，散布谣言，向林纾及《神州日报》提供经过歪曲的材料，为反动势力攻击北大推波助澜，影响很坏。1919 年 3 月 31 日，蔡元培将他开除学籍。

动罢了；把他们当作保守派，当作旧的，来和我们对抗，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恐怕有点不配。

先生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中西一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不是可以在名词形式上随意附会的；"体用兼赅"更是一个难以索解的套语。尊重讲学自由，不是这样。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例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革新派对待保守派，当然大声疾呼，攻击他的短处，就是有的动了感情，骂几句粗恶的话，也都无妨；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们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那新旧并立的现象，何时才能消灭呢？

我对于学术外延内包的观念，中国的旧学，只是世界学术中一部分，其非其全体；儒家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纲常伦理，只是孔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他们本分以内价值的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此外所谓价值的存在，乃指其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言，至于在现社会上适用的价值，乃别一问题）。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并且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底下，说都一文不值，说都是异端邪说，像董仲舒那样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

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然。本志[1]攻击孔教，除不适现代生活以外，这也是一种理由。

以上所说的话，先生以为如何，尚希赐教。

独秀谨复

一九一九年春

---

[1] “本志”，指《新青年》。

国防军问题(告四国银行团)

我们按照欧战后的世界大势和中国民困财穷的状况,稍有丝毫人气的人,莫不异口同声主张要裁兵。但是裁兵要裁到什么程度呢? 据我看来,最好将现在所有的兵,分年裁尽,一个也不留。把这养兵的银钱,来兴教育,办实业,几十年后教育实业都发达了,那时候民智国力便自然充足,内乱外患便自然不生,以后还要兵做什么,万一那时候世界仍有战争,外患仍不能免,再讨论国防问题也不迟。像此民穷财尽到了这步田地,一般的国民没有教育,多数的军人没有学识,制造军器的人才也没有,制造军舰的财力也没有,单招些无教育的游民土匪,就当作国防军,这不是有意骗人,也就是无心作梦。

就算说兵是不能尽裁的,国防是不能不讲的。也只好就现在全国已有的军队,挑选那大烟鬼子土匪乞丐样子少点的,留下十几师至多二十几师,做国防军就得了。其余的马贼兵、土匪兵、乞丐兵,都应该分年裁尽,永远不再招兵,才是道理。

最不可以的,是在现有的军队之外,又要招什么国防军。更不可以的,是那一系人要把自己系的军队叫做国防军。自己系以外的军队,既然不是国防军,难道便可以假藉裁兵的名义将他们裁去吗? 呵唷! 裁兵是全国一致赞成的。但是若照这样的法子裁兵,不但大大的违背了友邦和国民希望裁兵的宗旨,并且是万万办不到的。譬如南方人要裁尽北洋军的军队,单留下西南的兵做国防军,或者是直隶系要裁尽安徽系的军队,或者是广西军要裁尽北军和云南军,单留下自己的兵做国防军,这是办得到的事体吗? 这不比威廉第二想做世界大皇帝还要糊涂吗?

但是这种糊涂的消息,时常跑到我耳朵里来,不是某师某旅驻扎某处,就是某师长某旅长派了什么人。他们以为本系的势力,只要有了国

防军四个师团，边防军四大旅团，把京师南北苑和京汉津浦北段紧紧把住，便可以纵横中国无人抵抗了。

前月二十一日，东方通信社的电报说道：日本的贵族院预算内示会时，江木千之氏关于中国南北和平，深信有改变各省政体，改革督军制之必要，特质问外相之所见如何。内田外相曰：江木君之所见，在中国北方，诚堪认为根本问题至为必要，予亦有同感。惟中国政府现在准备改革各省督军之军队，编成"新国立军队"之计划。至改革时所需之经费等事，希望依四国借款团而解决之，云云。

照这电报看起来，什么"新国立军队"，不就是现在新编的国防军吗？外国大臣在国会里说的话，自然不是谣言。我们政府里既然有了这种糊涂大计划，并且因为这大计划又要向外国借款，我良心上实在忍不住要劝说几句道：

我们国民已经穷极了。我们国民已经被兵糟踏够了。如今借款裁兵，我们还可以赞成。借款招兵，我们是不赞成的。若是一面假借裁兵的美名，裁去敌系的军队。一面借款编练自己一系的"新国立军队"。象这种要闹大乱子的计划，我们更是不赞成的了。唉呀！中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定要闹得他不能混呢？你们若是闹极了，恐怕还有国民要请外国来保护的那一天。那时看你们的国防军是如何防法？防的是什么？

我还有几句话奉告四国银行团道：各国借款把我们办实业、办教育，我们是感谢的。就是借款把我们裁兵，也是感谢的。若是借款把政府招兵，我们是要怀恨的了。若有一国军阀，要扶助中国军阀里个人的势力，借款把他编成那个人的一系的"新国立军队"，像这种鬼鬼祟祟的勾当，不但为害中国，也就是破坏东亚和平的种子，其余的三国银行团，要留神才好。

1919 年 1 月 5 日 《每周评论》第三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又要制造民意了

有一位先生和畜生同名，和薛大可齐名。曾在袁皇帝袴下伸头呐喊，代表民意，说约法不良，替袁氏造了一部新约法，随即又制造民意，说共和不好，要捧袁世凯做皇帝。随后又说民意要复辟，在张大辫子军中拿了一阵子鹅毛扇。现在又来到北京，说什么旧国会制的宪法不合民意，要创办什么"国民制宪倡导会"。哈哈！这位先生心中的民意，真是五光十色哩！

军 民 分 治

军人是对外用的，在国内政治上，他没有地位。现在政府里人和在野政客，都把"军民分治"四字挂嘴上，当作最时髦的政策。殊不知野蛮国只有军治，文明国只有民治。地方治安，应该是地方官的责任。请问民治以外，军治是什么？全国的海陆军，都应当隶属中央，不当分属地方(就是联邦制，地方政府也不养兵)。所以什么"军民分治"，什么"划分军区"，都是根本的错误。

到底是那一团利害？

议员本代表国民的，却受了督军的指挥，反对曹汝霖做交通总长。

曹汝霖却知道这一团不及那一团利害，所以外国人便提议京奉路全部取现。一个国务员同意案，暗中也有两团势力的竞争，这国会成个什么国会！政府成个什么政府！

得众养民

前月十八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开口便说道："道以得众为先，政以养民为本。"按共和国没有皇帝，不是家天下，不知什么人想得众做什么？共和国人民是靠自己养自己，不靠人养的，更不要官养的；不但不要官养，并且出租税养了官。我们中国的人民不但养了官，还养着许多官来残害人民。啊呀！少发点纸票子来骗人民的钱(用出算一元，收入只算四角几分，不是骗钱吗?)，少招点士兵来伤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就算是阿弥陀佛了！如今没有什么圣祖高皇帝，什么圣祖仁皇帝，用不着什么"抚育元元"，"加惠黎庶"的恩诏！

谁是匪

各省的匪多极了。政府要打算除暴安良，剿匪，诚然是顶要紧的事。但是这件事不自今日才要紧，也不是陕西、福建更要紧。南方收容了卢、樊等匪，本来不对。但是有曾经政府任命的两位鼎鼎大名巡阅使原来又是什么出身呢？如今果然要剿匪？当真要剿匪？那我就举起双手赞成！

国防军

国家养兵，本来都是为国防用的。现在又要新招什么国防军，那末其余的军队，留做什么用处呢？叫做什么名目呢？难道叫做"家防

军”吗？

军人与官僚

野蛮的军人，腐败的官僚，都是国民之仇敌。但是两样比较起来，军人更觉可怕，可厌。同是可怕可厌的军人，我们觉得那不曾倡首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不曾阴谋复辟，不曾加入督军团来逼着总统解散国会的，比较还好一点。

武治与文治

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敌党；或者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收人民的膏血；或者是做几道命令，来兴办教育工商业，讨外国人的好；做几道命令，来提倡道德，提倡节孝，提倡孔教，讨社会上腐败细胞的好。武治主义，文治主义，当真是这样吗？

尊孔与复辟

照孔圣人的伦理学说，政治学说，都非立君不可；所以袁世凯要做皇帝之先，便提倡尊孔。现在内务部又要把颜元李塨二人从祀圣庙，政府里居然准了，因此下了道命令，说些什么孔子道赞化育，陶铸群伦，“重儒修，明正学”（邪学是什么？），“入德即在彝常，导世先端教化”的话。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意思？

安徽小鬼

章太炎因为安徽人在政治上造的罪恶太多了，逢人便骂“安徽小鬼，没有一个好东西”！现在别的方面不用说了；单说自称人民代表的先生们，北京某俱乐部的重要分子，不大半是我们贵省人吗？安徽省议员，不是奉承倪嗣冲通过了《盐斤加价》的议案了吗？我想章老先生的话真正不错。

1919年1月5日 《每周评论》第三号 署名：只眼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

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1919 年 1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对于梁巨川[1]先生自杀之感想

梁巨川先生自杀前一个月，留下《敬告世人书》一篇，说明他自杀的宗旨，现在把这书中最紧要的几处录在下方：

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今人为新说所震，丧失自己权威。自光、宣之末，新说谓敬君恋主为奴性，一般吃俸禄者靡然从之，忘其自己生平主意。苟平心以思，人各有尊信持循之学说。彼新说持自治无须君治之理，推翻专制，屏斥奴性，自是一说。我旧说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纪纲，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

今吾国人憧憧往来，虚诈惝恍，除希望侥幸便宜外，无所用心；欲求对于职事以静心真理行之者，渺不可得。此不独为道德之害，即万事可决其无效也。夫所谓万事者，即官吏军兵士农工商，凡百皆是。必万事各各有效，而后国势坚固不摇。此理最显，我愿世界人各各尊重其当行之事。我为清朝遗臣，故效忠于清，以表示有联锁巩固之情；亦犹民国之人，对于民国职事，各各有联锁巩固之情。此以国性救国势之说也。

梁先生自杀的宗旨，简单说一句，就是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堕落。他这见解和方法，陶孟和先生已有评论；况且他老先生已死，我们也不必过于辨论是非了。我现在要说

---

① 梁漱溟之父。

的，就是在梁先生见解和方法以外的几种感想：

第一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杀，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新时代的人物，虽不必学他的自杀方法，也必须有他这样真诚纯洁的精神，才能够救济社会上种种黑暗堕落。

第二感想，就是梁先生主张一致，不像那班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的职务，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这种人比起梁先生来，在逻辑上犯了矛盾律，在道德上要发生人格问题。

第三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以身殉了他的主义。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伦常挂在口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

第四感想，就算梁先生是单纯殉了清朝，我们虽然不赞成；然而他的几根老骨头，比那班满嘴道德暮楚朝秦冯道式的元老，要重得几千万倍。

第五感想，就是梁先生《敬告世人书》中，预料一般人对他死后的评论，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实在是遗憾千万！

1919 年 1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答王禽雪(摆脱奴隶性)①

禽雪先生：

国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乃国人于一切事物，无论好歹，凡是古代遗留者，均以“保存国粹”为前提，不许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议，其弊将不可胜言。足下既从事贫民教育当教以劳工之尊严，摆脱一切奴性，不但国粹一端已也。

独秀

1919年1月15日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吕澂(美术革命)

吕澂先生：

本志对于医学和美术，久欲详论；只因为没有专门家担任，至今还未说到，实在是大大的缺点。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足下能将对于中国现在制作的美术品详加评论，寄赠本志发表，引起社会的讨论，那就越发感谢了。说起美术革命来，鄙人对于绘画，也有点意见，早就想说了；如今藉着这个机会，正好发表出来，以供国内画家的讨论。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这是什么理由呢？譬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钞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中国画在南北宋及之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谭叫天的京调，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里人的两大迷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许人说半句不好的。绘画虽然是纯艺术的作品，总也要有创作的天才，和描写的技能，能表现一种艺术的美，才算是好。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题”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到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却要把王画当作画学正宗。说起描写的技能来，王派画不但远不及宋元，并赶不上同时的吴墨井(吴是天

主教徒，他画法的布景写物，颇受了洋画的影响），像这样的画学正宗，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至于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画，他那幼稚和荒谬的地方，和男女拆白党演的新剧，和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宗译的新小说，好像是一母所生的三个怪物。要把这三个怪物当作新文艺，不禁为新文艺放声一哭。此覆还求赐教。

独秀

1919年1月15日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答黄介石(老套头的修辞学试题)[1]

足下这封通信,真是令我无从回答。我读了某校修词学的试题,有几层感想:(一)觉得这试题,不是现代学校试验国文的题目,仍旧是古代科场策问的老套头。(二)我想全班学生,总有一大半人不知道这题目问的是什么。(三)全题所论,多半是文章的派别和变迁,当是这位先生自家见解的修辞学,和西洋的 Rhetoric 不是一物。(四)修辞学只限于骈文,当云"骈文修辞学",不当泛称修词学。以骈文为文章之全称名词,在名学上说不过去。(五)今天才晓得中学学生多半国文还不能通顺的缘故。这班国文教习,真是"误人子弟……"了。

独秀

1919 年 1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①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除 三 害

我刚写出这题目，有一位朋友见着，说：你是做戏评吗？我说：不是评那戏台上的旧戏，是评这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戏。朋友说：你莫非要骂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么？我说：不是，不是。你别忙，听我细细评论这中国的三害：

第一是军人害。世界上的军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中国的军人算是更坏。威吓长官、欺压平民、包贩烟土、包贩私盐，只要洋枪在手，便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那为首的好汉，还要藉着这班"官土匪"的势力，来逼迫总统，解散国会，抢夺军械，把持政权，破坏法律。直弄得全国人民除军人外都没有饭吃。这不是中国的大害吗？

第二是官僚害。我所说的官僚，并不是政治学上所谓"官僚政治"的官僚。官僚政治，是中央地方所有的行政都归官办，自然不及人民自治的政制完善，却非那官僚本身的罪恶。我所说的官僚乃是中国式的官僚。一生的志愿，长在谋官做刮地皮，逢迎权贵，欺压平民。国法是什么，官规是什么，地方的利弊是什么，人民的苦乐是什么，一概不问；一心只想发点财，回家享福。其中厚脸的角色，还要自夸有经验，重道德。拼命的勾结门生故旧，把持政权。拼命的抑制那新思想，新人物，不许他丝毫发展。不问是前清的旧官僚，或是民国的新官僚，不问是目不识丁的蠢物，或是学贯中外的名流，但凡官僚犯了以上所说的毛病，我就认定他为害中国不在军人之下。

第三是政客害。政客先生们口里也说军人和官僚不好。我们当初也只望他们比军人官僚稍胜一筹。照他们现在的行为看起来，实在令人不敢佩服。其中固然不能说没有好人。但是大多数的政客，有的是依附军人的新官僚，有的是混入政客的旧官僚，有的是改扮政客的军人。满口的政治法律，表面上虽然比军人官僚文明的多，但是用X光

线一照，他们那抢钱抢位置的心眼儿，都和军人官僚是一样。跑到北方就说要保全中央的威信，跑到南方就说要护法。到了和他位置有关系的时候，什么中央威信，什么护法，都可以牺牲的。这几年，政治的紊乱，就说不是他们兴风作浪，却未见那一党那一派的政客，堂堂正正的发表政见，诉诸舆论，来贯彻他的主张，都是鬼鬼祟祟的单独行动，东去运动督军，西去联络名流，忙着开什么和平会，把疏通一切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当作将来自己做总理，做总长，做次长，做省长，做道尹，做县知事，当厘金差事的手段。把这班政客烧成了灰，用五千倍的显微镜，也寻不出一粒为国为民的分子来。

并不是我好张口骂人。我们问问良心：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

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1919 年 1 月 19 日 《每周评论》第五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必须经过合法的手续，方能成立，断不许所谓名流私人集合可以冒充的。最奇怪是朱代表电请国务院派周自齐、林长民到南方筹办国民大会。分明由政府委员组织私人团体，硬说是国民大会，硬说是有仲裁两方面争执的资格，恐怕国民不能承认罢。

鸦片与纸票

上海烧了存土一千多箱，北京中交纸票渐渐涨价，总算是现政府办了两件差强人意的事。但是甘肃、陕西、云南等省，仍旧烟苗遍地；丘八贩烟土，无人敢问；吗啡的坏处，比鸦片还要利害；湖南、湖北的纸票，真是商民的大害：像这些事，才是政府份内应该办理的。比那异想天开的重道德尊孔教的命令，正当得多，有益得多。

1919年1月19日 《每周评论》第五号 署名：只眼

烧 烟 土

此次烧毁上海存土，我总以为是正当办法。第一理由，就是可以表示政府禁烟的决心。第二理由，就是这种害人的毒物，除去一点好一点。但是有许多人主张不烧，把他送给欧美红十字会。他们主张的理由，是说把许多值钱的烟土，平白地烧了，不合经济原则。我说这土若不烧毁，万一私下卖出去，吸烟的人越多，国民生产力越发低减，这又合经济的原则吗？

有的人说：各省烟苗和存土多得很，单烧这点土没用处。我说：不然，譬如有人说，世上做恶事的人多得很，我从前做这点恶事不打紧。象这种见解能算不错吗？

有的人说：把这土送红十字会，做欧战养恤伤兵的费，也算稍尽参战的义务，比烧了不好吗？我说：红十字会收了这大宗烟土，还是做药，还是卖给人吸呢？若说做药，拿许多烟土来做药，真是骇人听闻。税务司答万国禁烟会代表徐维绘的话道："把关栈中充公司私土，赠送诸协约国红十字会，已绰乎有余。"若是还卖给人吸，这种参战的义务不尽也罢。

最奇怪是讲礼法道德的康南海，也反对焚土，打电报给政府，说什么"政贵有渐"，"果决非行人之宜"。又说"验土恐展转株连，将别成巨案"，主张把存土分送罗斯福的家属，和红十字会，其余的用作赈济川湘难民，立大学，开马路。我不说别的刻薄话，只问康先生一句，应该用什么方法，把烟土变成金钱，来做这许多好事？

令人万分难解的，就是以禁烟为目的之万国禁烟会和普益禁烟会，也反对焚土。那普益禁烟会的代表肖同荣，公然在会场偷取烟土。这事如若不假，他们反对焚土的意思，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又有一种反对焚土的见解，说是上海存土，已经有短少掺假的弊

病，现在想烧了灭迹。中国官场作弊的本领太大，肖同荣偷土的事，正是因他查的太严，故意栽诬他的。所以不如送给红十字会，将来还可以发见存土损失的证据。这种理由，颇有研究的价值。但是我也有几种疑问：

第一，除唐少川的电报有"隐没贿据之疑问"外，其他团体，并没有堂堂正正发表存土的黑幕，主张必须交红十字会，方免烧土灭迹的疑问。

第二，康南海反对焚土电中，说"验土恐展转株连，将别成巨案"，却是烧土反不能灭迹的见解。

第三，肖某偷土既是打算焚土灭迹的人的栽诬，他何以不发表焚土灭迹的黑幕？何以普益禁烟会长声明："肖同荣原非本会中人，更无所谓本会代表，只据以伊系属土商出身，经人介绍为临时监视员"呢？

第一，我们希望的，是监视焚土的各团体，若真正见的焚土是隐没贿据的奸计，何妨明白反对，不必支支吾吾说什么"损失巨款""废物利用"的话。

第二，是政府的委员，要发点天良办理此事。不要因为贪贿赂或是怕得罪人，拿焚土禁烟的好名义把官场黑暗史上添一段纪事。

1919 年 1 月 26 日　《每周评论》第六号　署名：只眼



请问蒋观云先生

国事这样纠纷，立在主人地位的国民，理当出头过问。所以开合法国民大会的办法，我们并不反对。但是蒋观云先生寄某君的信中，所论国民大会，我们颇有不解的地方，现在写出几条，要请蒋先生指教：

一、先生所主张的国民大会，是合法的选举组织，还是不经过选举的自由集合？

二、选举的组织，自然是合法。但是中国土地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交通如此不便，若候国民大会来解决时局，是否时势所许？

三、若是自由集合，这会员的资格，是如何规定，从何处得来？国民有可以不守法律的万能吗？

四、若由教育会、商会、省议会，推选野贤组织，那非教育会、商会、省议会的国民，便没有推举代表的资格吗？那在野而不贤的老百姓，便没有说话的资格吗？这贤不贤的标准，又是何人用何法来核定呢？

五、若是野贤自由集合的团体，便打起国民大会的招牌。那我们各党各派非野贤的老百姓，都也来集合一个国民大会。那时有了《双包案》《三包案》的国民大会，好说那个是真那个是假呢？

六、蒋先生自己说“其意以为共和国家，主权在民。议员为人民代表，不许更有第二种人主持国是。吾以为共和国家，论理此言极是。”何以又骂他们是“议员皇帝”呢？

七、集会演说，做报评论，发电主张，不都是老百姓讲话的法子吗？何以必须设个非法的国民大会，才算是能讲话呢？

八、老百姓的发言权，固然无人能来剥夺，但是一部分的老百姓可以自居为全体老百姓来发言吗？

1919 年 1 月 26 日　《每周评论》第六号　署名：只眼

我的国内和平意见

（一）先 决 问 题

国内政治问题，或者是希望根本解决，造成永久的和平。或者是希望用和平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这两种的主张虽然不同，而放下战争的方法，用和平会议的方法来解决时局，算是全国一致了。

既然是全国一致赞成的和平会议，无论它组织的方法如何谬误，在政治史上总是一桩大事。我很尊重它，又很希望它，所以在各种问题之外，提出这先决问题。因为这种问题若不首先决定，这和平会议便没有成立的理由，和成功的价值。

第一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不要固执“中央威信观念”，南方不要固执“单纯的绝对的护法观念”。在政治学词典上，我们查不出“威”字的解说，这是不必讨论的了。说起这“信”字，却是政府存在的重要条件。象那曾经政府公布的约法和他种法律无论好歹，未经取消以前，都应该有效。又像那政府发出的纸币，写在纸面上是壹圆，收入的时候，也应该算壹圆。这才是政府的信用，应该保全的。如今那班督军们，不听政府命令，不守法律，自由行动。纸币壹圆用出，五六角收入。中央威信已经扫地，单单的为议和平统一起见，对于南方的要求，就要拿中央威信来拒绝，这不是活见鬼吗？再说到南方的护法主义，法律是国家存立的要素，那有反对护法道理。但护法不是单纯抽象的理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拿他当作帽子来加上压人的。要说绝对护法，应该在具体的内容上，加以分析的实际的批评，才是道理。若是单用抽象的护法调头，当作压倒一切的万能利器，那督军团也时常拿“国法”“法律”来吓人，能算他们是护法吗？而且国家成立和发达的要素，法律之外，还有政治。法

律以外的政治作用，固然是不宜轻视的危险物。法律以内的政治作用，却是不可轻视的。在新国家组织未备时代，占重要的位置（我们不反对南京临时约法，正是这个理由）。所以我劝南方护法诸公，不要拿抽象的护法招牌，来压倒一切。要从具体的事实上，想想自己所做所为，有无再要他人来护法的地方。再想想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当采用？所以我以为南方对于“单纯的绝对的护法观念”，应有几分觉悟。况且世上一切的争端，到了双方都承认议和，便双方都到了半降服的运命，双方都默认了有让步的条件。若是双方都执要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还是要武力解决，这和平会议便没有成立的理由。

第二先决问题，就是此次和平会议，应当把解决国家的重要根本问题，造成比较的永久和平为目的。不应当专在两方利害冲突的问题上着眼。两方的代表，应当打破代表南北当局的观念，应当发挥代表多数舆论的精神。若是因为发挥这种正大的精神，就是南方代表附和北方代表，北方代表附和南方代表，都不算失职。诸位代表先生们，若是把国家观念抛在九霄云外，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囚在“南北代表”四字以内，那一寸目光，转来转去，不离两方当局的利害（就是总统、副总统巡阅使督军善后军费等）。诸位中我虽有些朋友，也顾不得要送上一个徽号，叫做“南北当局的差官”，不能算是和平会议的代表。这会议也只好叫做“分赃会议”，不配说是“和平会议”。像这种分赃会议，在政治史上有丝毫价值吗？

1919 年 2 月 2 日 《每周评论》第七号 署名：只眼

（二）废督问题

废督军的办法，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除了和他饭碗有关系的朋友，可以说无人不赞成。我对于这个问题，不但是普通赞成，更是特别赞成。普通的赞成，不过把废督看作军制上行政上的问题。我却把废

督看作政治上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在一切政治法律问题之上。因为督军制度若不废去，无论中央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试问袁世凯死后，约法国会不都恢复了吗？后来怎么样呢？而且武人干涉政治，不但共和宪政不能实行，就是君主政治也不能成立。那唐代末年的藩镇，不正是榜样吗？

现在有一班拥护督军的朋友，看见主张废督的声势很大，面子上不好反对，便转一个弯，假藉那"军民分治"的招牌来搪塞。大家要晓得"军民分治"，乃是数年以来流行的政界一个极不通的名词。要拿他来代替现在的督军制度，正是拿半斤来换八两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在理论上"军治"二字不能成立。国家的海陆军，都是为对外的国防而设。至于对内，非因特别事变发生，是不能时常使用的。所以军人除了治军以外，不治别的什么。那军人除治军以外还要治民的"军治"制度，古今中外，只有三种。一是封建时代的国家，一是革命时代的临时组织，一是统治殖民地的制度。除这三种之外，"军治"制度，万万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事实。现在的中国，当然不是封建时代。督军制度，固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产生物。但是现在革命时代已过，此种临时组织，当然是宪法时代所断然不容存在的了。至于现在欧美日本各国统治殖民地的制度，像那印度总督，香港总督，安南总督，爪哇总督，菲律滨总督，台湾总督，朝鲜总督等，固然都是"军治"制度。但是他们这种制度，乃是战胜民族，对于被征服的殖民地的法子。我们若是采用这种制度，试问谁是战胜的民族(清室已经退位，难道在清朝做过官带过兵的，就是战胜的民族吗)？谁是被征服的民族？各省是谁的殖民地？我们被征服的小百姓固然程度不高，你们自居战胜的伟人阔老们，也要拿把镜子，照照自己又是怎样一副嘴脸！

第二在事实上，"军民分治"四字不能成立。地方行政，有了省长的民治，便无需督军的军治的，有了督军的军治，那省长的民治，便是军治的附属品，断然不能独立自主。试问现在各省的省长，有一个不是受督军指挥的秘书长政务厅长吗？有一个算得是独立自主的行政长官吗？省长既不能离开督军，独立自主办他的民治，这分治二字，是怎样说法呢？又有人说，若是实行督军专管军事，省长专管民事，这不是军民分

治吗？我以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话。军政长官若是专管军事，不问地方上的民事，那只可以叫做第几师的师长第几旅的旅长，断不能叫做某省的督军。师旅长所管是不分省界对外的国防军队，省长所管是划分省界的民政，这两样本来性质大不相同，只可叫做军民分“职”，不能叫做军民分“治”。照以上的理论和事实，断然不能拿军民分治的谬论，来保存这妨碍国家统一地方发展的督军制度了。

又有人说，废督的理由，固然充足。怎奈现在各督军的势力很大，事实上恐怕做不到。我以为却不尽然。这也可分为理论事实两方面的讨论。在理论上说起来，处置国事不像处置家事，应该大刀阔斧的，只问应做不应做，不问能做不能做。况且南北两方的当局，若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还有脸争着做总统，做总理组织政府吗？全国的国民，若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还只望在世界上组织一个共和立宪的国家吗？

在事实上说起来，南方各督军，既然以护法自命，这种不合法治的制度，总应该不主张保存的了。北方各督军像李纯、陈光远、王占元、鲍贵卿诸君，平时都很明白，总也能为大局牺牲个人的位置。至于安徽倪督军陕西陈督军湖南张督军，他们钱也刮够了，恶也作满了，藉这机会回家享福，总算他们的运气好，也未必定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况且这次取销督军，是制度上的改革，不是同个人过不去，也未必就会激成变故。若是他们定要把持权利，不顾大局。我们国民也应出点血汗，救出这军政统治之下被征服民族的地位。若是我们国民没有自救的力量，就用最后手段来请外国干涉，也未始不可。因为这种出于国民自动外国好意的干涉，虽然失点虚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若是恐怕损失主权，宁可容忍这妨害国家发达的督军存在，不情愿叫外国干涉。我断定将来兵日多，民日穷，政治越弄越糟，那实在的最大的损失主权之运命（就是亡国），不久便要落在我们富于虚荣、爱国心的国民头上！

我希望和平会议，劈头第一件就提出这废督问题。此事倘能办到，不但在政治史上开一新纪元。就是这次会议里不易解决的闽陕问题、各实力派地盘问题、罪魁问题、裁兵问题，都因此容易解决了。我更希望最贤明的云南唐督军，江苏李督军，出来极力提倡，以身作则，免得将来外国干涉，那就造福国家不浅咧。

废督的问题倘能决定，还有和这问题相联、应该注意的事：

一是如今不是驻防时代，各省的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应该和督军)同裁撤。北京的将军府，没什么职权，若是为安插裁撤的督军计，暂时存留到未始不可。否则也要撤。

二是废督后各省的军队，都应该改归中央政府的陆军部直辖，按数目字的顺序编定各师各旅的名称，万万不可分属各省。像那振武军安武军毅军荣字军等特别名目，更当一概取销。至于那不能编入正式军队的兵，只好遣散。这时陆军部的职权颇重，应当择那党派彩色稍淡的人做总长，才不启各省各派军人的猜疑。

三是废督后的军制，应该以师为单位，军长军司司令部，多是战争中临时组织，平时无设置之必要。就是因为敷衍几个资望较高的军人，不得不设立军长。也只能按着数目字的次序，叫做第一军第二军等，直隶中央政府。万万不可合几个行政区域划分军区，设立军区长。若是划分军区设立军区长，不叫做第几军军长。这便是恢复前清总督制度，这便是改每省一个小督军为数省一个大督军，这便是明白承认军人对于地方有管辖区域，这更是增加军人的大权，种下藩镇割据的祸根。近几年"划分军区"和"军民分治"都是很流行的时髦名词，其实都大错而特错。

四是师司令部或军事司令部，均不可设在省城及商埠。

五是各师旅的军饷，通由陆军部直接发给，不可向省长取用。

六是已裁的督军不可改为省长。就是不得已改为省长，也不可将他原有陆军改为警备队。倘用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废督等于不废。

七是交通部应当通饬各处电报局，以后除了紧急的军事，凡是军人发议论的通电，无论是非，一概不准传达。我们新闻记者，就是见了这种电报，也不该登在报上替他们传达。

1919年2月9日 《每周评论》第八号 署名：只眼

(三) 裁兵问题

照我们的理想，是反对战争，是完全去兵的主义。现在让一步说，

就算战争一时仍不能免，兵是不能全去。但是中国此时的军队不但兵数太多军费太大，我们国民担任不起。而且这全国无教育的兵队，那个配说是国防的正式军队，能够和外国打仗呢？国民拿出无数的血汗钱，来养这不能打仗，不能为国防，而且扰乱安宁秩序的军队，到是图什么呢？所以就地方安宁秩序说起来，就国民担负说起来，就国民生产力说起来，就整顿真正能为国防的军队说起来，都不能不将现有的军队全数裁去。至于正式的国防军队，只好日后另起炉灶，眼面前不必谈起。但是裁兵的理由，人人都晓得的。至于裁兵的办法，我却有几条意见，现在说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

一、全国兵队同时裁去，这是事实上断然做不到的事。如此必用分期裁减的方法。此时全国兵数约在百万内外。半年裁一次，一次裁十万，五年可以裁尽。

二、裁兵的次序，第一二期应该先裁此次南北开战以后新招的兵。像那国防军振武新军续招的军，更是不用说的了。第三四期应该裁的就是未曾编成正式的军队，像那定武军安武军营字军毅军等是也。第五六期要裁并的，乃是服装器械不完全的正式军队。第七八期就裁并那教育不完全的军队。最后就裁并那军官们军事教育不完全的军队。这时剩下的，或者可以加入新征募的编为正式陆军。

三、五年期内应当在中央政府常设一裁兵委员会。南北派出人数相等的委员，协商两方平均应裁的兵数，免得歧轻歧重，大家怀疑。

四、被裁的兵官，应该有相当的年俸。被裁的兵，应该有相当的遣散费。

五、移到边地开垦，开工厂令他们做工，送到外国做工，这些法子都比给费遣散好。

六、被裁的兵，万万不可改为警察或民团。

七、有地方自治会的议决，可以办民团，军械调遣都由地方官监督。那省长和县知事的警备队，万万不可以存在。至于地方上的治安，小事有警察，大事有民团，再大的事有正式军队，用不着什么警备队。

八、全国的兵工厂，应该统归中央政府的陆军部管理，不得分属地方。

九、未裁的兵，都应该改归中央政府管辖，重新按照部章编制。不可分属地方，加以某省的某师某旅某军各种名目。

十、五年裁尽后，倘然仍有军备的必要，那时精选有适当军事学的军官，重新创设常备陆军，也不算迟。至于那兵的来路、我很赞成前清末年半征半募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并非是强迫兵役，而可以得曾受教育的兵士。至于兵数，最多不能出二十师。因为服装器械教育完全的军队，那费用比现在的叫化子军队要多好几倍。二十师果然都是精兵，便和日本此时的兵力相等。至于对内，若是交通发达，便不必多养兵。

若是不能裁兵，不但国民的生计不了，这武人的特殊势力，更无法取销。这种特殊势力倘不能根本取销，去了袁世凯，又来了段祺瑞。去了段祺瑞，又来了陆荣廷。去了陆荣廷，以后还有无数的袁世凯、段祺瑞、陆荣廷，凭藉这为虎作伥的丘八爷，造成特殊势力，来扰乱政治。若是抛弃舆论的潜势力，藉重武人的特殊势力，无论违法护法都是对人问题，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共和宪政的根本障碍。

1919 年 2 月 16 日 《每周评论》第九号 署名：只眼

（四）国防军问题

在表面上看起来，国防军也是国内一种军队，应当裁去与否，可以和他种军队一样，归在裁兵问题内一同讨论。但是那里面复杂的情形，关系内政外交都十分重大。在和平会议，断不能不当作一个特别问题提出来研究的。

在内政上说起来，全国的海陆军，都是为国防用的，都应该归陆海军部节制。现在的国防军，单归一派人专利，而且不受陆军部的节制，和从前段祺瑞所反对的袁世凯的模范团是一模一样的。像这种有特别权利的国防军，不但南方不肯承认。就同是北洋的他种军队，也未必甘心容忍这种“只此一家并无分铺”的办法。而且此次南北战争，固然因为护法。其所以造成护法战争的原因，乃是段祺瑞用武力破坏国法压

迫南方的政策。现在段氏的政策既然不行，要让徐东海来用文治主义调和南北，以谋统一。那段氏当然要因为误用政策，负责而去，不干预政权才对。若是用换汤不换药的法子，由内阁一变而为参战处，再变而为国防军，大权独揽，雄视北方，中央政权，隐为操纵。在南方看起来，未免和当初战争目的太不相合。若是照这样议和下来，恐怕国防的效力和南方人政治活动的生机，都仍旧放在断头台上。南北和平统一的希望，难保不因此决裂。在北方看起来，陆军部国防军都在一系势力支配之下，不但别系的人不能安心，就是徐东海的政权，也恐怕朝不保夕。这都是国防军若不取消，在内政上必然发生的恶果。

在外交上说起来，原来这国防军，就是参战军的改名。参战军想受日本兵器兵费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军事协定的约束。说起军事协定，国民可为寒心。这件事原来是中日两国军阀野心的结托，假参战为名，一方是打算握大陆的兵权，一方是打算做国中的霸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苦的就是我们四万万被卖的人民。幸而欧战停止，参战军未能扩充，两国的军阀，还没有十分如愿。然而这国防军仍然是军事协定的余毒，所以顾、王两使要宣布那军事协定的秘密，两国的军阀都慌做一团。试问若没什么秘密不可告人的事，就是宣布又怕什么。这件事并不是我信口开河，请看本月初十的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曾说道："中日间现存的秘密协约和秘密决定，倘经中国委员在巴黎媾和会议提出，这都是前内阁援段主义的余殃。中日亲善上又筑一极大的沟渠，实在不胜遗憾。中国北京军阀派段、张、倪、徐等，不察世界大势，还想提用前内阁时代所缔结参战借款的余额一千七百闹到俄、德两国的现状，没有你们什么好处。我们更要奉劝段氏，他本来是位老实很有人望的军人，何苦始终为人利用，留下子孙万代误国的恶名！

1919年2月23日 《每周评论》第十号 署名：只眼

（五）国会问题

和平会议里的国会问题和宪法问题，都是法律问题。讨论这等问

题之先，要简单说点我对于法律的见解。我虽不藐视法律，也断然不迷信法律。我觉得这组织复杂的人类社会，除了国家制度以外，有许多用不着法律的地方。就是国家制度之下，那法律的用处和好处固然很多。而法律黑幕底下所藏的罪恶，也不算少。但是就国家制度和作用或人类社会他种结合看起来，若是没有法律来拘束人类行为的表面，那种争战状况，恐其比现在法律底下所藏的罪恶还要可怕。所以我以为在社会的里面，固然不能说法律万能。而社会的表面，却不能不尊重法律的假面。倘撕毁了这假面，我们利己损人的本性，更难以制止了。

假定这种见解，若不十分荒谬，这南北争持的国会问题，便容易解决了。解决的方法，就是北方应该用法律改变法律，不可完全拿一方面的事实，来破坏法律的假面。南方也应该只要保全法律的假面，不必完全拿一方面的理论，来束缚事实，造成破坏法律假面的时势。若是连法律的假面都不要，那便是专制，便是野蛮。若是以法律的假面为不足，定要死守刻板的法律，那便是司法界的法律，不是立法界和行政界的法律。两方面倘若都有这种觉悟，那国会问题，不就容易解决了吗?

新国会没有法律的根据，当然不能存在。若用特殊势力改变法律叫他存在，那么甲种特殊势力可以改变法律，同时乙丙丁各种特殊势力都可以改变法律。今日特殊势力可以改变法律，异日连续无穷的特殊势力都可以改变法律。撕破法律假面的国家，当然有这种紊乱的政象。若想保法律的假面，若想免紊乱的政象，若想谋永久的和平，这新国会断然不能不牺牲的。因为民主国法律假面的作用，和君主国皇帝的假面一样，若撕去不用，便无法统一这用强力相争的政局。

旧国会虽被非法解散，其精神上的生命，依然存在。现在反对旧国会存在的，也有几种理由，分别评论如下：

最普通流行的议论，是说按照法理，旧国会固然应当恢复。怎奈北派军阀绝对不赞成，事实上如何能恢复呢? 我以为就是抛弃法理单说事实也不能说旧国会绝对不可恢复。因为北派军阀反对恢复国会固是事实，南派军阀主张恢复国会也是事实。两个事实相消，一方面的事实，便不能当做充足理由了。

其次的说国会一经解散，和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我以为非法的解

散与合法的解散不同。集合体的国会和有机体的生物不同。人死不可复生，因为自然界的生物没有复生的可能性。国会虽解散，不能说人为的集合体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又其次的说议员已满法定期限，还要继续补足那未能行使职权的日期，各国无此前例。我以为这种见解，对于众议员虽有点理由，对于最近改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却是如何说法呢？

在消极方面看起来，这几种反对旧国会存在的理由，我都以为不大充足。但在积极方面，倘能够不撕破法律的假面，而可以消灭旧国会，我也未尝不赞成。现在再将各种处置旧国会的方法，分别评论如下：

主张最多最时髦的，就是新旧国会同时消灭，再用旧法招集新国会。我以为这话大大的不对。如今且不说照约法国会非法解散当然无效的话。现在不是革命开国时代可以先有政府后有国会，试问用旧法新招的时候，倘不撕破法律的假面，这招集国会的合法政府如何产生呢！

有人主张由和平会议修改国会组织法，然后由新法招集国会。这话更说远了。照这样办法，不但招集国会的政府无法产生，而且用非法机关变更法律，恐怕说不过去罢。

有人主张由和平会议承认一临时政府，由这临时政府用旧法招集新国会。我要请问和平会议这种特权，是何人所予？从何处得来？若照这样撕破法律假面的办法，自然是容易解决。

又有人主张把新旧国会合并起来，选举总统制造宪法，然后再按宪法招集新国会。我以为这种主张，更是奇怪，在理论上新国会无法律的根据，且凭空增加议员额数，旧法便完全破坏。在事实上这两种国会议员，如何能合在一处行使职权呢？

又有人主张新国会不必解散，惟在旧议员中或旧议员外加选西南几省议员，就算正式国会。这仍是保存新国会的办法，虽然是比现在各省议员的人数完全，而破坏法律假面的缺点，仍然如故。

以上各种主张都行不过去，除了由和平会议承认旧国会继续存在，没有办法。因为旧国会在法律上本来存在，但只除去政治上不能行使职权的障碍，便能在中央政府自由集合，无须招集。我们并非爱惜旧国会，不过爱惜法律的假面，主张用法律改变法律，不赞成用非法手段，轻

轻将他销灭，种下国家无穷的祸根罢了。

我们一方面固然希望反对旧国会的人，不要拿一方面的事实破坏法律假面。一方面也希望议员诸君，因为要保全法律的生命，不妨权且让事实的势力在法律假面底下活动。因此我以为旧国会固应当恢复。但是恢复之后，议员诸君也应该有几项公认的条件：

一、在广州续补的议员，不经过合法的手续，恐怕不能有效。

二、恢复后专办选举总统议决宪法二事，此外法律问题政治问题，都让下次国会讨论。

三、总统问题，只好迁就法律假面底下的事实势力，不可用理论来改变已成的事实。

四、关于宪法上前次争论未决的问题，研究国民两系，应该有互相让步的精神，好叫宪法早日成立。

五、参议院存废问题，应该用法律改变法律的手段，由国会本身解决。原来两院议员都从同一阶级的人民中重复选出（欧洲和日本的两院制，多半是贵族非贵族的区别。美洲上院是代表联邦。中国既非联邦，又无贵族，实无两院之必要。或者参议院由有产阶级选出，另用普通选举法，由无产阶级选出众议员，到是和缓社会革命一种法子。但是这种制度，欧美各国尚未能行，中国人听了更要害怕，所以现在也不必提起）。所以参议院实没有存在的必要。若由国会本身解决，改两院制为一院制。转瞬众院期满，再据宪法招集新国会，那历年纠纷难解的国会问题，不就根本解决了吗？

若不照我们这样主张，一方面定要撕破法律的假面，抵死不肯恢复旧国会。一方面不但要保全法律的假面，并且不承认法律假面底下的事实势力。漫说这都是办不到的事体，就是眼前勉强办到，成就了暂时的小和平，恐怕要酿成将来大不和平，请和平会议南北代表诸君十分注意！

1919 年 3 月 2 日　《每周评论》第十一号　署名：只眼

（六）宪 法 问 题

现在和平会议里所谓宪法问题，乃是制宪问题，不是讨论宪法的内容。我们倘有丝毫尊重法律的观念，前次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的宪法，

当然有效，这制宪问题，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万分想不到我们只顾自己的主观不顾法律客观的中国人，对于大部分已成的宪法，忽然不算，竟提出另外制宪问题。

我第一请问的，就是全国公认的正式国会所组织的宪法会议二读会所通过的宪法，有什么理由可以根本取消？若说有不满人意的地方，你们要晓得世界上就再过一万万年，也没有完全满人意的事，何况我们幼稚时代的立法事业。若是因为不满人意，就要根本取消，便永远没有公布宪法的日子。况且你们所谓不满人意的地方，尽可用合法的手续，一部分一部分的渐渐改造，也断没有轻轻的将全案一笔勾消，另起炉灶的道理。为那几条无用的宪法，也不知闹了多少闲气，才好容易通过了二读会。如今又要废掉从头再来一回，何以慰国民和友邦对于中华民国宪法成立的热望？

第二样要请问的，若废去已成的基础，另由新国会制宪，这新国会的本身有没有法律的根据？若在国会以外另创制宪机关，是否违法？

国会议宪的权柄，根据约法。非由国会用制宪的手续修改约法，当然不能在国会以外另设制宪的机关。约法诚然不满人意，他成立的手续诚然不完备。但是当时没有第二个合法的立法机关，自从开国以来，又没有第二种根本法。未经合法的手续修改以前，这约法当然完全有效。若随意说他无效，试问民国八年以来，根据约法所发生的对外条约对内法令有效无效呢？我想除了袁皇帝的余孽以外，没有人能说约法无效的。约法既然有效，旧国会便无法解散，国会制宪的权柄，也无法取消。

有一班人主张宪法应当由国民自己制定，不能委之国会。因为国会有政党作用，他们议定的宪法，是合于多数党的意思，不合于全国国民的意思。这话却似是而非：试问国民制议，是国民直接行动呢？还是用代表的方法呢？若是主张国民直接行动，我却十分赞成，这种办法若当真实行起来，恐怕他们要吓死。若是仍旧选举代表来组织一个制宪机关，却仍免不掉政党作用，和国会的性质和形式有什么分别？

1919年5月20日　《每周评论》第十八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呜呼特别国情!

租界上的领事裁判权和警察权,海关的协定税法,世界上受外国这种不平待遇的,现在只有我们中国一国。若问各国何以待我们这样特别,他们必定爽爽快快答道:就是你们常说的"中国有特别国情"的缘故。

公理战胜强权

我们对于参战,简直算没有出力。如今若在和平会议席上,提出无数的要求,固然可耻;但是在各国方面,要把这个理由来拒绝中国,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揭 开 假 面

协约国攻击德国的旗帜,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

谁 的 罪 恶?

政府令军警督察处检查军人私贩烟土,总算胆子不小。这位不会做官的马处长,却当真的去严行搜查;查出贩土的人不是师长的兄弟,便是阔人的马弁,弄得没有办法,听说要想辞职。禁烟本是一件好事,马处长总算一个好人,好人竟办不下这好事,请问是谁的罪恶?

1919 年 2 月 2 日 《每周评论》第七号 署名:只眼

威 大 炮

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

公 理 何 在

此次欧洲的大战,比利时真是义侠可风,牺牲的程度也算不小。如今会议席上,五强国竟垄断起来,可怜吃了千辛万苦的比利时,竟做了门外汉,连日本也比不上,试问公理何在? 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 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

光 明 与 黑 暗

近来日本黎明会里的人,是抱着"反对军阀专制,资本家专制"的新

思想。反对他们的守旧党，就是黑龙会里的人。这两边一黑一明的旗帜，到也鲜明。

特别国情

前筹安会的重要职员景耀月，近来发布他在国民制宪倡导会招待席上的演说。大意说是宪法要按照一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特别制定，不可模仿欧美的成法。我看什么共和，什么宪法，都是欧美人特有的制度。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都不必勉强学他。我劝景某还是拿古德诺“特别国情”的话头，去鼓吹帝制罢；何苦谈什么共和国的宪法呢？

1919年2月9日 《每周评论》第八号 署名：只眼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堕地之共和，根本摇动也。前以《东方杂志》载有足使共和政体根本摇动之论文，一时情急，遂自忘固陋，竟向《东方》记者提出质问。乃蒙不弃，于第十五卷十二号杂志中，赐以指教，幸甚，感甚。无论《东方》记者对于前次之质问如何非笑，如何责难；即驳得身无完肤，一文不值，记者亦至满意。盖以《东方》记者既不认与辜鸿铭为同志，自认非反对臣权自由，自认非反对立宪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不作与此冲突之言论；则记者质问当时之根本疑虑，涣然冰释，欣慰为何如乎。惟记者愚昧，对于《东方》记者之解答，尚有不尽明了之处；倘不弃迂笨，对于下列所言，再赐以答；则不徒记者感之，谅亦读者诸君之所愿也。

(1) 辜氏著书之志，即在自炫其二千五百年以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等之固有文明，对于欧人无君臣礼教之伦理观念，加以非难也。《东方》记者既郑重征引其说，且称许之，则此心此志当然相同。前文设为疑问者，特避武断之态度，欲《东方》记者自下判断耳。不图东方记者乃云："夫征引辜氏著作为一事，与辜同志为又一事；二者之内包外延，自不相同。"此何说耶？夫泛泛之征引，自不发生同志问题。若征引他人之著作，以印证自己之主张，则非同志而何？譬若记者倘征引且称许尼采之"强权说"或托尔斯泰之"无抵抗说"，当然自认与尼采或托尔斯泰为同志，以其主张之宗旨相同也。记者未云：辜鸿铭主张君臣礼教，《东方》记者亦主张君臣礼教，由是而知《东方》记者即辜鸿铭。且并未云：《东方》记者乃辜鸿铭第二。但以《东方》记者珍重征引辜氏生平所力倡之言论宗旨，且称许之，遂推论其与辜为同志。倘谓此二者内包外延自不相同，所推论者陷于谬误；则此等逻辑，非记者浅学所可解矣。

（2）德国政体，君主政体也；孔子伦理，君臣等之五伦也。君臣尊卑者，孔子政治伦理之一贯的大原则也。辜鸿铭、康有为、张勋皆信仰孔子之伦理与政治，主张君主政体者也：此数者本身之全体，虽为异物，而关于尊重君主政体之一点，则自然互相连缀；《东方》记者倘承认吾人思想域内有观念联合之作用，自不禁其并为一谈。德国政体，君主政体也；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此二者，当然可并为一谈。辜鸿铭所主张之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其所同情之德国政体，君主政体也。此二者，当然可并为一谈。辜鸿铭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张勋之所言，亦尊孔也，尊君也：此二者，更无不可并为一谈。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张勋所言所行，亦尊君也：当然可作一联带关系。此数者，关于尊重君主政体之一点，乃其共性；苟赞同其一项者，则其余各项，当然均在赞同之列。诉诸逻辑，“凡尊崇孔子伦理，而不赞同张勋所言所行，为其人之言不顾行者也”。《东方》记者对于前次之质问，未曾将此数项所以不能并为一谈之理由，及各项中赞同者何项，不赞同者何项，一一说明。但云：“对于《新青年》记者所设问题，以为过于笼统，不能完全作答。”《东方》记者之答词，如此笼统；则《新青年》记者，未免大失所望。

（3）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与功利主义，在形式上虽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时产生，其相互关系之深，应为稍有欧洲文明史之常识者所同认也；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此所以欧洲学者或称宪法为国民权利之证券也。不图《东方》记者，一则曰：“欧美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之说，非功利主义所能赅括；吾国人之为此，则后于功利主义。”再则曰：“夫批评功利主义之民权自由，非反对民权自由，批评功利主义之立宪共和，非反对立宪共和。”是明明分别功利主义之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与非功利主义之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为二矣。以记者之浅学寡闻，诚不知非功利主义之民权自由立宪共和果为何物也。《东方》记者以应试做官之读书及金钱运动之选举，比诸功利主义之民权自由立宪共和，斯亦过于设解功利主义，拟不于伦矣。《东方》记者谓可以逻辑之理审察之，则所谓逻辑者，其《东方》记者自己发明之形式逻辑乎？否则应试做官之读书，乃读书者腐败思想；金钱运动之选举，乃

选举中违法行为；功利主义之所谓权利主张，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等，乃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中重要条件；若举前二者以喻后者，为之例证，诉谓因明与逻辑，得谓为不谬于事实之喻与例证乎？

（4）通常所谓功利主义，皆指狭义而言；《东方》记者之所非难者，亦即此物，此不待郑重声明者也。惟广狭乃比较之词，最广与最狭，至于何度，是固不易言也。余固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者，原无广狭之见存。盖自最狭以至最广，其间所涵之事相虽殊，而所谓功利主义则一也。《东方》记者所排斥之功利主义，与余所颂扬者虽云广狭不同；即至最狭，亦不至与其相反之负面同一意义。但在与其负面相反以上，虽最狭之功利主义，与《东方》记者所排斥者同一内包外延，余亦颂扬之。盖以功利主义无论狭至何度，倘不能证明其显然为反对之罪害事实，无人能排斥之也。倘排斥之，自不能不立于与其相反之地位。《东方》记者乃不谓此推论为然，且设一例证云："凡反对图利之人，即赞成谋害者；凡反对贪功之人，即赞成犯罪者。"此推论果合乎否乎？余则以此不足为非反对功利主义，即赞成罪害主义之证明。盖以功利主义与图利贪功，本非一物；若以恶意言之（既以其人谋利贪功而反对之，必其为不应谋而谋，不应贪而贪之恶方面也），且与功利主义为相反之负面。审是，则图利与谋害，贪功与犯罪，同属恶的方面，而无正负之分，固不能谓反对其一者必赞成其一；若夫功利主义之与罪害主义，为相反之正负两面，反对其一者为赞成其一，不容两取或两舍也。《东方》记者，以此例证批评记者推论之不合，合前条所举之例证观之，得发见其有一公同之误点。其误点为何？即《东方》记者不明功利主义之真价值，及其在欧美文明史上之成迹；误以贪鄙，不法苟且，势利之物视之；其千差万错，皆导源于此。《东方》记者，倘亦自承之乎？

（5）自根本言之，学术无所谓高深；其未普及之时，习之者少，乃比较的觉其高深耳。且今日柏格森之哲学，可谓高深矣；乃其在大学公开之演讲，往各国游行之演讲，听众率逾千人；贩夫走卒，亦得而与焉。此非高深亦可普及之例乎？况《东方》记者以高深学术为教育文化中心之说，记者本不反对。特以其专重高深之学，而蔑视普及教育，遂不无怀疑耳。明言"教育普及而廉价出版物日众，不特无益学术，反足以害

之。"此非谓教育普及廉价出版物日众，为有害学术之事乎？谓为有害学术，非反对而何耶？不图《东方》记者复遁其词曰"所谓廉价出版物之有害学术者，自指勃氏所言之书报及坊肆中诲盗诲淫之书而言。"夫诲盗诲淫之书，与廉价出版非同一物，与教育普及更毫无关系。今反对诲盗诲淫之书，不知以何缘因而归罪于廉价出版？更不知以何因缘而归罪有教育普及？《东方》记者倘承认其因噎废食之推论为不谬，最好再归罪于苍颉之造字。《东方》记者强不承认明说"教育普及，廉价出版物日众，有害学术"，为反对教育普及之言，已觉可怪；复设一相类之例以自证曰："民国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言论荒谬，如某日报之鼓吹某事，杂志之主张某说。"云云。则此例中所指为言论荒谬者，自然指某日报某杂志而言。若以此例所言为"反对民国，反对出版物，以定期出版物为荒谬。"果当乎否乎？！

余以为《东方》记者此等例证，只益自陷于谬误而已，未见其能自辨也。此例之文倘改曰："自民国成立以来，定期出版物日众，其中佳者固多，惟言论荒谬如某日报之鼓吹某事，某杂志之主张某说。"此不过泛论当时出版界之现象，或无语病之可言；因其所谓荒谬者，乃专指某日报某杂志而言，与民国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不生因果联带之关系也。今《东方》记者所设之例，其本意之反对民国反对定期出版物与否不必论；第据其例词，显然以民国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为之因，以某日报某杂志之言论荒谬为之果；二者打成一片，未尝分别其词，虽欲谓之非反对民国非反对定期出版物而不可得也。以此比证前例，亦以教育普及而廉价出版物日众为之因，以有害学术为之果，虽欲谓之非反对教育普及而不可得也。倘易其词曰："教育普及而廉价出版物日众，学术因以发展；惟若勃氏所言之书报及坊肆中诲盗诲淫之书，则不特无益学术，反足以害之。"使《东方》记者如此分别言之，不使诲盗诲淫有害学术之书，与教育普及廉价出版发生因果联带之关系，虽欲谓之反对教育普及而亦不可得也。

(6) 学术之发展，固有分析与综合二种方向，互嬗递变，以赴进化之途。此二种方向，前者多属于科学方面，后者属于哲学方面，皆得谓之进步，不得以孰为进步孰为退步也。此综合的发展，乃综合众学以成一家之言；与学术思想之统一，决非一物。所谓学术思想之统一者，乃

黜百家而独尊一说，如中国汉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欧洲中世独扬宗教遏抑学术，是也。易词言之，即独尊一家言，视为文明之中心，视为文化之结晶体，视为天经地义，视为国粹，视为国是；有与之立异者，即目为异端邪说，即目为非圣无法，即目为破坏学术思想之统一，即目为混乱矛盾庞杂纠纷，即目为国是之丧失，即目为精神界之破产，即目为人心迷乱。此种学术思想之统一，其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乃现代稍有常识者之公言，非余一人独得之见解也。

《东方》记者之所谓分化，当指异说争鸣之学风，而非谓分析的发展；所谓统整，当指学术思想之统一，而非谓综合的发展；使此观察为不误，则征诸历史，诉之常识，但见分析与综合，在学术发展上有相互促进之功；而不见分化与统整，在进化规范上有调剂相成之事。倘强曰有之，而不能告人以例证，则亦无征不信而已。反之统整（即学术思想之统一）之为害于进化也，可于中土汉后独尊儒术，欧洲中世独扬宗教征之。乃《东方》记者反称有分化而无统整，不能谓之进步；且征引“中国晚周时代，及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之文明，分化虽盛而失其统整，遂现混乱矛盾之象”以为例证。夫晚周为吾国文明史上最盛时代，与欧洲近代文明之超越前世，当非余一人之私言。不图《东方》记者因其学术思想不统一也，竟以“混乱矛盾”四字抹杀之；且明言以晚周与汉、魏、唐、宋比较其文明，不能谓其彼善于此；诚石破天惊，出人意表矣。即以汉、魏、唐、宋而论，一切宗教思想文学美术，莫不带佛、道二家之彩色；否则纯粹儒家统一，更无特殊之文化可言。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东方》记者之所见，奈何正与历史之事实相反耶？《东方》记者又云：“至于文明之统整，思想之统一，决非如欧洲黑暗时代之禁遏学术，阻碍文化之谓，亦非附和雷同之谓。”按欧洲中世所以称为黑暗者无他，以其禁遏学术阻碍文化故。其所以禁遏学术阻碍文化者亦无他，乃以求文明之统整思想之统一故。夫统一与黑暗，皆比较之词；黑暗之处，乃以统一之度为正比例；一云统一，即与黑暗为邻，欧洲中世特其最甚者耳。《东方》记者倘不以欧洲黑暗时代之禁遏学术，阻碍文化为然，亦当深思其故也。《东方》记者以“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为高；复以

"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为贵;此非附和雷同而何?此非以人间思想界为留声机器而何?《东方》记者意谓:吾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本有圣经贤传名教纲常之统一的国是;今以西洋学说之输入,乃陷于混乱矛盾,乃至国是丧失,乃至精神界破产;遂至希此"强有力主义,果能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以暂定一时之局"。此非禁遏学术阻碍文化而何?

《东方》记者一面言:"吾人不宜仅以保守为能事。""西洋学说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迎。""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一面乃谓:"西洋在中古以前,宗教上之战争与虐杀,史不绝书;其纷杂而不能统一,自古已然。文艺复兴以后,思想益复自由;持独到之见以风靡一世者,如卢骚、达尔文等,代有其人;而集众说之长,立群伦之鹄者,则绝少概见。"(记者按:西洋学者,若康德、孔特、卢骚、达尔文、斯宾塞之流,莫不集众说以成一家言,为世宗仰;只以其族尊疑尚异,贵自由独到,不欲独定一尊,以阻碍学术思想之自由发展,故其新陈代起,日益美备。《东方》记者乃以其不独定一尊,谓为立群伦之鹄者绝少概见,其病在不细察文化之实质如何,妄以思想统一与否定优劣,不知适得其反也。)又谓:"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亡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盖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吾人乃希望藉西洋文明以救济吾人,斯真问道于盲矣。西洋人之思想,为希腊思想与希伯来(犹太)思想之杂合而成;希腊思想,本不统一;斯笃克派与伊壁鸠鲁派,互相反对;其后为希伯来思想所压倒。文艺复兴以后,希伯来思想又被希腊思想破坏;而此等哲学思想,又被近世之科学思想所破坏;今日种种杂多之主义主张,皆为破坏以后之断片,不能得其贯串联络之法,乃各各持其断片,欲藉以贯彻全体,因而生出无数之障碍。故西洋人于物质上虽获成功,得致富强之效,而其精神上之烦闷殊甚。"(按:《东方》记者所非难之西洋文明,皆在中古以前及文艺复兴以后,殆以其思想不统一之故乎?独思想统一之中古时代,则未及之。不知《东方》记者之所谓宗教上之战争与虐杀,正以正教统一,力排自由思想之异端,造成中古黑暗时代耳;此非中古以前文艺复兴以后之所有也。)似此一迎一拒,即油滑官僚应付请托者之言,亦未必有此巧妙也。若此等"战争与虐杀"之文明,"自陷于混乱矛盾"之文明,"破坏以后之断片"之文明,致"精神上烦闷"之文明,

《东方》记者明知其不足为“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乃偏欲尽力输入而欢迎之；是直引虎自杀耳，岂止“问道于盲”已耶？《东方》记者其狂易耶？不然，明知“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何苦又主张尽力输入而欢迎之？不更使吾思想界混乱矛盾不能统一，使吾精神界破产，使吾国是丧失耶？是则愚不能明也。

若云：“西洋之种种主义主张，骤闻之，似有与吾固有文明绝相凿枘者；然会而通之，则其主义主张，往往为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扩大而精详之者，”耶？若假定此等“丙种自大派”(见本志第五卷第五号五一六页第十三行)之附会穿凿为不谬，则《东方》记者所诅咒西洋文明之恶名词，皆可加诸吾固有文明之上矣。既认定其为吾固有文明之一部，且扩大而精详之，又何独以其在西洋而诅咒之耶？若云：“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耶？将输入其同者而融合之乎？使其所谓同者为非同，则附会穿凿耳；使其所谓同者为真同，则尽力输入为骈枝，为多事。将输入其异者而融合之乎？则异者终不能合，适足以使吾人思想界增其混乱矛盾之度，非所以挽回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而为吾人迷途中救济之道也。无已，惟有仍遵《东方》记者“不希望于自外输入西洋文明”之本怀，且用“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之方法，使吾国数千年统整之文明不至摇动；则《东方》记者之主张，方为盛水不漏也。

《东方》记者又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呜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 Dcemocoa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倘由《东方》记者之说，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则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

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实不至之国体而论，亦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盖国体既改共和，无君矣，何谓君道？无臣矣，何谓臣节？无君臣矣，何谓君为臣纲？如何融合，如何会通，敢请《东方》记者进而教之，毋再以笼统贪混之言以自遁也。若帝制派严复"大总统即君"之谬说，乃为袁氏谋叛之先声；今无欲自称帝之人，《东方》记者谅不至袭用严说，重为天下笑欤！

就历史上评论中国之文明，固属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儒家又属中国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此种过去之事实，无论何人，均难加以否定也。至若《东方》记者所谓：《新青年》于"共和政体之下，不许人言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又云"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乃已往之事实，非新青年记者所得而取消。已往之事实既不能取消则不能禁人之记忆之称述之"，斯可谓支吾之遁词也矣。吾人不满于古之文明者，乃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会耳，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值；更不能谓古代本无其事，并事实而否认之也。不但共和政体之下，即将来竟至无政府时代，亦不能取消过去历史中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及其他种种黑暗之事实。若《东方》记者之所云，匪独前次质问中无此言，即全部《新青年》亦未尝有此谬说。前次质问中所谓：共和政体之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者；乃以《东方》记者力言非统整已国固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文明，不足以救济精神界之破产，不足以救济国是之丧失，不足以救济国家之灭亡。然若实行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恢复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图思想之统整，以救国家之灭亡；则无君臣之现行制度，不知将以何法处之？疑不能明，是以为问。非谓吾固有文明中无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而欲取消历史上已行之事实，禁人记忆之称述之也。《东方》记者所谓焚书坑儒；所谓前清专制官吏，动辄以大逆不道谋为不轨之罪名，压迫言论；此正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时代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者之所为；而混乱矛盾之共和时代，或不至此。公等倘欲享言论自由之权利而恶压迫，慎毋反对混乱矛盾之西洋文明，慎毋梦想思想统整，而欲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以自缚束也。

(7)《东方》记者所谓"原文明言强有力主义之不能压倒一切反足酿乱"。今细检原文,未见有此。有之则所谓"特恐其辗转于极短缩之周期中,愈陷吾人于杌臬彷徨之境耳"。于表示欢迎之下,紧接此词;盖惟恐其寿命不长,未能压倒一切为憾;固非根本反对强力主义,谓为足以酿乱也。其他极力赞扬之词则曰:

> 强有力主义者,……即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之谓。当是非淆乱之时,快刀斩乱麻,亦不失为痛快之举。……古之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百家竞起,异说争鸣;战国时代之情状,殆与今无异;焚书坑儒之暴举,虽非今日所能重演;而如此极端之强有力主义,实令后世之人,有望尘勿及之叹。今日之欧洲,又与我之战国相似,乃有德意志主义出现。……无所谓正,无所谓义,惟以强力贯彻者,斯为正义。……秦始皇主义,德意志主义,与我国现时政治界中一部分之强有力(当指段内阁而言)主义,实先后同揆。……秦始皇主义,在我国已经实验;虽获成功,不旋踵而殁;……然中国统一之局,汉室四百年之治,亦未始非始皇开之。德意志主义,正在试验时代,成败尚不能预料。吾人就历史上推测强力主义之效果,则当文治疲敝是非淆乱之时,强力主义出,而纠纷自解。……故我国之强有力主义,果能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以暂定一时之局,则吾人亦未始不欢迎之。

《东方》记者眼中之战国时代及欧洲现代之文明,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是非淆乱之文明也:颇希望强有力者,出其快刀断麻之手段,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以定于一。此言也,《东方》记者固笔之于书,谅非《新青年》记者推想之误;其是非可否,请读者加以论断,余则不欲多言矣。若余之所感者,乃《东方》记者所崇拜,所梦想,所称为"痛快之举"、"望尘勿及"、"纠纷自解"、"吾人未始不欢迎之"——之三种强力主义——其一秦始皇主义,固可以开汉室四百年统一之江山,颂其功德;其他二种强力主义,均已成败昭然,效果共睹;——坐令是非淆乱之今日,无有能快刀断麻,压倒一切,以定时局,以解纠纷者;吾知《东方》记者对于德帝威廉及段内阁,当挥无限同情之热泪也欤。

《工艺杂志》序文中所云:"虽周孔复生亦将无所措手。"固属述其当

年之感想；而后文对于自给自足之工艺，则仍谓亟宜提倡，未见取消前说；谓为反面文字，亦未得当。

(8) 所谓梦呓者，乃指《中西文明之评判》之著者日人而言。盖自欧战以来，科学、社会、政治，无一不有突飞之进步；乃谓为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非梦呓而何？正以此事乃稍有常识者之所周知，而况《东方》记者之博学方闻，宁不识此，故未详加事理上之诘责耳。何谓反唇相讥耶？

(9) 辜氏《春秋》大义主旨在尊王，并以非难欧洲人之伦理观念也。台里乌司氏亦谓欧洲文化，不合于伦理之用，而称许辜氏所主张之二千五百年以来之伦理为正当，是非崇拜君权而何耶？《东方》记者译录其说而称许之，故敢以辜氏伦理上之主张为正当与否为问。此何谓罗织？

(10) 辜氏谓中国人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而不注意于物质之一佐证。夫注意物质则洁，注重精神则不洁；独重精神者可与不洁为缘，重物质者则否。是以中国人以重精神故，致有不洁之癖，致有种种臭恶之生活；岂非精神之为物，我使中国人不洁至此哉？余是以有精神为何等不洁之物之叹也。

此外，若前次质问中之(5)、(6)、(7)、(13)、(14)、(15)等条，及(9)条中之第四项与第七项之前半段，并乞明白赐教；倘仍以"不暇一一作答"六字了之，不如一字不答也。

此中最要之点，务求赐答者，即：

(一) 自西洋混乱矛盾文明输入，破坏吾国固有文明中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遂至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国家将致灭亡。

(二) 今日吾人迷途中之救济，非保守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不可。

(三) 欲保守此固有文明，非废无君臣之共和制不可。倘废君臣大伦，便不能保守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便不能救济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国家灭亡。

此推论倘有误乎否耶？

1919 年 2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司令部土多

前几天《顺天时报》上，有一段日下三多的文章，说京中某司令部包贩烟土，司令部土多，是三多之一。查京中有两个司令部：一是京畿警备司令部，一是奉军驻京司令部。这土多的不知是那一个司令部？我要请问军警督察长和警察总监。

信实通商

如若有人想买鸦片土，可以送现洋四百五十元到东城某胡同某军机关处，比时就取得收条，烟土一百两随即送到。并且有了他发的收条，这烟土就算保了险，不怕警察查拿。这不算得信实通商吗？

理想家那里去了？

法兰西国民，向来很有高远的理想，和那军国主义狭义爱国心最热的德意志国民，正是一个反对。现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并且执政的多是社会党，很提倡缩减军备主义。而法兰西却反来附和日本、意大利，为着征兵废止、国际联盟、军备缩小等问题，和英美反对，竟使威总统有主张将平和会议迁移他国的风传。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

第一次警告

德意志未败的时候，协约国口口声声都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到了现在把从前说的话简直忘了。那武力称雄的迷梦，倘不彻底醒觉，恐怕这回过激派暗杀法国总理的事，乃是第一次警告！

不准百姓点灯

上海某报记者，曾经批评别的报不应该骂人，自己却时常大骂人而特骂人，并且时常用极轻薄的图画骂人。他又曾骂人独断，不懂得多方面的研究。而见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言论，便拿出独断的排斥的态度，怒目张筋、面红耳赤的大骂。却不守着多方面研究的方法，和反对派平心静气的讨论。这就是常言所道："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1919 年 2 月 23 日 《每周评论》第十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旧党的罪恶

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原。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中日亲善

欧洲和会，已有反对秘密外交的趋势。而口口声声说中日亲善的日本，偏偏不许我们宣布中日秘约。此次欧战，乃是公同对敌的义举。所以出力的各国，不曾向塞比、波兰要求酬报。而口口声声说中日亲善的日本，偏偏要把山东的铁道矿山，做青岛交还的条件。中日亲善，原来就是这样！

亡国与卖国

亡国总是一件不幸的事体，卖国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却不能因为亡在那一国，卖到那一国，在道路远近上，人种差别上，分别幸与不幸，好与不好。同一亡国卖国，若说亡在卖在道路较近人种较同的国家手里，就算是亲善，不算是亡国卖国，这个道理无人能懂。

铁道管理问题

中国现在及将来自己管理的铁道很少，大部分的管理权，都落在外人手里。同是外人管理，各国分管和国际公管，究竟有多大的利害分别呢？我以为只要运输权不落在外人手里，和其他用人行政上有相当的条件，就是归国际管理，也不能说照现在各国分管有弊无利。若不问青红皂白，提到国际管理，便一口断定是“亡国政策”、“卖国行为”，这个道理恐怕也无人能懂。

1919年3月2日　《每周评论》第十一号　署名：只眼



人种差别待遇问题

自正义公理人道而论，人种差别待遇，是应该反对的。所以我曾主张东洋民族应该在世界平和会议，提出人种平等的意见，合力要求（见二号《每周评论》社论）。日本特使居然在巴黎提议此案，当时我们听了，大为佩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又鬼鬼祟祟的自行撤回，我们听了，又大为失望。现在不知道又因为什么缘故，日本人又大吹大擂的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因为这问题，特地不满意于美国，更特地不满意于威尔逊总统。

在道理上说起来，黑人姑且不论，我们黄色人种的文明和经济程度，将来都很有希望。就以现在而论，虽然比不上白色人，也未必到了应该受差别待遇的程度。此时巴黎会议，既然是打算在世界永久的和平上着想，我们黄色人种散在世界各国的很多，若不打破那人种差别待遇的观念，日后酿成黄色人种不平之声，岂不是世界永久和平的障碍吗？

所以日本人这种提议，我们当然是根本上赞成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应该注意的几件事：

第一是我们中国人应当联合全体的黄种人，正正堂堂的向巴黎会议要求平等的待遇，不能附属日本，做美日对抗的机械。

第二是我们中国内地还没有十分开辟，边界荒地更多，用不着向国外移民。所要求的是华工及侨商的待遇，和日本移民政策的内容不同。

第三是我们黄人既然对于白人要求平等待遇，我们黄人自己对于黄人，先要平等待遇。若是我们黄人对于黄人的什么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在朝鲜的主属关系，不能打破，还有什么面孔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呢？

1919 年 3 月 9 日　《每周评论》第十二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亡国与亲善

近来日本人的机关报，大张旗鼓的说美国东洋舰队要租借三都澳，如果成为事实，中国就要永远亡国了。又说中美有什么密约，美国得在中国设立造船所，中国聘请美国士官教练海军，这都是亡国的条件。我以为这两种消息，真假利害暂且不论。试问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行动，是叫中国亡国还是和中国亲善呢？二十一条和军事协约，是亡国的条件还是亲善的条件呢？

欢迎英美舰队

日本人的机关报，说英国有派遣东洋舰队三十只，美国有派遣东洋舰队二十只的计划。日本人说这是英美对华的野心。我们说这是东洋一线光明的希望。因为我们东洋各国的国民，都被本国的军阀压迫得无路可走，不得不希望有别的救星。请看德意志国民，若不是得了协约国的救星，不仍旧压在黑暗的军国主义的脚下吗？

陕 西 问 题

北方军阀系的人和日本系的人，都说南北和平会议，关于政治法律

等国家根本重大问题很多。南方不应该因为陕西一隅的小问题[1]，便要停止会议，便要请外人干涉。我们以为陕西的问题，表面上虽然很小，里面却很重大。因为军阀不从政府停战命令，还说什么政治法律呢？我看他们的意思，是要南方代表专门在和平会议讨论法律政治的大问题，对于陕西问题不发一言，由着北军从陕西打到四川，从四川打到云贵，从云贵打到两广。到了此时，南北和平会议，也就不用会不用议了。如此和平会议，岂不做了北方进兵的掩护吗？他们何尝要尊重什么法律政治大问题，其所以责备南方代表，不过是"项庄舞剑"罢了。

不忘日本的大恩

此次南北战争，只因为有日本的军械和借款，才杀得我中国人妻离子丧，血肉横飞。现在南北和议不大顺手，日本使馆又来说什么按诸商律，参战借款无法停付。倘然因为有了军费，南北又打起仗来。那时就把中国人杀尽，只剩下记者一人，也不能忘记了日本的大恩！

日本人的信用

有人说日本人向来不大有信用，此次居然尊重商律，要将参战借款交出，对于中国的军阀，总算有信用。又有人说，他出点小款，叫你中国人杀中国人，他却得了军事秘约上的利益，还算不来吗？不然参陆两部的出张所，就能在中国设立了吗？

日本人与曹汝霖

你们平时都说日本对于中国有野心，又因为曹汝霖亲日，便凭空加

---

① 陕西胡景翼等于1918年春宣告独立，加入南方的护法军，而北方竭力攻陕，想把该省放在停战范围之外，南方反对。这是和会迟迟不能召开的一个原因。

他一个卖国的徽号。现在你们所谓亡国的卖国的铁道国际管理，日本人和曹汝霖却都急的了不得，拚命反对，你们看看日本人是何等亲爱我们！曹汝霖是何等爱国！

国际管理与日本管理

有许多人反对中国铁道归国际管理，我很佩服他们的爱国心。但是不可因为反对国际管理的结果，把中国大部分的铁路归日本管理才好。因为一归日本管理，他那保路的兵队就来了，沿路的巡警也来了，一切商人小工娼妓都来了，甚至于还要设立民政署。欧美各国人就是管理中国铁路，从来没有这种怪现象。

1919年3月9日 《每周评论》第十二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东局千零十三号

本来参战军里面，有许多日本人执行重要职务。他们偏偏不肯承认，硬说参战军里没有日本人。请看电话簿上东局千零十三号电话，是参战军训练处坂西室，不知道这位坂西是那国人？

参 战 军

有人问我：就算是欧战还没有完全了结，就算是西伯利亚还不太平，中国军队的程度都不相上下，都可以用做参战或是边防。为什么定要归一系人编的国防军，才能参战，才能防边呢？参战军本来因为欧战已了，才改个名目叫做国防军，现在为什么又称做参战军呢？中外舆论都主张要裁撤国防军，只有日本人的机关报，极力说现在没有撤废参战军的理由，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说：这就是国防军断难裁撤的缘故，也就是国防军断不能不裁撤缘故！

亚洲的德意志

欧洲的德意志，已经抛弃军国主义了。亚洲的德意志，还是毫无觉悟。他对于世界上的事，反对缩减军备与废止征兵，和自由主义的英、美不合。他对于中国的事，袒护军阀，反对裁撤参战军，又和自由主义

的英美不合。他如此迷信武力，且看他将来的运命如何。

爱尔兰与朝鲜

欧洲岛帝国有个爱尔兰问题，亚洲岛帝国也有个朝鲜问题。这两个民族自决运动的精神，都已十分表现。可算东西对照，无独有偶了。但是美国众议院，已经多数议决援助爱尔兰独立了，这问题差不多就要解决。再看朝鲜怎么样呢？

1919 年 3 月 16 日 《每周评论》第十三号 署名：只眼



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迷顽可怜的国故党，看见《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几篇大学教习做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大学造了种种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这种谣言传的很远，大家都信以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报，也就加了许多批评。

上海《时事新报》说道："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上海《中华新报》说道："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之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失坠，饭碗打破，遂拼命为轨道外的反对，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钱的权力，要想用'驱逐'二字吓人。这本来是他们的人格问题，真不值污我这枝笔。"

《中华新报》又说道："北京非首善之区乎？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华新报》又说道："自此事之起，舆论界及一般新教育界，当然义愤之极，以为这是辱没了学者，四君等当然不能受此奇耻。惟记者以为究竟是谁的耻辱？与其曰受者之耻辱，毋宁曰施者之耻辱，与其曰四君等之耻辱，毋宁曰中国全体民族之耻辱。"

上海《民国日报》说道："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中略）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不图发轫方始，主其

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而遂弃此大学以去也。”

《北京晨报》说道：“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故连日每有所闻，未敢据以登载。嗣经详细调查，知此说实绝无影响。不过因顽旧者流，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

北京《国民公报》说道：“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必欲逆此势力而与之抗，徒然增一番新旧之冲突而已。（中略）昧者不察，对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旧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记者亦将是认之，而无如其否也。记者往尝读书，常怀一疑问，闻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于其间？昔日之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

对于新思想存在的价值，和政府不当干涉言论思想的理由，上海、北京各报都说得很痛决，无须我再说。而且政府并没有干涉，更不必“无的放矢”了。但是对于国故党造谣的心理，我却有点感想。

这感想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

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

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见十日《北京大学日刊》），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

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

《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

1919 年 3 月 16 日 《每周评论》第十三号 署名：只眼

为什么要南北分立?

——南北人民分立呢?还是南北特殊势力分立呢?

前年张勋复辟的时候,我曾主张仿奥、匈制度南北分治。那时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无论南北,都有一大部分人相信君主政治或大权政治,不妨画定北方几省,让他们去过那"磕头请安"、"打板子"的生活。那相信欧美自由政治的人,可在南方另设自治政府和国会。免得南北意见分歧,种种都说不到一处。

但是现在细细想起来,我这种观察很浅薄,我这种主张很鲁莽灭裂。

听说上海会议的南北代表中,颇有主张南北分立的人。我就简单问他们一句:"为什么要南北分立?"

我不是迷信统一的人,但主张分立也须有个理由。在人种、宗教、语言、历史上当然不发生南北分立的问题。他们回答的唯一理由,必说是"因为南北政见不同"。

我以为他们所持的这个理由,和我从前所想的是同样的观察浅薄。除了人种、宗教、语言、历史不同以外,多年共同生活的国民,实没有分立的理由。

若因为政见不同,便主张分立,这理由却十分薄弱:

(一)全国民的政见,永远没有相同的时候。要因政见不同而分立,必至人人分立而后已,便永远没有公同生活的组织。

(二)所谓不同的政见:第一层要分别他是南北两方人民的意思,还是少数野心家的意思。第二层要分别他是正当的政见或是不正当。若是少数野心家不正当的政见(例如从前南美蓄奴制度,和此时中国北方军阀的军治主义),就应该用多数民意正当的政见,来征服他们才是。不应该承认他们利用分立的名义,施行他们的野心和不正当的政见。

说南北政见不同应当分立的人，必是假定南方人相信自由政治，北方人相信大权政治和军国主义，南北政见如此不同，所以只好分立。我看南方人是否都相信自由政治，这个问题且不必讨论。试问相信大权政治和军国主义，是北方多数人民的意思，还是少数野心家不正当的政见呢？若真正是多数民意，或者还可以分立。若是少数野心家不正当的政见，便万万没有分立的理由了。因为一国的分裂，既没有人种、宗教、语言、历史上异同问题，又非出于利害感情的真正民意，但凭少数野心家不正当的政见，便把国家分裂起来，这只可以叫做“割据”，不能叫做“分立”。

果然要实行分立，请问这南北的界线，是如何分法？若是由军人政客们以意为之，那沿江各省属南属北，用什么来做标准呢？若是以西南护法几省属南，其余的都属北，那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六省的人，难道都是相信大权政治军国主义吗？若是各省人民投票决定，现在军治下的人民，能自由表示意思吗？

我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要点，不在南北分立与否，而在能否合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铲除这南北军阀的特殊势力。倘能铲除这特殊势力，不但南北分立不成问题，就是什么陕西问题，福建问题，湖南问题，川、滇问题，粤、桂问题，湘、桂问题，也都根本解决了。这种特殊势力倘不能铲除，就是南北果然分立，北方且不必论，那南方将来层出不穷的唐、陆、川、滇、粤、桂、湘、桂，种种问题，试问如何解决？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调和团结这种利害感情冲突的特殊势力，来建设南方的自由政治呢？难道又牺牲民意的本位，来就特殊势力的本位，分立什么“滇国”、“桂国”吗？

仅就一时特殊势力少数野心家造成的现象，便主张毫无民意根据的南北分立，固然没有理由。就是那理由充足有历史习惯根据的各省地方分治，在军阀特殊势力未铲除以前，也没有主张的价值。因为军阀不铲除，无论名义上是南北分立，或是各省地方分治，那实质上都是“藩镇割据”，和地方分权人民自治的精神，隔得太远。

1919 年 3 月 23 日 《每周评论》第十四号 署名：只眼

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

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

我们希望朝鲜人的自由思想，从此继续发展。我们相信朝鲜民族独立自治的光荣，不久就可以发现。我们希望朝鲜独立以后，仍然保守今日“用民意不用武力”的态度，永远不招一兵，不造一弹，做世界上各民族新结合(不叫做国)的模范。受过军国侵略主义痛苦的人，当然抛弃军国侵略主义。既然抛弃军国侵略主义，当然没有养兵的必要。

我们希望日本人，纵然不能即时承认朝鲜独立，也应当减少驻留朝鲜的军警，许他们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第一对于这回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一概不加以刑罚，正所以表示日本人的文明程度。因为这回独立运动，乃是朝鲜人的正当权利，并没有触犯日本的国体和扰乱日本国的安宁秩序。我想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这回悲壮的失败，都应该流几点同情的热泪。

有了朝鲜民族活动光荣，更见得我们中国民族萎靡的耻辱。共和已经八年，一般国民，不曾一天有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辛亥革命，大半是盗贼无赖，借光复的名义抢劫)。国民和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任凭本国和外国的军阀联合压迫，不敢有丝毫反抗。西南护法军，竟和国民分做两截。不但乡下的农民老百姓，不敢做声，就是咶咶叫的名流、绅士、政客、商人、教育界，都公然自己取消了主人翁国民的资格，降作第三者来调和政局。请看这回朝鲜人的活动，是不是因为没有武器，便不敢反抗，便抛弃主人翁资格来做第三者？我们比起朝鲜人来，真是惭愧无地！

这回朝鲜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以学生和基督教徒最多。因此我们

更感觉教育普及的必要，我们从此不敢轻视基督教。但是中国现在的学生和基督教徒，何以都是死气沉沉？

1919年3月23日 《每周评论》第十四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你护的什么法?

日本鉴于世界大势,要将朝鲜和台湾的总督,改用文官,免得军治制度招朝鲜人和台湾人的反抗。

想不到我们中华民国里,曰称护法的人,还有分设九军区的主张。画分军区,就是承认军人有管辖区域,就是承认军治制度。这是比日本人对待被征服的朝鲜、台湾还不如,请问你们护的什么法?

和平的根本障碍

南方派说陕西问题是重大问题,北方派说是枝叶问题。我也说是枝叶问题;不但陕西问题,就是福建问题,参战军问题,也都是枝叶问题。只有造成这三个枝叶问题的原动力,乃是和平障碍的根本问题。若不除去这根本障碍,那上海的和平会议,终久是要破裂的。

试问造成欧洲战乱的威廉第二,若仍旧在德国执掌兵权,那巴黎的和平会议,能够成立吗?

中国的李完用宋秉竣是谁?

昨天在中央公园听甲乙二人闲谭,甲问乙道:现在朝鲜受日本这样虐待,都是那包办卖国李完用、宋秉竣二贼的罪恶。我们中国也快到朝

鲜的地位了，你可晓得那李完用、宋秉竣是谁？乙答道：我是戏迷，不谭国事。昨夜在第一舞台看得好戏，余叔岩唱过打鼓骂曹，接着就是龚云甫的徐母骂曹。那姓徐的小子虽然不是好东西，跟着曹氏去干坏事，他母亲那一顿痛快骂，却算是女中豪杰！

希望各国干涉

唐少川因为和议要破裂，通告外交团，许多人说他不对。试问，国事被武人败坏到这步田地，国民既不能起来解决，除了希望外国干涉，还有什么法子呢？况且光明正大的希望各友邦用好意来干涉，比秘密和一国亲善，勾引外力来巩固个人的地位大不相同。

莫做傀儡

传闻段芝泉对他部下说：说现在国内国外都反对参战军，你们偏要把持，不肯放手。你们为着饭碗抬我做傀儡实在是要不得。

何人的命令？

政府里普通停战命令，特别陕西停战命令，都已经发布。何以援陕的北军，还在进攻呢？他们在政府命令以外，还受了何人的命令呢？

停止纳税

上海各商业团体，十九日在商帮协会开会提议，南北倘不停战，商

民便停止纳税。这是欧洲人民裁制政府伸张民权最初的利器，这是人民对待政府最稳健的态度；这是中国人民觉悟的第一步！

1919年3月23日 《每周评论》第十四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更 加 肉 麻

梁节庵先生常对人说：我听见什么维新党革命党谈自由平等民权，已经是肉麻了；如今更听见许多前朝的官吏老儒，投降了革命党，做了他们民国的官吏议员，已经可耻，还要厚着脸学我们谈纲常名教，我听了更加肉麻！

林纾的留声机器

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老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无论那国的万能国会，也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罢？

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随便拿人吗？

各国的治外法权，不出使馆以外。就是对于可怜的中国，扩充一点，向来也不能出租界以外。现在日本使馆，竟公然在北京捕拿朝鲜人；无论所拿的是政治犯或是窃犯，不请求中国警察代拿，都是侵犯中国的主权。试问东京的中国使馆，若有这样行动，日本的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呢？

1919 年 3 月 30 日 《每周评论》第十五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冤哉洪述祖!

洪述祖判了死刑,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是那教唆洪述祖去谋杀宋教仁的袁世凯,乃是真正首犯,虽然死了不能加刑,何以政府里人人都还尊敬他了不得呢?

南　北　一　致

人人都说南北意见不能一致,其实不然。请看陈树藩在陕西提倡种烟,唐克明也在鄂西照办。北方某军驻京的机关,和某旅长某司令部,都为包贩鸦片发了横财,云贵军队也全靠这宗生意才有兵饷。这岂不是南北一致吗? 再看护法军不提护法的事;国防军不肯担任国防的事;这不又是南北一致吗?

纲　常　名　教

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通选举,优待劳工,补助农民,尊重女权等等方法,来消弭社会不平之气。但是这种希奇古怪的外国事,比共和民权更加悖谬,自古以来不曾有过,一定传不到我们中国来。即便来了,就可以用"纲常名

教”四个字，轻轻将他挡住。日本人胆儿太小，我们中国人不怕！不怕！

中国和平的障碍

吴佩孚听了赵恒惕“这回南北战争，不是北军攻打南军，简直是日本攻打中国”的话，才主张停战。当时有人说赵恒惕这话，是故意造谣，离间北洋团体的。前几天日本前外相加藤，在宪政会议员总会的演说，也说“彼参战借款，军事协约，兵器供给等，为中国和平之障碍者，多属前内阁之失策所遗留。”大家应该相信赵恒惕的话，不是故意造谣了罢。

太监与缠足

世间事理，固然没有绝对一定的是非；但是太监和缠足这两件事，总算得非多而是少罢。不料广州有一位新闻记者，居然称赞缠足，说是有关风化。北京某大学有一位教员，在讲堂上说宦官是中国特有的好制度。中国人复古思想，竟然到了这步田地，只有令人叹气罢了！

安徽省议会的笑话

倪嗣冲的议会，因为安徽绅民反对盐斤加价，警务加征，一五加征三个议案，曾由议长提交大会议决，要取缔人民嗣后对于议会议决各案不得函电干涉。这件事我们用不着批评他，只写下来当作中国议会史的附录里一段笑话材料就得了。

婢学夫人

林琴南排斥新思想，乃是想学孟轲辟杨墨，韩愈辟佛老。林老先生

要晓得如今虽有一部分人说孟轲、韩愈是圣贤，而杨、墨、佛、老却仍然有许多人尊重，孟轲韩愈的价值，正因为辟杨墨佛老减色不少。况且学问文章不及孟、韩的人，更不必婢学夫人了。

倪嗣冲的儿子

议员倪幼丹，听说参议院要弹劾教育总长，他说道：咱们国会何必干涉学堂的事？照这样看来，那位自称参议院代表去恐吓傅总长的人，他的知识程度，还不及倪嗣冲的儿子！

1919年4月6日 《每周评论》第十六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衍圣公和张天师同声一哭

全国基督教会，推举代表，到欧洲和会，请愿信教自由的规定，大概如下：(一)各国政府应该对于各教的人民，一律平等看待，不得规定一教为国教。(二)各国政府应该革除宗教的仪文礼节，政教分离，免得政界人员有教规不同的障碍。(三)政府不得拿国家的公款，供一教的需用，象建筑祭祀岁俸等类。凡用公款建设的寺产，都收归国有，改做公共事业之用。各项祭祀岁俸，永远停止。(四)各国政府元首，不得敕封各教的教师，和僧道的职员爵位。象衍圣公、张真人等封号一概取消。

不可思议的新旧思潮

日本是君主国，那德莫克拉西主义，和纲常名教主义冲突，原来是当然的事。若在共和国里，纲常名教本当不成问题了，一方面却还把纲常名教当做旧思潮，一方面也把德莫克拉西当做新思潮，两边居然起了冲突，实在是不可思议。更奇怪的竟有一班调和大家，折衷大家，想用那折衷主义来调和新旧。试问德莫克拉西是什么？纲常名教是什么？两下里折衷调和起来是个什么？

林琴南很可佩服

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象这样勇于改过，

倒很可佩服。但是他那热心卫道宗圣明伦和拥护古文的理由，必须要解释得十分详细明白，大家才能够相信咧！

关门会议

南北代表，都赞成关门主义。《平和日刊》的记者，更劝他们“谢绝外界，暂断交通，远师四大国秘密会议之成规”。要晓得这回巴黎会议，也是分赃会议，所以不得不秘密，所以毫无价值。我看他们议决的事件，大约和从前维也纳的神圣同盟差不多，事后必无效果。请看匈牙利的事，就是个榜样。南方某代表，还主张不见客不看报。象这样“闭门造车”的法子，固然免得议论庞杂，意见纷歧，我看他们这样怕庞杂纷歧，倒不如请出一位皇帝来，下一道上谕解决时局，岂不更简单痛快！

国民参预政治外交的资格

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若是一般国民的中坚分子，没有政治和国际的常识，却十分危险。譬如对于政治法律，毫没有是非可否的正当主张，单单求着苟且和平了事，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政治的资格。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

文治主义原来如此

在段内阁武治时代，大学到安然无事；现在却因为新旧冲突，居然要驱逐人员了。哈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

美国也有军械借款吗?

美国军械借款的消息如果不假,不但我们对于美国没有好感情,并且这言行不一,乃是美国国民一大污点。但是还没有听说美国军官在中国参战处办事,所以日本人若因此痛骂美国,可叫做"强盗骂贼"。

形式的教育

日本国民党新发布的政纲第七条,是"教育去形式的积习,宜谋与国民生活的实质相接触。"我们中国的青年,也正要死在形式教育的监牢里面,那教育部直辖的最得意的某专门学校,更是极端的形式主义,内容却是一包糟。

议长串通卖矿

人人都说旧国会捣乱,但是还没有发生议长卖矿的事。有人说北洋派因为筹画削平南方的兵费,卖去的路矿多得很,这两位议长尽这点小小义务算什么!

怪哉插径班!

我现在不反对基督教,也不反对学生信仰基督教。但是象清华、南开等,并不是教会经费所设立的学校,那教职员却用全力要叫基督教做他们的"校教",要叫他们的学校做教会的附属品,我却不以为然。听说清华学校还有什么"插径班",这班的用意,乃是拿考试分数做信教的交换条件,这岂不是一桩怪事!

预定的计划

中国式的官僚政治，大弊病在无论什么事都没有预定的计划，总只是随事敷衍，四方八面不得罪人，才好保全他那打不碎的橡皮饭碗。这回北方代表在上海和会提出的议案，我们当然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算有了预定的计划。倘能认真照这计划实行，我们也很赞成。

1919 年 4 月 13 日 《每周评论》第十七号 署名：只眼



我们应该怎样？（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

我们人类的生活诚然是烦闷的生活，是不是永久烦闷固然不敢断定。今日以前和将来几世纪以内恐怕仍然免不掉烦闷。那醉生梦死生活自觉力和下等动物相等的人，现在不去论他。一班有自觉智力的人，对这烦闷生活，有二种危险的人生观：

（一）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

（二）厌世自杀的悲观主义

抱第一种主义的人，是看透人类种种黑暗的本性，而且觉得决没有改进的希望。抱第二种主义的人，是误在高视人类，以为他生来的善良灵贵和别种动物不同，而眼见的周围事实，却大为失望。这两种人对于人生的观察，都是没有彻底，而且没有勇气，所以不堪烦闷生活的痛苦，便自然发生这两种危险的人生观。

我们若是觉得个人和社会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这两种危险的人生观，有时虽有用处，却不可做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唯一信仰。

在生物学上看起来，人类也是一种物。人性黑暗的方面，像贪得、利己、忌妒、争杀等，和别种动物是一样，并不比他们高明。而且有虚伪、欺诈的特长，比别种动物更坏。但是人性光明的方面，像相爱、互助等，也和别种脊椎动物一样，而且比他们更是发达。至于分别及决择善恶的心灵作用（即道德意识），或者可以说是人类独有的本能。若是人类没有这种先天的本能，那几个圣贤的教训，必然毫无效果。

顺世和厌世主义的两种人，都只见得人类黑暗的一面，没有留心那光明的一面。就是留过心，若是没有努力改造的勇气和自信心，也必定自然而然走到那顺世堕落或厌世自杀的境界。我们要逃出这两种境界，首先对于人性必须有黑暗光明两方面彻底的观察和承认。其次的

须要，就是努力改造世界的勇气和自信心。社会中有勇气和自信心的先知先觉，应该用个人的努力，渐渐减少人性黑暗的方面，渐渐发展人性光明的方面。

我相信这种努力，不但可以唤醒没有生活自觉力的人，并且可以指导一班有自觉力而胆怯的人，叫他们都抛弃那“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和“厌世自杀的悲观主义”，都来跟着努力的人信仰这“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和人类种种黑暗奋斗。到了这种“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成了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唯一信仰，这时代的人类，就快脱离烦闷生活的时代不远了。

有一班研究生物进化的人说：生物中的人类肉体上精神上一方面可说是进化，一方面也可说是堕落。所谓道德的意识，被和一般动物同样的贪残利己心及生活困难逼迫而去，这便是人类堕落，以至于将来自灭的原因，无论如何努力，恐怕终久达不到改造的目的，也就终久免不掉灭亡的运命。我看这种疑问，诚然是很有价值的疑问，但是这班人也只见得人类黑暗的方面，没有留心那光明的方面。我总相信由我们个人的努力，拿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那黑暗的方面，不见得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相信他可能，是有两个证据：

（一）在理论上说起。我们若不能否认相爱、互助，及分别决择善恶的心灵作用，也是一种人种的本能，便不能断定没有改造希望。况且我们自己既然发见了自己堕落以至灭亡的原因，这就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心灵作用，这就是人类或者不至灭亡的幸运，这就是我们自己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性的证据。

（二）在事实上看起来。自从始祖以至现在，我们个人的肉体、精神，和社会的组织，都曾经时时努力时时改造时时进化，未尝间断。就是那最难改造的道德意识，也没有人能说毫无成绩。拿过去现在推测将来，何至叫我们绝望呢？至于生活困难，大部分是因为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不良，和人类本性上的黑暗无关，更没有不能改造的道理。

现在时代的国际强权，政治的罪恶，私有财产的罪恶，战争的黑暗，阶级的不平（贫富男女贵贱官民尊卑名分等问题，都包含在内），以及种种不近情理不合人类自然生活的法律道德，四面黑暗将我们团团围住，不用说

这都是我们本性上黑暗方面和一般动物同样的贪残利己心造成的恶果。有这些恶果，才造成我们现在这样难堪的烦闷生活。不用说这些恶果不是一时造成的，也自然不是一时能够除去的了。但是总可以由个人的努力，奋斗，利用人性上光明的方面，去改造那黑暗的方面，将造成这些恶果的恶因减少，这恶果便自然减少，他减少的程度和迟速，自然以我们努力的强弱为标准了。

我们的烦闷生活，将来可不可以完全脱离，都是个难以解答的疑问。但是由我们的努力改造能够比现在逐渐减少，这是可以相信不疑的。若是我们妄想以为上说的国际强权那些恶果一齐除去，我们便完全享受幸福，便完全脱离烦闷生活，这是和中国人起初妄想以为清朝倒了人民便有自由幸福，后来又妄想以为袁世凯倒了人民便有自由幸福同一谬误。人类本性上黑暗方面一日不扫除干净，个人的努力改造一日不能休息。一民族不努力改造，一民族必堕落以至灭亡。人类不努力改造，人类必堕落以至灭亡。努力改造纵然不能将人性上黑暗方面和烦闷生活完全扫除，总可以叫他比现在逐渐减少，除此便没有救济堕落以至灭亡的方法。我所以敢说，我们应该把“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当做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唯一信仰。

1919年4月15日　《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

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多谢倪嗣冲张作霖

中国资产社会和劳动社会都不很发达，社会革命一时或者不至发生。但是倪嗣冲在安徽拼命搜刮金钱，包办煤矿铁矿，不许旁人插手。张作霖在奉天因为要扩张自家的银号，霸占全省的财权，弄得别家银行钱庄纷纷破产。我看这两位财神，倒是制造社会革命的急先锋！

伤寒病和杨梅毒

军人的武治主义，是发大热的伤寒病，现出早晚就要性命的样子，但是热退病就好了。官僚的文治主义，是毒菌传遍血液的杨梅疮，眼前表面上虽不大觉得什么痛苦，一旦毒中脑部或是脊髓等处，却是无法可治。中国政界伤寒病还没好，杨梅毒又正在那里极力发展，非赶快把"安体匹林"和"六百零六"并用不可！

土 匪 世 界

陕西全省的兵，除了胡景翼的一旅和管金聚的一旅，无论南北都是土匪。现在要救济陕西的人民，非把胡、管两旅以外的兵一齐调开，绝对没有办法。若用匪剿匪，真是欺人之谈。

却没有了自己

我曾经遇见一位反对《新青年》和《新潮》杂志的人，问他反对的是那一篇文章那一种议论。他说:“我并没有看过《新青年》和《新潮》，只听见别人都这样说。”又有一班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他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的议论和古人所说的不合。我看这两种人只晓得有别人，有古人，却没有了自己！

四 大 金 刚

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都是很有知识和能力的人，不知道社会上因为什么说他们是亲日派四大金刚。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国，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手拿上面写着“卖国贼”三个字的旗子，送到车站。我们是没有血性的国民，只好希望章等四人有点觉悟。

世界第一恶人

英文《京津时报》所载日本寺内内阁时代联合俄、德帝党缔结三国同盟的计划，如今虽还没有十分证实，但照他扶助中国军阀压迫人民的毒计看起来，却有几分令人相信。寺内！寺内！真是世界第一恶人，罪

在德帝威廉第二以上！

毕竟南方军人有良心

林葆怿、莫荣新、李烈钧、吕公望、方声涛、李根源、程潜七人，通电痛说军人干政的罪恶和军费过大的弊病，十分痛快。毕竟南方军人有点良心。

1919 年 4 月 20 日 《每周评论》第十八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苦了章宗祥的夫人

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把一位公使的夫人吓得哭了。其实章宗祥他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学生何必这样恶作剧！

怎么商团又要“骂曹”？

段内阁和寺内内阁时代，前后二万万元的借款，抵押了无数的矿山铁道和森林，不用说都是日本西原氏，中国章、曹、陆诸人的大功。破坏铁道统一的功劳，也算曹汝霖第一。这回设法妨害巴黎专使提案的亲日派卖国贼，还没有查实是谁，上海商业公团，又居然归功于曹汝霖。我想曹汝霖必然暗中笑道：就是你们中华民国的全国国民都站起来骂我，我不但不怕，而且正于我有大大的利益。

陆宗舆到底是那国的人？

有人说中华汇业银行是中日合办的，有人说完全是日本的银行，我们实在弄不清楚。为了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的事，那中华汇业银行

总理陆宗舆，给中华民国农商总长财政总长的信，满纸的贵国、贵政府。这中华汇业银行到底是那国的银行，陆宗舆到底是那国的人，我们实在弄不清楚！

再看江庸的戏

日本人宝爱江庸，也不在章、曹、陆之下。章、曹、陆在外交界做的好戏，我们都已经看过，实在不忍再看了。有人说江庸的父亲是一位旧文学家，很讲道德，必然有家教，不许他儿子卖国。

法律是什么东西？

吸鸦片烟和赌钱，自然不是好事，法律应该禁止的。但是那有钱有势的老爷太太们，在公馆里吸鸦片烟，打麻雀，打扑克的，天天不知道有多少。大老官赌起钱来，输赢到十万八万，都是常有的事。就是那惩办烟犯赌犯的法官警察官，吸烟赌钱的也不少，那个敢说他们犯法？单单寻着那吸烟赌钱的穷苦男女，捉来又是拘留，又是罚钱，说他们犯了刑法，违了警章。原来刑法和警章，就是这么一件东西！

干政的军人反对军人干政

南方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北方的参、陆两部也通电大表同情。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已经令人怀疑了。至于那用兵保段内阁上台的张作霖，用兵赶黎总统下台的倪嗣冲，也来通电说军人干政的不是，未免太滑稽了。

破坏约法的人拥护约法

有了新国会就没有约法，有了约法就没有新国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想不到新国会的议员，也主张国会议宪的权柄是约法赋与的，不许旁人代劳。王郅隆竟电告北方代表，说国会根据约法，应该拥护。冤哉约法，破坏的是他们，拥护的也是他们，这件事刚巧和北方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同时发生，可算是"无独有偶"了。

克伦斯基与列宁

克伦斯基本是俄国温和派的首领，现在居然致电劳农政府，说他的思想渐渐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接近。可是世界上温和的人都要渐渐的激烈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

新国会议员说南北代表无权解决法律问题，我也以为诚然不错。不但法律问题，就是裁兵废督问题，将来也不过议决几个空言的议案，实际上都不是他们能够解决得了的。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像那二十个毫无力量的代表，是湖南人说的话"没得寸用"。

护法？丑！套狗索！

你们不是到过广州非常国会高谈护法吗？你们所骂的非法政府非法内阁所设的战后经济调查会，二百多会员当中，旧国会议员到占了四

分之三以上，内中有许多到过护法国会的。如今为了每月三百大洋，居然摇尾伸头套了非法内阁的“套狗索”。这种轻骨头，比三钱灯草灰还轻。战后经济调查，是何等重大事件，怎么拿人民的血汗钱，来做这项不经济的“套狗”用，这种黑骨头，比漆比墨还黑。

1919 年 4 月 27 日 《每周评论》第十九号 署名：只眼



贫民的哭声

“肚子饿极了，我们两天没得吃了。想问对门借点米熬粥喝，怎奈他们的口粮还没领下来，也在那里愁眉叹气。”

“好冷呀！老天为什么又要下雪？这风雪从窗户吹进来还不打紧，只是从屋顶漏湿了一家人这条破被，怎么好！”

“我的可怜的丈夫，他拉车累的吐血死了，如今我的儿子又在这大风雪中拉车，可怜我那十二岁的孩子，拉一步喘一口气！”

“我七十一岁的爸爸，昨天拉煤回来，不知道怎么一到家倒在地下，就死了。象这样热的六月天气，没有棺材收尸怎么好！”

“我家娘儿俩没饭吃，把我卖到窑子里，天天挨打挨骂受不了，要求巡警老爷做主。”

这是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

据警察厅最近的调查，北京人口，合共有男女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四十名。那纯粹没有职业的贫民，占十分之一。东洋车夫有四万多人。排字的工人，差不多有一万。公娼私娼，总也在一万人以外。北京城里九十几万人当中，要算这十几万人最苦恼了。

这十几万苦恼的人，常常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我们七十几万市民都听见没有？

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人人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

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在欧美各国，他们贫富悬隔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佣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

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所以穷苦的工人时常和开工厂的资本家为难，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

我们中国却不是这样。那有钱的人，他的钱还并不是费了些心血开设工厂赚来的，乃是做文武官卖国借款拿回扣搜刮抢劫来的。通国的钱财，都归到这班文武官和他们子孙的手里。弄得中等人家，仅能够穿衣吃饭，穷苦的人连衣食都没有，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

北京城里头一个懒惰无能力而且奢侈的，就是溥仪那一家人。他家有多少人口，凭什么一年要用什么皇室经费几百万？只要他省出十分的一二来，办几个贫民工厂，也可以帮北京的满、汉穷人开一条生路，免得他们男的没饭吃去拉车，女的没饭吃去卖淫。

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那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呵！呵！我知道了：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察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

这班文武官，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手里享用，还留给那懒惰无能力的子孙享用，天天吃燕窝，打扑克，逛花园，跑汽车。那不能卖路矿借外债得回扣，不敢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的良民，当然穷得没衣着，没饭吃。

现在人心大变了，马上就要和从前两样。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那里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命。

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彩烈的弄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子享用，子孙万代享用。他们那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那里听见什么贫民的哭声！就是听了那可怜的哭声，也只笑着说道：这是他们命该如此。

单是北京一处，就有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这不是

一个小问题。

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1919 年 4 月 27 日 《每周评论》第十九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公同管理

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因为日本管理的地方，不但兵队警察要来，那卖淫的，卖药的，卖鸦片的，卖吗啡的，收买铜钱的，一齐都要来，都要把中国人踩在脚底下当狗打。打过了还要中国人和颜悦色的同他“亲善”，不然就加上你一个“排日”的罪名。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黄人，持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日本人在东三省和山东的情状，比从前俄人德人怎么样，这就是个明白的榜样。

两个和会都无用

上海的和会[①]，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

---

① 1919 年 2 月 20 日，北方政府总代表朱启钤与南方广州军政府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开和平会议。唐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取消参战借款、解散参战军等条款，遭北方政府拒绝。3 月 2 日，和议停顿。4 月 9 日，和会续开，唐再提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督办处、善后借款南北政府共同分用、军政府法令有效等条款。5 月 13 日，和会不了了之。

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1919年5月4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号 署名:只眼

孔教研究

四月三十日北京《顺天时报》上有一篇论说，题目叫做《孔教研究之必要》。细看他文章的内容，题目应该改作《孔教拥护之必要》才对。因为他开口便说："新学白话文之鼓吹，乃为知识普及社会进步起见，吾人极表赞成，当俟别论。至排击孔教，则为吾人所不取。"他已经决定不取排击孔教，便不是研究的态度了。若取研究的态度，将来研究的结果，排击或是拥护，却不能预定的。

我对于这篇论说，分析起来，觉得他有三个谬误的观念：

第一，不以能否适合现代社会定孔教价值　他说："孔教由其文字之表面观之，固多不适于现时。例如君臣之义，全然为共和国所无。即关于亲子、夫妇之道，及其他关于一般道德之说明，亦多与现代人心不甚相合。盖现代于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均认人类个人之平等，同受国家之保障。于是亲子、夫妇，及其他一切人与人的关系，自与古时'以人类不平等为原则之时代'不能相同。仅就此等处排斥孔教，以为不合于时势，亦可谓不思之甚矣。"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顺天》记者既然承认孔教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和现代社会人心不合，不知道我们还要尊崇孔教的理由在那里？

第二，不在遗书文字上研究孔教教义　他说："凡文字不可拘泥读之，所可读者乃其精神。今欲知孔子，若专就其遗书详细解释，终难得其真相。"又说："至其研究之方法，则不可拘泥文字，更不可为古人之解释所拘束。……倘为朱熹、王阳明之徒所束缚，则必难得孔子之真意矣。"我对于这几段话，发生了左列两个疑问：

（1）孔教非自心现量不立语言文字的佛教可比，又不能在乩坛上请孔子的灵魂来自己说明，除了依据遗书文字和后儒的解释以外，还有什么研究的材料？

（2）除了君臣、亲子、夫妇（三纲）之道及其他关于一般道德之说明，孔子的“精神”、“真相”、“真意”究竟是什么？

第三，不以孔子生存时学说主张为根本　他说：“论者欲知孔子之真义，请先假定孔子生于现代，与己对座，自为颜、曾诸子，对孔子发问，而思孔子将为如何之回答。试观孔子当时对颜子、曾子、子贡、子路诸人之问答，各异其趣。可知孔子若对于现代之吾人，其所答者，必更与告诸子者判若霄壤，自不待言。试思之，使孔子对于林琴南氏将如何答之乎？对于陈独秀氏将如何答之乎？使孔子生于个人平等、共和制之现代，而为新闻记者，则其所论又将如何乎？”我对于这一段话，也有几个疑问如左：

（1）孔子答现代人的话究竟如何，《顺天》记者和我都不曾在乩坛上听过，都不能够凭空断定他对不对。但是他生存时所答颜、曾诸子的话虽然各异其趣，试问有没有和他平常君臣、亲子、夫妇之道及其他关于一般道德之说明大不同的地方？

（2）对于已往的人，无论他生存时学说主张如何，若可以假定他生在现代，他的学说主张就能合现代潮流，必和他生存时不同，就断定他有尊崇的价值，那么我们对于秦始皇、张献忠、拿破仑、梅特涅等人，也都可以这样假定吗？那么我们对于自古以来学说不完全、不正确的学者，也都可以这样假定吗？

（3）就假定孔子生存在现代，他的学说主张，必合现代潮流，必然可以施行，必然可以尊崇，可惜他现在还没有像耶稣那样复活起来，给我们一点新教训。我们只能研究未复活以前，他的旧教训的价值在那里，未复活以前，他的君臣、亲子、夫妇之道，及其他关于一般道德的说明，对于现代生活和世界潮流，还有施行尊崇的必要没有。

1919 年 5 月 4 日　《每周评论》第 20 号，选自《独秀文存》

署名：只眼

致胡适信

适之吾兄：

国民外交协会发起国民大会，本打算今天在中央公园集合；警厅因为四号学生闹了事，便禁止集会；此时公园左近交通要道都密布军警，禁止行人走过；大会恐怕开不成气了！

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

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弟独秀白〔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午后四时

中华书局1979年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

——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国民呵！爱国学生诸君呵！外交协会诸君呵！我们对日外交，差不多十有九分是失败的了！而且我们对日的外交失败，又何止一个"山东问题"！眼前已经是可悲可惨，日后亡国的可悲可惨，更加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无量数倍呵！

是什么没良心的畜生造成我们这样悲惨的境遇！

日本人因为自国的权利欺压我们，这是他们被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的，我们不必怨他。曹、陆、章等亲日派固然有相当的罪恶，但是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种种罪恶的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我们也不必专门怨他。

况且曹、陆、章等未必真有卖国的行为，他们如果卖国，政府怎肯让他们都站在重要的地位？

曾记得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革命党用炸弹打了薛大可所办的亚细亚报馆[1]，薛大可大叫冤屈。现在曹、陆、章等也受了同样的冤屈。

欺压我国的日本人，为了"山东问题"正在他们国里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好几万人天天闹个不休，他们的政府不曾丝毫干涉，他们是何等高兴？我们被日本欺压的中国人，也为了"山东问题"，想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做政府的后盾，政府却拿武力来殴逐国民，不许集会，满街军警，断绝交通，好像对敌开战一般。日本人看了岂不活活笑死！

若说是恐怕破坏安宁秩序，尽可多派警察监视，也没有事前揣测就要剥夺人民集会自由权的道理。若说恐怕和前回学生一样闹出事来，

---

[1] 1915年9月10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创刊，"明白宣布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次日晚七时许，革命党人派杨玉桥向该报馆门口投掷炸弹，爆炸后，死伤数人，杨亦身殉。12月17日夜，该报编辑部再次被炸。

前回学生集会，被害的只曹、章两人，公共的秩序安宁并没有丝毫扰乱。政府无故禁止国民集会，对于欺压中国的日本，亲善主义固然表示得十足，但是对于被日本欺压的本国的人民怎么样？

曹、陆、章等究竟有没有卖国的事实，姑且不论。但是他们的恶名已经遍传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自己不曾辩明，又不避嫌辞职。政府也不避嫌，仍旧把他们放在重要地位，我真百思不得其解。

汪大燮、林长民都曾经做过政府的阁员，现在也还居政府中有责任的地位，对于卖国党都发过有责任的言论。究竟谁是谁非，政府何以置之不理？

听说司法界因为学生聚众事件，正在搜查证据，预备提起公诉。试问政府官吏有了卖国的评判，检察官有没有搜查证据提起公诉的责任？司法官是否可以在司法独立的美名之下，因私交紊乱国法？

就说二十一条辱国的密约，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试问拿军事协定①和济顺、高徐的合同②，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也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吗？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二千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此外还有许多铁路、矿山、电话、森林，都用贱价卖给日本，到底是何人主持，是何人经手？是不是日本用兵力迫胁的？

甘心把本国重大的权利、财产，向日本换军械军费来杀戮本国人，这是什么罪恶？造成这罪恶的到底是什么人？

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人心已死的中国，国民向来没有团结一致的爱国心，这是外国人顶看不起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中国顶可伤心的现象。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

---

① 1918年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省交换共同防敌公文，中日军事协定正式成立。日本政府据此可出兵北满、外蒙，既占中国领土，又可进攻苏俄；并借款给段祺瑞政府，扶植皖系军阀。

② 1918年9月2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缔结济南至顺德、高密至徐州二铁路预备借款契约，契约规定：借日金二千万元，年息八厘，由二铁路现在及将来一切之财产并其收入为担保，无日银行之承诺，不得提供为他项担保。

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像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中国，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不然便要送交法庭，加上他一个干涉政治扰害公安的罪名。这样办法好极了！好极了！

禁止国民集会，拿办爱国的学生，逼走大学校长，总算对得起日本人了！听说亲日的军阀派还要解散大学封禁报馆哩！这也未免过于要好了！你们可晓得有许多富于爱国心的国民，现在虽没有象学生这样出头说话，看见你们这样行径，都在那里暗中落泪呵！

曹、陆不过是一种机械，章宗祥更不比曹、陆，他的罪恶，只是他的现职连累了他，此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积极卖国的大罪恶。国民呵！爱国学生诸君呵！外交协会诸君呵！你们若是当真把这根本大罪恶都加在曹、陆、章诸人身上，实在冤屈了他们呵！

1919 年 5 月 11 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 署名：只眼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

（一）敬告协约国国民

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但是拿破仑时代的世界大战争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所以造成第二次大战争。这次威廉时代的世界大战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恐怕又要造成第三次大战争。要想免第三次大战争的痛苦，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弃公理的强权不可。什么“国际竞争”，什么“对外发展”，什么“强国主义”，什么“强力即正义”，都是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有因必有果，将来受这痛苦的，却不单是我们中国人，希望诸协约国国民都要有点觉悟，别做第二德意志。

（二）敬告中国国民

“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公理的思想。但是“民族自卫主义”（就是在国土以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

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像这种全体国民的存亡大问题，可怜只有一部分爱国的学生和政客出来热心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旁边不问，已经是放弃责任不成话说了。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是政客利用煽动（全体国民那个不应该出来煽动？煽动国民爱国自卫，有什么错处？），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种下作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

（三）敬告日本国民

若说中国没有开发的利源很多，因为缺少资本和经验，工商业又不容易振兴，一方面日本因地小人多，有对外发展的必要。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大义说起来，日本人若真心实行中日亲善主义，不占据中国土地，不侵害中国主权，不垄断中国的交通机关和矿山，破坏中国民族生存的基础，至于相当的工商业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觉得有相互的利益。在日本民族发展上说起来，若定要实行军阀派的侵略野心，未必就能够将中国人斩尽杀绝，徒然弄得两民族感情日恶，一方面工商业上受绝大的影响，一方面势力范围日渐扩张，旅居中国的日人日渐加多，虚荣上经济上虽有利益，而旅居中国的日人种种不法行为，不但大召中国人的恶感，并且影响于日本国民品行，不能不算是极大的损失。所以我要奉劝日本国民，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国真实的稳健的发展，应当用和平的工商主义，不应当用强迫的侵略主义。若说商业发展要有政治的强力保护，那么此时基督教在中国，何以比从前各国用强力保护干涉的时代还要发达呢？若说日本倘不侵略，就难免让欧美人捷足先得，我看这种话头，正是逼迫中国人仇恨日本接近欧美的原因。

(四) 敬告外交当局

我们国民是何等昏惰，政府是何等糊涂，外交失败也不好专责备那一方面。单说这山东问题，我们提出巴黎和会对德直接索回青岛或是各国暂时公管的希望，十有八九是一场春梦了。我们现在要提醒外交当局的，就是万不得已到了中日直接交涉地步，我们要抱定宗旨：若是日本肯把青岛和胶济路完全交还中国，并不要求他项权利，单是要求赔偿攻打青岛的兵费，我们还可以允许。若只是名义上的交还，除了承认他继承德国已得权利以外，不能再添上丝毫别的矿山铁道等经济上的利益。至于济顺、高徐两条铁路，是从山东问题又向北扩张到直隶问题、向南扩张到江苏问题，更是断断不能承认的。政府若是听从亲日卖国派的诡计，凭空断送重大权利，酿成直隶、山东、江苏三省的问题，这种卖国大罪，国民是万万不能再恕的了！

1919 年 5 月 18 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 署名：只眼



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

（一）上海总商会的佳电

北京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均鉴：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使宗祥不胜其任。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致青岛德军云："尔曹不退出，当以兵车相见。若青岛为我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中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今欧战既停，章使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本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又不奉命遽回本国。甫抵都门，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津，复潜住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值此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条约并无牵制，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际此人心浮动，伏乞将办理情形晓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叩，佳。

（二）日人对于佳电的欢感

日本人见了上海总商会的佳电，正合他们的意旨，所以十分欢迎，

十分感谢。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有一篇论说,题目叫做《读沪总商会对山东问题佳电之感言》。内中说道:

值此舆论喧嚣,纷纷自扰,或者煽惑学生,胁迫治安,以为争夺势利之计。或者利用谋伤两国关系,以为鹬蚌渔父之计。吾人夙为东亚大局忧之。顷读上海商务总会对山东问题呈请大总统、国务院、外交农商两部之佳电,吾人实不能不有无限之感慨。盖全国商会之领袖,其镇静公正之态度,达观大局之见识,自有与一般嚣嚣者流不同者焉。

又说道:

该电又云:"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电请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电知陆专使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种条约并无牵制,应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云云。此尤为正当议论,正当办法。何其处心平静,而谋策宏远耶!苟中国国民及政府当局,有此了解,有此用意,东亚两国之事,更无何等困难之问题矣。上海总商会诸君看见日本人这样夸奖他们,不知道难受不难受?惭愧不惭愧?后悔不后悔?

(三)上海商民反对总商会的函电

佳电发表后,上海商民大惊失措,痛恨总商会媚外辱国,群向商业公团联合会请求反对。亲向该公团询问办法的人很多,就中的商会会员实占多数。商业公团因此特开会议公决,除致函该商会诘责外,并为釜底抽薪的法子,电致北京声明否认佳电的主张。上海总商会久已众叛亲离,自有此次违犯众怒的佳电,尤足使旧日声名扫地以尽。兹将电函并录如下:

(一)商业公团致北京电　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

部钧鉴:上海总商会佳电,主张青岛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极端否认。并请转电巴黎专使。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五十六公团叩。

(二)公团致总商会函　敬启者:顷阅报登贵总商会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佳电,不胜疑讶。查青岛问题,我全国主张请求欧洲和议,由德国直接交回中国,并取消“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此万口一声,天下皆知者也。今读佳电,一则曰请遴派大使克日起程,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再则曰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等语。以上云云,是我全国人民所誓死坚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何以贵总会佳电违反民意,适为该国之愿。本会同人至愚,不解所谓,纷纷来函询问,应请高明详晰见复,以释群疑,是所切祷。此致上海总商会。

(三)赵锡恩致总商会函　总商会主任干事暨诸君大鉴:所贵乎商会者,以法定之机关,为商人之保障,谋利源之发展,助国家之富强,事至繁,任至重也。今我中国大势亟矣,外侮纷乘,其目的在夺我商人之生活。内乱蜂起,其结果亦以我商人为牺牲。商人于此更宜如何竭智代谋,翼护同类。……乃我观于我上海之总商会,则有惭骇悚惧大惑不解者,如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在欧参预和议之成败,亦即关系我商业前途之存亡。失此不争,转瞬为高丽之续。我商人生计行见剥夺以尽。北京学生集合奋兴,共击误国之官。全国学生,闻风继起。商业团体联合会已于青岛问题、学生风潮有所建议,实力能及之举动,亦已沈毅进行。独我总商会徘徊瞻顾,若恐一经表示,即致开罪于强邻者。报纸喧传总商会重要分子,多欲顾全与日本人之私交,雅不愿其手掌中之商会,有违日本人之片面亲善主义。其言虽未可尽信,要之国人多数认我商会为麻木不仁之形式机关,益证以此次之态度,固已无可讳饰者也。鄙人亦商会一分子,诚欲湔雪此耻,敢求诸公振作精神,速图自白。今日报载我商会上政府电,主张派使赴日争回青岛,是不啻与虎谋皮。外人仍疑我商会暗助日本,贯彻其中日自决之主张,脱离欧洲和会公理之拘束。是虽勉发一电,仍未足餍人望。愚见以为我商会当此谴诟丛集之时,宜速召集全体大会,共同研究挽回主权稳保商业之策。或电恳我国驻欧议和代表,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伏。义愤所激,或能感动和会

中人之良心，力持正谊，保全中国。或更分电欧美各国大商会，表示我国商人之意思、痛陈中日交涉之不平。欧美各国商人不乏爱慕公道之士，度能出一言以为声援。此外更须警告日本商会，晓以利害，使知两国人民恶感愈深，日本商人将不能立足于中国。彼等怵于生计之丧失，当必苦劝政府收拾野心，改变政策。一面由我商会提倡相当御侮之法，以促野心家之返省。苟能同心戮力，持久不懈，而谓毫无效果可收者，吾不信也。惟事机万急，稍纵即逝。……鄙人本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切望于我商会者至重。……急不择言，诸希鉴察。

（四）沈卓吾致总商会函　顷见报纸载贵会对于青岛问题所发之佳电，言人所不忍言。此种独得之见解，究出谁人之主张？且佳电之责任，抑仅贵会会长负之耶？抑此外有无代为负责之人也？事关国家，不得不有以奉询，务祈明示为祷。

（四）提交和会与中日自决的利害

山东交涉问题，中国人主张在巴黎和平会议交涉，日本人原来希望不提交和会，由中日两国直接自决，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和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将来山东的利害关系极大。日本希望直接交涉有三种意思：（一）是青岛问题若不提出和会公决，由中日私自议决，这便造成中日两国在和会里不能列在国际平等地位，这便造成日本代表东亚诸国立在盟主地位，这便造成日本在亚洲的蒙罗主义。同一交还青岛，由和会议决与中日自决，关系两国的国际地位很大。所以十四日《顺天时报》明白说道："关于山东问题最可注意之点，即日本力争由日本将青岛交还中国者果为何故是也。日本所争者，非区区之青岛，非区区之山东，实为维持东洋唯一强国之体面。而所谓维持体面者，又非徒在虚荣，实为东洋百年之安宁计也。"（二）是由和会议决，精神上还是中德的交涉。由中日自决，精神上形式上都是中日交涉。青岛问题完全归到中日交涉，便根本上已经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了。（三）是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兵力和贿赂对待中国政府，藉口交还名义上的青

岛，又可以取得一大批德国权利以外的济顺、高徐铁路和许多矿山的权利。为日本利益打算，自然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好，所以曹汝霖也说日本必将青岛交还中国，倘不交还，他也出来反对。上海总商会这样糊涂的主张(其实用不着他们主张，已经到了这不幸的地位了)，一定说他们暗助日本，或者有点冤枉。但是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知识，不明白世界潮流大势，随便妄谈国事，实在是万分危险呵！

1919年5月18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 署名：只眼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

——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目无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赳赳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

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倘不能照这样征服他们，凭空想他们拿出良心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1919年5月26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卖国都有凭据吗？

小卖国——卖军用地图、外交秘密文件等——往往有凭据，大卖国倒往往没有凭据。若已经有了事实上的证明，只因为没有特别凭据可以到法庭起诉，就说不能加他卖国的罪名，那么世界公认朝鲜卖国贼李完用、宋秉畯，除了亲日的事实以外，难道有什么卖国的特别凭据吗？

只 有 叹 气！

为了山东问题，我们国民除了口头上慷慨悲歌的排斥日本以外，没有丝毫别种觉悟。就以排斥日本而论，只知道单纯而且不能实行的排斥日货，不从根本上振兴工艺着想，我对于这种很浅薄的思想和运动，又不忍反对他们，只有叹气罢了！

自家人不及外国人

政府对于山东问题，是何等软弱退让！对于南方的八条要求，是何等强硬拒绝！难道国家的利权，尽可以让给外国，却断断不可让给自家吗？请问政府当局是什么肺肝？

1919年5月26日 《每周评论》第23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德意志是战败国，战败国的外交失败本是当然的事，然而他们国民对于屈辱条约的示威运动，非常激烈，他们政府未曾丝毫禁止。意大利和日本是战胜国，战胜国侵略别人土地的外交，就是失败也不算是屈辱。但是意大利和日本的国民，还说是屈辱的外交，对于政府的示威运动，也非常激烈，他们的政府却也未曾丝毫禁止。我们索回青岛的外交，既不是因为打了败战，又不是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政府为什么要禁止国民卫国的运动呢？我们现在忍不住要发出极悲惨可怜的声音，奉劝军警诸同胞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同盟会与无政府党

从前清朝未倒的时候，官厅拿人，私人害人，不论青红皂白，都用“同盟会”三字做罪案。后来革命成功了，许多无耻的官僚侦探，都设法加入“同盟会”，而且大摇大摆的在众人面前冒充“老同盟会”。如今想倾陷人的又换了一种罪名做武器，叫做什么“无政府党”。请问中国那里有许多无政府党呢？

北京十大特色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

色：(1)不是戒严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2)一条很好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3)汽车在很狭的街上人丛里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4)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敌。(5)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曾干涉。(6)刮起风来灰尘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7)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8)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9)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10)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

1919年6月1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四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立宪政治与政党

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

六月三日的北京

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贴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吃　饭　问　题

常言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将他止住。”我看人要吃饭，也无法将他止住。各国都有许多雄赳赳虎狼似的军警，要立什么密约便立什么密约，要侵占人家土地便侵占人家土地，要怎样横蛮不说理便怎

样横蛮不说理。独有人民要饭吃，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爱情与痛苦

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南北一致

这回外交问题，政府自有办法，全国的学生和上海的商民瞎热心，添了政府许多麻烦。惟有西南护法诸将帅，除唐继尧外都一言不发，颇与政府宣示外交命令所说"外交繁重，责在当局"，"国人惟当持以镇静，勿事惊疑"的话相合，总算是好孩子，政府应当优待他们。

政学会与桂系

政学会系的军人发了军人不干政的通电，桂系的军人接着就恭恭

敬敬打电给徐大总统、钱总理，单说“护国”，不提“护法”了。不知道他们内中闹的什么猴？

1919年6月8日　《每周评论》第25号　署名：只眼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薄。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决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公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而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
>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1919年6月8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署名：只眼

北京市民宣言[1]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2]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1919年6月9日

（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

① 《北京市民宣言》共一页，上半页为中文，下半页为英文。据高一涵回忆：由陈独秀起草，胡适译，北京大学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印刷。六月十一日晚，陈独秀、邓初（即邓仲纯）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宣言》，陈独秀被暗探跟踪，在散发《宣言》时被逮捕。九月十六日，获释。（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又见：《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辑）。

② 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三人均为皖系军阀的实权派。

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①

久闻贵志发达，惜未细读。又闻"五四运动，诸君出力独多，窃以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但其觉悟之程度，却不一律，是可分为三步观之。其一，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此在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不独参与五四运动者为然，即反对斯举之官僚——甚至曹、章辈——虽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尔，然亦非绝对无此感悟。其二，则政治不良之觉悟。吾人日者屡闻各方面有请愿之举，多涉内政问题，可见国人已有此种觉悟；特以例前者，则觉悟之程度，及具此觉悟者之人数，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其三，则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有如杜威博士所云："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具此种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种觉悟者之人数增加，则尽美尽善矣。

1919 年 11 月　《国民》第二卷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① 原题为《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陈独秀讲话》。演说日期为 1919 年 10 月 12 日。

实行民治的基础

“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

民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北京《民治日报》所说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 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 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 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 生计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重要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

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在这两种工具当中,又是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觉得还有点不彻底;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须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但是我决不因此灰心短气,因为有三个缘故:一是中国创造共和的岁月,比起欧美来还是太浅,陈年老病那有着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国社会史上的现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这种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像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三是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和国家

观念不发达，从坏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因此物质文明不进步，因此国民没有一致团结力；从好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却因此没有造成像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

现在政象不佳，没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缘故，也有好几层：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们从前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军全由军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都以为政府万能，把全副精神用在宪法问题、国会问题、内阁问题、省制问题、全国的水利交通问题，至于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问。五是少数提倡地方自治的人，虽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旧迷信大规模的省自治和县自治，其实这种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划分行政区域和地方长官权限的问题，仍旧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截然是两件事。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必须把上面说的二、三、四、五这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伟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规模的极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上做工夫；不然，无论北洋军人执政也罢，西南军人执政也罢，交通系得势也罢，北方的安福部得势也罢，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学会）得势也罢，进步党的内阁也罢，国民党的内阁也罢，旧官僚的内阁也罢，我可以断定中国的民治，仍旧是北京《民治日报》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民治。

我不是说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内阁，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须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充分发展；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

筑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那一国都还没有实行；政治的民治主义，英美两国比较其余的国家，总算是发达的了。他们所以发达的由来，乃是经许多岁月，由许多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拢起来，才能够发挥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好像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细胞组织、器官组织合拢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们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颁布一部宪法几条法令，就会马上涌现出来的，乃是他们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道："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说道："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

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现在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时局如此纷乱，政府那里顾得到地方自治的问题；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还未经正式国会详细规定出来，我们怎样着手？至于同业联合的组织法，政府国会都还未曾想到，更是无从组织。我想这种见解是大错而特错，是有两个根本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以为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实现。我以为这种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就是能够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

治，我们不要；我们所要的，是从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第二个错误，是以为法律能够产生事实，事实不能够产生法律。我的见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对，我以为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社会上先有一种已成的事实，政府承认他的"当然"就是法律，学者说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学说。一切法律和学说，大概都从已成的事实产生出来的。譬如英、美两国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们的人民创造出来这种事实，后来才由政府编成法典，学者演成学说；并不是先由政府颁布法典，学者创出学说，他们人民才去照办的。所以我觉得时局纷乱不纷乱，政府提倡不提倡，国会有没有议决法案，都和我们人民组织地方自治、同业联合不生关系。

我所说的同业联合，和那由店东组织的各业公所及欧洲古时同业协会(Guild)不同，和欧洲此时由工人组织的职工联合(旧译工联，Trade Union)及其他各种劳动组合也不同；因为此时中国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铁路矿山的督办总办，都是阔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们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纯粹资本作用和劳力没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务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

关于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种种学说、制度，非常之多；至于详细的办法，一时更说不尽；我现在单只就中国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且可以实行的，举出几条原则，免得失了直接的实际的精神，就会发生笼统、涣散、空洞、利用、盘踞、腐败种种不可救药的老毛病。

最小范围的组织

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一乡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夫，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

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

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

这种小组织的地方团体和同业团体，人数都必然不多，团体内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会直接议决事务，无须采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团体的事务，各个分子都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以免得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在积极方面，可以养成多数人的组织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业上尽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观团体涣散。中国现在的地方自治办不好，就是因为大家让少数的绅董盘踞在那里作恶；同业联合没有好效果，就是因为现在各业公所的组织，只是店东管事独霸的机关，与多数的职工店员无涉。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就是因为小组织的人少，便于全体直接参与，一扫从前绅董、店东、工头少数人把持的积弊，又可以磨练多数人办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数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上的话来回答：“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对于政治有很大的责任，然后自然能养成一种政治人才；美国的浩雷斯曼说：‘我们的主张不是说人生下来就配干预政治，不过总要叫他配干预才是。’这就是民治主义的教育。从前美国的选举也有财产、教育、男女

的限制，现在才把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为男女应该有同等权利的理论，姑且不提；单就事实上说，女子加入的坏处，我一时想不出；我却想出许多女子加入的好处，女子的和平、稳静、精细、有秩序、顾名誉、富于同情心等，可以使团体凝结的性质，都比男子好；他们第一美点，就是不利用团体去夤缘官做。

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

执行团体议决事务的董事，由团体全员投票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应当有教育、财产、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数宜多，任期宜短，不能连任；每半年改选三分之一，满期退任的次第，抽签预定。无论大会或是董事会，都只设临时主席，取合议制，不设会长总董。这都是防备少数人盘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地方自治应该注重的是：教育(小学校及阅书报社)，选举(国会、省县议会及城乡自治会)，道路，公共卫生；乡村的地方，加上积谷、水利、害虫三件事。同业联合应该注重的是：教育(补习夜学，阅书报社，通俗讲演)，储蓄，公共卫生，相互救济(疾病、老、死、失业等事)，消费公社，职业介绍，公共娱乐，劳工待遇等事。上海工业界现在有许多同业的联合会发生，我们十分欢迎；但是我们也有十分担心的两个疑问：(一)是否仅仅为了外交的感触？还是另有团体本身生活上实际需要的觉悟？(二)是否店东管事们在那里包办？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颇和我主张的小组织相同；但我们不能满意的地方：(一)到会的会员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体，并没有过半数。(二)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东管事，没有店员的分。(三)本身的组织和实际生活需要的问题，都没有谈

起，请了许多事外的人来演说，发些救国裕商的空套议论，这是做什么！我盼望社会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所注重的实际生活需要讨价过低，说我主张不彻底；我相信照中国现社会的状况，只有这种小组织，注重这种实际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义坚实的基础，乃是政治经济彻底改造必经的门路。我盼望官场中神经过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马上就联想到破坏统一；不要提起同业联合，马上就联想到社会革命。我主张的这种小组织，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实在说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们政权无涉，于你们官兴多碍，就是这种小组织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不但比不上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那样彻底，就是比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还要和平简陋得多。

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

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军人、西南军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已未系、政学会，可以总批他“明抢暗夺误国殃民”八个大字；一定要说那个好那个歹，都是一偏之见，缺少阅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上最后要留意的，就是别让三害鬼混进来，伸出他背上的那只肮脏黑手，把我们的一线光明遮住了。蝇营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惯会看风头，乘机窃取起来，更是眼明腿快，我们要格外严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最好是各种小组织的事务所，都贴上“小心扒手”，好叫大众留神。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坚实的基础，也是故意摆出矮户低檐的景象，好叫这班阔人恐怕碰坏了纱帽翅，不来光顾才好。

这篇文章刚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见张东荪先生新做的《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见《解放与改造》的一卷五号）说得很透彻，可以补我这篇文章的遗漏，读者务必要参看。我所主张的小组织好叫人人有直接参与权，似乎是打破一切寡头制度（头目包办制度自然包含在内）的根本方法；这种思想倘然能够成为事实，成为习惯，不但现在经济方面的恶制度可以扫除，就是将来较大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组织，自然也不会有寡头专制的事发生，真民治主义才会实现。我所主张的同业联合，也含着有“两元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联合会日刊》所说的尽同，而且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话说来太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论旨，改日再谈罢。

十一月二日夜

1919年12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答半农的《D——!》诗[①]

不知什么是我？不知什么是你？

到底谁是半农？忘记了谁是D?

什么顷间，什么八十多天，什么八十多年，都不是时间上重大问题。

什么生死，什么别离，什么出禁与自由空气，什么地狱与优待室，什么好身手，什么残废的躯体，都不是空间上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是什么？

仿佛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近边的人，远方的人，都同时说道：

在永续不断的时间中，永续常住的空间中，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

在这些痕迹中，可以指出那是我，那是你，什么是半农，什么是D。

弟兄们！姊妹们！

那里有什么威权？不过几个顽皮的小弟兄弄把戏。

他们一旦成了人，自然会明白，自然向他们戏弄过的人赔礼。

那时我们答道：好兄弟，这算什么，何必客气！他们虽然糊涂，我们又何尝彻底！

当真彻底地人，只看见可怜的弟兄，不看见可恨的仇敌。

提枪杀害弟兄的弟兄，自然大家恨他；

懒惰倚靠弟兄的弟兄，自然大家怨他；

抱着祖宗牌向黑暗方面走的弟兄，自然大家气他；

损人利己还要说假话的弟兄，自然大家骂他；

---

① 这首诗作于1919年11月5日，刘半农的诗《D——!》载于《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1日。

奉劝心地明白的姊妹弟兄们，不要恨他，怨他、气他、骂他；

只要倾出满腔同情的热泪，做他们成人底洗礼。

受过洗礼的弟兄，自然会放下枪，放下祖宗牌，自然会和作工的不说假话的弟兄，一同走向光明里。

弟兄们，姊妹们！

我们对于世上同类的姊妹弟兄，都不可彼界此疆，怨张怪李。

我们的说话大不相同，穿的衣服很不一致，有些弟兄底容貌更是稀奇，各信各的神，各有各的皮气，但这自然会哭会笑的同情心，会和我们连成一气。

连成一气，何等平安、亲密！

为什么彼界此疆，怨张怪李？

大家见了面，握着手，没有不客气、平安、亲密！

两下不见面，便要听恶魔底教唆，彼此打破头颅，流血满地！

流血满地，不止一次，他们造成了平安、亲密，在那里？

我们全家底姊妹弟兄，本来一团和气；

忽然出来几位老头儿，把我们分做亲疏贵贱，内外高低；

不幸又出来几条大汉，把一些姊妹弟兄团在一处，举起铁棍，划出疆界，拦阻别的同胞来到这里；

更不幸又出来一班好事的先生，写出牛毛似的条规，教我们团在一处的弟兄，天天为铜钱淘气；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离，失了和气？

不管他说什么言语、着什么衣裳，不管他容貌怎样奇怪，皮气怎样乖张；表面上不管他身上套着什么镣锁，不管他肩上背着什么刀枪，那枪头上闪出怎样的冷光，肮脏的皮肉里深藏着自然会哭会笑的同情心，都是一样。

只要懂得老头儿说话荒唐，

只要不附和那量小的大汉，

只要不去理会好事的先生底文章，

这些障碍去了，我们会哭会笑的心情，自然会渐渐地发展。

自然会回复本来的一团和气，百世同堂。
怎地去障碍，怎地叫他快快发展，
全凭你和我创造的痕迹底力量。

我不会做屋，我的弟兄们造给我住；
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姊妹们做的；
我不会种田，弟兄们做米给我吃；
我走路太慢，弟兄们造了车船把我送到远方；
我不会书画，许多弟兄姊妹们写了画了挂在我的壁上：
有时倦了，姊妹们便弹琴唱歌叫我舒畅，
有时病了，弟兄们便替我开下药方；
倘若没有他们，我要受何等苦况！
为了感谢他们的恩情，我的会哭会笑底心情，更觉得暗地里增长。

什么是神？他有这般力量？
有人说：神底恩情、力量、更大，他能赐你光明！
当真！当真！
天上没了星星！
风号，雨淋，
黑暗包着世界，何等凄清！
为了光明，去求真神；
见了光明，心更不宁。
辞别真神，回到故处，
爱我的、我爱的姊妹弟兄们，还在背着太阳那黑暗的方面受苦，
他们不能和我同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

作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1920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署名：独秀

《新青年》宣言[①]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

---

① 本篇原题为《本志宣言》，发表时未署名，收入《独秀文存》时改为现标题。

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1919 年 1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随　感　录

法律与言论自由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像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像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

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像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俄国 Lenin 一派的 Bolsheviki 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

党在瑞典都城 Stockholm 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 Bourgeoisie(工商社会)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 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竟占了多数，因此叫做 Bolsheviki，英文叫做 Major group(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 Lesser group)Mensheviki 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 Bolsheviki 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Bolsheviki 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暂且不去论他，痛恨 Bolsheviki 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利权，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我们暂且也不去论他；那第一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 反对 Bolsheviki 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蒙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

(二) 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主张和 Bolsheviki 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的德国的现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又在那里讨论扩充海军预算等。

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 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辨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 Bolsheviki 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换一方面说：Bolshevikism 的内容，和他们如果得志思想上有无变迁，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没有人能够断定；但是现在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阶级的、一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利权，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

调和论与旧道德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一)

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同一人数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这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我们抱着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固然可以据进化史上不幸的事实，叙述他悲悯他实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灾乐祸得意扬扬的主张他应该如此。譬如人类本能上，有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等恶德，也没有人能不承认是实在如此。然断乎没有人肯主张应该如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再说到道德问题。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于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

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却不限于东洋、西洋。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那里；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旧的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好处在那里？勤俭二字用在道德的行为上，自然是新旧道德都有的，不算旧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像那刻薄成家的守财奴，勤俭都是他作恶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标准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章行严先生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这种偏枯专制，没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旧道德造成的。这种道德就是达到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会；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公同生活的理想，还远的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不能满足。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

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岂不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笼统”与“以耳代目”

头脑不清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原，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这种不求甚解的脾气，和我们中国人思想学术不发达的关系很大，详细说起来，不但太长，而且要惹出许多无谓的是非和可笑的辨论，现在且举一个极浅显的例：

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对于一切学堂都叫做武备学堂，一切报纸都叫做《申报》，一切新派的人都叫做吃洋教的，像这样不求甚解，像这样“笼统”，这样“以耳代目”，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真想不到现在北京竟有一班士大夫，攻击蔡孑民先生说他是耶稣教徒；又有一班留美学生，攻击胡适之先生，也说他是一个耶稣教徒。蔡、胡两先生是不是耶稣教徒，他们曾在本志发表的文章可以证明，硬相信他们是耶稣教徒，未免犯了“以耳代目”的毛病；即令他们的确是耶稣教徒，也不算什么错处，拿这个来做攻击的材料，未免犯了“笼统”的毛病。

我并不是替蔡、胡二人辨护，他们也用不着我辨护，我所伤感的是中国现在的士大夫、留学生，还是和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一样！

留学生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派遣留学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国，一次

是现代派到西洋。这两次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简直可以说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这两次留学生造成的。我们中国派遣学生出洋的时间、人数都不算很少，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却是关系很深了。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要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这是什么缘故？各部里每月用几百张纸钱，可怜裹住了多少英雄！我奉劝已回国未回国的留学生诸君，别抛弃你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

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

那个军人不横暴不抢钱？那个官僚不卖国肥家？那个政客不结党营私？我们从前专门骂段派，骂曹、陆，骂安福俱乐部，以为中国人要算这班分子最坏，中国必断送在他们手里；以为别的军人，别的官僚，别的政客，总要比他们好些，其实这种观察是一偏之见，大错而特错。

南京、武昌、广州也都禁止国民爱国运动，拘捕学生，打伤学生，比北京还要利害。广州的护法军人居然赶跑了议员，打毁了报馆，枪毙了主笔；北海的鱼都飞了，佛也跑了，河间府的田地现在也买不着了；南昌的商会叫苦连天；全国督军的荷包都满了；吴佩孚一旦做了湖南督军，假面就会揭穿。我们为什么专门反对段派呢？

中国实业公司是些什么人主持，在那里内外勾结大卖而特卖呢？北京的中、交票是何人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还设法阻碍他兑现呢？“新华储蓄”的功德是谁做的呢？各条铁路是那一系的人把持舞弊弄到这步田地呢？北京□□胡同新造的大洋房，这钱是从那里来的？军事协定究竟有没有得过日本贿赂的人？北方官场中能找得出几个像董康那样干净的人呢？南方官场中能找得出几个像伍廷芳那样干净的人呢？我们为什么专门反对曹、陆？

上海某某制药公司是那些人帮他运动注册的？第一次北方议和代表用的八十万，南方代表都毫无沾染？倪嗣冲盐斤加价的事，安徽人无不痛心切齿，偏偏有个进步党的首领说是义举。新思潮的运动，已经很受压迫了，现在又加上一个国民党的要人大骂无产社会，说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广东财政厅，盐运使，关税余款，西南银行的问题，闹得鸭屎臭；北京固然是一派人的家天下，广州也是政学会的家天下；军人反对旧国会的军政府改组案，不是他们指使的吗？他们上海的机关报，现在开始攻击新文化运动了。我们为什么专门反对安福俱乐部？

我并不是为段派、曹陆、安福部辩护，我只希望我们青年国民要有彻底的觉悟。所谓彻底的觉悟，并不是要来彻底的攻击他们，是要一方面彻底的觉悟他们都不可靠，一方面彻底的觉悟只有我们自己可靠。不管他们怎样横暴贪污，只要我们自己万万不可再像他们那样横暴贪污，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这公正廉洁的部分渐渐延长，那横暴贪污的部分自然就渐渐缩小。照这样办法，虽说过于迟缓，就怕比用特别大气力、求急速改造社会的效果还大，还要实在。就是攻击他们，也不可偏责一方，因为他们通是一路的人，若是责甲恕乙，不但甲心不服，乙必暗笑这班书生容易欺骗。

1919 年 1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告北京劳动界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

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我想一班失势的帝王贵族，何妨把横竖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劳动阶级之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覆，就是新旧帝王贵族，勾结盘踞的日本政府，也要添设"劳动事务局"和"社会局"。社会局附属在内务部，办的是工场法、劳动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价、利益分配几件事务。劳动事务局是在农商部的劳动局之外，直隶内阁和各部平行的机关，办的是贫民救助、职业介绍、住屋改良、贱费医诊、孤儿贫儿养育、盲哑保护，儿童俱乐部、儿童图书馆、公共卫生、传染病预防、禁烟、禁酒、消费公社、公设市场等项事务。

现在我们中国的劳动问题怎么样？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

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的人（许多无地劳动、无力劳动、不肯劳动的贫民，还不在此内）。如此，我们现在要提出劳动问题、贫民救济问题来讨论，大概不是“无中生有”“无病而呻”罢？象日本社会局、劳动事务局打算办的各种事务，未见得不比“祀孔”、“文官考试”、“西北边防”、“封禁报馆”、“建立功德祠”更加要紧。因为多数人没有饭吃，是一件最要紧最危险的事啊！

据本月十七日北京《民治日报》的《北京的见闻录》上说：单是内右四区，就有赤贫的一八二八户，七七四九人。我从前做过一篇《贫民的哭声》，想替北京贫民诉点苦况，必是财产阶级的先生们都看不上眼，所以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前几天梅兰芳一班戏子，在新明大戏院唱戏为车夫休息所筹款，倒很令人佩服，不知道北京的士大夫对于这件事作何感想？

劳动界的痛苦自然很多，一时也说不尽。北京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一）是中交纸币，不吃他工价暗亏的直接痛苦，也受他物价加高的间接痛苦。（二）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饮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三）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靠拖车糊口。

我现在所盼望劳动界的，并不是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消极的努力，就是不赌钱，不吃酒，不吸烟，不扎吗啡针，不去当兵，不要早婚配多养儿女。积极的努力，就是创设同业联合（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我做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学、储蓄机关，这几件事紧急，要提前先办。

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以外另行组织。成衣和理发匠本来都有团体，不过组织的方法要大大的改变。排字印刷制版的工人也有一两万，内中认识字的很多，应当容易组织。邮差都认识字，又和交通机关接近，组织起来更快，并可以帮助别的劳动团体的活动。北京虽然没有很大的制造厂，但是像东单牌楼一带的铜铁厂、制靴

铺，骡马市大街的木工厂、“祥聚”、“福盛”、“德善”、“骏生”、“振纶”等织布厂，“丹凤”火柴、洋烛两公司，首善工艺厂，度量衡制造厂，彰仪门大街的工艺局，彰仪门内的“富兴”、“长顺”两个纸坊，据我所知道的这些地方，合拢起来，工人也不在少处，只是没有联合的组织，便拿不出你们办事的力量。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我盼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我也盼望他们恳恳切切的来做你们的朋友。你们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

我盼望官场和资本家，你们既然反对“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尽政府的职分，就应该注重民生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当做全国人的公共机关，不应该把政府当做专门保护少数人财产工商阶级利益的机关，不应该把多数人无产劳动阶级的痛苦不放在眼里。你们何妨趁夺利争权的余暇，把杀人的军费省下一点，把中交票抬高一点，或者也仿照日本政府“社会局”、“劳动事务局”的办法，对劳动界施点“仁政”。你们对于劳动问题，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催派代表到会，我看是用什么“临时抱佛脚”的法子对付！

我盼望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法兰西从前的贵族，鄙薄那激烈的革命党人，送他们一个“无〔套〕裤汉”(Sane Cultte)①的混号，现在他们这班无裤汉，内中恐怕有些人穿上军服礼服，自命为知识阶级的绅士了。我们的中华革命党，现在也有个人居然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挺起胸脯歪着嘴骂无产阶级的人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我看你们刚才穿上裤子没有几天，不必像煞有介事！

1919年12月1日 《晨报》 署名：陈独秀

---

① 现译名无套裤汉。原是穿华贵短套裤的贵族和富人对穿粗长裤平民的蔑称。至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为革命者自豪的称号。

对于国民大会底感想

国民大会，是我们人民对于本国政府及世界各国表示我们公共意见底一个顶好的方法，前回国民大会，因为政府里人胆子小疑心大没有开成，很觉可惜。昨天的国民大会居然开成了，而且到会底人很多，秩序很好，所以我个人对于昨天的大会有两个乐观：一是可以令政府放心，令政府觉悟，市民聚众开会只要官厅不来无理压制，未见得就一定要做出破坏秩序底事；从今以后政府可以安心让我们大家发布意见，免得无理压制反来激成事变。一是向来不大热心公益底安会长[①]，昨天也到会签字，担任抵制日货日币底完全责任，我们十分感谢他。

我有一个小小不满意底地方，就是学生所散传单，内有“日奴”“日本小鬼”等字样，这实在不是正当的态度。

我对于今后国民大会应该做什么，也有二种意见：一是对内，一是对外。

对内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导政府不是说空话，是叫他们要明白非遵照人民底公共意见办事不可，是叫他们不敢贪赃枉法卖国殃民。推倒一个政府若是再建一个政府，张王李赵无论谁来组织政府，都是“鲁卫之政”，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若是不能指导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添上一些无谓的扰乱罢了。大家如若不信，请看民国底政府比前清怎么样？现在的内阁比以前的内阁怎么样？

对外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抵制日货底方法。我并不是反对排货底运动，我觉得我们要有有组织的运动，而且应当乘此时机振兴工商业，才是根本办法，单是空口抵制日货，恐怕不但没有什么效果，而且我们自

---

① 即北京商会会长安迪生。

己白受经济上的损失。在日本方面看起来，我们抵制日货，并不是表示仇恨底意思，是要拿排货底手段，造成他们产业界底危机，促进他们抛弃侵略主义底觉悟。但是有一位日本底社会党人告诉我说："日本社会党很盼望中国抵制日货，但必须各重要的商埠都有持续六个月底精神，日本工商界才能够发生危机"。可见短期的排货手段，恐怕不能叫日本觉悟，我们的商界反大受损失。在中国方面看起来，纸、糖、布等许多日常必需品，十有八九都是日货，严格抵制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无论那一国人，爱国心鼓励底力量总没有经济压迫底力量大，况且中国人爱国心底力量更是薄弱得很，少数人乘着感情说大话，那里会有实际的效果？所以我以为排货底办法，若是乘着一时的热情，向一团散沙底群众，摇旗呐喊，决计没有用处，一定要将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研究，究竟拿什么组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我们圆满的目的。我以为一方面用消极的排货方法，涣散的十人团还不济事，是要急速设立各种的同业组织，相约绝对停购日货底奢侈品，尽量减少日货底必需品。代以国货或西洋货。一方面用积极的振兴工业方法，先从纸、布、糖这几项消费最多的着手。以前我们的排货政策屡次失败，都是没有组织，和没有国货填补两个原因。今后仍然脱不了因果关系，我们应该有大大的觉悟！若是有组织的排货运动，不是散沙的排货运动，而且渐渐有国货填补，日子久了，必能够叫日本产业界发生危机，必能同日本底明白人联络起来，扫荡东方底侵略主义。若是没有组织的散沙运动，又没有国货填补，这种短期的偶发的排货运动，不过徒然叫本国商人受经济的损失罢了，那能够促起日本人底觉悟呢？

1919 年 12 月 11 日 《晨报》 署名：陈独秀

自　杀　论

——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君在三贝子花园投水自杀了。他自杀底原因，大概是厌世。

林君底同学罗志希君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说林君不是因病想免除痛苦而死，乃是万恶社会迫他自杀的；他并说出三个救济底方法：（一）美术的生活，（二）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新的人生观。

北大教授蒋梦麟先生也做了一篇文章，他不把青年自杀的罪恶都加在社会身上，他说："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他。"他主张"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用大刀阔斧斩一条路，为后人造幸福"，"从地狱里造天堂"。他以为"自杀是自示其弱"，"自杀是一个大罪恶"。他以为自杀算是杀了社会上一个人，而且是杀了社会上一个有用的好人。

北京《晨报》上登了一首《读〈自杀论〉有感》的诗：

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劳苦！不若永死了不复生。

我昔曾绝望。自杀，岂粗鲁？当我自杀时，万象皆空，情志自由，乐难数。

神魂即与体魄离，茫然如睡，无知无识，更何忤？

谁谓自杀是懦夫？懦夫岂能自杀，甘为虏？

利己利他两不亏。何罪，求死不自主？

今且追恨援救我的人，把我解了；死乃生之祖。

茫茫宇宙何时停？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

有一个外国人，听见蒋梦麟先生谈学潮后青年底三种心理：（一）事

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二)思想自由；(三)改变人生观。他便说：好危险！将来恐怕有许多青年要自杀。

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也要做一篇论青年自杀的文章，他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做出来，他的意思大概是：能自杀的人固然比偷生苟活的人好，但是再转一个念头，能用自杀的精神去改造世界，比消极的自杀更好。

杜威夫人说："我不自杀。若是我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

以上都是对于林君自杀底各种感想。我以为林君自杀，是青年自杀中底一件，青年自杀，是全般自杀中底一件，要评论林君自杀底问题，不得不从全般自杀问题说起。

自杀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那里还有别的现象，别的问题发生呢？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感想可以解答的。我现在从各种方面分别讨论如下：

一、自杀底趋势

二、自杀底时期

三、自杀底原因

四、自杀底批评

五、自杀底救济

一、自杀底趋势　据社会学者说，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我以为是思想发达和经济压迫底程度)加增底趋势，因此各国自杀底人数多寡不同。从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一年，五年间平均计算，欧洲各国底人口一百万里，自杀底人数如下表：

丹麦	二五三
法兰西	二一八
瑞士	二一六
普鲁士	一九七
奥地利	一五九
比利时	一二二
瑞典	一一九

巴威利亚	一一八
英格兰	八〇
那威	六六
荷兰	五八
苏格兰	五六
意大利	五二
爱尔兰	二四

有一位意大利底社会学者也说自杀底事，多发生在智识阶级，曾统计意大利和法兰西百万人中，自杀的人职业如下：

法兰西	
自由职业	五一〇
工业家	一五九
原料制造者	一一一
商人，运送业	九八
仆婢	八三
意大利	
科学家、文学家	六一四
军人	四〇四
教育家	三五五
行政官	三二四
商人	二七七
司法官	二一八
医生	二〇一
工业家	八〇
原料制造者	二五

二、自杀底时期　欧洲自杀底时期，每年从一月起，渐渐增加；自七月起，渐渐减少。日本人底自杀期，每年七八月间最盛。

三、自杀底原因　据统计学者底话：自杀事件，文明人比蛮族多，教育程度高的比程度低的人多，青年老年比少年人多，妇女比男子多，未婚的人比已婚的多，都会比乡村多，穷人比富人多。照统计学上自杀

底人数看起来，可以发见自杀底三个原因：

(一) 智识信仰发达——文明人、有教育的人、青年老年人

(二) 情绪压迫——妇女、未婚的人

(三) 经济压迫——都会里的人、穷人

这三个自杀底原因，详细地追本求原，社会压迫自然是这三个原因底总原因；但分别说起来，前两个是偏于主观的，后一个是偏于客观的。偏于主观的自杀，虽然受了社会压迫或暗示的影响，而自杀者的意志在主观上多少总与压迫的或暗示的意志相结合；偏于客观的自杀，大部分是因为社会的压迫。

再就自杀事件底各种直接的原因，除精神病之外，可以类别如下：

(1) 厌世及解脱
(2) 烈女殉夫
(3) 忠臣殉君及奴仆殉主人
(4) 义士殉国家及朋友
(5) 教徒殉教及志士殉主义
——第一类，关于知识信仰。

(6) 失恋
(7) 羞惭
(8) 忏悔
(9) 名誉被污
(10) 考试落第
(11) 刑罚底痛苦
(12) 虐待底痛苦
(13) 疾病底痛苦
(14) 愤恨
——第二类，关于情绪压迫。

(15) 饿寒所迫
(16) 债务所迫
——第三类，关于经济压迫。

第一类底男子殉忠，女子殉节，都是中国、日本重要的道德，最大的荣誉，印度还有寡妇自焚的事。像这类的自杀，完全是被社会上道德习

惯压迫久了，成了一种盲目的信仰；因为社会上不但设立许多陷阱似的制度，像昭忠祠、烈士墓、旌表节烈、节孝牌坊等奖励品，引诱一班男女自杀；而且拿天经地义的忠孝大义，做他们甘心自杀底暗示；这种压迫和暗示受久了，便变成一种良知，觉得殉忠殉节，真是最高的道德，不如此便问心不过。殉教、殉主义、厌世、求解脱，这几种自杀，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上社会直接的压迫，一方面也因为主观上受了一种新信仰新思潮的暗示，暗示也算一种间接的压迫。Wundt 把暗示（Suggestion）叫做"醒的催眠"（Watch-hypnose），因为他也有催眠作用，受了暗示的人，便入了"意识逼窄"（Narrowing of consciousness）的状态，暗示底力量压迫着他的思路向一定的方向进行，他自己的意志完全失去效力（略用 Christensen 底意思，见 Politic and crowd-morality p. 12）。Christensen 分暗示为二大类：一是别人的暗示（Foreign suggestion），一是自己的暗示（Auto-suggestion）；别人的暗示又分两种：一种是人身的暗示（Personality suggestion），一种是社会的暗示（Social suggestion）。人当恐怖、猜疑、冥想、迷信底时候，多起自己暗示的作用，中国人怕鬼，就是这种作用。人身的暗示，最有力量的是两亲、业师、宗教家、医生、演说家、音乐家、演剧家、大思想家、社会改革运动者、大文豪、爱国者，不但同地同时，就是在远方古代，他们也都有暗示底力量；社会的暗示就是历史、传说、习惯、舆论、道德、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思想潮流，这几样暗示底力量强大而且久远。个人底行为或者不能说全没有意志自由底时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选择信仰行为以后，都完全受环境暗示底支配，决没有自由底余地。自杀也是一种行为，所以不能说不是受环境底压迫和暗示。压迫和暗示紧紧地逼窄了他的意识，意识失了觉性，意志失了效力，好像鬼迷了一般，压迫在后面追赶，暗示在前面指引，所以不知不觉地只看见自杀是唯一的道路，不容他看见第二条道路；而且暗示占领了他的知识界域，成了信仰，也不愿意走别的道路；所以平常人看做极悲惨，可恐怖的事，自杀的人看做平常，绝不回顾。这一类自杀的人所以多是文明有教育的青年，因为知识信仰发达的结果，比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容易接受这种暗示。

第二类底（6）、（7）、（8）、（9）四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道德习

惯和舆论的压迫;(10)、(11)、(12)、(13)、(14)五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社会制度的压迫。人是社交的动物,一旦受了压迫,社会上无立足之地,断绝社交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像这种人自然毫无生趣;但是他们倘不受厌世思想、解脱主义的暗示,恐怕还没有自杀底决心。因为自杀多兼两种原因:一是社会的压迫,一是思想的暗示;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比较自杀的少,都是思想不发达,缺少第二种原因;倘若二种原因俱全,无论怎样勇于奋斗的人,一方面为社会底道德制度所驱逐,一方面为厌世思想所引诱,还有不自杀的道理吗?妇女的情绪易于感动,未婚的人情绪容易失调,所以自杀底人数比男子比已婚的人多。

第三类的自杀,纯粹是因为经济的压迫,受思想暗示底影响很小。都会里的人生活更艰难,所以自杀的比乡村多。物质文明越发达,富人兼并的力量越大,穷人所受经济压迫的痛苦越深,所以文明人自杀的比蛮族多。这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不良底结果,不能说是文明本身底弊害。至于学说思想随着别的文明发达,而且传播加快,厌世主义的暗示,也随着效力加大,所以各国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加增底趋势,这只可以说是厌世主义的弊害,不能归罪文明本身。这种受了思想暗示的自杀,应该归到第一类,和第三类的自杀关系很浅。因为受经济压迫而自杀的人,大半教育知识底程度很低,未必有学说、思想上的信仰;所以有许多困苦不堪老年残废的乞丐,还要贪生怕死,有为的青年却往往自杀,就是这个缘故了。少年人自杀的少,也因为他感觉痛苦和暗示的力量薄弱。有几种蛮族不但他们自己不自杀,并不相信人类真有自杀底事,正因为他们一方面思想不发达,一方面经济的压迫也不甚利害。

以上三类十六种自杀底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两大总原因:

(一) 社会的压迫(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

(二) 思想的暗示(个人的,社会的两方面)。

四、自杀底批评　古来对于自杀底批评,有反对非反对两派:

(甲) 反对派

(一) 佛教反对一切杀,自杀也包含在内,而且他们相信轮回,杀这世的肉身,无济于事。

（二）基督教极端反对自杀，以为犯了自杀罪的人不能够到天堂。罗马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主张就是受污的女子也不应该自杀。

（三）意大利神学者阿夬纳斯(Thomas Aquinas)说自杀有三样罪：一是违背了好生恶死的自然性；二是减少了社会底分子；三是侵犯了上帝底生杀权。

（四）费希特(Fichte)说为人生存时有义务，自杀是想免除义务，所以不道德。

（五）叔本华(Schopenhauer)说自杀不是应该非难的行为，乃是糊涂的行为，因为自杀只能够灭绝肉体，不能够灭绝本体(即意志)。他又以为自杀底真正目的，在求得精神底平安，否定意志是达此目的底唯一方法。否定意志是什么？就是无我主义。

（乙）非反对派

（一）希腊禁欲派(The Stoics)说自杀可以解脱一切痛苦。

（二）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人类处置自己的生命，若算是侵犯上帝底权利，那么人要延长上帝用自然法限定的生命，岂非也不应该吗？"又说："我若是没有力量为社会造福，或是为社会底累赘，或是因为我的生命妨碍别人为社会尽力，那么我若是自杀了，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三）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反对国家设立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和处罚自杀未成的等法律。

（四）福录特尔(Voltaire)说："若说自杀有害于社会，那么屠杀生命的战争，何以各国底法律都认可？"

我们对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两种趋势：一是古代宗教家大半反对自杀，一是后来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大半不反对自杀。希腊古代的风气，本和自由思想的近代相仿佛，所以有 Stoic 一派的主张，完全与基督教相反。自由思想的希腊人，事事与基督教相反，不止自杀一端。

五、自杀底救济　讨论自杀底救济，第一个先决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救济底必要？

我们为什么要救济自杀？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

便自然破灭。各国政府所深恶痛绝的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说他们是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到是真有两个可以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他们却不曾看见。这两个思想是什么呢？一个是独身主义（我以为不婚主义和独身主义是两样），一个就是自杀。

更进一步讨论，我们为什么要维持这社会不让他破灭呢？这种疑问是很难解答的疑问，是哲学上的疑问；厌世百杀的人，正是这种疑问达到他心境最深的处所，感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才发生一种彻底的觉悟，最后的决心；这种自杀是最高等的自杀，是哲学的自杀，是各种自杀底源泉、模范，各种自杀多少都受了他暗示底影响。这种对于人生根本上怀疑的自杀，决非单是改良社会制度减轻压迫所可救济；他心境深处底疑问倘没有圆满的解答，对他说什么生活好，什么生活不好，什么社会制度好，什么社会制度不好；对他说自杀道德不道德，犯罪不犯罪，于社会有害无害；对他说什么死得值不值，什么徒死不能收改良社会的效果，什么为人类造幸福应该奋斗到底，什么自杀是女性，是示弱，是懦夫。像这一类的话，都是隔靴搔痒，在他的眼里都没有一看的价值。只有能解答他心坎里面深处所藏人生哲学的疑问，才能够改变他的人生观，才能够做他不去自杀的暗示。

我以为这种疑问，是两种心理造成的：一是苟且心，一是偏见。苟且心出于宗教上"空观"底暗示，以为人生百年，终久是死，死后底社会更和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偏见出于哲学上"性恶"底暗示，以为人类生来性恶，救济、希望，终久是绝对的不可能，像这种黑暗万恶的社会，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

这两种心理都可以造成厌世自杀，懦弱的人就是不自杀，也要变成顺世堕落一派；顺世堕落原来就是厌世自杀的变相，都是极危险的人生观。这两种人生观，对于人生底价值都是根本地怀疑：一切皆空，人生底意义是什么，价值在那里？黑暗万恶，人生底价值又在那里？人生既然无意义，无价值，活着徒受痛苦，不自杀便是无意识的苟活。

人生果然完全是空？人性果然完全是黑暗？人生果然无意义，无价值？

相信"空观"的人，未必都相信灵魂转生（果然灵魂转生，不但现世界空

而不空，并且死后底社会还和我关系不断），就是我也不相信灵魂转生；但是“种性不灭”、“物质不灭”，我们是相信的；一切现象是转变不是断灭，一切空间时间都无实在性，都是这永续无间的转变现象上便于说明的一种假定，我们也可以相信的。我们个体的生命，乃是无空间时间区别的全体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这永续转变不断的大流中，本来是合成一片，永远同时存在，只有转变，未尝生死，永不断灭。如其说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说分别人我是空是幻，如其说一切皆空，不如说一切皆有；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各种历史都是全体生命大流底记录，我与非我一切有生命底现象、痕迹，都包含在这些记录里面。我们个体生命和全体生命底现象、痕迹，无论是善或恶，是光明或黑暗，总算是“有”不是“空”。

复次讨论人性问题，“性恶说”本是一种偏见，人性本有善恶两方面如下表：

善的方面：	**恶的方面：**
创造的冲动	占有的冲动
利他心	利己心
互助的本能	掠夺的本能
同情心（即恻隐心）	残忍心
爱慕心	嫉妒心
哀哭的本能	嗔忿的本能

在生物进化上看起来，人类也是一种动物，他本性上恶的方面，也和别的动物一样；不过恶的方面越减少，善的方面越发达，他的品格越进化到高等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虽是最高等动物，“下等动物的祖先”所遗传的恶性固然存在，他们所遗传的善性也未尝不存在；况且现在正在进化途中，恶性有减少底可能，善性有发展底倾向，何以见得绝对没有救济底希望呢？受厌世主义暗示的人，只看见人性上恶的方面，没有留心那善的方面，岂不是偏见吗？

“空观”是世俗囿于现世主义底一种反动，“性恶底悲观”是过于把人类看得高明底一种反动。反动不合真理底本来面目。我们现在要了

解人生不完全是空；而且要了解这不空的人生不完全是恶，我们要了解人生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了解得人生底意义与价值是什么，他心境最深处所怀的疑问，便自然有了解答，自然会抛弃那危险的人生观。

危险的人生观，厌世的自杀，乃是各种自杀底母亲，这种自杀底救济，也就是各种自杀底根本救济。因为自杀底原因虽各不相同，多少都受点厌世思想的暗示，这种暗示可以算是各种自杀底共性。解除了暗示，抛弃了危险的人生观，对于人生根本的怀疑有了解释，方才可以和他说什么改良生活状况，反抗社会压迫，由个人改造社会，奋斗到底一类的话。这种自杀有了救济，其余自杀底救济才有路可寻。

厌世观以外，其余的自杀：像上文所列的(2)、(3)、(4)、(7)、(8)、(9)六种，都是为了社会道德习惯上积极的压迫；(5)、(6)两种，都是为了宗风名教学说道德上消极的压迫；(10)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压迫；(11)、(12)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消极的压迫；(13)、(14)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或消极的压迫。

社会成了固定性底时候，他的道德的组织和制度的组织，往往发挥一种极有势力的集合力，压迫、驱逐那和他组织不同的分子；那被他积极的(就是奖励)或消极的(就是禁止)压迫而没有集合力和他反抗的分子，往往出于自杀。这种被压迫、驱逐而自杀的分子倘然多了，决不是全社会中底好现象。救济底方法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压迫的社会要觉察自己的组织底缺点，要有度量容纳和自己组织不同的新生分子，要晓得这种分子将来也会有集合力，也会有一种新组织，取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分子倘然发见了社会底罪恶，不要消极的自杀，要有单人匹马奋勇直前的精神，要积极的造成新集合力和压迫的社会反抗。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反抗与结合，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社会进化所必经的现象；社会上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

经济压迫的自杀，自然也是社会制度不良的结果。世界上对于这种自杀底积极的救济，正闹得天翻地覆，现在不用多说了。我相信社会经济制度果然能够改变，生产机关、工具和生产物，都归到生产者自己手里，不被一班好吃懒做的人抢去，那时便真能达到孔子“均无贫”的理想。因为贫富是比较的现象，缺乏乃是对于不缺乏相形见绌的情况，分

配果然平均，那里会有贫的现象？生产物果然按劳力分配平均，无论生活如何困难，那里会有心怀不平愤而自杀的人呢？

据以上讨论，自杀底救济，仍用因果法则，照着自杀底总原因分为两事：

（一）解除思想的暗示（改造人生观）；

（二）解除社会的压迫（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组织）。

现代青年的自杀，大多数是（1）、（6）两种原因；林君自杀自然是厌世不是失恋。这班现代的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这些理想无一样不和现社会底道德、信条、制度、习惯冲突，无一样不受社会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足以介绍他们和思想潮流中底危险的人生观结识，若是客观上受社会的压迫，他们还可以仗着信仰鼓起勇气和社会奋斗，不幸生在思潮剧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主观上自然会受悲观怀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象这种自杀，固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自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不算是社会杀了他，算是思想杀了他呵！忠节大义的思想固然能够杀人，空观、悲观、怀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

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吗？有的，有的，但是最近代最新的思潮不是这样。思潮底趋势如下表：

古代思潮：	近代思潮：	最近代思潮：
理想主义	唯实主义	新理想主义、新唯实主义
纯理性的	本能的	情感的
超自然的	自然的	以自然为基础的
天上的	地上的	人生的
神的	物的	人的
全善的	全恶的	恶中有善的
全美的	全丑的	丑中有美的
未来的	现世的	现世的未来
人性超越万物	人性与兽性同恶	人性比兽性进化

理想万能	科学万能	科学的理想万能
玄想	现实	现实扩大
无我	唯我	自我扩大
主观的想像	客观的实验	主观的经验
个人的非国家的	国家的	社会的非国家的

古代的思潮过去了，现在不去论他。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我们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他的反动，他的救济，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就是最新的思潮；古代思潮教我们许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我们绝望，最近代思潮教我们几件可靠的希望；最近代思潮虽然是近代思潮底反动，表面上颇有复古的倾向，但他的精神、内容都和古代思潮截然不同，我们不要误会了（参看《新青年》六卷六号中《文艺的进化》）。

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Bertrand Russell）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和法国罗兰（Romain Rolland）底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和罗丹（Rodin）底新艺术。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中《精神独立宣言》）。

这思想变动的时代，自然是很可乐观的时代，也是很危险的时代，很可恐怖的时代，杜威博士和蒋梦麟先生所虑的，想必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底必经的阶级〔段〕；况且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并不危险，并无恐怖性，岂可因噎废食？

1920 年 1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①]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底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1)我祷告我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2)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3)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姊妹们都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新 出 版 物

近来新出了许多杂志，并且十种里总有八九种是说“人”话的新杂志，不用说中国社会上只有这件事是乐观。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更有数

---

① 《双十》，1919年10月10日创刊，后改名《浙江新潮》，共出刊四期。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第一中学查猛济和甲种工业学校沈乃熙（沈端先、夏衍）等二十多位学生联合创办。《非孝》的作者是施存统，批评杭州四家报纸一文的作者是沈宰白（夏衍）。

种进一步的感想：

（一）出版物是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文化运动底全体。出版物以外，我们急于要做的实在的事业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只走这一条路？若是在僻远的地方——云南、甘肃等处——发行杂志，到也罢了，像北京、上海同时出了好些同样的杂志，人力上、财力上都太不经济了。

（二）我们的民族性，是富于模仿力，缺少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将来恐怕还有新新新舞台，还有新新新新无穷新……舞台出现，像这点小事，都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现在许多人都只喜欢办杂志，不向别的事业底方面发展，这也是缺少创造力底缘故。就以办杂志而论，也宜于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杂志，若是千篇一律，看杂志的同是那一班人，未免太重复了。

（三）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

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

我从前总觉得尊孔与复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在又觉得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日本要侵略我们土地利权的，是那军阀、财阀、外交官和保守主义的新闻记者，那进步主义的社会党人，却都以为不应该侵略中国。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保守主义的渥木斯克政府，自己已经是朝不保夕了，还仍旧想侵略蒙古和黑龙江；他若是强起来，岂不是第二个日本吗？现在保守主义的英、法政府，仍旧在那里梦想侵略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虚荣，而倾向社会主义的劳动家、学者，却都宣言侵略主义不合人道。最近最明白的一个例，就是意大利底大政变。大政变底原由，是因为国会议员分为两派：一是保守派，主张侵略主义，主张兼并非麦；一是社会民主派，反对侵略主义，攻击段迪阿底行动。保守派底

军队枪杀社会党员，劳动界便全体罢工，要求政府卸去保守派阿尔兰特兵队底武装。军阀财阀们脑子里装满了弱肉强食的旧思想，所以总是主张侵略主义；社会党人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所以反对侵略主义；这不是必然的因果吗？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底侵略主义，没有不切齿痛恨的，但是我们究竟应该走那一条路？

裁兵？发财？

裁兵自是人民最希望的事，但像政府现在的办法，实在令人失望得很：(一)查八年度预算案，陆军费在二万万以上，裁兵二成，岁费应该减少四千万元，何以只能减二千万？(二)八年度预算案及路电邮航四政特别会计预算案，每年短少有三万万之多，只节省军费二千万，何济于事？(三)各处军队底空额何止二成，现在只裁二成，便是不裁一兵反可以得一笔裁兵费，岂不是无上妙计？(四)公文上虽然裁去二成，倘再招警备队，每年节省的二千万，是否改个名目，还要政府拿将出来？(五)整顿丁漕、税契、一切杂捐，何以和裁兵做在一篇文章里面？是不是又要借裁兵来横敲人民底骨髓？

阔处办

我看见多少青年，饮食起居，婚丧酬应，都想着朝阔处办才有面子，他眼中底朴素生活，大约是很寒酸可耻。

我回想从前有许多亲戚朋友，都因为喜欢朝阔处办，才破坏了家产，牺牲了气节，辱没了人格，造成了痛苦，我想起来，我浑身战栗！

现在的青年他们又想朝阔处办，然而没有钱。没有钱仍然想朝阔处办，所以身为大学生不得不投降安福部，不得不听安福部底命令拥护胡仁源，不得不利用胡仁源来分配他们自身的位置；现在失败了，大家看穿了，丑得不好意思和旧同学见面了。

阔处办！阔处办！过去已堕落的青年，现在方堕落的青年，都被你害得苦了。我盼望未堕落的青年，倘若这位先生叩门求见底时候，总要挡驾才好，现在你若见了他，将来你就不好意思见你的朋友了。

青年体育问题

健全思想，健全身体，本是应该并重的事，现在青年不讲体育，自然是一大缺点。

听说杜威博士说奉天底学生体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底学生都现出疲弱的样子，这是学生界应当警觉的一件大事。但是备〔讲〕体育应有三戒：(一)兵式体操，(二)拳术，(三)比赛的剧烈运动。

这三件事在生理上都背了平均发达的原则(小学教育更不相宜)，在心理上都助长恶思想。军国民教育的时代过去了，什么兵式的杀人思想，少输入点到青年底脑筋里罢。庚子年“神拳”底当，我们已经上够了，现在马师长底武艺我们也领教了，别再把孔夫子所不说的“怪力乱神”来“贼夫人之子”。比赛的剧烈运动，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助长竞争心、忌妒心、虚荣心，更是他的特色。

约法底罪恶

从前旧人骂约法，现在新人也骂约法，这约法合该要倒运了。

旧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他们束缚得住，到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却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约法！约法！你岂不是一个有罪无功的厌物吗？

政府拿《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两种武器，来束缚人民出版、集会底自由，许多人背着眼睛骂政府违法，其实政府何尝违法？约法里明

明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因为约法对于人民底权利，原来有这样一手拿出、一手收回底办法，政府才订出许多限制的法律，把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束缚得和钢铁锁练一般。这本是约法底罪恶，何尝是政府违法呢？这种约法护他做什么？我要请问护法的先生们，护法底价值在那里？

男系制与遗产制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见《新潮》二卷二号)，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

远古乱婚或同姓为婚时代，曾经过女系制(或是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这是各国社会学者所同认的了。在他们渔猎为生家族初成立底时候，社会上固不尽是男子掌权，家族以内更多半是母长制，这也是自然之理。后来农业发达，人口加增，土地所有权底观念一天深似一天，战争也就多起来了，那战胜的部落把掳来战败的男子为奴，女子为妻。(古代的掳妻 Capture-wife，自然不能和本族的自由妻平等，仿佛和后世的妾相似；后来妾底制度，也是从掳妻变化出来的，所以汉文妾字从立从女，就是罪人底意思。)在社会学上，这就叫做"掳妻"或"掠夺婚姻"。又有一种和平的方法，乃是用农产物或家畜交换，这就叫做"买卖婚姻"。因为这两种婚姻制度，女子在家族、在社会底地位，自然发生和以前不同底两种现象：一是女子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自从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所以女子底身体便不能归自己所有，在家归父所有，出嫁归夫所有，夫死归夫家或子所有。既是个人的所有物，便和别的动产、不动产一般，所以他的物主任意把他毁坏、赠送、买卖，都不发生什么道德的、法律的问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底"三从"大义，也就是男系制完全胜利底正式宣告，也就是女子终身为男子所有底详细说明，铁板注脚，不如此便不算孝女、良妻贤母。只可惜中国人底三从主义，女子归男子所有主义，还不及匈奴发达。匈奴父死，父底妻和别的财产都归儿子所有。

这种从子大义，这种把女子也归在遗产以内一同承袭底制度，比中国人更做得淋漓尽致。

从前在女系制底下的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那遗产自然是男女平分或是专归女子。到了女子专归那一个男子（女子底夫）私有以后，接着许多教主、圣人都说出一篇男尊女卑底大道理，女子底地位自然渐渐低将下去，自然由女系制变为男系制，由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变为完全父长制。同时父子关系也分明了，遗产也自然变为男子专有了。后来宗法观念和家长观念发达起来，长子、嫡子底地位又比次子、庶子加高，便发生了长子或嫡子承袭爵位底习惯。由这个习惯，一切没有爵位底平民，也模仿他们造成了长子一人承袭遗产底习惯。东洋各民族男系的血族观念，格外发达，女子底地位也格外低，所以宁可以承继旁系的男子，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

现在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什么男系制、女系制，都是过去的历史问题，不是现在的社会问题，除了几个贱丈夫，自然没有人明目张胆的拿男系制来做道德、法律底标准。至于遗产制度，也应该随着社会底趋势有个应时的改革才好。有一班思想彻底的人，总觉得劳力所得以外，不会有许多正当的财产；就说凡是财产都算是劳力所得，都算是正当，那绝对不劳力的子孙，也没有安坐而得遗产底道理；就勉强说不劳力的子孙所得遗产，是他劳力的先人自由遗赠底权利，也断乎没有嫡系的女子不能承袭遗产，旁系的男子反来可以独霸底道理。这是什么道理，什么法律，我想了三日三夜，也想不出头绪来。

李女士底承继的哥哥，固然是残忍没有“人”的心；但是我以为不能全怪他，我对于社会制度要发两个疑问：

（一）倘若废止遗产制度，除应留嫡系子女成年内教养费以外，所有遗产都归公有，那么李女士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二）倘若不用男系制做法律习惯底标准，李女士当然可以承袭遗产，那么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解　放

我们中国人不注重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这都是迷信名词万能底缘故。

现在大家对于“妇女解放”这个名词也是这样。有人方才主张妇女解放，实际上还没有一点事做出来；又有人并不反对“妇女解放”这个事实，却反对“妇女解放”这个名词，说解放不是自动，辱没了妇女底人格，惹得大家怀疑，慢说实际运动，连口头上也几乎不好说了，这是图什么！

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事实本来是这样，何必要说得好听，男子也是如此，并非专门辱没妇女，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

我们生在这解放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名词好听不好听，彻底不彻底，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在思想转变底时候，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底公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我们迷信名词万能，还是八股底余毒。名词若果万能，“共和”这个名词，自然比“专制”、“君主立宪”都好听得多，彻底得多，可是中国现在总算有了“共和”这个名词了，实质上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觉悟：（一）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实质，不是理想底空名词；（二）我们若要得到理想底实质，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空名词固然没有价值，就是他所代表底实质，也只有他

本身相当的价值，没有象“万应丸”百病包治的价值。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法〔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

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底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有的人说：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国家是一个防止弱肉强食，调剂利害感情冲突，保护生命财产底最高社会。这都是日本教习讲义上底一片鬼话，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话，我们断乎不可听这种恶魔底诱惑。全人类底吃饭、穿衣、能哭、能笑、做买卖、交朋友，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底事。

这个名儿原来是近代——十九世纪后半期更甚——欧洲底军阀财阀造出来欺人自肥底骗术。这种骗术传到日本，日本用他骗了许多人（日本底平民和朝鲜人、中国人都包含在内），中国留学日本底人，现在又想从日本传到中国。其实大战以后，欧洲底明白人已经有了觉悟（参看本志前号中《精神独立宣言》），想把这流血的陈年账簿烧去不用了；就是日本也有几个想烧流血账簿底明白人，武者小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个；中国

人原来没有用这种账簿底习惯，现在想创立一本新的从第一页写起，怎么这样蠢笨！

但是我们对于眼前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的日本，怎样处置他呢？我以为应该根据人道主义、爱公理主义，合全人类讲公理不讲强权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来扑灭那一切讲强权不讲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那一国；若是根据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来排斥日货，来要求朝鲜独立，未免带着几分人类分裂生活的彩色，还是思想不彻底。拿日人来排斥日货，在人类进化史上仍是黑暗的运动，不是光明的运动，我们学生界应当有深一层的觉悟，应当发展在爱国心以上底公共心。至于那连爱国心都没有底奸商奸官，根据个人的私利主义，贩卖日货，贩卖中国米出口给杀中国人底人吃，我不承认他们的见解和我一样。

1920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署名：独秀



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

前几天北京方面复辟派谣传很利〔厉〕害，许多朋友听了很气愤，我听了丝毫不以为异。我们现在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小孩子出来做元首和老头儿做元首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复辟，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昨天有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闻记者和我谈话，他问我对于中国政治底见解，我告诉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他当时大为诧异。我问他："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是帝政还是民治呢？"他笑道："自然还是帝政。"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底苦功。

我们的君主不天天在那里下圣谕叫我们安分守己的读书吗？叫我们兴办实业吗？他用的各省督、抚、司、道不都比光绪、宣统时代还要威风万倍吗？封禁报馆，监禁主笔，不比光绪皇帝、宣统皇帝还要利害吗？贪赃枉法的文武官吏遍满全国，皇帝左右连一个铁面御史都没有了，这是么世界中！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去做了帝国官吏的，现在不用理他；还有一班未做官的老同志，自孙中山先生起，赶快回复到辛亥以前的生活。一面宣传民治主义普及人民，一面设法取消帝政。一切设想、运动，都要当做未曾宣布共和以前一样。

同盟会底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焉有不倒的道理？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尽得足，匆匆忙忙挂上了共和招牌，十分冒昧可笑。譬如一个素不用功侥幸及第的学生，倘不赶紧补习功课，那里会有毕业的希望？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诸君呵！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责任，不但辛亥年

未曾完结，现在还未曾起首呵！我们不可以革命成功的伟人自命，我们应该以侥幸及第的学生自命。我们应该补习的功课有三门：

（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

（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

（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

什么召集国会，什么制定宪治，什么发展实业，都要建筑在这三门功课上面，基础才算巩固。现在大家迷信的国会和宪法，都是帝政时代的产物，他们骨髓里充满了帝政的腐败臭味，我们实在不满意，实在没有恢复底价值。

我们希望赶紧补习三门功课，补习好了，我们希望从新创造纯粹民治的国会、宪法。

1920年1月3日 《星期评论》第三十一号 署名：陈独秀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那里去了？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那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底大问题。

Olive Schreiner 夫人底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

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见六卷六号《新青年》六〇一页）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底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底价值。

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1920年1月5日

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第651页



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自然是觉得旧文化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中国底社会上有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必要，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我现在要敬告诸君的有三件事：

（一）出版物是新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全体；

（二）新文化运动只当向前的发展，不当向后的反动；

（三）不应该拿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做射利底器具。

出版物自然是新文化运动中很要紧的一件事。但此外要紧的还很多，不必大家都走一条路。我们富于模仿力，缺乏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有了王麻子底剪刀店，接着就有汪麻子、旺麻子出复。有了稻香村，接着就有稻香春、桂香村出现。现在大家都来办报，不肯向别的事业方面发展，也就是缺乏创造力底缘故。照我们现在的学问程度人才力量，一个地方只配办两三种报，多了便要人力分散，勉强杂凑起来，一个报也办不好。这是何苦来！就是办报，也应当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报，不必办许多性质相同的报。现在性质相同，读者方面相同的报已经不少了。我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果然有价值，尽可送到各报发表，各报没有不欢迎的。一定要自己独立办一个人云亦云的报，这是什么一种心理？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时〔的〕招牌吗？我实在不忍这样说，实在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新报出现，内容都大同小异（内中有几种牛鬼蛇神的报，又当别论）。看报的还是那一班人，实在人力财力都太不经济。所以我总希望大家拿这些人力财力，去办新文化运动中比出

版物更进一步更要紧的事业。

死抱着祖宗牌位向后退走的顽固派，我们不去论他。就是那半新半旧的先生们，像那帮着警察厅大骂同学的人，又像那挂起留美学生的金字招牌办杂志，却仿照无聊的医生底办法，请出许多名人介绍，这班人既然可怜没有当顽固派的魄力，头脑中又抛不了祖宗牌位底偶像，我们也不去论他。我们深以为憾的，正是我们很推重的杂志，我们很希望的青年，也发出似是而非的议论：说什么"这种直觉的新学问家同古代的中国学者，有什么分别，恐怕还不及他们有人生与社会的经验呢"。试问大科学家底直觉哲学，是否毫无价值？试问中国现在是否有人算得是直觉的新学问家？试问古代的学者底人生与社会的经验，现在有什么价值？说什么"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①]世界新思潮，在学术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在社会上是真自由真平等的互助主义同新式的社会组织，在文学上是写实主义同人道主义。试看他们的文字，有几篇真有科学的精神（发阐科学的更少），有几篇用科学方法彻底研究社会问题，又曾有几篇写实文学的大著作"。他列举的三种新思潮固然不错，可惜这三种新思潮虽然都受了科学的影响，却不是他没头崇拜的自然科学所能包办的呵！他用"趾高气扬的态度，夸大眇视的心胸"，骂倒一切新杂志，固然痛快，但独独推重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除了因为这两种杂志多讨论自然科学以外，不知道还有何种理由？他说："我们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句话固然有理。但科学脑筋却不限于自然科学，不反背科学精神的文学艺术，也都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表现。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只应当拿科学的方法研究别的学问，却不可拿自然科学说明别的学问。拿生物学说明社会学，就是一个失败的先例。现在中国底杂志无不幼稚，难道只有讨论自然科学的杂志特别进步吗？他说："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竞言科学，而实不知科学。……其所以不知科学者，科学艰深，非一蹴可几。玄谈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难就易也。顷年以来，思想革新，诚甚盛矣。然试登

① 本篇中的省略号都是原有的。

高远瞩，国内书报，刊行者何限，亦尝有专言精确科学者乎。……美洲之科学北京之大学月刊数理杂志，其言论文章，稍近科学矣。然其销行之度，能如其他鼓吹谬论者乎。……方今之人，震于西学之势，痛诋中学。……而抑知性理之学，经数千年之蕴蓄，其中固有至贵者存乎。夫理学与科学，两事也。科学之效，在利用厚生，使吾辈有精严之宇宙观；理学之用，在存养省察，使吾辈有正确之人生观。故理学不患其旧。虽羲皇之言，苟其果善，亦皆可从。所谓'推之万世而准'也。而科学则力求其新，非新则绌矣。……又说新者多拾人牙慧之余，似是而非之妄解，虚诞无实之谬谈耶！此其二大弊也。此二弊者深入人心，小之可害中一人，大之可害遍族类”。这一段议论，恰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好像是一人手笔。前半段极为独尊西洋的科学(看他科学玄谈对举，又不满于近来的思想革新，又专门推重讨论自然科学的三个杂志，想必是专指自然科学)，别的关于思想艺术的学问，都一笔抹杀。这还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慑于西洋物质文明底极幼稚的观念。至于西洋各地学术文化底发达，简直未尝梦见。当真西洋文明只有科学吗？我们只应该输入他们的科学，不输入他们的别种学问艺术思想制度吗？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等，不比科学更难几倍吗？都可一蹴而几吗？后半段忽然又把中国底性理学抬起来和西洋底科学并重，而且分作两事，实在令人莫明其妙。大约他还是抱着张之洞以来“科学是新的好，道德是旧的好。物质文明是西洋好，精神文明是中国好”的一种成见。中国底性理学，和西洋底哲学伦理学学类，难道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吗？西洋底近代哲〔学〕伦理学都受过科学的洗礼，所以可贵。中国底性理学怎么样？中国底性理学，果然只谈人生观，不曾涉及宇宙观吗？科学果然只可以教我们的宇宙观，不能教我们的人生观吗？非科学的性理学，怎能够教我们的人生观正确不至错误。理学只问善不善，不问旧不旧，这话固然不错，但在理论上科学又何尝不如此呢？照他这样分别科学和性理学底不同，是否有科学的根据？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推之万世而准”这句话，是一种妄想。是演译〔绎〕法最大的流弊，决不是科学家脑筋里应有的东西呵！我们现在一面要晓得自然科学只是各种学术底一种，

不能够拿他来取消，代替别的学术；一方面要晓得别的学术（道德学、性理学也包含在内），多少都要受科学精神的洗礼，才有进步，才有价值。

像那德国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造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造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是。若是把这两种歧形思想合在一处，便可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底新注脚了。我以为珍重研究介绍新思潮的人，他若真是打破了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了一个科学脑筋，就应该指出那种思潮是新的，是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好的效果；那种思潮是旧的，是不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恶的效果。不可以笼统说凡属自然科学以外的新思潮，都是“玄谈”，都是“谬论”，都是“空谈”，都是“燎原之祸”，都是“拾人牙慧”（义皇之言，何尝不是人之牙慧），都是“似是而非之妄解”，都是“虚诞无实之谬谈”，都是“可害中一人”，都是“可害遍族类”。像这种笼统不举实例的谩骂武断，在官场文告中时常看见，学理的讨论果然是这样吗？科学家底态度果然是这样吗？自己说“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我们学理不曾真正研究，怎么能鼓吹他人评论他人呢？”“还须虚心观察，不敢独断底人”，怎样竟出以非科学家的态度呢？谬论与空论不同。说他是谬论，必须要指出他所以然的谬处，才算是科学态度的批评。若拿出科学家的态度，实际批评那种新思潮是何以好，那种新书报，那篇文章，有那种谬论，他谬处在那里。像这种学理的讨论，正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若是不问青红皂白，对于一切新思潮笼统加以“鼓吹谬论”的徽号，这简直是从根本上反对新文化运动，助守旧官僚张目，要造成向后的反动。若是明目张胆的守旧派说出这种话，我们不以为奇。某杂志似乎也是一班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办的，竟然有向后反动的现象。像这种挂起“毋忘国耻”招牌卖日货的办法，我们断然不能容忍！

有一个人写信给在北京的朋友说：请你告诉秦先生，“我赞成新思潮，新文学，请他邀同全体教员学生打电报给山东督军，快快派我的差事”。上海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因为现在关于新思潮的报销路都很好，此地有许多做黑幕小说的做红男绿女香艳小说的朋友，都打算改

做这种投机的事业了”。我得了这两个消息，不禁替新思潮捏了一把冷汗！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趋势。这是何等神圣事业！我们中国人腐败、堕落，精神上物质上都到了破产的运命。最后的希望，就是想随着全人类大改造的机会，来做鼓吹这大改造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或者是起死回生底一线生机。这种最后救济的新运动，不过才有一点萌芽。倘若仍然把他当作从前的维新、立宪、革命运动一样，当作一种做官发财的器具，这便是明明要把中国人和全人类同样做人的一线生机斩断了。做官发财的路道很多，何必做这样黑良心的事！鼓吹新思潮的报，自然没有人能够专利。容人悔过，也算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没有觉悟的人，仍然是拿投机射利的动机来办鼓吹新思潮的报，所以不得不替新思潮捏一把冷汗。我有一位山东朋友，他有一种偏见。他总说："上海社会中了'苏空头'的害，无论什么事发生，总有许多人乘热闹出风头，决不会有真实的新文化运动"。这位朋友虽然学问见识都好，却不曾到过上海一次。他的观察未必正确。我是住过上海好几年，却不敢像他那样一体轻视上海底朋友。但是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才不至为这位山东朋友所轻视！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像现在这样的浅薄、粗疏、空泛，谬论还不彻底，小区区就是一个首先要自首悔罪的人，持论谬不谬，和精密的学理，原来是两件事。有时很精密的学理也许是谬论，有时学理虽不精密也许不是谬论。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像克罗马[①]底资本论，克波客拉[②]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但也许有人说他们是鼓吹谬论。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化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

① 克罗马，即卡尔·马克思。

② 克波客拉，即克鲁泡特金。

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几句话，却真是我们的昏夜警钟呵！

1920年1月11、12日 《大公报》（长沙） 署名：陈独秀

基督教与中国人

（一）

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虽然不全是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生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向来不把他当做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看做一种邪教，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不去研究解决方法，所以只是消极的酿成政治上社会上许多纷扰问题，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现在若仍然轻视他，不把他当做我们生活上一种重大的问题，说他是邪教，终久是要被我们圣教淘汰的；那么，将来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并且在社会问题上还要发生纷扰。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

（二）

在欧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是欧洲底文化从那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

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不但耶稣如此，《旧约》上开宗明义就说：

> 有害你们生命流你们血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人与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像造的。（《创世记》第九章之五、六）

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

（三）

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底怨恨。(3)因为中国人底尊圣、攘夷两种观念，古时排斥杨、墨，后来排斥佛、老，后来又排斥耶稣。(4)因为中国人底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往来的人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稣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老，所以觉得他无聊。(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圣的官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士拥护教徒底人权，遭官场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恶徒，扩张教势，遭人民怨恨。(7)基督教义与中国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显然冲突。(8)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9)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反以科学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许多无根的谣言。(10)天主教神秘的态度，也是惹起谣言的引线。

上列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盼望他们若真心信奉耶稣最后的遗言——《马太传》底末章最后二节所说——今后不要再错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从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但现在是

觉悟到什么程度？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横蛮是孟轲、韩愈底态度，孔子不是那样。

（四）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他们不同的地方，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于情感，逆人天性（即先天的本能）的道义，自然算不得是道义；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梁漱溟先生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都是情感的事。"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但是他说："富于情感是东方人的精神。"又说："这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东西两文化分歧的大关键。"他这两层意思，我都不大明白。情感果都是美吗？欲望果都是恶吗？情感果能绝对离开欲望吗？只有把欲望专属物质的冲动，情感专属超

物质的冲动，才可以将他两家分开。其实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的两种冲动，不能把他们分开，不能把他们两家比出个是非高下。欲望情感底物质的冲动，是低级冲动，是人类底普遍天性(即先天的本能，他自性没有善恶)，恐怕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欲望情感底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冲动，也是人类底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以为西洋东洋(殊于中国)两文化底分歧，不是因为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在同一超物质的欲望、情感中，一方面偏于伦理的道义，一方面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东洋的文化自然以中国为主，阿利安人(Aryan)底美术、宗教，本是介在这两文化系间的一种文化，与其说他近于中国文化，不如说他近于西洋文化；至于希伯来(Hebrew)文化，更不消说的了。

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淫)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在不敢以"富于情感"自夸。

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不说别的好现象，就是自杀的坏现象都不可多得，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总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现在要补救这个缺点，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不是贯串的，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是机器、柴炭，不是蒸汽与火。美与宗教的情感，纯洁而深入普遍我们生命源泉底里面。我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五)

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一方面也要晓得他盲目的、超理性的危险；我们固然不可依靠知识，也不可抛弃知识。譬如走路，情感是我们自己的腿，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眼或是引路人的眼，不可

说有了腿便不要眼。

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

不但那些古代不可靠得传说、附会，不必信仰；就是现代一切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都没有耶稣底人格、情感那样重要。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现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马太传》十二之六）

又说：

我不为祭祀而为怜悯。（《马太传》十二之七）

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罪状，就是因为他说：

我能破坏这神殿，并且三日内造成。（《马太传》二十六之六十一）

我们应该崇拜的，不是犹太人眼里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约翰传》二之二十），是耶稣心里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他曾说：

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马太传》七之七）

（六）

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

（1）崇高的牺牲精神。他说：

我是从天降下的活面包，吃这面包的人永生；为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贡献的面包就是我的肉。（《约翰传》六之五十一）

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饮物。（《约翰传》六之五十五）

吃我肉饮我血的人，与我合一，我也与他合一。（《约翰传》六之五十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过于爱我的

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七）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八）

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将来必失去生命，他为我失去生命，将来必得着生命”。（《马太传》十六之二十五）

耶稣在将要被难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人要卖他，他举起酒杯向他们道：

请你们满饮此杯，因为这是我的血，为誓约为众人赦罪流的血。（《马太传》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2) **伟大的宽恕精神。他说：**

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

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

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传》十五之十）

我告诉你，那妇人许多罪恶都赦免了，因此他爱也多；被赦免的少，爱也少了。（《路加传》七之四十七）

神欢喜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欢喜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路加传》十五之七）

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底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再把左边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给他。（《马太传》五之三十九、四十）

我不是为无罪的人而来，乃为有罪的人而来。（《马太传》九之十三）

(3) **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

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聋子能听，有癞病的人洁净，死的人复活，穷人得着福音。（《马太传》十一之五）

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你自己。（《马太传》十九之十九）

卖你所有的东西，送给穷人，如此你将得着天国底财宝。(《马太传》十九之二十一)

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马太传》十九之二十四)

第一尽全心全精神全意爱你的神，第二爱邻人如爱你自己，一切法律、预言者，都是遵这两大诫。(《马太传》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你们须相爱，你们须相爱如同我爱你们。(《约翰传》十三之三十四)

穷人少的布施，多过富人多的布施，因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余，穷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尽其所有。(《路加传》二十之三、四)

Pharisee人与学者讥诮耶稣和税吏及罪人同食，耶稣对他们说道：

你们堂中，谁有一百只羊，若失去一只，他不离开这九十九只，去将那失去的寻得吗？寻得了，是要喜欢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里，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邻人，向他们说，恭喜我寻回来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诉你们，神喜欢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喜欢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也是这样。(《路加传》十五之一至七)

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七)

耶稣说："听到我的话而不实行的人，好比一个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风吹，雨打，洪水来了，这屋是要倾覆的，这是很大的倾覆。"(《马太传》七之二十六、二十七)

现在全世界底基督教徒都是不是愚人？把传教当饭碗的人不用说了，各国都有许多自以为了不得的基督教信者，何以对于军阀、富人种种非基督教的行为，不但不反抗，还要助纣为虐？眼见"万国人祈祷的家做了盗贼的巢穴"，不去理会，死守着荒唐无稽的传说，当做无上教义；我看从根本上破坏基督教的，正是这班愚人，不是反对基督教的科

学家。大倾覆底责任，不得不加在这班愚人身上！

中国底基督教状况怎么样？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邻人如爱我们自己；他忘记了耶稣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他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他忘记了基督教是穷人底福音，耶稣是穷人底朋友。

1920年2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答虞杏村

杏村先生：

中国的学校，简直是害人坑，是黑暗牢狱；请看有名的清华学校和北洋大学还是这样，别的不用说了。我也曾经害过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汗流浃背呵！这件事不但不必责备政府，并不必只望什么教育家，谁配当教育家？只有学生自己起来解决。

独秀

1920 年 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

附：虞杏村致记者

记者足下：

今年夏天我从商业学校毕业出来，在银行里谋了位置，有一位年老的同事问我："商业学校教些什么东西？"我一时说了几句大话，后来想想汗流满面；虽则我在学堂的时候，成绩亦不算恶，终觉得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人，现在把原因说些出来：

（一）学校里好尚虚名；办学的请了几位留学生，同不得意的政客，教学生读了几本似通非通的讲义，就说得天花乱堕，不是夸造就人才，就是说改良商业；其实造成的人才极少，并且何曾把商业改良。

（二）讲义来历不明；外国留学生，把外国书译了几本；或者把编成的书，东拉西扯成了一本讲义，只要名目的同，不管能否适用。

（三）教员不适宜；请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教经济学，请一位工科大学的工学士教银行学，只要能照讲义读一篇，亦不管学生明白不明白。

名词不统一；譬如“Current Account”有的译为往来存款，有的译做活期存款，还有用东文“当座预金”的，弄到学者摸不着头脑。

我记得以前有位蒋梦麟先生，他在时报上投了一篇稿(与某银行经理谈话)，说的实在不错；因为商业学校的毕业生，真是没有用处；虽然学生自己亦有不好的，但一半是受学校的害。还请几位教育家和实业家，快些想个法子，救我们可怜的青年！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虞杏村自大连中国银行寄。



答臧玉海

玉海先生：

林老先生自命为古文家，其实从前吴挚甫先生就说他只能译小说不能做古文；现在桐城派古文正宗马先生也看不起他这种野狐禅的古文家；至于选派文家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不必拿宝贵的时光阴和他说废话。况且现在青年思想底大害，不是这班顽固的老辈，乃是有点新思想而不彻底的少壮学者呵！

独秀

1920 年 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

附：臧玉海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和先生是从来没见过面的，这回无故的相扰，真是觉得对不起！

先生也许知道：直隶的学校除了京津略开通些，保定的是极死不过的！在这许多极死不过的学校里边，还是只有个育德中学气压略低些。你想，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们还不快些走向光明去，偏要自寻不快，有些人立起个“国故促进社”来。学生的知识虽则幼稚，却也知道已死的东西是不能促进的。——研究也可，整理也可，怎的会促进？不料他们讲了些圣贤书——囫囵吞枣的讲了些《史记》、《畏庐文集》——还不算，又给那承道统的林琴南写了去一封信：拿他比韩愈孟轲，拿那所谓倡新学说的比杨墨佛老，求他给他们讲的那课程做个序。林老头子，居然就来信应允了他们。序还没做成，我先把这封信抄上给先生看看，看了真是肉麻啊！先生要不嫌扎眼，以后我可以再把那序子寄给先生。来信

如下：

育德诸君子同鉴蒙

赐书，以孟韩见。待读之汗浃于背。仆伏处京邑，年垂七十，以卖文卖画自活，不敢问及世事，以叛伦逆常者，闹如蛙蝇，复有大力者，拥最上之皋，比率之，为禽兽行。名曰新道德，实则示之以忤逆淫荡。凡能力反道德者，均谓之新视杨墨佛老之祸，酷至万倍。杨墨佛老均不足祸人，而孟韩尚力攻之。今之倡率人类，反于禽兽孟韩虽作又将如何。而况世无孟韩，又焉能制诸君子崇尚儒先保守经学。此沧海横流中一砥柱也。鄙人斡力虽薄，敢不起从诸君子之后，请将所选之书凡例一纸见示，以便恭撰序言，以如尊嘱。铅椠困人，不暇多述。诸希

鉴宥，不备。

林纾顿首

独秀先生！我想我们这些很活泼的青年生活在现在，真算走了背运了！不但没人领我们走向光明去，还有许多的大人先生们要蒙蔽我们，限制我们，摧残我们。你看残苦不残苦！可怜不可怜！我在这个生涯里瞎混，一方面可怜自己，一方面可怜我那最亲爱的同学；我是不能不奋斗，不敢不奋斗的！——虽则那些事可以任着他们，可是我怕把我那很好的同学领错了路！所以我写信给先生商量。总之，先生如果不忍于看着他们瞎子领瞎子，我还是请先生努力的领我们向光明去！

一九一九年十二晚念四，学生臧玉海



答 明 慧

明慧先生：

我们若还要国会政治，男女都应当有普通选举权。他们如若不肯，必有一班学者帮他们说出种种学理来；我们若是再进一步，他们必然又强制我们要选举权；到那时必有一班无耻的学者，又来说出选举权底一篇大道理。

独秀

1920 年 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

附：明慧致记者

记者足下：

现在世界文明国大半妇女都有选举权。为什么我国妇女独没有呢？有人说："中国女子的程度还没有到。"我不晓得他们说几时就算可以到了。若是他们说中国女子没有做出什么可观的事在社会上，但是这不可以怪我们，只因为政府不给事我们做；虽然我们有能力有才干不能显出来，真是可恨！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奋斗的原故。比方我们现在还不快快起来，我不晓得几时能够有选举权送到我们的懒手上来。我想我们起头做的时候，一定要受许多可怕的阻滞；但是我们不必怕他。倘是前几年没有革命的举动，那就我们现在仍旧要受专制的压制。

我们的民国名誉上已经有八岁了，但是实事上一点也没有实行。因为民国的意思，就是国民应该用选举权来直接表明本人的意思。虽然男子已经有选举权表明他们个人的意思，可惜我们女子同在专制国手下并没两样，就是因为我们女子没有选举权来表明我们个人的意思。

我不信男子能够用他们的选举权来表明我们女子的意思。有人想选举是男子特有的权柄,可惜这是错了。前几年的时候,权柄都在一个专制皇帝的手里,平民那有什么选举权呢?倘是那时候的男子要选举权,平常的人要讥笑他们象现在的人要讥笑女子要选举权一样。幸而他们男子不怕别人愚笨的讥笑,所以能够造成一个民国,他们才能享受选举的权柄。我们当然是很佩服他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呢?我望我女同胞同心合意一齐起来废去这不平等的制度,和得到我们希望的选举权。我们若是一天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一天不可以算是民国真国民了。既是这样,那就民国也不能算是一个有名有实的民国了。

明慧上　　十二月五日



新教育之精神[①]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

我并没有什么学问(先生[②]自称),不过蒙海内同胞推奖,年来奔走四方,唤醒民气,也不过稍尽一点国民责任而已,实在抱歉得很。

今日承诸君之请,来此讲演,仓促之间,我也没有充分的准备;但诸君现在是读书师范学校,为教育界之重要分子,将来出身办事,主要是教育界上,又如社会上的中坚人物,而教育为国家的命脉所依托,故诸君的责任,实在非轻。我今天演说之题目,也就是新教育之精神。我对于新教育一项,素少研究,而在座诸君,尽是研究教育的,想平日对于教育一项特有心得,以不知教育的人,而对研究教育之人讲教育,岂不班门弄斧吗?

我所谓新,非绝对除去一切经史诗书考据……之谓,更在知其所以新之之道耳。譬如研究经史,而能知其新之之法则,则昔日读圣经,考训话,讲道学,仍然是新。若不然,那怕日日读 ABCD,习数学,习理化,还不能够算得新,甚至比较旧的,还要差些呢!

今就以教育一方面讲,要怎样才算得新呢?我们中国的学校教书,是最腐败的,你看现在各省的学校,有些因经费都被外人拨扣,以致陷于无教育之地步,那是一不消说了!还有一些办得最热闹的,校舍固然好看,是"巍巍峨峨"的洋房,内面学生的教科如何?教员的教授法如何?以后学生的勤奋如何?一切都不管问;只顾外面好看——这是中国人的特性,非独办教育的如此,即凡百举动,亦莫不然。譬如架个茅厕一样,外面只用白灰粉粉饰,内面是屎是尿,臭不可闻,那都不管了。你看现在的学校,那一个不是如此,都是以空相尚,讲究形式。学校的

---

① 1920 年 2 月 7 日,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首刊于 2 月 9 日《国民新报》,标题为《新教育的精神》,但内容较简略。

② 记录者对陈独秀的称呼。

大权，掌在教长及少数教职员的手中，学生的困苦，全然不顾。教职员程度有不好的，学生不能非论，如有违着的，就拿那些诽谤师长，侮辱职员的条例来压迫学生，把学生当作机械的、被动的。学生只能在书桌子上做自己的功课，于外面社会上的实况，一点都不知道。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出了学校，更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那还能望他改造社会吗？似这种学校，不过造出几个书呆子出来罢了！于国家没有一点益处，故今日要学新教育有几个要点。

1. 宜注意社会方面，
2. 当以学生为主体，
3. 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际为主。

第一，怎样要注重社会方面呢？因为社会是我们人类组成的，我们人原是社会的成分，假如我们没有社会，那么，我们以一人，能够供给自己的要求吗？倒可日常的用品，寝室的器具，断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又如外界的侵袭——洪水猛兽之类，又不是一人可以防御得住的，故必定聚而为社会，顺我们人类同情协力之自然趋势。此自古各大学者，所承认的，是以我们人类，是决不可与社会分离人。教育是教养人类，使有经社会生活的能力人，故第一要注意社会方面，譬如教授小学的地理，若开口就把〔讲〕巴黎、纽约如何繁荣，如何重要，他知道巴黎、纽约在那块儿呢？我的意思以为教地理应先从本讲堂讲起，然后教本校的校址，以及本城市、本县、本省，实地考察，庶儿学得有益处。若讲到历史一项，小学的历史教授只好取消，何故？要晓得小学生，本无学问可讲，他的教育宗旨，原是启导他的智能和开发他的思想。你若对他讲什么唐虞三代，五霸七雄，他的耳未曾听过，目未曾见过，他知道是什么？如此教授，不惟更差，适是以惑其思想，乱其脑力，故不如不要为好。又如教授理科，更用不着书本子了，顶好将本地方所产生的动、植、矿物的活标本，实地考察，还得益较多。他如修身、农业、商业、图画等科，更好就社会的实在情况研究，使儿童能应用于社会上，得实在的效果。

第二，怎样要以学生做主体呢？从来我们中国的学校，都是把校长、教职员做主体，学生反放在客位，当作被动的和机械的。教员在讲堂上教授，只知把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装入学生的脑子内去，殊不知学

生固有他的知识和学问，不得要拿先生的来装入进去；如先生的能够引导他们所能做的，启发他们所同有的，和学生自动的本能就是了。故现今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他说："在当时，是先生教学生，若在今日，更是学生教先生了。"实在不错，怎么说？在当时先生教学生，只晓得把书本子装入学生的脑子里去，那更不消说了。若在今日小学教育，学生正当少年时代，恰如春天的草木一样，正是萌芽时期，他的脑髓，优园美满，思想力、记忆力，一切都比先生强得多。年幼的儿童的心理，还足以先生研究。若在教授时间，有些事情先生想不到的，而学生反而想得到，先生不能说明的，学生反能充分了解，并能提出许多疑问事情来，能启发先生的思想和脑力，这岂不是学生教先生吗？又如学生在校求学，于校中一切事情，知得明瞭。而现今学校的事情，专靠着校长和少数教职员掌办，开口就说他们是研究教育有经验的人，先前他也做过学生过来，办学校一定是好的。殊不知，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没有一定的规矩，即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洋的亚底士多德，在当时，他的学说，是"质诸鬼神而无疑，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然至今日，又"时移事变"，那就不行了。要知教育的事业，是与世界一齐变化的，若说"往日是先生教学生"为正理，今日是学生教先生为不正。专只就古时的理论，而不考察今日的事实，那就不可以了。学校的事情，学生所知的比较多，怎么说呢？学生在校内求学，所谓亲莅其境了。对于学校的事件，要如何改良？如何配置？如何办法？何者有□于学校。对于学生有不便利处，更要废除。何者学校缺乏，对于学生有益，更要兴办，学生一一透底明白。故学校若以学生为主体，遵学生提议办去，没有办得不好的。若靠着几个教职员，我恐怕办去，只有退步，那还能够与时俱进吗？系看现今的学校，那一个不是以学生做客体，拿他当被动的机械的，学校的事情，学生不唯不能参与，反而动辄拿那些通则规例，来压迫学生，终日如此，教育又怎能与世界一齐进步呢？又何怪每一个学生，进了一个学校，至毕业后，若是压得背驼足软，了无生气呢？如此学校教育，只能造成一班奴隶性质的国民，只知道服从，那还能够自动吗？那还敢望他来出力为国家和改造社会呢？

第三，何以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质为重呢？我们中国人，是最爱

讲形式，不顾实际的，我听闻北京清华学校，建筑图书馆，费了三十几万，仅仅买了二万元银元的书，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若要不讲形式，多买些书，供众人的阅览，岂不好吗？现今各省的学校，无一不是讲究形式，如外面的校舍，学生的制服，都是讲形式的，至内面学生的科学，教员的授法，却一切都不管问，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自教育部起，至国民学校，都是讲究形式的。当真说起来，要打破形式教育，必先取消教育部人员起，因为他是最好讲形式的，取消了他们，然后注重实际的教育，庶几较易。

还有最奇怪的，就是一般的农业学校，外面挂了某某农业专门学校的招牌，学生和教员，坐在学校内讲农业，外面田间的事情，不独不能耕种，简直一点都不知道。这种学校，我倒不晓得办了有什么益处？此外，尚有好多的学校，常常逼迫学生进校的时候缴纳制服费，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一年四季，都是要穿制服，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甚至学生家里贫寒的，连学膳费钱都没有，那有钱来缴制服费呢？并且学生在校，读书就读书，穿什么皮鞋，戴什么制服帽，若是穿便衣便帽，岂不是好么？再进一层讲，若留了些□费，把学生买书，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劝诸君，此后出钱办事，不必讲形式，多注意实效就好了。那么，学校经费多，就多开办几班，学校经费少，就少办几班。把学生的科学，认真教，提高学生的自身必须的本能，切莫压迫他。至外面的校舍，那更可以不问——茅屋亦可以做学校，不必一定要洋房，没有桌凳，坐在地上亦可以讲学，只要认真教授，形式尽可以不管他。

以上三个意见，更是新教育之精神，我望诸君此后在教育界上办事，是最要注重的。第一，就是要注重社会方面，教学生，宜就社会上一般的事情，为儿童所时常知道的；或亲自看见的；那就自然易于了解，没有“莫明其妙”的弊处了。第二，学校当以学生为本位，教育以启发儿童的本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不可压制他。第三，更宜实事求是，不可虚张形式，讲尽外观。今天时间太仓促，自知没有十分准备好，有负诸君之雅意，还望诸君原谅，原谅罢！

1920年7月31日 《教育学术研究室杂志》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马亮记)

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

——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

（甲）改用底理由

A. 本体的价值

（1）时代精神的价值（德莫克拉西）

（a）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
（b）经济的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
（c）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　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
（d）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
（e）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

（2）在文学工具上的价值

（a）文学底界说

- 阮元[1]—沈思翰藻（出文选萧序）。
- 章太炎—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 Brooke[2]—有思想、情感、体裁，艺术性、精巧（Curious care）。
- Bascon[3]—才智的、情感的、艺术的、永久的价值。
- Hunt[4]—表现思想、想像、情感、趣味。
- Standard dict[5]—高尚健全普遍的思想，美的体裁，艺术的结构。
- 我的主张—（一）艺术的组织；（二）能充分表现真的意思及情；（三）在人类心理上有普遍性的美感。

---

① 阮元（1764—1849），清学者。字伯先，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著《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转下页）

(b) 文学底作用
- (一) 达意 / (二) 表情：情意本身—语言—白话—文言文
- (三) 叙事：文言文—古文—古事；白话文—今文—今事

(c) 文学底派别
- (一) 纯艺术派—超越人世问题，艺术的价值独立。
- (二) 人生派—注重人生现实问题。
- (三) 人生艺术派—艺术美的享乐与人生底解释。

(3) 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a) 文体创造

(b) 输入外国文学的精神
- (一) 写实主义。
- (二) 析理精密。
- (三) 社会化(Socialization)。

(c) 世界的文学

B. 应用的价值

(1) 在教育上的价值

(a) 儿童想像力底发展

古文—盲从古人的、他人的想像力。

白话文—直接能发现有的、自己的想像力。

(b) 科学教育底发达

(一) 节省专门科学(医、矿、农、工)学生研究艰深文字的时间精力。

(接上页)② 博鲁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英国诗人。1911—1913年，游览欧洲大陆、美国、加拿大、南海等地。1914年参加大战，翌年病逝在战舰上。其《书信集》和《诗集》于1918年出版问世。以1914年所写的一系列战时十四行诗而驰誉世界文坛。

③ Bascon为Bacon之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思想家，近代经验哲学的始祖。他的哲学论著和科学归纳方法对近代学术研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④ 亨特(Leigh Hunt, 1784—1859)，英国19世纪诗人、散文家。他的著名长诗《荔密尼的故事》，借用意大利中世纪爱情悲剧的题材，来表现诗人所处的新时代的精神。长诗具有感情炽烈、色彩瑰丽、充满着音乐节奏美的语言艺术等特征，从而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开辟境界和风格。他的《自传》，被誉为对当时文坛的重大贡献，他以熟不拘礼、随便交谈的亲昵文体，刻画出他所熟悉的人物形象和亲眼目睹的事件，特别是他跟诗人雪莱、济慈和史学家喀莱尔等的交往情况，坦率细致，娓娓动人。

⑤ dict为dicta之误。Standard dicta规范化的准则。

（二）用白话文叙述科学，较古文易于表现明瞭正确的观念。

（c）学生抄写讲义底便利

（2）在社会文化上的价值



（乙）解释疑惑

（1）不能行远{时间 / 空间}

方言不能行远（京话是方言非国语）

国语能够行远（白话是国语非方言）

（2）破坏旧文化

增加新的文化

普及旧的文化

（3）没有文学的饰美

文学的饰美：
- (a) 结构巧妙—白话、文言同
- (b) 意思充足明瞭
- (c) 声韵调协
- (d) 趣味动人

(b)(c)(d)—白话胜过文言

▲古文　名词、形容词色泽是脂粉，是表面的美。非真美，典故更是张冠李戴，不切事情。

▲白话文　“白描”是真美，是人人心中普遍的美，“百战不许持寸铁”是白话文底特性，所以文学的白话文比古文更难做，决不是“信口所说”、“信笔所之”。

(4) 字句冗长

(a) 文学的经济，在意思以外的经济，不在意思以内的经济

(b) 由简而繁，是文言与白话共同的趋势，原因有四
- (一) 事物增加
- (二) 语言变化
- (三) 印刷便利
- (四) 社会现象日趋复杂

(5) 不典雅

(a) 典不典是时间问题，现代的事物到后代都是典。

(b) 雅不雅没有界说，没有标准。

宫殿冕旒等词(非平民的)未必雅，如近代四六文。

拉车卖酱的话(平民的)未必俗，如古诗《孔雀东南飞》及杜白诗等。

(6) 现在的白话诗文不好

- (a) 作者底艺术不精
- (b) 真的白话文学年月还浅

—都和白话文体本身没有关系。

(7) 非纯粹的白话文

(a) 古语　不全然废弃，但以现代通行的为限。

(b) 新学术语　当然采用。

文章三类：
- (一) 普通应用文学术语不多用
- (二) 说理文
- (三) 文学的文

(二)(三)—一般人了解学术语的程度，当随教育增高。

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关系，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

(8) 不能达高深学理

(a) 自然科学
(b) 社会科学

名词不易了解，古文与白话文同，
但白话文的解说比文言容易了解，
所以听讲比看书更加懂得清楚。

(c) 宗教艺术，重情感的更宜于白话文。

以上理论

(a) 陈大齐演讲的心理学。

(b) 胡适著的哲学史实验哲学。

(c) 杜威底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演讲录。

(d) 王星拱、任鸿隽底科学论文。

(e) 陈嘉霭著的因明学。

(f) 基督教底旧约新约。

(g) 周作人关于文学的译著。

以上实例，都能达高深的学理，都比窥基底因明疏和严复译的书易于了解。

1920 年 2 月 12 日 《晨报》 署名：陈独秀



陈独秀过沪之谈片

编者按：

陈炯明时任广东省省长，拟将海关的关余充作创办西南大学的经费，时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的岑西林亦赞同此举，请章士钊、汪精卫等筹办此事。他俩又邀陈独秀参加。陈于1920年2月23日由北京至沪。据联合通信社云："陈独秀君应西南大学之约，前赴广州，于阴历年终过沪，小作居留，即乘轮赴粤，兹得其谈片如下"：

陈君云："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者，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西南大学，自汪精卫、章行严、吴稚晖三君，与予（陈君自称）会晤后，吴君颇主张大学地址设在上海，在吴君之意，以为大学设在广州，诚恐受政治军事之牵动，大学基金，因此或难巩固，不如就上海租界选定地址，无论政治军事，有何变动，可保不受动摇。实则西南当局，既有创办大学之决心，成立以后，自有舆论与人心之保障。就如北京大学，虽历几许风潮，终能屹然不动，即其明证。若设在租界，则倚人为生，大学自身，已失其独立根性。办成以后，有何价值？故吴君此种主张，吾个人绝端反对之。汪章两君，本无成见，予已电告两君，表示此意。将来会晤以后，当可仍照原议也。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在巴黎办中国大学，或将西南大学另开国外部。此议吾人亦不赞成。盖吾人求学，既已远赴巴黎，当然不入中国大学，且事实上亦以径入法国大学为宜。欲学中国学问，则尽可就地求之，初无赴法之必要也。若以为凡人但能一抵巴黎，即可脱胎换骨

变莠为良，不必问其求得何种学问之理想，则吾人未敢苟同。盖归自巴黎，又依然为恶者，事实上正不乏人也。”又说：“吾人赴广州后，将于印刷界有所刷新。或就西南大学添设印刷部，以为刷新计划之试验。此种计划，第一步，即将铜模之单字，改为双字，或联字，所有名词熟语皆分别铸为一颗，例如上海两字，向来须先取上字，再排海字，吾人新铸字模，将上海两字铸成一颗，其余名词熟语，大半类是，则排字时，可省二分以上之时间，则印刷事业可省二分一以上之名词。[①]动词、接续词，分别隔断，俾读者一目了然，无形中寓教授文法之意，日久以后，便可将吾国固有之单音语变为复音语(拼音)。此计划之实行，拟另设一印刷学校，教授一班生徒，从事工作，以为改良各处印刷业之先导云。”

（载《申报》1920 年 2 月 23 日）

---

① 编者按：原文如此。

致程演生[1]

编者按：吴文质先生于《安徽史学》1985 年第 1 期披露《陈独秀遗简》(一)四件，现从中选收一件。

演生先生：

前天的信想必收到了。白话文选事望从速进行，因为许多地方都急于用这种东西。虞女士事老绅士辈能出头办理否？他的颂事倘能进行，上海方面能有经济的援助(约可一二千元)，倘需用时，可告孟邹转达仲农兄。舍间近来平安否？请你回我一信。

弟　众白

一九二〇年二月廿六日

---

① (1) 此信是 1920 年从上海寄往北京程寓的，信封印证。

(2) "仲农"即卢仲农，安徽和县人。

(3) 仲甫亦作众甫，众即众甫的缩写或简称。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一)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底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决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

(二)

马尔塞斯人口论的内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内)底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2)这种不断的倾向底结果,生物常苦于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发生种种悲惨,人类社会底贫困罪恶不能绝迹也就为了这个缘故。(3)因此人类社会要想

断绝这个祸根,凡是没有赡养家属资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来防止人口过多的自然力。

后来新马尔塞斯派,对于前列的(2)、(3)两项大加修正。这修正派的人,以为人类底贫困和罪恶,不仅是人口过多的结果;社会组织的缺陷,的确也是一种原因。他们又以为拿制欲和独身主义来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实行预防受胎的法子,因为预防受胎比制欲合乎自然,而且不损身体底健康。

后来无论赞成马尔塞斯底学说或是反对的人,对于修正派底意见,反对的却少得多了。但是他们对于马尔塞斯底(2)、(3)两项意见,虽然加了多少修正,却于他的根本学说,还是不曾动摇。因为马尔塞斯主张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项,马尔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学说当做万古不动的一大真理,也就在(1)项,因此人口论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于(1)项了。

(三)

人口底增殖率,果然是照马尔塞斯底推算,每二十五年必定增加一倍吗?

生物底生殖力,自然都很伟大,即以一切动物中生殖力最低〔的〕象而论,他一生百年间,平均生殖六子,这六子果然都能生存蕃殖,从最初的一对夫妇起,经过七百四五十年,应有一千九百万匹子孙;生殖力最高的微生物,有几种一昼夜可以生殖一万倍以上。若照马尔塞斯底主张,单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论,便可以推断生物在事实上计年增加底倍数。那么单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项,也已经充满地球了。

生物底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蕃殖增加底倍数,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人类底生殖力固然伟大,克鲁泡特金所谓自然的破坏力(寒冷、大雪、暴风雨、旱灾、水灾等),亦复伟大,战争的、瘟疫的破坏力更是不用说的了。据中国底历史,三千年间,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调

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狭不同，合并异族的人口增加等原因，实际增加当然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在马氏他自己也知道在历史的事实上因有自然的限制，人口增加率不是这样快，所以他说："人口若无限制，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人口论》第一版十一、十四页)后来迷信马氏学说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记了上半句，因此比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点。

在马氏著书之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自从他死后一直到现今，欧洲大陆各国，不但没有人口过多的现象，而且都有人口不足的恐慌，这真是马氏警告、豫言当时所想不到的了。如今大战后更是不用说的了，就在战前，即以法、德两国而论，如何使人口增加，不是两国几十年来政治家和学者苦心研究的问题吗？法国因为人口减少，Bertillon 有三百年后降为三等国，五百年后种族灭亡的警告。"法国人口增加奖励协会"(Alliance nationale pour I'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rancaise)曾提出奖励人口增加议案十二条。议会也屡次提出同样的议案。德国自从一九〇〇年以来，产儿力非常低减，因此国论沸腾，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书多至二百十六种。Julius wolf 教授等所组织的"德国人口政策学会"(Deutsche Yesellschaf fur Bevolkerungspolitik)，他们的政策：(1)产儿底限制；(2)产儿底障碍，如花柳病预防、女工保护、产妇保护等；(3)保护现生的小儿。此等现象，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警告、豫言相反吗？

(四)

生物底增殖，果然和食物底增殖不能保平均的速度吗？文化进步的社会，果然不能按照人口增殖速度，扩张食物底范围，增加食物增殖底速度吗？

多数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给者；伤

〔像〕这种生物自己吃别的生物而生存，同时别的生物又吃他而生存；因此可以说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时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例如猛类鱼吃普通鱼而生存，普通鱼吃小鱼及甲壳虫而生存，他们在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同时在他方面不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吗？

即以最进步的人类而论，一方面吃别的生物而生存，一方面也算是别的生物底食物，象那最大的猛兽和最小的微菌，不都是吃人的生物吗？前一项现在或者可以说渐渐减少，后一项无论医术卫生如何进步，将来能否绝迹，还是一个疑问。

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在文化进步的社会，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在时代的人想像得到的，何以能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的比例增加呢？

人口增殖率当然不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供给人类吃的生物，他们的生殖力，每二十五年却可以增加数十倍或数百倍。倘用科学来选择、培养和人力保护，不叫别的生物侵占，增殖底速度更要大大的无限增加。例如有许多我们现在不吃的生物，若是利用科学来选择、消毒，我们食物底范围便自然扩张了。我们现在所吃的生物，若是用科学来培养和人力来保护：像养鱼隔离法（产卵期内和他鱼隔离，防止卵为他鱼所吃），农业上蚕业上驱除害虫法、家畜防疫法、牧场防兽法，都严密实行起来，食物增殖底速度，自然没有不意外增加底道理。

私有财产废止底好处：(1)社会资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底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在这时候，自然可以实现“无旷土无游民”的理想，再加上农业化学天天进步，农产物增加底速度，自然非常伟大了。

姑且让一步说，这都是未来的空想；就以现在的经济制度，现代的科学程度而论，自从马尔塞斯死后现在八十五年间，因为资本集中、机器广行、交通发达、殖民地开拓这四个缘故，欧美经济状况生了绝大的变化，和马尔塞斯时代迥不相同。一方面农产物输入多量，毫没有收获渐减底恐慌；一方面工业物却有收获渐增底效果，生产过剩底恐慌居然

成了经济学上一个原则。因为有生产过剩的恐慌，所以他们寻找销场的希望比寻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热烈得万倍。他们用极强大的海陆军保护殖民地还不过是一种手段，扩充销场，拥护商业，才真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所以近代的国际战争，往往拿出极大的牺牲，所争得的并不是一块土地，不过是几项有利的通商条约。

再让一步说，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话固然不错，但无论分配如何不均，也必定在勉强维持社会生存以上，资本家才能够拿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像现在俄、奥两国产业界底情况，无论有如何大力的资本家，也不能够把维持国内底生存尚嫌不足的生产物，用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在一种生产过剩急找销场的国家，若是没有资本私有制度，平均分配起来，当然有维持生存以上的余裕了。因此就是这种非实际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况且棉纱、米谷更是生活品中第一不可少的东西，决没有绝对不足还可以输出的道理，近代中国、日本、美国底人口都非常增加，而棉纱、米谷反是大宗的输出品，这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预料相反吗？

（五）

科学发达，生产技术也进步，人类食物底范围，自然有无限扩大底可能性；但是对于土地这一层，有一以为土地底丰腴力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对于这一定丰度的土地上所加劳动底生产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收获递减法则”。这种法则都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一个有力的帮助，因为这种法则若是真理，在人类食物范围扩大上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法则就是说：一块土地底收获分量，决不能随劳力分量比例增加。例如第一年十人耕种一块土地，有百分的收获；第二年加十人耕种，收获分量虽有增加，决不能照人数增加的比例增加一倍。照人数

比起来，反有劳力递加收获递减的现象，如下表：

	一年度	二年度	三年度	四年度	五年度
劳动人数	10	20	30	40	50
收获总量	100	180	240	280	300
最后增加的劳力所收获		80	60	40	20

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的食物不全靠农产物；第二，我们要晓得化学发达可以人工增加不须耕种的食物；第三，我们要晓得将来农业化学发达，收获底增加还可以在人数增加的比例以上；第四，我们要晓得此时地球上未开垦的荒地还多得很，假定收获递减法则是真理，人口有加无减也是事实，这种真人满的恐慌，也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后；若是把眼前的社会问题放下不理，预先忧虑那多少年以后的事；那么有人说地球将来也要毁坏的，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呢？

（六）

有人把经济思想分为二大系统：一是富底哲学，说明富底性质及原因；一是贫底哲学，说明贫底性质及原因。斯密亚丹属于前者，马尔塞斯属于后者。人类底贫困不单是食物一样，乃是衣、食、住、知识、娱乐一切等等不足者对于足者比较的现象。不但没有衣、食、住是贫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贫困，着布衣的比着绸缎的是贫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贫困，着短衣的比着长衣外套的是贫困，没有钟表用的比有钟表的是贫困，步行的比坐马车、汽车的是贫困，无钱结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贫困，无力量读书的比学者是贫困。倘在均产社会里，权利均等，机会均等，没有足不足底比较，个人贫困底现象便不会发生了。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立刻成了“均无贫”的社会吗？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公共觉得生活资料不足，那时才可以拿人口过剩算贫底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

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资料不足底一种原因。马尔塞斯说明贫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经不大周到了;他说明贫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他这种贫底哲学,恐怕还不及斯密亚丹富底哲学稍有根据。

马氏生在盛唱均产人权的时代,不肯盲从时论,对于 Godwin 及 Condorcet 加以有系统的攻击,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胆识。发明了贫底一种原因——即人口过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过于偏重他发明的这一种原因,和别的发明家、持论家陷于同祥的偏见。不但如此,假令人口过剩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权利是从那里来的?又何至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又何至说没有得父母财产的人没有吃饭的权利,好比宴会里未请的宾客没有入座的权利一样呢?(《人口论》第二版五三一页)Place 说马尔塞斯否决无事的穷人有吃饭的权利,却许无事的富人有这种权利。象马氏这种掩护资本家底偏见,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问题。

贫民多子,自然是社会上一种悲惨的现象,我们应该设法救济的;但是救济的方法,不能够象限制人口那样简单。第一要向〔问〕贫民是怎么会贫的,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罪恶?第二要问贫民底子女何以没有公共教育底机关,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缺点?若丢开这两个问题,专门限制贫民人口,这种劫贫济富的办法,就不说什么生存权和人道主义,社会上必招两项实际的损失:(1)贫民底子孙中往往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倘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岂不是要受绝大的损失么?(2)富人底子弟多游惰,贫民底子弟多勤劳,倘专门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游惰的分子渐渐增加,勤劳的分子渐渐减少,岂不是可怕的么?

优种论虽有点和个人自由、人权平等冲突,比人口论似乎还好些。因为优种论所要淘汰的,在他的观察总是社会上恶劣分子,还没有贫富底分别。

（七）

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梦话。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中国一百万人口左右的都市，不过上海、武汉（合武昌、汉口、汉阳而言）、广州、北京四处，拿人口和土地比例起来，是不是人口众多，还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发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们人口数目比别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须我们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别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产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

但是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曾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可以解决的。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底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底现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过多；生活资料不足，不是生活资料增加底可能性赶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若依马尔塞斯底主张专门限制下层阶级，不承认贫民有生存权；那么，中国式的上流阶级——即富贵游惰分子——渐渐增加，贫苦的劳动的生产分子渐渐减少，不知道将来要变成一种什么社会？

所以我主张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该并行下列的几个方法：

（1）发展生产事业　劳动方面，大都市底工厂里，每天工值两三角做十二点钟的工，大家还惟恐谋不到手；人口稠密的农村里，因为租地竞争，地主除收租外还有种种不法的需索，佃户终年辛苦还不能够饱暖；农家底帮工，每年工价不过十余元；这都是人口过多，工价过低到这样地步。但是我们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就是已经发达的农业，不但东北西北底边地，就是内地各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这一样就可消纳无穷的人口。

(2) 发展交通事业　此事对于人口问题有两种效果:(一)增加能生产的人口;(二)利用有余以补不足,等于增加生活资料。

(3) 发达科学　此时欧美各国底物质文明虽是进步,将来科学越发达,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还要随着无限的增加,至于我们科学还未萌芽的中国更是不用说的了。

(4) 发达生产技术　无论农产工产品,技术越发进步,生活资料增加底速度越发增加。

(5) 增加劳力底数量　土地劳力在生产要素上应该居首要地位,在我们“游惰神圣”的国里,不但劳动底人数过少,劳动底力量也不充分,一般劳动者做工底时虽多,大半等于西洋的怠工。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

(6) 分配平均　现在军阀集中资本,人民已经是受不了;财阀倘再来集中一下,将来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余裕,那最大多数最大痛苦的人,连一班拥护资本主义大骂社会主义的学者自己或是他的子孙,都要变成没有生活资料的贫民,都要被马尔塞斯取消他们的生存权了。在财产权私有社会里,似乎不可因为有许多穷人生活资料不足,便马上断定是人口过剩,便马上断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因为若将全社会合拢起来平均分配,不见得生活资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强盗太有余了,别人便当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讨论社会上究竟是不是人口过剩,究竟生活资料足不足,候实行分配平均后再谈,似乎才能够得到真相。纵然大家说平均分配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那就请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这总是做得到的罢。这种分配底法子固然离平均还差得远,但是也可以救济人口问题一部分的危急。

(7) 限制人口　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

1920 年 3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

——反对在沪设立

自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西南大学大纲，并决定校址设立在沪后，陈君独秀极不谓然。此间各界要人，如唐少川、孙伯兰，皆反对在沪之议。谢无量更谓大学在沪设立，必当派员筹备，其结果购置地皮不得，建造校舍不成，而大学基金已归于尽，届时西南大学四字，已成为历史上理想的名词，盖上海地皮昂贵，建造艰难，非主张在沪设立诸公所能梦想也。兹陈君独秀又发表其反对在沪设立之种种理由，略记如左，陈君云：

大学在沪设立，主张最力者为吴稚晖、胡汉民诸君，其主张之理由，谓在沪设立有四种利益：(一)上海在外人势力之下，不受政潮牵制；(二)广州恐不免战争，一有战争，大学设备难保根本破坏；(三)为川湘黔三省学生交通计，以上海为便利；(四)大学基金出于关税余款，此项余款，属于中央，故大学宜设在沪。此四种理由，皆不能使吾人信赖，何则？政潮影响，不能及于大学，北京大学自辛亥以来，经几许政潮，始终屹然无恙，即其明证。若恐武力破坏，则吾国武人，野蛮似不至此，北京大学亦曾从京津兵变、张勋复辟两次纷扰，未尝动其毫发，亦足使吾辈安心。如谓不信赖中国政府与社会，必求依赖外人，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匪第学校，其他事业亦宁有安全发表之余地。故以谋安全讲学为理由，主张在沪设立，实有置北京大学与广州高等师范及全国一切学校于化外之意味，吾人绝不敢承认。至于交通，以现时状况论，在沪可谋川湘黔三省之便，而招粤桂滇三省之不便，便不便各半，所谓便利者，已两相抵消。况大学为百年大计，吾人言交通，至近当以川汉粤汉两路成立为标准，两路成立后，川黔湘皆以赴粤为便，则所谓上海便利者，更无理由。至谓经费出于关余云云，其理由直有否认西南政

府之意味，实属矛盾之极。且关余为国家收入，西南大学当然为国立大学，初与在粤在沪不生关系，此在沪有利之说，吾人不能信赖之理由也。且大学在沪，尚有三大弊害，吾人不可不知：(一)办大学而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上为莫大痛苦，况以国立大学置诸政权不及之地，尤为不成事体。(二)上海租界，地皮昂贵，大学须用地基，必须数百亩，欲觅数百亩地面，已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曰能之，而开办之初，即耗去地价数十万，他种设备，不能不趋于易简，结果所至，恐不出谢无量君所言主张。在沪之人，希望同济学校旧址，无论该校旧址不能敷用，而该校尚在法人手中，交还手续，亦非一时所能办到，且非经过北京政府，不能接管该校产业，不识主张者将以何法经营之，此吾人所惑者也。(三)近代教育原理，专门学校皆斟酌社会状态，为适宜之配布，比如都会设文科理科，商业地设商科，工业地设工科，因学校教育不能不受社会地，所谓闭户读书与社会隔离者，非近代教育原则所许也。上海为工商社会，不宜设立文理两科，西南大学断无专设工商科，以迁就社会之理。且先设文科理科，为已定之计划，将校址安置上海，直与教育原理反背。更就广州言，大学设在广州，尚有五大利益：(一)广州社会，有多数市民及讲学之人，不似上海之纯为工商社会，设立文理两科，合于教育原理；(二)校址有公地可拨，不必销耗巨金；(三)两粤民风勇健，输以高尚文化，必能奋发有为；(四)南洋华侨归国就学，以广州为便，设有大学，可通南洋教育；(五)中国三大流域，黄河流域已有北京、南开两校，长江流域亦有复旦、南洋及其他各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使与江河流域，平均进步，今恰好有此机会，若移归上海，则上海锦上添花，而将来广州大学之建设，不知何时矣。凡此五种利益，主张在沪者，皆不记忆及之，已属异事，更有一显明之理由，即以西南政府创办之大学，不置诸其自己之领地，而寄诸东南海滨之外人肘下，名称矛盾，系统冲突，尽人皆知，而主张者亦未注意及之，诚令人无从索解也。至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设立西南大学外国部于法国里昂，已均得军府承认，岁拨经费二十万，此举尤令人骇怪。法国文化中心为巴黎，里昂不过机织发达之一工业地，何以吾国必设大学于此？况区区二十万，何足以语大学，更何足以语外国大学。吾人留

学法国，何必自设大学，吾人欲学中国学问，何必远航赴法。凡此种种，真令人人五里雾中，莫知所措矣云云。

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 《申报》 署名：陈独秀

致周启明信

启明先生：

二月廿九日来信收到了。《青年梦》也收到了，先生译的小说还未收到。重印《域外小说集》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你开来的办法，芝寿兄托我转答如下：

一、照原议。

二、照原议。

三、版权既不让群益，报酬若干，群益底意思，决计请先生自定。

《新青年》七卷六号底出版期是五月一日，正逢 Mayday 佳节，故决计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一篇托尔斯泰底泛劳动主义，如何？守常兄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缘故？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底告白，不知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或有实际事业在北京左近，此事请你告诉我。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弟　独秀

〔1920 年〕三月十一日

前回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请你见面时问他一声，我很盼望他的回信。又白。

1979 年 5 月 15 日　《历史研究》第五期

教育缺点

——在江苏省教育会上的演讲

今天所讲的，统合说起来，是教育上的缺点，也可说就是教育上的罪恶。并且这种缺点和罪恶，并不是腐败的学校所有的现象，却是在平日声誉很好的学校，都免不了的。真正腐败的学校，倒也赶不上这种缺点咧。我所说的教育上缺点和罪恶，一种是犯主观主义，一种是犯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是牵连一起。因为是主观的，所以有了形式的，因为有形式的，所以有主观的。这种弊病，在欧美各国亦不得免。在我国不但中等以上的学校，是这样，就是小学教育，也都是这样两种主义。先把主观主义的缺点说出来。教师只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时候，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意思灌输进去，这就是主观主义的现象。要知道好的教育，应该学生教先生，这句话说来很奇，怎样学生反而教起先生来呢？就是先生在教授时候，必定要拿学生做本位，细细考察这一班许多学生。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特性，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天才，用什么教材放进，便有什么反应发生，不是随便可以教授的，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经验来。做教育的，依据我国现在教育，所以没有进步，坏在主观主义。这种主义，和以前教授经史百家的旧教育，有什么分别！不过拿经史百家的旧教材，改了史、地、理化等等新教材罢了。我们要知道新旧教育之不同，全在主观教育和客观教育上分别，不是在教材上的关系，是在活用教材方法的关系。我们所以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是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不过在主观、客观的分别，旧教育的弊病，不问学生是否明了，用他主观的眼光，随便灌输学生。什么伦理科、历史科、地理科，所授教材，全凭讲演，不切实用，就像伦理重在实践，不是说空话便算了事，在理应该把这科取消。历史科，排列了许多不相干的古事，崇拜偶

像的说话，教给学生记忆，有什么用处？地理科，在乎简单明了，并不是罗列许多无用的地名，硬要学生牢记，这样教法和以前的旧教育的，教学生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什么分别呢？不说旁的，就是北京很有名的某学校，教职员的思想，也算很新的了，不过他们所授的教科，糊涂的很，陈列的文字，学生大都不懂。这也是中了主观主义的害处。欧美各国无论那种学校，每礼拜至多不过二十多个钟头，分了许多科目，好使学生欢喜那种就学习那种，倒是事半功倍，很有效验。总之，无论什么学校的功课，倘使和学生个性适应的尽管教他，不是这样，尽管定了许多课程，教了许多材料，但是于学生实际上丝毫没有影响。那是何苦呢！吾觉得现在国内学校，往往不肯细细考察个性，随便教育，就是大学也免不了这种弊病咧。

讲到形式主义的流弊和罪恶，不在主观主义之下。很多的学校，只重外面好看，装璜华丽，气象焕然，就是茅厕的门面，都有种种装饰，某地方还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样子，校门总是做来很高，建筑必求新式，而于内容反一点不讲。实际上这样，教育到底有什么益处？推原其故，因为教育部平时只在形式上考求。所以上行下效，弄得教育一点没有实际。最可笑的，称了工业学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不但使学生进了这种学校，如入五里雾中，一些没有领会，就是教的人自己也莫明其妙咧。我有一种感想，要使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你想他们住在京里，社会生活程度、人情风俗习惯，一点不懂，定了什么许多章程法令，硬要人家遵守。不依照他，他就要驳他不合部令，依照了他，事实上又是不能做到，这明明是叫人家进于虚伪的境界。照教育部的意思，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其实中国这样的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样可以统一呢！譬如做了一件衣服，说是不管那一个人的身体长短大小，都要照这件衣服的尺寸，那岂不是笑话吗？简直说一句话，教育部存在一天，中国的教育，一定办不好一天。还有考试一件事，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产物。这种弊病，很多很大。因为有了考试，就有什么毕业问题，文凭问题，引起了学生的虚荣心。教师学生平常多都不注意，临到考试时候，在这一二礼拜以内拼死用功，不但临场时夹带枪替，于道德上很有影响，并且废食忘眠，在身体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试完毕，

把所有临时强记的完全忘掉了。有人说学生求学底目的，一种是要增加学问，一种是为社会进步、生活改良。象现在学生的求学，专为考试，这不过是为了毕业问题，希望早一天毕业，那文凭可早一天到手。所以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

你看欧美的大学问家，尽有在学校里考试时候，屡次落第，到了后来，偏享盛名。日本教育大家某博士，在学生时代，每逢考试总是不利。后来他在大学校里当了教员，很反对考试。其实考试及格不足为荣，考试落第不足为辱。考试得利的不定是桀桀大才，考试失利的不全是庸劣无能。有人主张考试的，说一朝废去了考试，那学生的学业，不能够看出他进步不进步。这句话实在是差误的。照他说没有了考试，不能知道学业的进步，那末以前私塾先生惯用扑责，警诫学生，现在废掉了扑责，难道学生就不及从前吗？总之，学生的学业，并不因考试提进的。并且做了教师，平日里不能知道自己学生品行学业的好歹，偏要凭着考试方才知道，这样漫不经心的教员，他平日的教育成绩也可想而知了。吾们要望学生道德上学业上进步，不在乎考试。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只要平常多方练习，自然能够进步。地理只要注重实地观察，化学注重在实验室里试验，那才可以得着好的效果。何必定要形式考试来贻误青年呢？所以我敢说，现在教育的流弊，不出这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自从杜威氏来吾国，到处演讲教育，他竭力攻击的就是这以上所说的两种主义。他说不但中国犯这种弊病，就是美国也未尝没有。日本更比中国不如，所以杜威到中国来最精要的讲演，却不在伦理学，也不在社会学，是在教育学。可惜我国人对于他所讲最精要的教育，不十分注意。现在我们教育界应该大家注意这点。因为这是教育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所见教育上种种不好现象，归纳起来，不出这两个主义。

1920年3月30日、31日，4月1日　《时报》　署名：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

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底《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像或愚人底妄想，想像、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

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象我们中国人底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好。吴稚晖先生说："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底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做一团。他们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去打麻雀，还比吸鸦片烟好一点。鸦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们堕落到现时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面理由：因为我们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闲死，劳动者岂不要闷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底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里店家打十番锣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

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现人类最高心情底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底时女画、十番锣鼓、皮簧戏曲这步田地，我们固然应该为西洋人也要来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连美术、音乐底种子都绝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孑民先生曾说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张申甫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创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底误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说过；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忌妒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别好些；但是因为他们有维持团体的公共心牵制，所以才有点组织能力，不象中国人这样涣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最近学生运动里也发生了无数的内讧，和南北各派政争遥遥相映。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半聋半瞎的八十衰翁，还要拼着老命做官发财，买田置地，简直是替儿孙做牛马，个人主义决不是这样。那卖国贪赃的民贼，也不尽为自己的享乐，有许多竟是省吃俭用的守财奴。所以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

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1920年4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①]

——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讲演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根据运动。[②] 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原文如此。

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小而结果大，不是一种好现象。在青年的精神上说起来，必定要牺牲大而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的效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赖自己！

1920 年 4 月 22 日 《时报》 署名：陈独秀

致李大钊、胡适等

守常　适之　申甫　玄同
孟余　孟和　百年[①] 尹默　诸兄公鉴：
慰慈[②] 抚五[③] 逷先[④] 启明

《新青年》七卷六号[⑤]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

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公同讨论赐复：

(1) 是否接续出版?

(2) 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

(3) 编辑人问题：

(一) 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

(二) 由在京一人担任；

(三) 由弟在沪担任。

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弟独秀〔一九二〇年〕四月廿六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

① 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期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② 张慰慈，名祖训，江苏吴江人。美国依阿华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③ 王抚五，亦名王星拱，安徽人。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硕士，国立北京大学化学教授。

④ 朱希祖，字逷先，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北京大学教员。

⑤ 指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

训卢永祥的秘书

卢永祥是个不识字的武人，他发出的电报，当然是他的秘书做的。当他的秘书，自然不应该有知识，我们何必责备他？但是“五一”纪念节的历史，去年的北京《晨报》，去年和今年的上海《星期评论》和前天工界传单，都说得很清楚，他虽然无知识却不是瞎子，为什么硬说五月一号是俄国劳动纪念日呢？难道世界上一切的事，凡是于你们不便的，都可以随便加上俄国二字好叫中外人都深恶痛绝吗？倘果然有此效力，我很希望把你们所喜欢的大洋钱上都加上俄国罗布几个字。

这次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本是工界各团体发起的，和学界毫不相干。像我们这样非劳动的读书人，只好厚着脸去做来宾，学生要有去的，一定也和我有同样的感想。卢永祥的漾电，硬把世界二字改为俄国二字已经是杜撰了，又硬说是学生开的，试问学生并不是劳动者，如何去开劳动纪念会？若说是学生利用劳动者，工界所发的传单、宣言，你们看见没有？和学生所要求的是不是一事？“学生等拟于五月一号开俄国劳动纪念会”这一句妙文，非善做截搭□[1]的老手不辨，倘若译成西文，传到外国，真是一场笑话！

1920年4月29日 《民国日报》 署名：陈独秀

---

① 似该是“题”字。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做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1920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1]

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话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放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

① 一九二〇年春，上海厚生纱厂要在湖南招收五十名女工。规定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月工资八元，其他待遇亦差；应招女工并须由家长签署志愿书和有力量的铺保。为此事，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纷纷载文指出工时过长、工资太低，以及妇女的人格、卫生、医药等等问题。厚生纱厂总经理穆藕初对上述的责难，进行辩护，遭到朱执信等人的反驳。全文共有十六节，陈独秀的《我的意见》是最后一节。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利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

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餬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产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借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

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于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

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那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曾〔存〕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够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熙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象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

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间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 Co-operative Society 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诒，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的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 Co-operative Society 制度，或者可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这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1920 年 5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答知耻(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

知耻先生:

工人底教育和储蓄固然是要紧,但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做减时增资底必须条件。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做工时间呢?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就是能够衣食饱暖,就是衣服楚楚,而被抢的权利,仍然是绝大的损失,终久是要大声叫冤的;因何理由必须强迫工人贮蓄才能增加工资呢?浪费时间及金钱与否,是工人自己利害所关,不劳他人强迫;若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时加资,实在是笑话。尊论以为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这句话真是名言。但全社会底界说,不是资本家独占的意思才好,不是工人除外的意思才好。照先生和郭某底意见,欧、美、日本底工业界,都是破坏的气象,都是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工人都习于游惰;那末,此时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工人勤俭、安分,只有我们中国工业界出品增多而且不恶劣;好极了,欧、美、日本也有不及中国的一日!不但先生及郭某有这样见解,欧、美、日本底资本家,诚然应该叹美中国工人能安分做牛马,比欧、美、日本喜欢破坏的工人驯良得多;但是我以为中国工人还没有好到十分,若工作时间每日加增到二十四小时,工资减到每年一个铜子,更足表示中国工人勤俭、安分的美德是世界古今第一;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1920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附：知耻致陈独秀（节录）

独秀先生：

……

增工资减工时之结果，不但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工人习于游惰，不能如前之尽心工作也。故仆之愚见减少工作时间，必与施行强迫工人教育并行；如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即以此一小时供强迫工人教育之用；而增加工资，又必须与强迫工人贮蓄并行：如此庶不致浪费时间及金钱，而于工人方面可得实益。

再吾国工业今方萌芽，求工不得之人，到处皆是，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尤当着眼于工人本身之实在利益；若一味效法欧美鼓吹破坏，仆以为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日本之前车可鉴也。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知耻上言。

答章积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

积和先生：

工作时间不减少，工人教育自然是没办法；但是只减少时间若不增加工资，仍然是没有办法。因为上海工价虽比乡间高，而物价也高；工人所得工资只可勉强敷衍衣、食、住三件事，教育费无从谈起；别人尽义务不是常事，而且不能普及。

独秀

1920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

在南洋公学演说

有人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太偏于社会方面，把政治忽略了，又有人批评我们何以不会讨论重大的宪法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旧的政治已经破产，中国政治界所演的丑态，就是破产时代应有的现象，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新的政治理想。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合乎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式宪法，而且要先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至于凭空讨论形式的宪法条文，简直是儿戏，和实际社会没有关系。

现代世界上政治状况是怎样？不但中国，无论那国也都是军人、官僚、政客底世界。因为他们的罪恶是太明白了，所以有许多人看出政治底罪恶太深，想根本推翻政治，主张无政治——无政府主义。现代人群底结合，有两种理想：(1)有军警、有法律、有政府的政治结合。(2)无军警、无法律、无政府的社会结合，我们中国人当然是赞成前一种的人多，赞成后一种的人少。但是我们要晓得就是退一步，主张前一种的结合——政治结合，也要主张新的政治，才可以把旧的政治罪恶洗刷一点。要研究新的政治和旧的政治主要的变化，第一要晓得各国政权转移底趋势如下表：

(a) 古代——第一、第二阶级(即君主贵族僧侣大地主等)执政。

(b) 现代——政治革命后第三阶级(即工商业资本家的官僚政客)执政。

(c) 将来——社会革命后第四阶级(即无产劳动阶级)执政：

例如：

德国底斯巴达司加
俄国底劳农政府
法国底工团
英国底基尔德
美国底 lww
（这三派虽反对国家及政治的程度不同，而主张劳动阶级统治产业却是一致）

将来的趋势虽然是这样明白，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中国有特别的国情，我们再退一步，主张再和平一点，也要叫他在(b)、(c)之间，似乎不可在(a)、(b)之间罢。

我们既然迁就国情，卑之无甚高论，主张在(b)、(c)之间，这新政治的组织及实质是怎么样呢？略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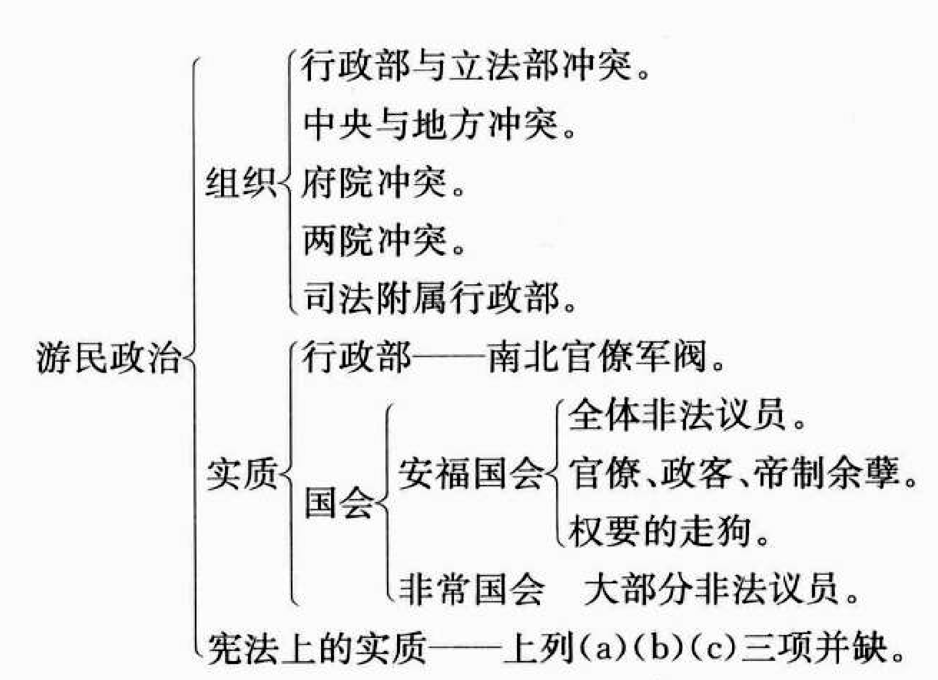
（一）新政治的组织

行政委员会——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委员，都由议会选出。
议会——中央及地方的议会，都由各业联合会按人数比例选出。
（各业联合会，由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各自组织）
法院——由议会选择。

（二）新政治的实质

(a) 个人底言论、出版、集会、婚姻，有绝对的自由权利。
(b) 关于遗产、粮食、银行、土地、利息率等经济制度底规定。
(c) 中央地方权限底规定：
（甲）属于中央者——外交、海陆军、海关、国营银行、工矿业及交通机关。
（乙）属于地方者——警察、司法、粮食、教育、土地、地方经营的银行、工矿业及交通机关。

中国现时的政象如下表：



新的政治比起旧的政治来，最大重要的理想，就是没有职业的人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就是拿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执政——即职业政治，来代替贵族、军人、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即游民政治。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时事新报·学灯》　署名：陈独秀

《水 浒》新 叙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为什么有许多人爱读他？

是了！是了！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

在这一点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许多人爱读《水浒传》的缘故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

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加多。他们要求我做篇叙，我没甚多话说，惟有指出这书主要的理想和技术，请读者注意。

民国九年七月七日，陈独秀叙。

《水浒》亚东发行(1928 年)



在电工联合会上的演说词

——工人与国家之关系

兄弟近因病体不适，没有多的预备，今天对诸君简便的说一下，就是工人应否爱国。这个问题，我恐怕诸君很有些不明了地方，但凡这一个爱字，是与我们个人有切身底利益的事呢，诸君要晓得现在的国家，不是工人的国家，是资本家的国家，政治法律以及种种设施，概为少数资本家而设的，与工人没有丝毫关系，我们且看近年的五四运动，就可以证明，这一件事，我们现在说消极的爱国，就是要打倒少数资本家底国家，建设劳动工人底国家，但这事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所望诸君，要有自觉、有团结，将来以无数小工会，联合成一大工会，那时我们劳动的国家，就不难于实现了。诸君勿以现在电器工会人数少，就扫兴，我们要把眼光放大，也不要心满意足，凡是我们的工界份子，都有联络他们入会的责任，将来会员达至数千人，那时兄弟到贵会演说，诸君也就高兴不小了。

七月十一日　陈独秀

《申报》1920 年 7 月 12 日



致 胡 适

〔上缺〕八卷一号文稿，我已张罗略齐；兄想必很忙，此期不做文章还可以，二号报要强迫你做一篇有精采的文章才好。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

吾兄在南京的讲义，务请恳切商之南京师，特别通融，给新青年社出版。可否乞即速示知。

弟独秀白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两个工人的疑问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而且把粮食收下来和运到别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地下生长的许多有用的矿产，更非用人工去开采，不会自己出来的。砖瓦不用说是人工做成的，木料生在山上，不用人工砍伐搬运，他自己也不会跑到砖瓦一块，自然替我们凑成功一个房屋。我们穿的衣服，自从种棉、养蚕以至纺纱、缫丝、织成布匹，那一样离得了人工？总而言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单靠天然的原料是不行的。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但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工？我们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不做工、不劳动，便没有粮食吃，没有屋住，没有衣穿。种田的人虽然自己〔不〕做屋不织布做衣，他用劳力做米的粮食，可以供给做屋的人、做衣的人吃用，因此可以说是拿自己劳力做的粮食换来别人劳力做的房屋和衣服。做房屋做衣服的人虽不种田，他能拿自己的劳力做成的房屋和衣服去换粮食，这也是分所当然。若是我们不做工不劳动，那便是自己一无所有，拿什么去换别人劳力做成的粮食房屋和衣服呢？这样的人要想有粮食吃有屋住有衣着，除了去做强盗、扒手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又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1920 年 8 月 15 日　《劳动界》[1]第一册　署名：陈独秀

---

① 《劳动界》周刊由陈独秀、李汉俊发起，于 1920 年 8 月 15 日创刊，目前能见到的为二十四册。其"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民国日报》1920 年 8 月 17 日，"《劳动界》出版告白"。)

致程演生[①]

演生兄：

方梦超[②]完全是一个流氓，且与小徐[③]有关系，改进会[④]为什么容留他！社会上坏人利用团体牟利的事很多，你们要小心！北京改进会若不驱逐方梦超，上海改进会便要宣告和北京改进会没有连带的关系，免跟着丧失名誉。

兄所选的白话文稿[⑤]，望速向适之取回；因为他打算将此稿卖给中华书局出版，真是出人意表之外。这件事一半是吾兄懒惰之过也。适之在京很受人攻击，想必也有自取之道。

弟独秀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1980 年 10 月　《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四辑

---

① 程演生（1888—1955），亦称程衍生，安徽怀宁县人，北京大学教授。

② 方梦超，安徽枞阳人。在北京常参加旅京皖人同乡会的活动。

③ 小徐，即徐树铮，属皖系军阀。

④ 改进会的全称为皖事改进会，是安徽省进步知识分子的团体。陈独秀主持的皖事改进会，不仅在旅沪的皖人中比较活跃，而且和北大教授程演生、王星拱等为主要成员的北京皖事改进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⑤ 程演生受陈独秀的预约，选辑《白话文选》，计划交亚东图书馆出版。

真的工人团体

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

1920年8月22日 《劳动界》第二册 署名：独秀

致周启明信

启明兄：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日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暂用他纸，稿纸候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弟 独秀白

〔1920年〕八月二十二日

1979年5月15日《历史研究》第五期

霍乱和痢疾

夏天霍乱，秋天痢疾，都是容易传染而且狠利害的病。得病的原因，大半是吃了腐烂的水果和不洁净的菜，喝了不洁净的冷水。可怜用力出汗的劳动者，那能够有许多洁净的热水吃，屋内或街上的自来水就是他们止渴的救命汤，这就是劳动界得病比别种人多的原因。劳动者有菜吃又有水果吃，已经是福气，还管他洁净不洁净，这又是一个得病的大原因。但是劳动界要把霍乱病和痢疾减少一点，怎样办才好呢?

1920 年 8 月 22 日 《劳动界》第二册 署名：独秀

老爷们的卫生

听说警察厅禁止劳苦的人在街路上睡觉，说是有碍卫生。多谢官厅也知道注意穷人底卫生了。但是他们若回到那十人同住一间的小屋里去睡，恐怕更不卫生。而且我还可断定他们若有做官的老爷们那样宽大的公馆，他们一定不肯在街路上睡觉。

1920年8月22日 《劳动界》第二册 署名：独秀



谈 政 治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

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 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 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 所引)。Christensen 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

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 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46、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政〔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

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

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铰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

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

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 Be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 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 Wilhelm Liebknecht，***No 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数多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

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 Be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

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1920年9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①] 署名：陈独秀

---

① 《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

对于时局的我见

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说：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出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现在安福倾覆后上海方面对于时局的舆论，颇不一致，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

（一）总想"不劳而获"，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这次打倒安福派，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别人都坐观成败。若是事后说便宜话，或是提出过大的要求，这是一定没有效果的。我们想"获"，必须要"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耻。至于左袒安福和段的先生们，正应该闭门思过，若还厚起面皮，拿国民的名义来唱高调，只好请他到段国去做安福国民，中华民国实不能容这样没廉耻的人！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他的威权，但未可把他看成神圣；因为他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民总意底表现，他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底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

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1920 年 9 月 1 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虚无主义

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可怜许多思想幼稚的青年，以为非到一切否定的虚无主义，不能算最高尚最彻底。我恐怕太高尚了要倒下来，太彻底了要漏下去呵！我以为信仰虚无主义的人，不出两种结果：一是性格高尚的人出于发狂，自杀；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堕落。一切都否定了，不自杀还做什么？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我盼望笃行好学的青年，要觉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别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对于社会上一切黑暗、罪恶，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因为单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实际的存在。

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

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像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居然算是全中国舆论底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说是文化底中心；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底中心，那末，中国底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因为此时的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工会底利用手段更是可厌，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

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

"不劳而获"，自然是不好的观念；劳而不获，也不是正当办法；最好是用劳力去求那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例如：与其提倡废姓，不如提倡名号统一；与其提倡女子剪发，不如提倡女子放足及解放胸部底束缚；与其邀集朋友办杂志，不如邀集朋友设读书会；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

俄 国 精 神

黄任之[①]先生说：中国人现在所需要的，是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我以为我们倘能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但是中国人此时所最恐怖的是俄国精神，所最冷淡的是德国科学，所最欢迎的只有美国资本！

---

①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人。

男女同校与议员

男女同校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上海大同学院是首先实行的了，北京大学收容女生，就是腐败的教育部也居然许可了，现在南京高等师范也打算收女生（听说“苏社”底首领很反对这件事，南京底教职员因此有点迟疑，我劝南京教职员勿为谣言所惑，因为“苏社”诸君总不至像安福部那样横霸），可见男女同校，在中国也已经成了事实了。但是广东、浙江、江苏什么省议会，都提出什么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哼！议员议员！尔等恶也做够了，人民厌恶尔等也到了极莲〔点〕，何必又闹笑话！

1920年9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署名：独秀



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

哲民先生:

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①](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那里会有纯粹的自由!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之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新生活和世外桃源?即于劳动问题,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

先生说:"劳工解放,农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何以我绝对未曾听见看见?这句话先生说得太轻率了。

独秀

1920年9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

① 费哲民给陈独秀信谈到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和劳动问题。

再答知耻(劳动问题)

知耻先生:

仆未尝不深知道先生是一位很可敬爱的青年,是一位人格很高尚的人,惟其如此,看见先生和万恶的资本家接近久了,竟然和他同化,说出许多似而非的话来,所以我格外痛恨资本家的魔力,不但掠夺了无数工人底财产,而且弄坏了许多青年底思想!工人财产被掠夺的问题,和工人要求教育平等的问题,理论上本不相联属,先生硬要拿后者做前者的条件,正合一班妄人主张不识字的女子不能放足一样。我并不是看轻了工人教育,而且很希望有强迫工人教育制度出现,但不愿意拿这个做讨论别的问题的条件,失了别的问题的独立精神。

先生主张"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我且问你:在现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工银如此之少,时间如此之多,先生有何神通可以使一般工人得着平等的教育?如此看来,又应该拿什么做工人教育问题的先决问题呢?还请赐教。若只拿教育这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底障碍,这句话只应该出在资本家走狗的口里,不是有人格有良心的人应当说的。

独秀

1920年9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答高铦(哲学思想与化学工业)

高铦先生：

吴稚晖先生说："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汪精卫先生说："我们天天发理论的空言，闲却了实用的科学，岂不是变相的清谈！"吴、汪两先生的话，实在是我们最近思想界的顶门针。我知道吴、汪两先生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万能，物质文明万能，更不是说思想革新无用，是说离开物质的文明，离开自然科学的思想，容易发生复古的清谈的流弊。即以思想而论，的确是人间超物质以上的财宝；但离开科学的基础和方法(Logical system)便是诗人的想像或妄人的胡思乱想，和思想大两样。这种胡思乱想，只是空空洞洞，为害还小，只怕是东扯西拉弄得材料很丰富，一动笔便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倍根、狄卡儿，马格斯、苦鲁巴特金等，牛头不对马嘴的横拉一阵，那怕著书等身，终久是个没条贯的糊涂虫！我晓得有许多青年犯了这种毛病。医这毛病的良药，就是自然科学和 Logical system。说到实用的科学，化学工业更是十分重要。我们当初对于西南大学怀着三个希望：(一)开办费六十万元、常年费八万元的理化试验所。(二)开办费三十万元、常年费三万元的图书馆。(三)常年费十万元的编译处。图书馆和理化试验所自然都是公开的供给社会的要求，不为一校学生所独有。此外实行男女同校，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也是我们重要的希望。可是为了无名义的私利的政争，把经费破坏了，我们这些希望都等于一场好梦，几时想起，几时便令人心痛。各处来信问西南大学的很多，我因为除免痛苦，一概不复，实在对大家不起，附白于此，请诸公原谅。

独秀

1920年9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

因为外国劳动运动都闹得利害,我们跟着凑热闹吗?我以为决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不应该有劳动运动。我们不能说中国底劳动者境遇不苦恼,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人不应该提倡并帮助劳动运动。

因为要大大的来改革中国底政治和经济组织,才利用劳动运动吗?我以为也不是这样。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底贫民窟他也曾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底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贺川先生所见的闸北和营盘口等处贫民窟里贫苦工人底生活状况,上海有钱有势的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见。但是像各处马路旁边小铁匠店里底小徒弟,无冬无夏从天明到夜半都站在火炉边旁打铁,这是容易见着的。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你们若是对于劳动运动袖手旁观,甚至于从中破坏,我奉劝你们以后便不必把什么仁义道德或基督教挂在嘴上骗人了。因此我要说一句可怜的话: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

1920 年 9 月 5 日 《劳动界》第四册 署名:独秀

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

富人生活

开着电风扇打麻雀。

坐汽车四处兜风。

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

吃荷兰水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

睡在纱帐里,床前放着一盘水,点着根蚊烟香。

肥鱼大肉嫌腻口,海参鱼翅又嫌腥。

穷人生活

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

拉车运货,走一步出一阵汗。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出气不得。

路上遇见自来水或施茶,不管脏不脏便骨嘟嘟地喝下。

睡在矮檐底下,或小客栈里,终应供蚊虫蚤虱大开宴会。

当了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得个半饱。

1920 年 9 月 5 日 《劳动界》第四册 署名:独秀

贫 民 窟

日本有一位贺川先生，在神户贫民窟和贫民同住了十几年，舍身舍家的帮助贫民，算是日本贫民的福星。现在来到上海，调查上海底贫民窟，十分恳切详细。我们从前只晓得上海有两处大的贫民窟，一在闸北，一在南门斜桥。现在贺川先生亲自去调查出十好几处，画出一张详细的图，他前天把这图给我看并且问中国有没有肯舍身帮助贫民窟的人，我对他实在又难受又惭愧。

1920 年 9 月 5 日 《劳动界》第四册 署名：独秀



无理的要求

三新纱厂底工人因为上海百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罢工反抗这本是分所当然的事。然而厂主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

1920 年 9 月 19 日　《劳动界》第六册　署名：独秀

为什么不吃牛肉？

从前老年人多半不肯吃牛肉，我们都说他迂腐，其实他不肯吃牛肉，是有一种很好的意思，我们不可大意了。

老年人不肖吃牛肉，是以为牛替我们耕了田地，出了米麦，做了这等重要的工作，还忍吃他的肉吗？所以我说老年人不肯吃牛肉是有很好的意思。但是种田的织布的做屋的做机器的劳动者也都替我们做了和牛一样的重要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他们肉呀！

1920 年 9 月 19 日 《劳动界》第六册 署名：独秀



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答仲渊等

仲渊、慕痴、颜启烈、邱伯年，和工商友谊会诸先生：

诸位来信都收到了，请于下星期三（即二十九号）午前九时枉驾法界宝昌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一会议，以便面商关于“店员周刊”一切进行的事。我们对于诸位来信未及一一作复，附此道歉。

秀松汉俊独秀同白

1920年9月26日 《劳动界》第七册

致周启明信

启明兄：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弟　独秀

中秋后二日〔1920年9月28日〕

1979年5月15日　《历史研究》第五期



致 胡 适

适之兄：

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

“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

八卷二号报准于十月一日出版，你在南京的演讲，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讲稿要寄来，先在《新青年》上登出。

弟　独秀

〔1920年9月〕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随　感　录

学说与装饰品

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譬如我们不懂适者生存底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输入达尔文进化论底需要；我们的文学、美术，都偏于幻想而至于无想了，所以有输入写实主义底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说底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作新学说鼓吹一日；比这些更新的学说若在社会上有了输入底需要，我们当然是欢迎他；比这些更旧的学说若是在社会上有存留底需要，我们不应该吐〔唾〕弃他。现在有许多人说，达尔文底学说，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底文艺，马格斯底社会主义，都是几十年前百年前底旧学说，都有比他们更新的，他们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了。这种论调完全把学说当作装饰品，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这两样大不相同呵！

再论上海社会

从前做《黑幕》一类的小说，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

法子很多,做这种小说来弄钱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黑幕》的生意不大好,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从前贪官、奸商合起来运米出洋,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运米出洋,好叫自己发财,穷人吃贵米,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贩米出洋受人唾骂,换一个法子来办平粜局,就由这平粜局运米出洋(详见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本埠时事栏),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造成米荒,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你们提倡新文化反对《黑幕》,我就挂起新文化招牌来卖《黑幕》;你们提倡办平粜反对运米出洋,我就挂起平粜招牌来运米出洋;这种巧计,可比《三国演义》上的诸葛先生还要利害。因此推论,打着"毋忘国耻"的招牌卖日货,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拥护军阀、官僚,也是意中事。所以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呜呼!上海社会!

懒惰的心理

改造社会自然应该从大处着想,自然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如此我们的努力才是经济的,但是不可妄想制度改革了样样事便立刻会自然好起来。只可说制度不改,我们的努力恐怕有许多是白费了,却不可说制度改了,我们便不须努力。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怀这种妄想的人就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

例如中国辛亥革命后,大家不去努力创造工业,不去努力创造教育,不去努力创造地方自治,不去努力监督选举,不去努力要求宪法上的自由权利,妄想改了共和就会自然有一步登天的幸福。又如俄罗斯

十月革命以来，大家不想想他在这短期间，除了抵抗内外仇敌及大饥馑，他所努力创造的只应该到何程度，便无理地责备他的成绩。这都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

我们现在及将来的改革倘不排除这种心理，定会要失败的。据我所知道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为他们是新思想、新制度底产物，便不须照旧式工商业那样努力那样竞争，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某处有一消费合作社，他们以为合作社是新的理想新的制度，不需要从前的营业技术，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有好几处学生贩卖部，他们以为是传播新文化底机关，不必采用营业的麻烦手续，连出入账目都随随便便不去用力弄清楚，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我看照这些同样不努力的、懒惰的空想，都没有不失败的。

此外我们时常有“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一些想头，也就是这种懒惰的心理底表现。人类社会底进化决不是懒惰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而容易。

1920年10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国庆纪念底价值

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

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底国庆纪念日，从元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其间受反革命的帝制派底压迫几乎不成个纪念日底光景曾有好几次，最明目张胆地强行禁止开会纪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在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视共和禁止国庆日底纪念，本是当然的事，我们不去论他；但是信仰共和、趋赴共和底人，也要确乎明白纪念这共和国庆日有什么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当分两层：一是共和底价值，一是中国共和底价值。

我们对于共和价值底批评，固然不象反革命的帝制派及无政府党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象一班空想的政论家迷信共和真能够造成多数幸福。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分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底青年自幼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底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但舆论每每随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

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共和国里表示民意底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选举投票，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底国里不必说了，就是施行普通选举底国里，也没有穷人可以当选底道理，花几十万元才得着议员，这是很平常的事。最穷的日本国，最近的议员运动费也必须十万元左右；相传有一位极有名望的人主张"理想的选举"，决计不出运动费，不过他的朋友亲戚代他用了酒席车马费七千元，到处传为美谈；试问这种美谈没有人帮助底穷人得的着吗？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我们对于中国共和价值底批评，并不觉得他比别的国共和格外无价值；对于他在中国将来并无希望，也和在别的国一样或者还要更甚一点。过去的纪念像黄花冈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次少数人也没有像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那有不流产底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

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看起来，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底价值了。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底原因：一是西欧的代议制度来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们社会主义的思想刚与共和同时发生，当时都还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数幸福。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

（一）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里底资本转到乙派武人官僚手里，是否可以使社会的资本归社会公有？

（二）中国士大夫底人格是否已与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适用代议制不须人民直接行动，除了多数人的援助他们的力量是否能够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设共和政治？

（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够造成多数幸福？

（四）抛弃多数的幸福是否能够使人心安定共和巩固？

（五）中国此时资本家生产制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是否应该乘机创设社会的工业，是否应该提倡私人的工业酿成经济不平等之危机？

（六）中国除了劳动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由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

（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底问题？

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

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须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以上所讨论的共和底价值和中国共和底价值，似乎都是我们在国庆纪念日应有的觉悟。

1920年11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答知耻(工人教育问题)

知耻先生：

先生也主张要加工资减时间，那便好极了；先生又主张不以减时增资为满足，更力主实施教育，那便更好极了。但先生是主张拿教育做减时增资底条件，我以为减时增资是工人应得权利，若加上条件便是搪塞底话。我主张拿减时增资做教育底条件，先生以为怎么样？每日做工十二点钟，上海现在的生活必需品这样昂贵，每月只有十元八元底工资，试问先生若处到这种境遇，那里会有时间力量去受教育，那里会感觉没有知识底痛苦？人类生活的欲望是由物质的进到精神的，断没有丢开物质的便进到精神的。饥寒救死不暇的人还说什么知识不知识！

先生自己说是主张减时增资的，说我"还有误解之处"，先生说我"武断"，先生说"三次通信具在"，现在把屡次通信里关于主要争点底话录在后面，请先生及读者诸君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误解、武断。

先生第一次信上说：

总之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

先生第二次信上说：

若对于无知识之工人实行增给工资，减少时间，而不谋增进工人知识，则于社会于工人均无益而有害。

先生第三次信上说：

仆深信教育平等为人类平等之惟一基础，欲求人类平等之实现，而不以教育为基础，虽以多财与工人，亦难有善良之结果。

先生这次信上说：

所以我虽没有神通使他们立刻受平等的教育……

把四次信上的话综合起来，先生是竖了一块教育平等底大招牌，随

即自认没有神通使他实现,这便是只有招牌而无货卖了。但是先生一方面又力说没有教育是不能减时增资的,那么,先生所主张的减时增资,在逻辑上是不是已经自己取销了呢?换句话说,就是:先生明明晓得教育是不容易实现的,然而偏要拿他来做减时增资底条件,这不是拿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减时增资的障碍是什么?

独秀

1920年10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答赵仁铸(大学教授问题)

仁铸先生：

增高一国学术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程度不可；增高大学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教授程度不可；此时中国要增高大学教授程度，非多多聘请外国学者不可：这是一定的道理。章行严先生前在北京大学时，即力说北京大学教授底程度已和学生底需要不相应，非改聘外国学者不可。王抚五先生也主张西南大学教授只用外国专门学者，他自己情愿辞去北京大学的教授来当助教。章、王二先生底见解都和尊论一致。我也极端赞成这个主张，但附有两个条件：(一)图书馆及科学实验室有相当的设备；(二)学生外国语有充分的听讲力；否则就是延聘外国学者来也无甚益处。

独秀复

1920年10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①]

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我听说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发起这个上海机器工会，算得一个很好的事。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但我有一句，请诸位牢牢记着：我说这个工会，将来万一有办到不如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努力，要把他糟的处所改造，把坏的分子驱出，尽力负责去干，万万不要见得他糟了，大家就让他去糟，个个不管了。

1920 年 10 月 10 日 《劳动界》第九册

① 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1920 年 10 月 3 日，陈独秀出席该工会发起会，并演说。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伙友》[①]发刊词

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此时中国这三种劳动者底境遇无不苦恼，商店底劳动者知识比别的劳动者发达得多，而又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所感的苦恼更甚。现在要联合起来，各人说说苦恼底状况及原因，公同商量一个改良的方法才好。

因为商业竞争上的关系，把人类有用的精力用在许多无用的地方，这是资本家生产制各种弊害之一；因此"废商论"在新的经济思潮里得了很大的势力。但是现在商业底经验及技术到了废止个人的商业竞争时代，在社会的工业自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职务，不可轻忽的。所以商业伙友们要觉悟不但自己的境遇有新旧改革底必要，就是自己的经验及技术底用途也有新旧改革底必要。

简单说起来，本周刊发行底目的有二，就是：

（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

（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1920年10月10日　《上海伙友》第一册　署名：陈独秀

---

① 1920年9月9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同工商友谊会代表开会，决定联合创办《伙友》（《本社特别启事》，《劳动界》第七册，1920年9月26日）。后来，因《伙友》宣传劳资合作，发行至第九册时，陈独秀等便同《伙友》脱离关系。原标题仅有"发刊词"三字。

敬告广州青年

在广州我有许多已经见面的和还未曾见面的好朋友，去年很有机会可以到广州，而竟没有去成，实是一件憾事！

我认识许多广东朋友，又有许多别省的朋友告诉我，广东人的性质和广东的社会状况，我归纳起来，得到两种极端不同的结论。一是好到无以复加，一是坏到无所不至。这两种结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端矛盾，不能并存，然而我以为这两样都是事实。

在民族性质说起来，不能为大恶的必不能为大善。所以富于保守性的康有为是广东人，富于革命性的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富于物质主义商买性质（广东人赌钱做官的乡绅是同将本求利的物质主义）的梁士贻是广东人，富于理想主义的刘师复也是广东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因此别人对于广东两种极端不同的批评，我以为都是事实。

现在压迫湖南底暴力去了，湖南青年底奋发一日千里，我料压迫广东人底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

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

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

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1920 年 10 月 20 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

一、星期日休息

二、每天只做八点钟工

三、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

我们中国底事样样都比不上外国，劳动者境遇也是这样，说来真是可耻又可怜！

外国劳动者星期日都有休息，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月都有工钱百元数十元，中国怎样？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女工、童工及老年工人，大概都有特别保护的法律，中国怎样？外国工厂里对于工人卫生及教育也都有一定的工厂法，中国怎样？外国国家或厂家对于劳动者底住所及饮食店多有很洁俭的设备，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劳动者生产的、病的、老伤的、死的都有相当的抚恤，中国怎样？外国已经没有万恶的工头了，中国怎样？

外国工人们已经得着了这们〔么〕许多好处，但他当初也和中国工人一样，后来结下了团体，经过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拚命要求才得着的，不是平平安安容易得着的。

外国工人们虽然得着了这们〔么〕许多好处，但他们还不满意，还是叫苦连天，还在那里结大大的团体，还在那里做大大的劳动运动；这大大的运动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矿工要求占领及管理矿山，意大利工人要求占领及管理工厂。我们少见多怪的中国人听了这些话，恐怕都要发出"人心不足"底叹声。

就是我也不敢希望我们中国底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

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

倘然今后仍旧照现在一样，工人们连这三样好处也得不着，像这样吃苦耐劳而工钱又极低贱的地方，必然要招引许多被工人驱逐的外国资本家来办实业，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所以中国工人这样困苦，不见得单单是工人底不幸，不知道一班资本家见到这层没有？

1920 年 10 月 23 日 《劳动界》第十一册 署名：陈独秀



《儒林外史》新叙[①]

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

《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

看了这部书的，试回头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当时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么样？当时的平民又是怎么样？——那一件事不是历历如在目前？那一个人不是维妙维肖？

吴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创造出这类的文学，已经可贵；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

他在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里写鲍廷玺的婚姻：他的母亲不管王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也不管鲍廷玺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小户人家，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的好。”——错不错，一味信着金次福说的话，“娶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到后来，把个鲍廷玺弄得颠颠倒倒。——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极不满意于父母代定婚姻制。

四十八回里写王玉辉的女儿殉夫一事，他的女儿要死的时候，王玉辉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还拦阻你？”女儿死后，他的女人大哭，王玉辉反劝道：“你这个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经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入祠那日，王玉辉转觉伤心。后来到苏州游虎丘的时候，看见一个船上有一个少年穿白妇人，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文章，很

---

① 本叙写于1920年。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书记载，此文由汪原放起草，陈独秀改写，并应汪的要求署陈独秀的名字。

看得出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

二十五回里倪老爹说："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又看他在五十五回里写荆元的朋友于老者种许多田地过活，何等自由，何等适意！——这两处又很可以看得出吴敬梓把"工"比"读"看得重。

这三个问题，吴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们认作问题，可见他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

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把他写在后面作一结束：

"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

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号，陈独秀。

《儒林外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



随　感　录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的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这班学者脑子里充满了权门及富豪底肮脏东西，他们不以为耻辱，还要把那些肮脏东西列入学理之内，他们那曲学阿世底罪恶助成了权门富豪底罪恶都一件一件写在历史上，我们不曾忘记呵！

劳动者底知识从那里来？

日本贺川丰彦先生（贺川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住在神户底贫民窟里十几年，专门出力帮助贫民，前两个月曾来上海调查中国之贫民窟）在大阪劳动问题讲演会曾说："在今日资本家制度的社会，金钱比生命还要贵重。资本家因为致富，不惜牺牲劳动者底生命。大正六年算是最隆盛时代，然全国增加了医生五万人，看护妇六万人，而人口死亡率还是增加。"又说："据文部省研究调查，十五万小学生中，贫民子弟底平均生长，男的矮一寸，女的矮一寸五分，食物不足的人，身长及知识都不能发达。第一要叫他们食物充足呵！社会若不叫他们的食物充足，有非难劳动者无知识底权利吗？"我盼望主张工人缺乏知识不能增加工资之人，都注

意贺川先生所举的事实！

三论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除了龌龊分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满了戴季陶先生所谓曼且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近来不但是曼且斯特的臭味充满了，拜金主义的国里纽约的臭味也加进来了，而且这种纽约的臭味在上海大时髦而特时髦。他们分明是不过为自己为资本家弄了几个铜钱，而偏偏自谓是在中国实业上贡献了许多文化。杜威、罗素来了，他们都当做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欢迎，而且引为同调(硬说罗素劝中国人保存国粹)大出风头(屡次声明罗素是某人请来的)；但是杜威反对形式教育底话和罗素反对资本主义底话，他们都充耳不闻，却和杜威、罗素这班书迂子谈起什么中美、中英邦交问题来了。罗素初到上海，在大东欢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说中替商务印书馆登了一段卖书底广告。我们一方面固然赞叹商务印书馆底广告术十分神奇，一方面可是觉得曼且斯特、纽约两种臭味合壁的上海社会实在唐突学者！

1920 年 11 月 1 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署名：独秀



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①

贤宗先生：

我前次文章发表之后，言论界未曾有赞同或反对的表示，我很为失望；现在接到先生底辩论，并且是很有价值的辩论，我非常快慰。我的意思还有一些和先生不同的地方，不得不写出来请先生指教。

在答复先生底辨论之前，我有几种信念必须明白发表出来：(一)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二)世间有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说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固然不对，一定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在逻辑上也有毛病)，终极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似乎不必作此无益的推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有益事业只有说明现在社会里已有的毛病，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会；倘若迷信很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候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我们若单单空想最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努力放弃了，那么世界终极是或者要毁坏的，个人终极也都要死亡的，我们未到终极期间底一切努力岂不是无意识么？(三)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笼统的否认他，他便会自然消灭的。譬如医治多年的疾病，纵然有药到病除底仙丹妙药，也要有这药才能够治病，断不是在理论上否认

① 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发表以后，郑贤宗投书《新青年》(刊于八卷三号)，发表了他的不同意见。

这病，这病便自然会好的。因为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这三条信念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所举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底两个最大的理由，在第一个理由，我那篇文章里面明明说："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又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我实未曾说过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东西。无政府党既然承认"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而在现社会实际的共同生活底需要上，是否真实证明国家这种形式这个制度（不是国家主义）底时期已经过去？在第二个理由，像那些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最甚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拿国家主义做招牌争商场弄出来的，不全是国家本身底罪恶。像这种侵略的国家主义即帝国主义，我也是绝对厌恶的；至于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有时不免现出狭隘的情感，但他是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如言语、历史、宗教、利害等）底基础上面，根深底固，他成立底基础不消灭，他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单是消灭了"国家"这个名义，在实质上人类但凡有组织，那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民族的冲突，就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仍然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想免除这种冲突，非先在事实上免除造成冲突底各项自然的障碍不可，各项障碍中以言语和利害关系最重要，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

政治与法律也和国家一样，是有人拿他作恶（一部分无政府党所主张的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也有人用这些事作恶），他本身并不一定就有罪恶。在无政府党以为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是根本解决，在我以为是因噎废食。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病底问题，未免有点笑话。在我那篇文章内，并没有说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是好的，只说过要有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要有强迫劳动的法律，要有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先生既然相信无政府主义，请你要将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底人民分别一下，

不要说些笼统话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

先生一方面以为我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一方面又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我实在有点不解。我对于国家政治法律，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个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做个主义来信仰；先生一定说他们于人类生活只是有害无利，难道先生所主张的无政府社会未实现以前之暗杀、暴动、炸弹、手枪，是于人类生活只有利而无害吗？

我那篇文章内是说旧党势力恢复推论到复辟，并非专门拿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来防备复辟。先生说："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这种理论说说很容易，先生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先生既然承认过渡时代应有一种临时办法，这便和我的意见相差不远；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

孟子人性皆善底话，只看见性底一面，已为常识所不能承认的了。主张人性皆恶底人，也可以说："独占之心，人皆有之；残杀之心，人皆有之；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填〔嗔〕忿之心，人皆有之；自利之心，人皆有之；……"或者有人说这些都是习不是性，我第一要问，何以善的现象是性，恶的现象就不是性呢？第二要问，习惯是不是第二天性，佛教所谓无始以来的薰习是不是和性有同等的力量或者更强一些？让一步说，恶是习不是性，可以改正的；但长久期间造成的恶习惯恶心理，是不是短少期间可以洗刷净尽的？在这恶习惯恶心理未曾洗刷净尽期间，自由放任主义是否行之有利无害？性善是无政府主义一个重要的基础，要请先生用科学的方法仔细研究一下。我所谓一时也决非很短的期间，大概要以疲劳回复了并且有了新的刺激普及人心为限度。我所谓强迫劳动底法律决不是永久的，这件事用不着先生死不赞成，我敢说不

但现在及将来不会有永久的法律，就是过去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永久的法律。

我以为关于人类基本生活劳动底规定，有二种方法：(一)由人类平均担负；(二)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时间可以较别的劳动时间减少。我所谓用法律强迫劳动，是不许有人不劳动，是不许大家都不肯从事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因为若没有法律强迫，在这机器完全代做和劳动的艺术化未成功以前，我敢说无一人或只极少的人情愿去做；并不是说用法律来规定“那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那一个人应该做不洁的劳动。”我不知道先生这种疑问是从何处想起？

我看人类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本能是不会衰减的；假定日后依教育底成绩，理性充分发展能够抑制本能，只望这个来解决男女问题，又不知在何时代。先生持论底通病是注目在远的将来，而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急待解决之问题放下不管。

恶的自由是应该束缚的，请问先生什么东西可以禁止罪恶发生？

事实是道理底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最后我要忠告先生的，就是先生所说：“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这句话。先生能断定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便不须改革了吗？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劳永逸的改革！

独秀

1920 年 11 月 1 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答柯庆施(劳动专政)

庆施先生：

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独秀

1920年11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共产党》月刊短言[①]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

---

① 原标题为《短言》未署名。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集）

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

现在中国底劳动运动，无论官场如何禁止，无论没良心的学者如何否认，可是他已经发生了。将来的结果，我想总不至于象民国元二年的这么工党什么劳动党一样。

要问将来的结果，先看此时的宗旨。此时劳动运动应该抱一种什么宗旨呢？戴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上说过：

> 我们如果要从事于劳动运动，就上海说，当然要把上海劳动者的实际问题拿来打算。倘若真是为劳动运动尽力，就应该暂时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因为那种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就今天上海劳动者本身上讲，实在不感触甚么必要。现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离开了改良生活的问题，无论甚么事他们本身都不能享用的。政治的劳动运动至少都要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改善了多少，欲望增进了多少，他们自己感觉到"由劳动者管理工厂"、"由劳动者所有生产机关"的必要，了解了这些意思然后才能发生，着手运动也才有效果。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研究只管研究，宣传只管宣传，实际的运动上，就不能不暂时搁开，把全副精神放到劳动者团结和改良生活条件的问题上面去。①

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指示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我觉得很恰当。此时劳动运动效果带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劳动者不能够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上海工会由于小政客发起的居多，所以开起会来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什么工界代表在什么国民大会策进会里笑话闹够了，劳动界诸君快快觉悟吧！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

① 这段文字引自戴季陶写的《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文，载《星期评论》第四十八号，即《劳动纪念号》，1920 年 5 月 1 日。并据此作了校对。

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倘若夹杂着政治运动来出风头，那结果必然和民国元二年的工党劳动党一样。政客式的工会呀！我祷告你已成立的快快消灭，未成立的别要发生！

1920年11月21日 《劳动界》第十五册 署名：陈独秀

在欢迎(送)蔡孑民出国宴会上致词[1]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晚）

今日同人欢迎蔡校长，而社会上亦有一般人，批评蔡先生为极坏。同人对于此事，已经批评个人意见不确当。今颇有展转之余步。而社会之不进步，大学安能平均。是故北大之缺点，曾有好处，亦复过誉。然蔡先生自任校长后，有二事为同人等所亲见者。一则学说独立，盖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而独树大学改革之精神；二则思想自由，北大内有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是以毁誉不足计，而趋向之所宝贵者，则精神也。今后同人之所希望，即在一面弥补缺点，一面保存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二者是矣。蔡先生自任校务以来，并竭力扩充，而各方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此实为学务不发达之一大原因。今安福虽倒，思之犹有余痛焉。极盼蔡先生凭其素日奋斗之精神，继续发展校务，以弥缺点焉。愿偕同人，举杯恭祝蔡先生一路平安。

陈独秀

1920年11月24日　《时报》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大学旅沪同学会，假座一品香，欢迎（送）校长蔡孑民及随同赴法筹办显昂中法大学事宜之北大教职员张申府、李光宇。参宴者有陈独秀及其夫人、马叙伦、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穆藕初等，以及各同学、各新闻记者，蔡孑民之弟亦由汉口来沪送行。宴会由陈独秀主持。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

致罗素先生底信[2]

罗素先生：

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

①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张东荪等陪同罗素赴湖南讲演，返沪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受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的反驳。一场论战就此爆发。陈独秀汇集双方的文章和他本人的文章共十三篇，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总标题，刊于《新青年》第八卷四号。现辑入其中第六、十三两篇。第十二篇作为附件。

② 原标题为《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这是一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罗素一直未答复。

复东荪先生底信①

东荪先生：

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此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 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 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 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底缘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

---

① 原标题为《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

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压榨，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那里来的？当真他们的命运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北〔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的很清楚，兹录如下：

教不变的蠢才。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松沪护军使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才。等着！我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

以先生底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底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有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到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象政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

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 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 Evolution 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那能够不失败，将来那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底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底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

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①和甚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底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颟顸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

① 基尔特(Guild)，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张东荪说他“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开发实业“止有协社为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见同期《新青年》载《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一文)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Bourgeois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到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Evot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马上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那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只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

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1920年12月1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附：东荪先生致独秀底信

独秀先生：

得你的质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而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一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随　感　录

劳工神圣与罢工

常常听见人说:你们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罢工或提倡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像这种头脑不清的说话,一班头脑不清的人或者以为很有道理。但是要晓得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社会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不是说劳动者拼命替资本家增加财产是神圣事业。为资本家做工是奴隶事业,为社会做工是神圣事业,头脑清楚的人应该懂得这个区别。我们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正因为现时生产制度下的奴隶事业玷辱了"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可见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和提倡劳工神圣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我盼望社会上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资本家又来假劳工神圣的名义欺骗劳动者,替他拼命做工。

主义与努力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

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

但现在有一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话真是不错。

革命与作乱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是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底目的是除旧布新，是要革去旧的换新的，是要从坏处向好处革，若用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

民主党与共产党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

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请看哈尔滨俄旧党《光明报》记者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底谈话（见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哈尔滨特约通信），这班民主派欺骗世人的诡计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说："我们非社会党的主张，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决不赞成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又说："至于日本呢，我相信他能帮助我们。"又说："谢米诺夫却是真正的民主党，现在只有他一人抵御共产党。"又说："不论是美国，是日本，他们取得中东路权之后，总没有我们俄国人好。"又说："中国取消俄使领，是不应当的。现在俄国人没有一个满意中国的审判厅的。"

由他这些说话，我们看出两件事：（一）原来反对共产党底真正民主党就是谢米诺夫这样贪鄙不法的人物；（二）原来民主党对中国底外交，和共产党放弃中东路权、放弃领事裁判权恰恰相反。

提高与普及

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适之先生对于大学生主张程度提高，理论上自然是正当，别人驳他的话，我看都不十分中肯。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感想：

（一）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

（二）专就北京大学学生而论，现在低的还没有，如何去提高？我

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底基础学。历来北大底毕业生有几个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的，有几个基础的普通科学习得完备的？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是何等危险！我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赶快教朱谦之、易家钺一流学生多习点基础科学，多读点外国文，好进而研究有条理的哲学，好医医他们无条理的昏乱思想罢！

我这两种感想适之先生以为如何？

无意识的举动

倒军阀，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倒一军阀成一军阀，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战争我们虽然不绝对的反对，但是无主义的地盘战争，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省自治运动我们也很赞成，但是混合一班腐败官僚，安、政余孽，烂污政客，警察侦探，运动省自治，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广州人赶去一班政客官僚，我们固然很赞成，但是他们又迎去一班政客官僚，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地学生排日货，我们固然不反对，但是去年天津学生今年河南学生强迫贩卖日货商人游街，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政局统一，我们也不反对，但是赞成现政府统一中国，实际上就是日本间接的统一中国，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

华　　工

英国人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英国国旗。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作工。中国劳动者在国内做的工，除了瞎子都可以看得见，这是不待说的，他们并且散布到全地球了，地球上五大部洲，到处都有华工底足迹，至于开辟那新旧金山底功

劳，更是历史的伟大。最近一班无耻的军人、政客各人自夸参战底功，试问除赴法的华工外什么人对于参战有丝毫功迹？我们可以自夸的只有伟大的劳动力这一项，但偏偏有一班心盲的人硬说："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在外国底华工姑且不论，试问中国国内若无劳动者，我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从那里来的？我想他只有答道："这些都是资本家做给我们的。"

四论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是那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出他们的威信。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做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底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底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底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上海《时事新报》上所载 P. R. 君那篇《世界改造原理》，简直是梦话，简直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人类自有二人以上之结合以来，渐渐社会的发达至于今日，试问物质上精神上那一点不是社会底产物？那一点是纯粹的个人的？我们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见解和一时的嗜好，

自以为是个性的，自以为是反社会的，其实都是直接、间接受了环境无数的命令才发生出来的，认贼作子我们那能够知道！即如P. R. 君所谓“不听命于人”之理想，当真是他个人的理想，绝对未曾听命于人吗？不但个人不能够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团体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福利耶以来之新村运动及中国工读互助团便因此失败了。不但一团体不能够自由解放，就是一国家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罗素先生所以说俄罗斯单独改革有点危险。不但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譬如妇女殉夫他自以为个人道德是应该如此的，又如我们生在这资本制度社会里的人，有几个人免了掠夺底罪恶，这种可怕的罪恶是个人能够自由解放的吗？除了逃到深山和社会完全隔绝，决没有个人存在之余地。我所以说P. R. 那篇文章是梦话，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

至于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的改造，我试问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主张个人物质的及精神的方面完全解放以后再改造，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所希望的人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他所希望的干干净净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种主义？我们若是听命于他的这种无信仰、无归宿之改造，是否也要“深入一层地狱不能自由超拔的反于本来大路上去”，是否也是“人类听命于人的改造”方法，是否也要“弄得非常紊乱无限苦恼，造罪作恶总不了悟”呢？

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

1920年12月1日载 《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署名：独秀

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1]

守常　玄同　适之　孟和　一涵
慰慈　　豫才　　启明　　抚五　诸君：

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弟独秀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

① 原信无时间，信中说："弟日内须赴广州。"——陈独秀离沪赴粤为 1920 年 12 月 16 日晚；信中又说："四号报已出版"——《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出版日为 1920 年 12 月 1 日。据此两点，可知此信写于 1920 年 12 月上半月。陈独秀赴广州，是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聘请，任该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相当今省教育厅长。

致胡适之、高一涵[①]

适之、一涵兄：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弟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1954 年 12 月

附：胡适的信(一)

仲甫：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廿七夜始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　　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　　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　　适。

附：胡适的信（二）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

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 移回北京；2. 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象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十一、廿二。

慰慈赞成此议。　　适。

一涵赞成此议。　　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　　王抚之〔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

玄同附注。一九二一、一、廿六。

欢迎新军人

现在及近的将来或至于很远的将来，我们都没有理由主张绝对的废兵论，而现在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却十分为害于社会，这是毋容讳饰的。他们不但把持民政财政机关使政府行政无形搁浅，而且包庇鸦片烟与赌博使社会受无穷之害，这种现象不但使社会上一般人厌恶军人，就是明白的军人也都痛心疾首。救济的方法既不能够从根本上主张废兵，惟希望有一班新军人挺身出来团结同志，将一班为害社会的旧军人渐次淘汰干净。这可以叫做“军人自决”，也可以叫做“军人自治。”但是须有何种资格才算得是新军人，这是必须确定的，否则不但人人可以随便自称新军人，并且比较有良心而徘徊歧路的军人没有机会找出他的自新之路。新军人的资格并不在他的军事学胜过旧军人，他所以与旧军人根本上绝对不同的是在两大信条：

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外国人只一个“财产私有”已弄到社会不得安宁了，我们中国人自辛亥革命以来又加上一个“军人私有”，所以更闹得不成世界。只听说有段军有奉军有辫子军有唐继尧的兵有陆荣廷的兵，却没听说有中华民国的兵。他们倚仗有他们的私有军队，所以才敢于横冲直撞，硬把中华民国闹到这步田地。有觉悟的新军人诸君啊！你们无论职务大小都有一个堂堂的人格，你们不是一盏灯一张椅一把刀一匹牛马，不要再做个人私有物了罢！

二是要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社会上何以说劳工神圣，是因为他有生产力。社会上何以厌恶军人，是因为他是单纯的消费者。旧式军人是帝王酋豪特别蓄养一部分人替他打江山争地盘的，所以有只消费而不生产的权利。新式军人是社会上人人应有抵御外侮之义务，所以除了在战争及训练期间，不应有不生产而消费的特

权。军人若有了生产力，现在所极难解决的军费问题、裁兵问题、兵匪勾结问题、军人包庇烟赌问题便自然解决了。像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制度和现在俄国的劳农兵，都是军人而有生产力的好榜样。

以前的事都随着民国九年去了。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实行新军人两大信条，宣传新军人两大信条，好做全中华民国新军人的模范。我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

1921年1月1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陈独秀君之教育计划

——先办广东大学

广东陈省长邀陈独秀先生赴粤主持全省教育，并保证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迭志本报。兹陈先生已抵广州。住长堤大东酒店。有人询其办理教育意见之大略。陈君答词多与本报前次所载戴季陶先生谈话中所述者相同。惟关于先办大学之意见较为详尽。据云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将来全省教育事务统由大学委员会办理。此种制度实非创举，乃仿法国定制。惟广东此时情状与教育已发达之法国不同。采用此种制度时不能不略为变通。我国向来言教育者多以小学为起点。由小学而中学而专门。如此办法，在学术上无坚固之基础。至于中学教育亦宜与高等专门人数相应，不则半途而废，于学业上固属可惜。而供过于求，亦决非青年学生之好现象。譬如高等专门需要七十人，中学供给一百人，则不为多。中学若供给至二百人，则中级学问人才有过剩之忧矣。余主张先办大学。一方则为招集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方即为容纳中级毕业生之过剩。照现在情形，能办理大学两所更佳。不能，先设一所亦可。至经费一层，全省常年须得三百万以上。广东全省收入为三千余万。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费殊不为多。即此三百万，以三分之一开办大学。其余以之兴办省立各校及社会教育，仅足敷衍。若不及此数，则办理殊不易矣。至大学地点，当然设欲广州。经费既由广东支出，当名为广东大学。□藉关余举办之西南大学，截然两事。至建设校址，当择东郊农林试验场，或其附近地方。若节在省经费，就高等师范校址改办。随图扩张。亦未尝不可云云。广东教育界当然另辟一新纪元矣。

1921年1月1日 《民国日报》第二张第六版

新教育是什么?

这篇是本年一月二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当时朴生、载杨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上发表,因为广州底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①]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底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底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table>
<tr><td>旧教育——科举</td><td rowspan="2">形式的不同</td><td>——经史子集</td><td rowspan="2">教材种类的不同</td></tr>
<tr><td>新教育——学校</td><td>——科　　学</td></tr>
</table>

照上表看起来,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的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

① 本文原载于1921年1月3日《广东群报》。4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转载时,陈独秀加了这一段文字。

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教育主义——个人的
教授方法——教训的

新教育——客观的{教育主义——社会的
教授方法——启发的

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定〔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

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教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像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自焚殉夫为道德，像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又如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

又如现在的广州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轿。

又如现代就是教育程度极低的人也知道奴隶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会的古代希腊，个人伟大的亚里斯多德竟主张奴隶制度不可废。

像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

是欺人的话。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底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1)可见之于家庭教师底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可见之于学校儿童底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3)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底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像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

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惠潮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第四个缺点就是旧的个人主义教育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承受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不脱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底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分〕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底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底界说，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现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及热心教育的人，关于这点很望诸君注意！

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底病状病源才能开方，服药后底经过状况

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像，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哩。哺养小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人底意思来哺养小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小儿底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底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之下学得许多实际的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小儿一样。

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底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们可以明白的了。

但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底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底不同。

杜威先生曾说，中国底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底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像日本底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

（一）伦理　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

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底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二）历史　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三）地理　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底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底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底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采〔样〕？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四）理科　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广州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广州有二十多年没下雪，香港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像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儿；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着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五）图画手工　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底成绩品，装潢学校底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

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底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学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底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底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的。因为手工图画底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画什么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像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底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谱的”教育；一切“填谱的”教育都适以限制受教育者底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贼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六）唱歌　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着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底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新教育底两个特点：

（一）新教育底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

（二）新教育底效力大过旧教育。

1921年1月3日《广东群报》

1921年4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转载　署名：陈独秀

广东教育制度改革计划[①]

昨天在某处得陈独秀寄来所拟教育制度原稿。并谓已得陈炯明同意。兹照录如下：

广东全省教育委员组织法

（一）本委员会为全省教育行政最高机关。其主要职权如左。一，编定全省教育制度。二，检查全省教育成绩及监督进行。三，掌管教育经费及办理预算决算。四，任免省立教育机关之人员。

（二）本委员会以左列人员组织之。（甲）政务委员。一，由省长委任之委员四人。二，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之委员四人。（乙）事务委员。三，由政务委员会指定大学及专门师范学校教职员若干人。四，由政务委员会同该项事务委员会延聘专门家若干人。

（三）全会委员互选委员长一人[但二三四种委员未成立以前得由（一）种委员互选之一]，总揽全会事务。

（四）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但得连任。

（五）委员长必兼大学校长。

（六）事务委员。分专门教育普通教育（视学员在此内）社会教育。会计检查图书仪器、建筑体育卫生统计八项。

（七）各项事务委员会开会时。以委员长或其他政务委员以之一人为主席。政务委员会开会时，以委员长为主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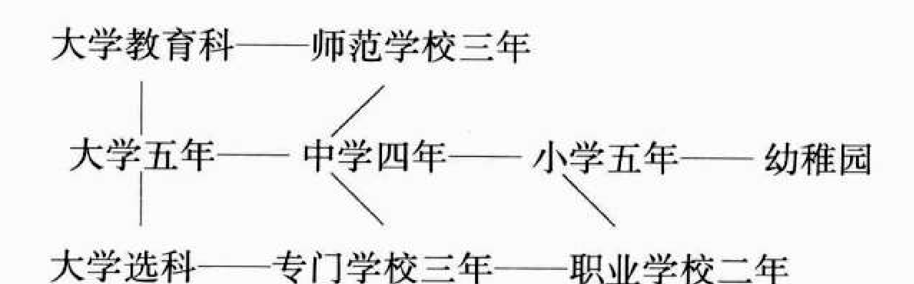
① 原标题：《陈独秀之教育制度》。

（八）任免全省省立各校校长及特别教育机关（如图书馆长等）。均由委员长提交政务委员会经多数议决，以全省教育委员会名义公布之。

（九）省长任命之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

（十）委员会得用左项事务员。一，书记，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二，会计，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三，庶务，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四，统计，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

全省学校系统图



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

大学理工两科：	1 000 000元
中学校：	150 000元，省立五校
师范学校：	100 000，并附属小学校及幼稚园
专门学校：	800 000，农，水产，工，医，药，美术，音乐，外国语，八校每校平均十万元
职业学校：	100 000，省立五校每校二万元，余均县立
以上学校教育费	2 150 000元
编译局：	100 000元
宣讲员养成所：	300 000元
贫民教养院：	100 000元

图书馆：	100 000 元，省立五所
博物馆：	100 000 元
剧院：	160 000 元
劳动补习学校：	40 000 元，省城立十处，平均每四处千元
美术院：	100 000 元
以上社会教育费	900 000 元
教育行政费：	120 000 元
外国留学生：	200 000 元
特别建筑费：	200 000 元
以上特别费共计	520 000 元

1921 年 1 月 7 日 《晨报》

答冯菊坡先生的信

《群报》记者：

在今天的《群报》上看见冯菊坡[1]先生给《群报》记者的信及记者的答复，知道冯先生肯对于鄙人《欢迎新军人》那篇文章，加以有理性的讨论。鄙人心中十分感谢冯先生，并且鄙人对于广州报界因此由悲观变为乐观。因为不幸我所见过广州报，不是无关重要的纪载，便是发讦反对方面的阴私，或是用无条理的诡辩、谩骂来出风头，像冯先生这样有理性的讨论，我第一次见着，所以我格外欢迎。

冯先生也承认现在及近的将来我们没有理由主张废兵，冯先生所怀疑的，是鄙人所说"或至很远的将来，我们都没有理由主张绝对的废兵论"这句话。

现在我引用罗素先生一段话来答复冯先生，以备冯先生参考：

> (前略)除去这些事件以外，还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就是用一种有组织的计划去扫灭无政府主义，恢复旧式的专制。假使拿破仑生于克鲁泡特金所主张实现的社会中，他的天才没有发展之余地，他能够甘心雌伏吗？如果一般野心家互相结合组成一种私有的军队，自铸军器，到后来出面压制深信自由而毫无防御的国民，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制止他们的行动。(见《到自由之路》第五章。)

罗素先生的意思是以为就是很远的将来，人类的竞争心、争权心和妒忌心三样根性是不容易完全消灭的，所以对内对外，小事仍需要法律，大事仍需要兵力，才能制止一切不正当的事。虽然将来的法律及军队渐渐和现在不同，而绝对的废止期，几乎是现在的人类一种空想。

以上面的说话，可以说明我不主张绝对的废兵论，并不专因为"抵

[1] 冯菊坡，广东人。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主要从事工人运动。

御外侮”，也不单是“一时的手段”，然却不是目的。

冯先生的意思，大概希望以法律的势力代替兵的势力，冯先生要晓得在无政府党看起来，法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主张要绝对的废止他。我以为法律力量是强过舆论，兵队的力量强过法律，确是人类的不幸，但此种不幸是很强有力的事实，我们只有努力把他渐渐改正，空言否认他，是没有用的呵！

不但兵的问题，我以为一切问题都不应该尊重在很远将来的空想，把现在及近的将来之实际改造忽视了，不知冯先生以为如何？

陈独秀　一月十日

1921年1月11日《广东群报》

社会主义批评

——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①

(一)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说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现代生产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现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资本私有。现在大工业时代和从前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简单生产工具可以生产的了;资本既然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15日,演讲词(记录)全文于1921年1月19日始在《广东群报》上连载完。后经陈独秀修改、补充,发表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

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二）是生产过剩。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生产品底种类额量，不受国家之统计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争加产额，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

现代分配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一年赚了净利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职员底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底官利二分二十万元，共总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底财产了。这个纺纱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像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

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二）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底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底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

资本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一切生产底工具，无工具不能生产，犹之无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资本；纸币是金钱底代表，金钱是资本底代表，都不是资本底本身。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不一定劳动，利用自己占有的资本雇用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利益。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底历史很早，远在渔猎时代，倘若那时雇人渔猎，或借器具给人渔猎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相同；到了农业时代，雇人耕种或买奴隶耕种，这时资本主义更是显然了；近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虽与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渊之别了。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于交换方法之进步　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谷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谷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着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着更进一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账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谷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底积聚和资本主义底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渊之别。（二）由于机器盛行　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鱼，有一架纺线车便可以纺纱，有一架织布机便可以织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

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着这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资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资本家自备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织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汽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资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资本家掠夺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资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资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聚起来的。机器积聚剩余价值既这样的迅速，交换方法又这样的便利，所以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迥非手工业时代所梦想得到的了。一方面资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底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那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底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

资本主义既这样强盛，压迫得劳动界无路可走，何以还说能讲社会主义呢？不然不然。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格斯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一定有人说：资本家占了剩余价值，资本无限增加，机器无限增多，生产品无限产出，岂不是很好的现象吗？岂不深合生众食寡为急用舒的孔门经济学说吗？殊不

知在共产社会里生众食寡为急用舒或者是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资本制度之下生产品增多，剩余价值也随着增多，此种无限增加的剩余价值复变为资本，不能用为社会公共增加福利，乃为少数的资本家所私有，于是乃由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Crisis)，所以说生众食寡为急用舒在资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现象。上面的话或近于抽象了，再详细说一下：在理论上看起来，社会上最怕的是贫乏，生产品多多益善，生产过剩是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许多许多，本算是好现象；但这种生产过剩的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反变成了社会底危机，乃是因为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这就叫做供过于求，这便发生销路底困难，过剩的额越大，发生的困难也越大；例如社会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现在产出一千五百匹还不大紧要；若是产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产过剩额到了这步，社会上必然发生经济恐慌。因为资本制度之下的产业状况是极端自由的，是无政府的，无论何项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自由联合自由投资增加生产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产品卖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资本家自由收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所得仅足糊口，生产较需要过剩了几倍，资本家虽然可以奢侈些，也断不能把同样的消费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资本阶级底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劳动界因购买力不增加，不能多销，那生产过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发生滞销、跌价、停工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这种必然的现象总括说起来，乃是资本制度之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因为资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底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经济恐慌。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溃的危机如马格斯所指示，而马格斯身后数十年资本阶级何以不但未曾崩溃并且日见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格斯学说失了效验。各国资本家拼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拼命推广制造业，拼

命寻求殖民地将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销售了，才能够弥缝一时表面上没有十分现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是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费了许多生命财产，结果所求得的不过是几条通商条约。因此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不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或与他资本国争夺商场都非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生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底权利；试看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治与强权底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他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两洲底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扩张在中国、朝鲜底商场，还美其名曰保全东亚和平是一样。

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言是怎么失败的呢？正因为他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底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乃因为他们的国家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底地位呢？威尔逊总统不过说得好听点，如果他美国当真抛弃了军国主义，他美国在国外底殖民地和商场抛弃不抛弃？如果抛弃了，国内底剩余生产怎么样？所以威尔逊总统底主张不但在巴黎和会失败了，并且此时美国底海陆军备仍然是有加无已。日本鉴于美国底情势，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业底威权，也不能不竭力增税扩张海陆军备到现状一倍以上，日本当局非不知这税太重了，全国底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下级军官底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机，但是他们更知道没有充分的武力保护商业不能输出剩余生产乃是更大的危机，所以明知道扩张军备是毒药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扩张军备是陷阱也不得不从上面走过去。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竞争扩张军备是无限的，相互争得的殖民地或商场是有限的；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

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底结果，国际资本阶级底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底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的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底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到是各国资本制度底崩溃还未现实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们到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们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底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既然有讲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他的派别分歧，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一、无政府主义

二、共产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四、工团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

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格斯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格斯；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他的缺点正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劳动者本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何待你不要，你尽管不要，资本阶级他是要的，他是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的；工团主义者以为国家政治总会侵害工人底自由，试问呻吟于资本家政权之下的法国工团他们的自由在那里呢？

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底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底权利，这样公平的调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调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特性。其实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

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

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底绝对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底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束缚，天才方可以发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那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的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先就经济而言：现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而且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但无政府主义者必定说：我们可以自由联合，公议生产事业，断不至有这样过剩或不足的情形发生；那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

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像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社会制度初变更的时候，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干涉呢？监守公物而自盗，强力迫胁不悦己的妇女，这种人无论到何时代恐怕都有，应不应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说：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五派中底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格斯，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的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如下表：

共产主义底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第一、德国底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问俄国共产党：有产阶级的人也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张无产者一阶级专政？俄国人答道：你们何以不主张全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问道：一阶级专政岂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们所谓民主政治底内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阶级专政呢？柯祖基著书大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说不合乎民主政治，说不是马格斯主义；其实马格斯在《哥塔纲领批判》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

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底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格斯底主张，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四、俄国底共产党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组织，〔但〕是他们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有人说马格斯当初所主张的俄国现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阶级全体指示共通的利害。“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格斯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采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由以上四点看起来，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

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1921 年 1 月 《广东群报》

1921 年 7 月 1 日《新青年》 第九卷第三号转载 署名：陈独秀



教育与社会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讲[①]

今日讲题为《教育与社会》。故向来我国社会与教育，是别而为二的，致结果多不良。余前在高师讲演《社会与教育》时，曾言其概略，兹再反复言之，以尽本题之意义。社会与教育分离，其弊之最大者莫如减少教育的效力。诚以人类精力，本应经济。若教育与社会分离，是即个人之教育，其效力甚微，其不经济实甚。盖社会支配个人，其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其力量小，理至明也。或者疑社会力量未必优于个人，每以孔、佛、耶之学说，能支配地球上一部份人之精神，至历数千年之久为喻，不知世界自有人类以来，中华之孔子，印度之释迦牟尼，欧洲之耶稣，其个人力量之大，似足以支配社会矣。然从实际上观察，其个人之力量，实由社会而产生。试推论之，世人徒知孔子支配人之学说为家族思想，亦即人伦之道。然亦知夫中国之为世界最大农业国，其人皆为土著之民乎。既为土著之民，则重迁徙，鲜往来，其种种风气，皆足以养成人之家庭思想。是孔子之学说，为社会所养成，世人不察，倒因为果，误矣。释迦牟尼亦然。其学说由印度社会养成，非印度社会为释氏学说所制造。何以见之。印度地居热带，酷暑如焚，人人皆抱厌世悲观之思想，故造成释氏之学说。征之耶教，亦何莫不然。耶教重自由与进取，虽与孔教之家族思想不同，与释迦牟尼之厌世悲观主义亦异，然究其原因，亦以欧洲多岛，交通利便，人民轻于迁徙往来，故无家族观念。且其地属北温带，气候温和，故无厌世悲观思想。是其学说亦由四围环境养成，非由耶稣建此以改造欧洲人类者也。由斯而谈，此三大伟人之学说，非自成之，乃社会成之也。设使耶稣生于中国，亦必主张家族主义；

---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20日。

孔子生于印度，亦必尚厌世悲观；释迦牟尼生于欧洲，亦必主张自由进取。要之，孔、佛、耶易地而生，其主张则互变也。从可知社会支配个人之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之力量小矣。此既证明，则教育若离社会而独立，则教育之力量自减，讵得不谓之减少教育之力量耶。

教育与社会分离，足以减少教育之效力，前已言之矣。然实际如何减少，可条析言之：

（一）教育的效力，普遍之力消失，只可及于部分或个人。

（二）学生训练的效力。社会与教育分离，则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故假使学校训练好，而社会不好，其得益仍寡。吾年来从教育经验上，观察此说，最足征信。予见小学生，往往在学校受训练时，极为活泼，极守秩序，极为奋发，极能合群，极不倚赖。惟一入家庭，则此种佳处，即觉销灭。或少壮大学生，在学校时，无不品行纯洁，志趣高超，为一有希望之青年。殆一入社会，则渐染渐深，愈久愈甚，终成为一无希望之恶人。此其证明也。

（三）学术上应用之效力。教育与社会分离，则学生在社会，自有一种特别阶级。其所学何事，社会无从知之，故社会上不甚注重，不甚相信。此种弊病，在社会固应负一半之责任，而教育家亦应负一半之责任。何以言之？日本兴学之初，其社会亦不相信教育。复由教育家致全力医学、农学两种与社会密切关系之科学，使社会知其利益，其后遂得社会之相信。故欲求学术之应用，必须使教育与社会密接。至我国社会之不相信教育，固由社会与教育隔膜。然农业学生，其所学得之学问，反不如老农。工业学生亦然，一经实用，其成绩反不如一小匠。故欲求社会之相信教育，非教育家注意于上述事情而改良之不可。

鄙意以为以后办学，务使社会明了教育内容，深知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及深信教育在社会上之实益。欲做到此层工夫，办农业学校，宜在乡间，办工业学校，宜在省城。为教员者，又宜认真训练学生，作育人才。今社会上感觉旧学者不如新学者，则教育自然得社会之相用。又广州以丝业著名，应办蚕业学校。潮州富于水产，应办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应办农业学校。若在潮州办农校，在北江办蚕业学校，在广州办水产学校，则其所学非应所在地社

会之要求，其学术之应用颇易自减，而教育力因以不大。前者言欲，用学术之应用效力大，而令社会了解内容，后者言欲学术应用力大，不可不适应社会之要求。推而言之，而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外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稗实用也。又如动、植物学，其分配种数，虽甚清晰，而对于我国地方种类，多付阙如，亦有何大用之处。故学术与社会分离，是死学术，学术与社会合，方是活学术。教育与社会离合，于学术应用效力之关系有如此者。

（四）文化普及的效力。我国教育与社会分离，教育对于社会，亦取闭关主义，而广东尤甚。故学校门首，多有挂“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等牌，不准外人窥看，人以为内中有不可告人之处。不知凡学校图书馆等，宜令人人皆可入内参观，使人人皆得增进知识，社会得渐渐改善。故外国图书馆，通俗演讲，均取开放主义，无论何人均可入内观听。我国直采取此法，使教育与社会合。否则教一千学生只一千学生受益耳，讵能希望文化普及乎！以上种种不好之处，皆就教育与社会分离而言。今后希望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使教育效力宏博，则幸甚，幸甚！

1921年1月21—24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在工业学校演说词[1]

——工学生与劳动运动

今天来到贵校，没有什么话说，但在座诸君，多工业学生，我们就在工业上研究研究。现在所讲的——就是“工学生与劳动运动”，这是工学生所应当知道的。

现当来讲这个问题之先，要把劳力的地位说明一下。

在旧式经济学说生产原素是——

一、土地；

二、劳力；

三、资本。

在现世新经济学，对于这三种的观察，觉得不甚满意，何以呢？因为土地纯然一块土地，若不经劳力者开垦，是没有价值，必要加上劳力才能发生效用。例如乡间的土地，不是农人去种些稻、麦、甘蔗、番薯等等，便没有价值。又如乡间的地方，不及省城长堤的价值。所以土地因其所加的劳力不同，则其价值也不相同。那么，土地是附属于劳力之下，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在资本也是一样，平常的人以为金钱即是资本。不知金钱只能代表资本，像钞票代表金钱一样。所以金钱并不是资本的本身，不过是一个代表的东西。真正的资本是什么呢？就是土地、机器、房屋、原料、粮食五种。土地没有劳力是不成的，已说在上面，不用再说。机器是用铁做成的，铁又是从矿山中得来的，由生铁而熟铁，通通是经过一种劳力的。所以这两种都属于劳力的范围。至若房屋、原料、粮食三种，皆由劳力得来。房屋是泥水木匠做成的，原料和粮食也是劳农的生产，没有劳力，这三种是不行的。机器没有劳力，便不

---

[1] 演说时间为1921年1月22日下午。

成机器。土地没有劳力，便不成土地。房屋、原料、粮食，没有劳力，便不成房屋、原料、粮食。我们可以说：资本没有劳力，也是没有独立的价值。照这样看来，劳力实在是生产的原素，土地和资本，断不能与劳力平行，要附属于劳力底下。那旧式经济学所说的，是不成问题。劳动既是占着生产上最重大的地位，我们就可以说下劳动运动了。古代经济学说，与现世新经济学说的不同之点，就是：古代把土地、劳力、资本，相提并重，专为大地主所支配；现在所注重劳动方面，因为土地非劳力不能成土地，资本非劳力不能成资本，大地主怎能够支配起来。所以现在说的资本，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乃是开天立地以来的劳动者产下的资本；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常说"劳动神圣"，就是因为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所以这样说。

现在也有人反对此说的，他以为今日的世界，不单是专从劳动家得来，还有所谓学者，如制作房屋的工程师。他说的原来不错，但对于劳力生产说，也不能破坏。因为工程师和技术家，不能逃出劳力范围之外，彼用脑力，也是一种劳力。我们解释劳力，不单就体力上说，大凡以体力脑力作工的，一概都是劳力的运动，不单指以体力作工，才算是劳力的运动。既然是用脑力和体力都是出力，那么：现在的资本家，也许有用脑力的地方，难道也算他是劳动家不成？据我的意见，现在的资本家和劳动家，仍然是有分别的。

一是雇主。资本家以自己的金钱，来买人家的劳力，谋自己的生活，就是雇主。

一是被雇者。自己没有资本，卖劳力与资本家，就是被雇者。

所以现在的资本家和劳动家，不是劳力与不劳力的分别，乃是雇主与被雇者之分别。

上面已把劳动运动的理论说了一遍，现在要说工学生的地位了。工学生占什么地位呢？就是占脑力劳动者的生产事业。我也曾说过，工程师和技术家，皆用脑力，都是劳动者。据我的观察，将来社会制度必要改革。但改革至怎样程度为止？大概终须做到把土地、房屋、机器等等，都为劳动者所有，各人都能够独立生产，不为被雇者，去做独立生

产的事业。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因为用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卖给资本作工，是一个被雇者；工学生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既然同是被雇于资本家，便是同在一个阶级。那么，工学生便应该和体力劳动者携手，不应该同资本家携手，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所以工学生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打破雇主与被雇者，不生分别，没有阶级，便可做成社会上种种改造的事业。

诸君都是工学生要知道自己所站的地位。觉悟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要和体力劳动者携手共进？这是很希望的。

（陈先生这番发挥，妙言精义，连出不穷，好像天花乱坠一样，片片喷香，收拾者手腕不灵，也许有挂漏和错误的地方，还要求陈先生更正，和读者原谅。周其鉴、阮熙朝附识。）

1921 年 1 月 28、29 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周其鉴、阮熙朝笔述）



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

——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会演讲[1]

今天本来预定三点钟来的，因为有些小事情，所以稍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高深学说，贡献于诸君。今天各位所定的题目，范围广大，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完，现在将简略说说，这是很抱歉了。这题大约有两种观念：第一种是精神上的，第二种是物质上的。我以为精神上的人生，没有什么标准。人说善则善，人说恶则恶，人说苦则苦，人说乐则乐。譬如中国妇女的生活，有时明明是很痛苦的，因为旧道德支配着，也觉得自己是无上光荣，是无上快乐；还有好些快乐生活的人，有时也觉得是很痛苦的，所以在精神上讲来，很难辨别人生正当不正当啊。

如果就物质上说，较为有点标准，然而非两三句说话就可以说明，古来的解说也很多。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历史上的人生，到今还未曾发见。真正的中国的人生，自古都是很不正当的，不是这一个压迫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压迫这一个。在封建制度的时代，有两种阶级：一是诸侯和地主，一是农奴。诸侯压迫农奴，农奴要受诸侯、地主的压迫。

如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进入资本制度的时代了。又发现两种阶级：代诸侯和地主阶级而起，是政府和资本家，从前的农奴，就是今日的劳动者。资本家能压逼劳动者，劳动者就要受资本家压逼。这种情形，不独中国如此，各国都是一样。又如中国的习惯，男子常是压迫女子的，这是甚么原故呢？难道女子就不是人？应该受男子压迫吗？中国

---

[1]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23日。

的古训所谓女子有三从之义：在未婚的时候，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你们想还有甚么道理来压迫我们呢。以上所讲的，都是不正当的人生。男子受政府、资本家的压迫，女子们除了政府、资本家压迫之外，更要受男子压迫。然而女子阶级之中，还有些同类上的压迫。好像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还有做奴婢的人，被主妇压迫，也是十分惨痛的。兄弟到广东来，看见这样的现象，格外繁多。所以中国的人生，都是一层一层压迫人家和被人家压迫的。男子所受的压迫是政府、资本家，女子所受的压迫有政府，有资本家，有男子，还有他同类的妇女。故此我以为从前人生，完全是不正当啊。

我如今天论压迫他人，和受他人压迫，不是说男女问题，是说人类的问题。总之人类是不应压迫人家和受人家压迫的。如果说到压字，却是最不正当的。换一句说，正当的人，就是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我现在所说的，不晓得诸位以为对不对。

1921年1月24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

——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①

现在我所讲的题目，是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女子问题，近来研究的人很多，但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所以我今日提出来讲讲，想于没有系统之中，找出一个系统。

今日所谓伦理，大概有两种观念：一种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一种是牺牲弱者抵抗〔帮助〕强者。现在军国主义，都是牺牲弱者的一种，是牺牲弱者帮助强者；与此相反的，就是社会主义，这主义帮助弱者抵抗强者。社会主义中最要紧的是劳动问题，然而劳动与女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妇女与劳工是社会中最没有能力的，劳工受资本家压迫，妇女受男子压迫。我们今日固要帮助劳工抵抗资本家压迫，尤要帮助妇女抵抗男子压迫。但今日我们专讨论的是女子问题，关于劳工问题，暂且不说。我虽单讲女子问题，然与劳工问题也有关系，因劳动不单是男子的事，女子也与劳动很有关系的。

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因社会制度，造成了社会的许多不平等的事情；因社会造成个人的不平等不独立，然后方有社会主义发生。讨论这点，妇女问题，自然是连带发生了。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

中国妇女，伦理上的信条，是三从主义。所谓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因在家从父，女子一切活动，都要受父亲的干涉，而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1月29日。

做父亲的干涉女儿，差不多当女子是桌上一个瓶，摆在一块地方，什么用也没有；做父亲的，可以将女儿卖给人、送给人，并且他父亲要恭维人巴结人，可随便把伊送人做妻做妾；女子若不肯嫁给有钱有势的人，是不行的。现在中国女子婚姻问题当中，百人中能自由的不过一二人，其余的多是父母作主。父母也不是单为女子设想，不过为自己联络有权势的人，便送给他人做妻，拿女儿作他一己攀援富贵的敲门砖罢了。女子在家从父，可以谓之全然没有人格。至于出嫁从夫，男子叫女子做事，女子不能抵抗，若是抵抗，社会断不相容。做夫的不但可以命令女子，并且也可以卖，也可以送。我们知道的，有许多男子，因吃鸦片烟，把他妻卖去的，也有强迫他妻去卖淫的。有人告诉我，广东有一处地方——我不知是不是——可以将女子租给别人。在古代社会，这种事很多，我固然不信广东还有这种野蛮行为，但或者形式上没有，而精神上也许有的。

现在女子结婚，差不多都是父母贪图富贵；不但父母把自己底人格取消，而许多女子也把自己底人格取消了。广东情形，我知得不十分清楚；至于上海情形，很是可悲：有一个上海很著名的学校，多数学生没有独立的思想，伊们知识虽好，而思想仅得一个：就是穿着要阔，要时髦。假使有一个不甚时髦，大家就看伊不起，而自己也觉得不象样。伊们最后的思想，就是要嫁一个留学生，回国之后，要做大官。但伊们的衣饰从那里来呢？伊们既不劳动，当然得不到；所以伊们的希望，只有望男子送来。这样的思想，自然把自己的人格丧失了。现在许多女子不想独立，只想穿阔衣服，也是把自己的人格同时丧失的。中国社会上的女子，无论从父从夫，都没有独立的人格；靠父养的，固没有人格，靠夫养的，也没有人格。所以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

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

现在尚有另一问题，许多人可以说：不必社会主义，女子也可独立；

不在社会主义之下,也可不受父母男子底压迫。这句话初看来,很有道理,但很错了。因离了父母家庭去谋独立生活,是不行的。何以见得呢?因女子离了家庭的奴隶生活,自然去谋独立生活,但社会是不许的。我们想想:女子离家庭而独立生活,去什么地方生活呢?在什么地方能谋生活呢?无论什么地方,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部分雇人做事,一部分帮人做事。女子若离了家庭,雇人做事呢,还是被雇于人。如果要雇人,直是笑话,不会有的。伊们既不能雇人,一定要受人雇,一定附于资本家,那么,就会变成资本家的奴隶了。从前女子是家庭底奴隶;而离了家庭,便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无论如何,都是奴隶,女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社会主义之下,不是这样。工人资本家没有分别,大家都要作工。所以必到社会主义时候,才能根本解决。女子在家庭,固有独立的人格,在社会,也有独立的人格。

我今天所讲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因为女子问题有许多零零碎碎,不能解决,非先提社会主义,无以概括。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而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所讲的伦理,不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就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后者就是社会主义。女子与劳动者全是弱者,所以我们要帮助弱者抵抗强者。除了社会主义,更没有别的方法。我以为不论男女,都要研究社会主义,而女子比男子更要奋斗才好。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这不单是女子的事,而男子也是这样。所以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以抗强者,就是我今日讲社会主义的意思。

1921年1月31日—2月1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1921年2月14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只眼

理发工会成立会演说辞[①]

今日中国的工会，不过开始，成立的实在不多，若在外国，无论那种行业，都有工会。但是外国在数十年前，也是没有工会，和我中国现在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政府不许工人设立工会之故。在政府不独有不许工人设立工会的意思，而且制造一种不合道理的法律，去干涉工人立会；如有人违背这种法律，政府就要将工人拿进监狱去受罪。后来各国的工人，努力奋斗，始得将那种不合道理的法律取消。

我中国现在的法律，也是不许工人立会的。所以在广州有许多工人团体，如广三铁路职工养志团和工余群旅等，都是正正当当的工人团体，因为政府不许工人集会之故，所以不敢叫做工会而改作种种的名称。

这种不许工人集会的法律是什么？就是治安警察法。这种治安警察法，成自何时？制自何人？谅想到会诸君，也会知道的。这种治安警察法律，就是袁世凯所制定的。但有一件事，诸君知道不知道？现在广东政府，对于治安警察法，经已有明文取消了。那么，广州的工人，当然有集会的权利了。而且据我近日所知道的，广东政府，不独取消了治安警察法，而且制定一种工会法，叫工人依照这种法律和他一定的手续，政府就会准许立案，自然得受法律保护。

这种工会法，不久就可以公布了。现在广东政府对于工人，有这样好意，但你们工人对于自己，应该怎样？请诸君想想！在外国的政府，不许工人集会，而外国的工人，能够自己努力奋斗，卒之战胜政府，将那不合道理的法律取消，得到集会的权利。今日广东的政府，既将有工会法，许工人集会，所以我们工人应该有较大的责任，假使尚不肯努力做

---

① 演讲日期为1921年2月10日。

去，未免自己看得太低，不知自爱了。

我到广州虽没有多久，但我知道工人的团体，表面上虽有许多：如职工养志团，机器工会，工余群旅等，都是工人的团体。但观察他的内容，实无组织之可言，不能叫做工会，而且连章程都没有，我今天见到贵会的章程，是我第一次在广州得见到工会的章程的，所以我对于贵会，发生两个感想：

（一）有详细完备的章程；

（二）到会者多是纯粹的工人。

除了以上两个感想以外，还有两点，希望诸君努力做去的：

（一）广州理发工人有四千多，而今天到会的，不过数百人，与全体工人相比，不过十分之一；所以我希望各位努力去联络同业，务要全体同业结合成一个大工会。

（二）现在贵会虽然有章程，但将来人数增多时候，有一点地方，应该修改的。因为现在贵会的章程第八项所有评议股与庶务股会计股文牍股纠察股交际股平列，是不对的。无论那种团体，评议部都应该独立，因为庶务等属于执行的，评议股是属于立法的。将来贵会修改章程时候，最好将庶务股会计股文牍股纠察股交际股等合成一部，叫做执行部；评议股独立一部，与执行部对抗。所有什么事，都由评议部议决，交执行部执行，所有执行部职员，也由评议部选举。至评议部的组织，最好由各街各路选出：如西关有若干同业，应该选出若干评议员；东堤有若干同业，应该选出若干评议员；然后由全体评议员共同组织评议部，这样组织方好。

至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各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我很希望诸君将来肯匀出一点时间入劳动学校读书。

我对于贵会的希望很多，但因为时间不多，而且贵工会已经成立，将来见面的日子亦很多，我改天再谈罢。

1921.2.10.鸣谦笔记

1921年2月13日　《劳动与妇女》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讨论社会实际问题底引言

在言论上指导社会是新闻家一种职务，此时广州的新闻界怎么样？我敢说广州的新闻界，腐败的不用说了，就是最好的新闻纸，他所发的言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与社会毫无关系，他能够指导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们不肯讨论社会实际问题。

言论自由自然是我们很希望的事，但是我对于此时广州式的言论自由，十分悲观，因为此时广州的言论自由未免太滑稽了。政府党的机关报公然鼓吹无政府主义，这是什么一种滑稽的言论自由！许多报上时常造谣言攻击个人的阴私，这是何等不法的言论自由！至于不满人意的善堂问题从来无人敢讨论；最近的国会选举总统问题赞否两面都不敢正正堂堂地发表主张；真的言论自由在那里！

许多人说此时的广东是言论最自由的地方，这句话我一百二十分不承认，像此时广州式的滑稽的言论自由，不法的言论自由，假的言论自由，毫无价值，离真的言论自由相隔还远得很。真的言论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呵！不是旁人可以赏赐我们的呵！

政治上的言论自由此时更不必谈起，所以我们不妨就社会问题讨论一下，试试广州到底有没有一点言论自由的余地。但讨论社会问题，要以实际问题为限；若是离开了实际问题，专门发空议论，就是天天谈政治，天天鼓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也无人来干涉你，这种滑稽的假的言论自由，我们要他做什么？

我们算提出关于广州社会上种种实际问题，要求言论界及读者诸君大家出来公同讨论，我不过提出几个题目，因为我来到广州日子很浅，对于广州社会没有多少知识。

1921年2月12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致周豫才、周启明信

豫才、启明二先生：

《新青年》风波[①]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如何，乞赐复。

弟　独秀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1979年5月15日　《历史研究》第五期

① 1921年2月初，《新青年》第八卷六号付排时，稿件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搜去，并罚洋五十元，不准在上海印刷。

致胡适之[1]

适之兄：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2]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独秀白〔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原件存北京大学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胡适于1922年5月7日创刊《努力周报》。

讨论广州社会实际问题[1]

影画戏院问题

电影戏也是社会教育之一种，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提倡，一方面却要十分注意。我们中国人受了旧戏剧中怪力乱神等恶的感化已经不少，现时影戏怎么样？

影戏中最要不得的就是侦探片，有许多国里是严重禁止的，我们中国影戏场所演的大半是侦探片；看的人大半也喜欢看侦探片；实在不是好的现象。

侦探影画片最能养成人机诈作恶底心理，并且能教人以机诈作恶底方法，例如上海阎瑞生杀害妓女莲英底案中，完全是模仿影戏。

广州某影画戏院竟有秘……秘……秘……密……大秘密的广告登在报上；这影片或者非侦探片，但看他告白中“黑中秘”三字，已令人见了毛骨悚然！

听说某影画戏院底经理人还有点知识，奉劝他以后要多演点科学片及新剧片，不可再演侦探片了；侦探片的影戏是警厅应该禁止的呵！

1921年2月19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① 《讨论广州社会实际问题》，由七篇文章组成，现查到“引言”、(一)、(二)、(三)、(六)计五篇，我们选了第(六)篇。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

季陶先生曾说：此时不是劳动运动，是运动劳动运动。我们也可以说：此时不是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运动。此时不但他们自己不肯运动，还有些劳动者以为运动劳动运动的人是多事，有些妇女们也以为运动妇女运动的人是多事。

照这样看来，我们还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做什么？

自来伦理思想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一是扶助弱者以抗强者。

前一派伦理，在心粗的人看起来，这种不合人道的思想算什么伦理。其实我们人类自古至今的历史，都是这种伦理思想造成的，我们现在所见所闻所行，一概是这派伦理的现象；人类将来的历史纵然有点变化，而人类对于其他动物的伦理观念，恐怕难得脱去损弱益强的老脾气。在将来的理想，无论我们如何不赞成这派伦理；但在过去及现在的事实，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

后一派伦理，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将来的理想。过去及现在的伦理、历史，都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的伦理、历史；其中最显明的，就是牺牲劳动者以助资本家，牺牲妇女以助男子。社会主义正因为扶助这两种弱者，抵抗这两种强者而发生的。

这两派对峙的伦理思想正在拼命的血战中，我们应该取那一派呢？我以为应该取助弱抗强的社会主义。这有什么理由呢？我以为这理由乃建立在社会学学者所说的"同类意识"上面。

各种动物的"同类意识"发展不等，乃是我们人类进化到今日庞大的社会之一大原因。但是我们人类这种意识固然比其他动物发展，而仍然日在进化中，还未曾尽量发展呵。劳动者不是我们的同类吗？他们穿的什么，食的什么，住的什么，知道什么，无日无夜的委身那毫无乐

趣的劳动，和没有知觉生命的机器有何分别？妇女不是我们的同类吗？本是人类底母亲，反变了人类的奴隶；不寄食于父，便寄食于夫；得意者也等于珠围翠绕的娼家，失意者便是日暮无归的乞丐；至于一般受虐待的养媳婢女，更过的是极人间悲惨生涯。

我们若要尽量发展我们人类可贵的"同类意识"，对于我们同类的弱者劳动与妇女，便应该发挥真挚的同情心去扶助他们。这就是我们应该采取助弱抗强的伦理之唯一理由，也就是我们所以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之唯一理由。

1921年2月20日 《劳动与妇女》第二期 署名：陈独秀

我的妇女解放观

“五一”劳动纪念日和“三八”妇女纪念日，这两个纪念日，是全人类脱离黑暗走向光明大道的标识。全世界各国，劳动与妇女无处不被人轻视，然而他们却是人类的最大多数，并且为人类负担着重大的工作。现在有了“五一”、“三八”这两个纪念日，每逢纪念，被轻视的人们，都应该特别加紧做一番反抗被轻视的表示，使轻视者知所警惕！

中国的劳动解放运动，已经随着每次“五一”纪念而日益进展，现在固终说不上完全解放，却已努力跑近权力地位。妇女解放运动是怎样呢？可以说还没有什么成绩。三数个大都会，有些剪发的女子；先婚后嫁，生私孩子，寡妇嫁人，都不像从前那样奇耻大辱的事；除了这件事，实在找不出别的成绩了。“三八”纪念日，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虽然有了两次“三八”纪念运动，可是力量很微弱，还不能够使轻视者感觉着被轻视的人们已经有了反抗运动。

今年的“三八”，正当全国的革命高潮中，不肯轻视妇女的人们，自然主张妇女要极力参加革命运动。我当然也不反对这个主张，我并且相信中国的革命胜利，妇女解放运动必能得着很快的发展；可是一向被轻视的妇女们，切不可一刻忘了自身的妇女运动。并且被轻视的妇女们，必须加紧自身的解放运动，才有力量参加政治革命；更进一步说，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种。

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中国妇女身体上第一苦恼就是缠足。有些以为小脚有一种美观，我以为是一种刑罚。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纠合一班小朋友，用黄纸大字抄写好几十张清朝西太后禁止缠足的上谕，张贴通衢，劝人放脚，当时全城的人都说我们是班疯孩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宣传方法固然很好笑，可也收到一些效果，可惜疯孩子太少，以至到现今二十多年，缠足恶

俗还未大改，不但乡村中仍然是很普遍的，即大都市还未绝迹。听说甘肃、陕西缠足恶俗更是厉害，脚小的妇女竟至终日膝行，并且市上竟有出卖膝行器具的店铺，因脚小而膝行者之多，于此可见了。江、浙妇女好着紧身小马甲，为害肺部也非浅鲜。

中国妇女精神上的苦恼，那便一时说不尽了。一切体教、法律、社交、教育、职业，无不压抑女子，所以有人号召“男女平等”。我以为按照中国妇女地位，在决定“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之前，更要紧的问题，是决定女子也是个“人”。我们中国的诗礼人家，有客来访问时，若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必定隔着门帘回答说：“我家里没有人。”这就是中国的妇女不自算是个“人”的铁证。所以中国妇女，第一必须取得法律家所谓“自然人”的资格，然后才能够说到别的问题，才能够说到和别的人同等权利。

被轻视的中国妇女们！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

1921年3月8日 《三八国际妇女纪念》，汉口长江书店印行

署名：陈独秀

辟　谣

——告政学会诸人

前在报上见过章秋桐[①]君论"败律"那篇文章，后来又听说他出洋读书去了，我很赞成他这种态度，我并且很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悟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

近来看见三月八日的上海《中华新报》(这报是政学会底机关报是人人都知道的)上，有一篇《广州归客谈》，前一半载了广东政界许多谣言，后一半说的是陈独秀"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说我"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同时民党暴徒如夏重民、吴铁城等又从而附和之……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各校学生及看报的人应该知道，用不着我辩正的；夏、吴两君曾否附和过这种学说，学生家长是否有饬令子弟退学之事，都有事实可以证明，也用不着我辩正的。

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能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合乎社会需要的道德，提倡犹恐不及，如何言废？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大腹贾以外，没人肯主张罢！

---

① 章秋桐，即章士钊。

《中华新报》有了这段荒诞的记载，同时温宗尧氏所支配的广肇公所也有同样论调的电报给政府当局，因此我不能不正告政学会诸人道：你们应该纳秋桐底忠告，采取磊落光明的态度；即或不能，也不应该因政治上之感情，迁怒于教育界，并且以稍有常识者所不信的谣言诬及教育界之个人，说是"禽兽学说"，说是"滔天祸水"，说是"广东之惨象"，这种政客作用真可谓异想天开；我奉劝你们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向精神上永远绝对失败的路上走。

我以为广州底言论界及学生界都有辟这种谣言的责任。

1921 年 3 月 18 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逐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我们中国历来私人的历史家很少,留心记载当时历史材料的历史家更少;因此,我们要研究前代社会状况,读小说往往好过读历史;但是这种小说家兼任历史家的习惯,终是小说历史两方面发达底障碍。

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材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

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一九二一年四月叙于广州看云楼

《红楼梦》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我近几年来细细研究我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到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我的惭愧悲愤哀伤常常使我不肯附和一般新旧谬论。

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

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

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

《民国日报·觉悟》上，太朴答存统的信中说：“我相信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国民性不能容，马氏主义是中央集权，故我不信其能实行。”又说：“中国底国民性既不容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而中国底社会情形又向来是无政府已惯的，所以一旦要行起劳农政治，要组织强有力的中央机关，我真不知其可也！”又说：“我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太朴先生这几句话诚然不错，但我以为若要迁就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情形而不加以矫正，只有袁世凯、张勋一班人绝对赞成罢；因为袁、张都正是口口声声根据国民性和社会情形发挥他们的主张呵！

我发誓宁肯让全国人骂我攻击我压迫我，而不忍同胞永远保存这腐败涣散的国民性，永远堕落在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刮刮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

文化运动底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敢说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社会运动底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敢说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人口问题这一类的事。

这两类事底内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们混为一谈，岂非怪事吗？

文学、美术里面，也许有人喜欢加上一点社会化的色彩，描写到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也许要很留意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做他们社会运动底工具；但这两类事业底本身，仍然是两件事，不可并为一说。或者有人一方面从事文化运动，一方面又从事社会运动，这只可以说一个人兼做两类的事，不可以说这两类事是一类。

有一班人以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又有一班人以为社会运动就是文化运动，这更是大错而特错；试问妇女问题、劳动问题，在文艺、科学上有何必然的连带价值？并不是我们看轻了社会运动，只因为他和文化运动是两件事，我们不能说在社会运动有成绩的人在文化运动也有成绩，也和我们不能说在文化运动有成绩的人在社会运动也有成绩是一样。以上两种人

的误会，都因为不明白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

又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若再进一步，连军事也拉进去，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

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不能说政治、实业、交通就是文化。这个道理罗素在北京演讲的《社会结构学》里面有一段说得很清楚，现在录在下面：

> 什么叫做文明，其定义可以说是要求生存竞争上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竞争范围以外之目的。古代文明，第一次发原于埃及、巴比伦大河出口之处，地土膏腴，宜于农作，由农业发生文明……在膏腴的地方，如长江、黄河底下游，一人工作出来的不止供给一人底需要，于是少数人得着闲暇，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如文字、算术、天文等，均为后世文明底基本。但在这时候虽有少数人从事文明事业，其大多数人作工还非一天到晚劳苦不可，科学、哲学、美术固然也有人注意，但只是少数幸运的人。在实业发达时代，生产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时作工，余剩的就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了。

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决不是短时间可以得着效果的事。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底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毫，那责备文化运动底人和以文化运动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

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

1921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 署名：独秀

随　感　录

下品的无政府党

我前次所说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即虚无主义的无政府党，在中国读书人中还总算是上品；其余那一班自命为无政府党的先生们：投身政党的也有，做议员的也有，拿干俸的也有，吃鸦片烟的也有，冒充人家女婿的也有，对人说常同吴稚晖先生在上海打野鸡的也有，做陆军监狱官的也有，自称湖南无政府党先觉到处要人供给金钱的也有，以政学会诬人来谋校长做的也有，书已绝版尚登广告劝人寄钱向他购买的也有，谋财杀害嫂子的也有，可以说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了。

吴稚晖先生说："什么无政府党，简直是拆白党！"

沈玄庐先生说："传播一种主义，为现社会所嫉视的，或单独施行一种牺牲生命的行为给社会群众一个暗示，这是何等简单纯洁的行为。勇于群众所不敢做的事，拿躯体做了肉弹，在己身一无所图而给昏迷的群众一个大大的暗示，尤为难能可贵。群众中间，亦须万人中得一二这样的分子，无论旧势力怎样严重的压迫，没有不崩溃的。可是这类的动作，是沉默中的迅雷，是立体的事实，决不是被雇佣或鼓吹别个人去做的事。现在居然有几个人把手枪炸弹挂在口头，印上纸面，做传播主义的锋头，这些不实的平面的空谈，拿来吓死老鼠都无用，打算骗哪个人呢？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鼓吹，希望别一个人去实行，这种叫人家去放火，自己立在隔岸做指挥者，事成，居了功，事败，免得祸；这是什么心理？

"现在有几个人，既不是过资本生活，又不做工银劳动，据他们的主张是'传播主义，维持生活'。在操行清洁的，未尝不象一个沿门托钵的

苦行僧；只是借传播主义来维持生活，就活现一个择肥而噬的拆白党。依我个人当面接受到的口吻，公然有无论取到哪一个人底财货，就算是‘光复’的。分明不是生产的劳动者，却把生产劳动者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也横领了来，掠夺的手段几乎驾在资本家之上；一面还要反对劳工专政。这又是什么心理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社会上为这些人下了这种标语，这正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例外的人，更是托尔斯泰对他无抵抗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斯阶级争斗史中变态的产儿。这几个人，常常自命为‘万国政府所不容’，幸而资本主义底国家和政府存在，一般人因为正在起阶级仇视底思潮，不注意到这些少数变态的拆白党身上去，如果经济制度革了命，哪里有他们的立脚地！”

青年底误会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底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要鼓吹主义，他就迷信了主义底名词万能。你说要注重问题，他就想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你说要改造思想，他就说今后当注重哲学不要科学了。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他就不尊重职务观念，连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也要诅咒了。你说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底名义干与一切行政、司法事务。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底利器。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

年底进步还是退步呢?

反抗舆论的勇气

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

1921 年 6 月 1 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 署名:独秀

答皆平(广东——科学思想)

皆平先生:

广东在政治上有责任的人都注重教育,至少也不反对教育,社会上空气稍差一点,然尚未到绝望的地步。说到科学思想,实在是一件悲观的事,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试问人事物质而外,还有什么宇宙人生?听说朱谦之也颇力学,可惜头脑里为中国、印度的昏乱思想占领了,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他此时虽然出了家,而我敢说他出家不会长久。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不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亦终于造谣言说梦话而已。中国、印度古来诸大冥想家,谣言造了几千年,梦话说了几千年,他们告诉我们的宇宙人生底知识,比起近百余年的科学家来真是九牛之一毛,我们快醒了。此间编译局若成立,当然要注重科学书,但这还不是提倡科学的好法子,不但科学风尚未成,出书无人购阅,而书籍上的科学,还是文、哲学式的科学,去真

科学还差一点。我以为造成科学底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底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这四件都是我们在广东正在要做的事。匆匆不及详答，乞恕。

独秀

1921年6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

告 劳 动

劳动诸君,你们的困苦你们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说了。你们的困苦也决不是枝枝节节可以解决的,现在要紧要奉告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业之劳动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

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粮食是诸君种的,衣服是诸君缝的,房屋是诸君盖的,矿山是诸君开的,一切车船机器无一不是诸君造的,全世界的东西都由诸君做成,全世界的权柄都应该归诸君执掌,现在诸君却为什么还这样困苦呢?诸君知道诸君的困苦是从那里得来的吗?不用说了,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都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了,诸君要做工糊口,而没有土地机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气卖给资本家做他的雇工。资本家给雇工的工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因此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资本家私有的土地机器房屋等生产工具改归劳动界大家公有不可。这件事却不是少数劳动者可以办得到的,并且不是一些主张不同方法不同各个自由奋斗的散漫团体可以办得到的。必须各行业各地方之劳动者都觉悟到:各行业的雇主资本家是一个阶级,各行业被雇的劳动是一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资本家阶级组织了政府国会,有了这些权力,所以才能够压制劳动,所以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劳动向来没有组织,不能团成一个阶级,所以显不出你们的威力,所以才永远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各行业的劳动组织成一个阶级,决没有反抗组织强大的资本阶级的力量。没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具夺归劳动界公有。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

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国家政府国会，都是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组织的，与劳动平民没有关系，所以劳动平民的困苦，他们向来不闻不问。这也怪不得他们，只怪劳动自己没有阶级觉悟，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政府国会，来解决自己的困苦。减少工作时间自然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时间虽然减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繁重，仍和不曾减少时间一样。加增工钱自然也是劳动应该要求的，但物价跟着工价涨了起来，仍和不曾加增工钱一样。所以这等枝枝节节的要求，决不是免除劳动困苦之根本方法。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决不能解决劳动界困苦，劳动界决不可依赖他们，所可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

1921 年 6 月 7 日 《共产党》第五号 署名：TS

致易培基函[1]

寅生先生：

来电敬悉。白沙[2]先生日前到此，自述北游石家庄以至京师，比以此道不易行，仍经由石家庄以至汉口，复由汉口而上海而广州。谈时力言决计以戎杀贼，当时弟明知其所言难□，因其心意烦闷，不欲重违其旨，漫应之而已。次日往见中山先生，自陈欲往北京运动开国民大会倒徐[3]，中山先生因其体弱，亦劝其暂停广州著文，不必他往。与弟不见数日，即传其蹈海矣。寓中无长物，只衣数件，遗言赠之茶房；乘渡船赴海，临命时闻曾留下扇帽各一。省署派人寻觅遗骸，至今未获。弟所以尚未奉闻者，一因遗骸未获，二因此种惨痛之事，诚不忍使先生早知。今承电询，不敢隐矣。俟捞得遗骸时，再行奉闻。

弟　独秀记　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

---

① 此函所用之信笺印有“广州全省教育委员会用笺”字样。

② 编者注：易白沙（1886—1921），湖南长沙人。易培基的胞兄弟。1913年参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1915—1916年，在《青年》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反封建。曾任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21年投海死。

③ 徐世昌，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

随　感　录

卑之无甚高论

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

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不彻底，更要责备他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反背了。我独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他又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公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我也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

吴稚晖先生说：“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

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

我希望不愿意民族的自杀之人,勿闭起眼睛妄发不认事实自欺欺人的高论!

革命与制度

社会底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倘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是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若说制度总不是好东西,不如根本革了他的命;这种高论或者有人以为如此才算彻底,其实旧制度正可借这种高论苟延残喘;因为凡是一种制度,都有他所以成立的理由和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势力,非有一种新的制度经过人们努力建设,成了舆论,成了法律,在事实上有代替他的势力,他是不会见了高论便自然消灭的;所以不切于实际需要的高论往往可以做旧制度底护身符,这种高论只算是低论罢了。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只可以改造变形,要说人类可以绝对不要政治,这话此时还没有证据。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只可以改造,要说政治可以绝对不要政党,这话此时也还没有证据。无论是有产阶级的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

希望。

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有人说，在有产阶级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党，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无法改造的，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象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又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

罗素这两段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

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底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过渡与造桥

今人多言过渡时代，我以为这名词还不大妥，因为有个彼岸才用渡船渡过去，永续不断的宇宙人生，简直是看不见彼岸或竟实无彼岸的茫茫大海，我们生存在这大海中之一切努力，与其说是过渡，不如说是造桥。自古迄今人人不断的努力，都像是些工程师和小工在那里不断的造桥。这座桥虽然还没有完工的希望，或者永无完工的希望，但是从古到今已造成的部分却是可以行人，并非劳而无功。我们今后若是不想

双脚蹈海，若是还想在桥上行走，只有接续前人工程努力造桥，使这桥一天长似一天，行人一天方便一天；不但天天要把未造的延长，而且时时要把已造的修整，不可妄想一劳永逸，更不应因一时不见彼岸而灰心。或者可以说，这桥渐渐造的又长又阔，能容大家行车跑马，又架上楼阁亭台，这桥便是彼岸，此外更无所谓彼岸。

1921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答张崧年[①](中国改造)

申府先生：

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吴先生此话正和你的见解相同。

你说："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我想正当的爱国心(我近来以为爱国心当分正当、不正当二种，正当的若朝鲜之抗日本，爱尔兰之抗英伦，不正当的若日本英伦之侵略政策)便是这样发生的。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想不到你也看出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②]的程叙不可。其实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不是容易的事，我现在最可恶闭起眼睛说大话的人罗素对中国人临别赠语，开口便说中国人欠诚实，真是一针见血的逆耳忠言！关于欧洲近状，请月赐一信，在本志发表。

独秀

1921 年 7 月 1 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

① 原标题为《答张崧年》(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张崧年即张申府。

② 张崧年给独秀信中，有一段话："我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叙应是：革命。开明专制(美其名曰劳农专政——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

答朱谦之(开明专制)

谦之先生：

我见了你的来信，想不笑实在忍不住，若真笑出来也未免太刻薄了。

我请问你：主张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主张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为什么便算是人格破产？这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说理持论只应该指出是非真伪，为什么要顾忌到有没有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难道你是以有无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做真理之标准吗？你是相信虚无主义的人，又是出家归佛的人，为什么说出"在真理上永不两立"的话来？

独秀

1921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附：朱谦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你主张要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吗？你要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吗？果然，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再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我为拥护人们的自由起见，发誓与先生在真理上永不两立。特此预白。

朱谦之

讨论无政府主义[①]

答区声白的信[②]

声白先生：

在《群报》上看见你的来信，对于我的意见加以纠正，我很感谢。先生所见也有些和我不同的地方，兹条复如下：

（1）照先生的意见"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先生说"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种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若因为两派有重大的意见，并且由于两派的同意，退出一派，这种不幸的事，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或他种团体也是有的，

---

① 区声白对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曾三次致函陈独秀，申述无政府主义观点。陈独秀也三次复函答辩（均刊于《广东群报》，后汇集于《新青年》九卷四号）。这里仅收录陈独秀的三封答辩信。

② 原标题为《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

并不须到了无政府时代才有这种妙法；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产业界的好现象，偶一为之，已经不妙，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我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完全不适用于经济方面。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份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份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2）我所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的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得比较的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先生举出两个自由组织的例，一

个是救火，一个是五四运动①，实在是妙想天开了。

先生要晓得救火是一桩偶然突发的事，他的目的极其简单；五四运动是一时的群众运动；若是拿这两个方法用在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真是破产了。人间社会是何等复杂，其间感情利害目的是何等纷歧，至于生产事业上时间的适应及分业的错综更是何等麻烦，拿一时突发的状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处置，我以为是常识所不许。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

再进一步讨论，即以救火说，七手八脚的各人自由行动是否比有组织的救火会更为有效？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由此可见先生所引的自由联合的例，纯然是用在偶然突发的事件和政治问题之群众运动，尚且不尽是自由联合；何况是重组织尚秩序关系复杂的经济方面、生产事业上，自由和联合更是不相容的了。

先生说："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这几句话我十分赞成，我希望先生认清了这个观念，切勿贪图超越这个观念以上的空想。但先生要注意，先生主张对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扩

---

① 《区声白致陈独秀书》："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证，中国有一种旧习惯，每逢一地方遇了火警，各地方的居民都很踊跃同往救援，无论在冬天雪夜，一闻告警，即争先恐后，跑到患灾的地方。救灾的时候，无论怎么危险，亦没有畏避的，患灾者对于他们，亦没有什么酬报，社会亦没有替他铸铜像，大总统又没有给他一个嘉禾章，又没有下过一道命令各地方居民如不联合救火的就杀无赦，法律又没有规定不救火的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如果是邻近的，尤可说是恐怕连累，但是很多在城中由极东跑到极西的。因一处地方的灾难，各地方的居民竟能以一最短促的时间，自由联合起来，可见联合与自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而联合数万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不特是这样，能够以法律绳人、军队压人的北京政府，竟要屈服。于此更可证明法律之无用，军队之无能，而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

充至少数人甚至扩充至多数人！在先生仅仅是不承认他个人的自由，在他是个人受了多数人的压服了；先生若说因为他不顾社会的福利，他便说，自古受人压服的人都是被人说不顾社会福利呵！自古压服人的人都是说为了社会福利呵！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3) 先生说："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这句话我也十分赞成；不但无政府的社会，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是由社会上有选举权的人多数意思，决定几条必要的法律，好维持社会上公共的安宁秩序。先生的法律观念，是临时的一种公众意见，这就叫做"自然法"。按自然法多由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法却是万分危险。过于铜板铁铸的法律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律当然要修改，但不能拿这个做绝对废除法律的理由；至于先生所谓随时变更的公意，却实在不敢领教了。第一，我们实在没有这种预知的天才能够适合随时变更的公意而不违背；第二，随时变更的公意完全是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公意有时固然能为善，有时也能作恶；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像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的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先生还说是康庄大道，还说是除了盲目的人断不至撞得头破额裂，我们实在不敢附和。

再答区声白书[①]

声白先生：

前天在《群报》上看见你的答复；现在再略陈鄙意如下：

1. 先生不赞成个人绝对的自由，我很佩服你的见解比别的无政府党好得多(我在《广州晨报》上见过几篇文章，一面说他们是共产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他们曾反对过；一面却口口声声说："我们主张极端自由，不是多得少得"，"我们既赞成安那其，而要求绝对自由。")，但是先生所主张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之办法，我却有点怀疑：一、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途无路了！二、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先生说："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屏斥亦奚足惜。""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是自由的大敌。""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这些话我们都很以为然，因为若不共守信约屏斥一群之敌，便不能保这群底组织及利益。换一句话说，信约既定之后，我们便不能容认不顾公共利益的少数人有"主张极端自由"、"要求绝对自由"之余地了。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至于成立法律底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2. 天下事始而赞成继而反对始而愿意继而不愿意的情况很多，爱情

---

① 原标题为《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

的夫妇还有决裂离异的时候，何况别的事。先生说："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我便问你：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末，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3. 在这一段，先生和我的意见不甚相差，便不必讨论了。但先生要注意的，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4. 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自己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心看一下。

反乎自由的事三种：（甲）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像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这种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是不应该有的；（乙）为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丙）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我们所讨论的是（乙）（丙）两种，我在女子师范演说的是（甲）种，先生如何并为一谈呢？自由平等虽是好名词，但不可当做万应丸到处乱用呵！譬如资本家之自由也是先生所不承认的了。

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的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5. 法律底作用在消极的制止，我们未曾主张并且自古也少有订一条法律积极的要人做一件什么事。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底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

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可见一方面主张人人同意及自由，一方面又说主张大团结大联合，直是自欺欺人！

6. 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请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7. 契约是各团体一部分人的私约，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在社会学上，团体、群众、社会这三样大有分别，万万不可以混同。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法律的大作用只是保护社会公共的安宁利益及裁制侵犯他人法律上的自由。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借法律侵害善人，执法者不守法律，法律本身都不受过；凡是这等弊病，就是公约契约都不能免。因北京政府的法律之无价值，便可以推定现在及将来各国底法律都无价值吗？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便可以绝对废除吗？世界上凡不是万能的东西都应当绝对废除吗？无政府主义万能吗？科学万能吗？教育万能吗？世界上何物万能？

8. 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并不是古代或宗教时代特殊的现象。法人杀死柔勒及五四运动和宗教迷信有什么关系呢？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三答区声白书[①]

声白先生：

你在《民声》上答复我的话，越说越支离了，不能不再详明告诉你

---

① 原标题为《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书》。

一次。

1. 这段里面,有一句原文为“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群报》上脱了“普遍的”三字。我的意思是: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所办的教育即或假定是善良的,然要靠这一点星星之火,慢慢地达到你所说“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的状况,真是河清难俟了。

据你的话,可见善良教育未曾普遍以前,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很多很多,试问你如何处置他,这便未免是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大障碍了。如此看来,请你还是快去努力施行善良教育,且慢谈无政府主义。你说,“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份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你这种说话和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我们也相信教育的功效好过法律,我们且相信教育是改良社会底最后最好的工具,但不能迷信教育万能更不能妄说教育的力量还未灭尽恶人以前即可以教育代替法律,因为若有许多许多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不肯去受善良教育,请问你又如何办?我想你们无政府党又要说我:“是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他所预防的弊病——不可能的证据,完全是被现世的景象骇昏了所致。”这几句话正是你们无政府主义者致命的病根底病根所在。我只简单请问:你们所说进化的无政府社会,是用人力从这现世的万恶社会渐渐改造出来的,还是用符咒把现世的社会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崭新的无政府社会和现世的景象没有连续的关系呢?办教育不必倚靠政府,现时资本家私立学校都做得到,这并不待无政府党底指教。你所谓“人民的责任”,请问这人民若兼指资本阶级,他们的教育可会有真是善良的一日?这人民若单指无政府党社会党,善良的教育一时又

何能普遍？

2. 我问你在岭南的效果如何，不过希望你实地感觉“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不见得人人都肯听从，因此可以悟得有时不得不用势禁以济理喻之穷（能理喻自然更好），并不是劝你以武力强迫怒目相视对待岭南学生。岭南学生对于你诚恳的传播主义反对宗教等说话果有感情果然相信吗？这件事何、刘、陈诸君都知道，说谎话是最可耻的事呵！

3. 自狭义的契约说起来，和法律底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前函已说过，你何以未看清楚？但自广义说起来，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有人称法律是社会的契约（或称民约），前函所以说：“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可说：“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你所说的契约和法律底不同，更足证明法律底必要；因为若无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间契约底标准及监督，便必然会发生两个弊病：第一是没有监督无以制裁违背契约底责任者；第二是没有标准无以制裁侵害甲种人权利的乙种人底契约发生。救济这第二个弊病，正是近代发达的国家制定进化的统一的法律之大功，这种法律进化的大功在我们人类进化历史的过程上是断然不应该蔑视的。古代各部落各地方有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信仰习惯，遂有种种不同的法律，因此遂发生种种冲突种种战争，后来因为国家进化法律进化，这种部落的法律地方的法律含有地方性的国家法律渐渐消灭，国内的冲突战争也跟随着渐渐减少；所以近来颇有人主张建设统一世界的大国家，订立更进化的更统一的有强制力的国际法律（现有的国际法因为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设〔没〕有强制力，所以无效），好渐渐消灭国界消灭国际战争；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理想是进化的，而且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想不到你们竟然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竟然以为全国统一的法律不好，竟然主张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难怪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退化的学说，因为照他的主张实行起来，在经济上必然要回复到手工业时代，在政治上必然要回复到部落时代。即让一步，依你所说国家所订定违反各地方的习惯心理强制各地方一体遵守的统一法律不好，要依各地方的习惯心理自行订定自由契约才对；我们现在要研究

的，第一是这种地方自行订定的契约底性质，第二是他的效能。第一关于性质方面的研究：(一)请问你既然力说法律和契约不同，为什么称国家订定的是法律，各地方自行订定的是契约？(二)你若说有制裁力使人必须遵守的才是法律，我们真不明白任人不必遵守的契约是一种什么东西？(三)若说国家统一的法律是不能尽合各地方的习惯心理的，我请问，各地方内各村落各团体各个人间底习惯心理是否都是一样？(四)若以是否经过同意分别法律和契约底不同；代议制是你们不赞成的，那末，个人间团体间的契约还容易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若地方的契约(其实就是地方的法律)要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岂是容易的事？(五)即令可以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试问又如何经过定契约时还未曾出世之人的同意？(六)即说不避麻烦，凡在一个地方范围以内有一个新出世的人都要征求他的同意通过一次，那末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儿童如何征求他的同意？(七)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别的契约不用说，关于儿童直接身受的童儿规约，是否也和你所谓只有一方面创制权的法律相同？(八)若说契约底同意权应以相当的年龄为限，现象怪极了；因为你们主张对于未出世的人还不能剥夺他的同意权，试问为什么已出世的人反来要到相当年龄才有同意权，这种规定年龄的契约又是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呢？第二关于效能方面的研究：(一)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准许吸鸦片烟或赌博，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二)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拥戴出一个皇帝或选举出一个总统，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三)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有损于他地方他团体底利益或有害于他地方他团体，他地方他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照以上两层研究，在性质方面，你所说的地方的契约，实质上就是地方的法律，无论他是否好过你所谓全国死板板的法律，这是地方法和统一法良否比较的问题，不是根本上法律应否存在的问题，你拿他来否认法律，算是文不对题；在效能方面，正赖有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各地方契约底标准及监督，才可以维持各种契约底效能。你说立法权是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不在人民全体；请问瑞士及美国都有全民直

接投票的创制权，是否立法权都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请问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得人民全体底同意？代议制度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你何所证明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真是跟着一般浅见的人瞎说！不但没有可以容纳全世界人全国人全省人全城人开会的会场，就是全民投票也不是常常可以举行的事。全国交通开会议时，若全体人员到会，岂不因之交通断绝？又如你们若开全世界无政府党大会，果能全体党员列席吗？所以除了用代议制度没有办法。你有何种理由可以举出一个中国和日本底治安警察法，便全称肯定所有政府制定的法律都不是保护人民的？你说："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你主张全体同意竟极端到这样可笑，我且问你：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一一得到未出世人的同意，是否不许无政府制度先他而存在？你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答我，我便不能不可怜你脑筋坏了！

4. 你说，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当可绝迹。我说：这种人不绝迹如何能够到真正共产之世。我再正告你一次：共产之世仍旧是我们这万恶的私产之世渐渐改造出来的，并不是用符咒把这腐败的旧私产之世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新的共产之世与旧的私产之世没有连续的关系呵；你说：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了。我们不知道你所说对待资本家的手段是什么？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未免小题大做了；用刑法制裁他，你们是反对刑法的；没收他的财产，那时已无私产了；剥夺他的选举权，你们是反对代议制度的；用诚恳的态度劝告他，他是不听的；拉他到学校去受善良教育，他是不肯去的；送他去到远方，未免是以邻为壑；终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为恶而已。你所说的乃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以叫做一个社会，这是团体不是社会，你是学哲学的人，难道团体与社会还分不清楚吗？一个社会里可以包含许多团体许多机关，社会和单一的有界限的家庭学校工厂学会党派等团体不同，也正和单一的有界限的监狱等机关不同，所以不能退出。若但是退出这

个社会，跑到远方，远方那里也有社会；除非跑到空山无人的地方或是自杀，才算是退出了社会。

5. 你只看见第二十七条[①]自由自治等合味的名词，你可曾注意到第三条加入底限制及课各团体底义务？又可曾注意到第四条所说“本总联合会由一个国民委员会支配之”？又可曾注意到第五条所说：管理委员会是由国民委员会指命的，各团体间底冲突是由管理委员会裁判的？又可曾注意到第九条所说“国民委员会实行各国民大会底决议干涉关于劳动者阶级的一切问题，决议一般性质的一切问题”？这是不是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正因为他仅仅只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而犹迷信各团体底自由自治，未能完全权力集中，所以不适于革命。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6. 我原来知道你不是相信 Stirner 派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种思想仍旧建筑在个人的自由权上面，系〔像〕这样一面赞成社会的联合一面又主张个人的自由之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 Stirner 反社会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有了社会的组织，个人的自由便要减削，社会的组织越庞大越复杂，个人自由减削的分量越多。我原来知道你也不是相信 Toktoi 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象这样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 Toktoi 无抵抗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于少数压服多数的事；例如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的人，在一个社会里无论是多数或是少数，当然要抵抗资本阶级，当然要压服了少数或多数顽强拥护政府及私有制度的资本阶级，然后无政府共产社会才能够现实的。假定我如果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宁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而不相信克鲁泡特金；因为斯悌纳否认社会的组

① 指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条文。

织，在理论上才算得把个人自由底障碍根本除去了；托尔斯泰看穿了抵抗、强力、政府、国家、法律、军队，这些事是必然相因而至的东西，他又看穿了个人的自由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多过机械工业时代，大交通大工业越发达，法律的强制力之需要也跟着发达，个人的自由遂跟着减削，所以他极力反对工业交通等一切物质文明。这两人底学说思想是否向着人类历史进行的线路逆行，这是另一问题，可是他们的学说思想都是一贯的而不自相矛盾，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至于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的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矛盾的学说，不但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并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若真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劝你还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才对，因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只有求教于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及无抵抗主义；若离开了个人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那强力、政治、法律等，一切抑制个人或团体自由的事便必然不免，所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我所以说你若是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便是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粉碎。

7. 抵抗必须强力，只这一点已经使你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露出很大的破绽。你现在说抵抗和压服完全不同，并举朝鲜独立及夺回贼赃为例；请看朝鲜已经抵抗了日本几次，若不由抵抗达到压服日本的程度，日本如何肯让他独立？你若不能压服盗贼，那能夺回自己的东西？你既然不敢附和“以暴易〔暴〕的办法”，那末，将来推倒资本阶级以后，你们无政府党一定反对以资本阶级压服劳动的办法压服资本家了，难怪有人说无政府党是资本阶级底好朋友！

8. 我在女师底演说是：“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分明是指物质的生活上普通事项而言，前函已分析说明这是属于反乎自由的（甲）类，是指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像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并且珍重告诉你，现在讨论的是（乙）（丙）两种，女师底演说是（甲）种，言非一端，义各有

当,你如何仍旧并为一谈?政治上革命者压服顽固党,教育上教育者压服受教育者,和物质的生活上人人不应受无理的压迫,试问有何冲突?在一群之内,人人能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意见以就他人,那自然极好;我所问你的是:若在一群之内处于万万不宜分裂的境况,而少数的顽固党对于一个关系一群存亡的问题,坚不肯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私见以就他人,拉他去受善良教育,不但他不肯去,而且也来不及了,请问此时除了压服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你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上若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不能成功?又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革命后没有多数的顽固派?俄国底十月革命是不是少数人的运动?现在他革命以后,在国民全体上看起来,是不是顽固派仍居多数?我们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你想能否成功呢?你是否反对以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呢?

9. 你这一段话我大部分莫明其妙,所说的比方,我想多数读者也都莫明其妙。我并未曾说你说过惟资本家方能够联合,我只说:"倘然能够这样(即指资本家的产业联合而自由而人人同意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我曾问你: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你既然理屈词穷,最好是一字不答;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说出:"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这样可怜的含糊搪塞的话来,将我问的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人人同意及有无强制执行等话,一字未答;并且你自己硬说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你虽不敢再行讨论,我还是要再行讨论;我还是要严重的问你: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有须得人人同意的自由及无强制执行的自由?倘能够这样自由,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你讴歌崇拜了;倘不能够这样自由,这种联合而不自由的自由联合(近代资本主义之下,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投资、自由契约、自由联合,都是资本家底不法自由,资本家产业联合是自由的,联合起来办事的条规是

不能自由的)，在你引来证明你“自由之与联合绝对没有冲突”的主张上，试问有何意义？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用去劳力的最大部分是替资本家做工，不但可以解辞职务，就是怠工罢工都是合理的；在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完全是替社会和自己做工，不但无正当理由不应该自由退出，并且怠工罢工都应该受相当的制裁；你们倘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你们倘以为这样不自由的办法比现在雇佣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深，你们还是去跪在资本主义脚下享受那奴隶的自由罢！

10. 广州两个学生会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没有，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如是：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一切交通机关，如果都像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分裂之后不同意再分裂，分之又分至于个人而后止，如此小团结小联合都不成，大团结大联合更怎能够成立呢？即令广州两个学生会已经联合拢来了，这因为他是学生会还不碍事，倘若是生产机关或交通机关，那分裂到再联合起来期间的紊乱损失，谅无人能够否认。我们并非有意反对人人同意自由联合的理想，乃因为这理想在许多事实上分明是不可能的，为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计，不得不承认有强制那不合理的不同意部分服从那合理的部分之必要。这种情实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邻国及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远非一类，何得举以为喻？

11. 社会和团体不同，不是单一的，不是有界限的，不是有门可闭的，抬出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还是不曾离开我们的社会；若说送到远方，把这种(常不尽责任而且常侵犯他人自由的)人送到远方底社会，岂不是以邻为壑吗？

12. 个人与个人间的契约，尚可望拿道德名誉信用来维持，有许多人不顾名誉道德信用，还是有法律制裁的必要；至于各团体间及个人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这便复杂了，便非道德名誉信用所可维持的了。找第三者排解，这本是现在的社会中常有的事，正为有恃强欺弱的人不容排解，所以才有法律制裁的必要。照你说：“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像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那末，你虽反对法律的制裁，却很赞成武力的制裁了；因为协约国若不用武力，如何能干涉德国？你说：“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

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我对你这段话有三个疑问：(1)协约国果然未曾压服那一国吗？(2)协约国之上倘然有一个中央统治机关——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机关，国际的强弱吞噬纷争岂不可以减少一点吗？(3)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果然也和协约国一样吗？将来政治上的自由联合，你举协约国为榜样；将来经济上的自由联合，你引克鲁泡特金所举欧美资本家的共同企业为榜样；恐怕有人听了你这些说话，会以为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已经在欧美各国实现出来了。

13. 可以利用群众心理的一二人，乃是置身群众之外，有自动的意识来利用群众之野心家；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中，个人的意识为群众心理所压迫，往往失了理性，被动的无意识的随着群众走，所以不能利用群众；请问这有何矛盾？我们始终所讨论的，是法律可不可以绝对废除的问题，不是法律有没有万能的问题，这一层你要弄清楚。固定的事，自由契约的力量能维持，那自然无问题；现在的问题，乃是自由契约的力量不能维持时如何办？我对于绝对废除法律的疑问就在这一点。一时的事，或为法律条文未备的，或法律条文已与现社会生活状况不相应而一时未及修改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就公众意见来解决的先例。但这种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以轻用，其理由有三：(一)是因为公众究竟是什么？有何标准范围？(二)是因为所谓公众的意见，是否野心家在那里利用群众心理？(三)是因为多数知识浅的人所发真的公众意见，是否合乎其是非也是一个问题。拿这种惝恍迷离不负责任的公众意见偶然来补助法律，已经是非常的革命的现象了，倘拿他来代替有固定性的比较可信的法律，真是大错而特错。天下事虽是千变万化，法律也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定法律的人虽没有预想的天才，但他也不能禁止后人以相当的手续加以修改的。未经相当的手续修改以前，法律自然是应该死板板的不能更改，这种死板板的因〔固〕定性正是法律的好处；倘毫无固定性，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所谓人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多少人，如此野心家烂仔都可随时以人民的名义修改于自己不便的法律，无政府党主张以公众的意见代替法律之大缺点正在此处，你如何反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最定〔完〕美的地方。

*　　*　　*

在以上讨论的范围以外，有二点不得不附告读者：

（一）声白虽相信无政府主义，却也极力赞成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行动；现在和我讨论的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若劳农俄国现行制度，他也认为革命时代过渡时代之自然现象，并不加以非难。（二）声白底思想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什么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一概反对；他的行为算得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绝不像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我很为中国无政府党可惜少有声白这样的人！

1921年8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答何谦生(同善社)

何先生：

我在北京时就听得同善社有许多妖邪举动，后来更知道长江一带信奉邪说的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是广东现在也不少了。主持其事的人无一不是有形无形的辫子朋友，信奉邪说的大都是政界军界极腐败不堪的分子，劳动界学生界信奉邪说的都极少或竟即于无。这种邪说较之灵学会野心更大，简直是白莲教、义和拳底后身，且含有复辟作用，只有用刑法来裁制，那里够得上加以学理的批评。

独秀

1921年8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①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②，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

---

① 1921年8月17日，陈独秀电陈炯明辞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9月9日，教育委员会职员特开祖饯大会欢送(1921年9月10日《广东群报》)。陈独秀抵沪时间，约9月中旬。本文末的"八月一日"是该号《新青年》所标的出版时间。但并非实际出版日期。

②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给陈独秀信中说："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持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持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

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过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秀

1981年8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致 胡 适

适之兄：

皖事已有变化，我们在上海的同乡主张专力在教育上用功夫。首先注意的就是教育厅长问题，省城方面，已有可与接洽机会。教育部方面，我们当可建议。上海同乡都希望吾兄到皖担任此职。弟意吾兄下年倘决计不在北大，到安徽去办教育，也倒很好。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和他项官吏不同，但能做事，似不必避此形式。吾兄万一不能去，我们便想请任叔永兄担任。闻叔永兄已任教部秘书，出为厅长，较秘书更有权可以办事。吾兄倘以为然，便请你写信和他商量一下，得他同意，我们便可令京沪二处皖事改进会同人，分向京皖当局建议。望即赐复。

弟独秀（一九二一年）　八月廿七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

我们社会主义者，往往不甚觉察列强对于被掠夺的各地之苛酷，常一再加以压迫而不休，其实若谓'非列强'的民族之独立，全靠列强间不和而保存，良非过言。华盛顿会议底危机，即列强间苟能妥协，则中国或将被列强分割而压迫，或不被分割而受列强共同的压迫。诚然中国代表亦将列席于华盛顿会议，但在巴黎和会，中国未尝无代表，其结果曾何益于中国？中国不签约曾何补于他土地底丧失？

罗素先生对英国 Labour Leader 记者说的几句话，竟然唤不醒我们中国人底迷梦，实在可怜极了！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级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有两个唤不醒的迷梦：(一)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二)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倘列强不能妥协，冲突起来，限制军备案不能成立，太平洋诸问题不得解决，不但是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底不幸，简直是世界和平底不幸。

在这资本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那一个不是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除非列强他们自己抛弃殖民政策，毁坏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如何能够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小民族，所以我们中国人第一个迷梦，可以说是"与虎谋皮"了。至于第二个梦，那太平洋会议底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因为列强间若是自起冲突，相互破坏个干净，这时候太平洋沿岸被他们压迫的弱小民族才有解放之一日；若是他们互相妥协了，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如中国人、朝鲜人、西伯里亚人，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从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运命。

所以太平洋会议列强若是冲突而破裂，正是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幸事，如何反说是不幸呢？中国人这种观察完全错误，我所以说那太平洋会议底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

若有人不相信我的说话，检查一下太平洋会议底来原及召集会议底最近动机，便明白这会议底性质了。

此次太平洋会议远的来源就是英日同盟，这英日同盟底作用，其初乃是英日合力排除俄国在华底势力；其后乃是英日合力排除德国在华底势力。在日俄战争以前，中国北方在俄国掌握之中，南方在英国势力之下，日本初兴想来中国得好处，必须北破俄或南破英，否则不能插足，在日本当日联俄破英图中国南部，或联英破俄图中国北部，本无成见，和英国商议盟约同时也有密使在俄谈判，只因英国外交手腕敏捷些，英日同盟成立，俄国便败于日本；倘当日俄日同盟成立，形势便和现状不同了。日俄战后，日本乃代替俄国底地位，和英国一北一南半分了中国。这时新兴的德国忽来插足山东，北日南英都同时戒严，英日都要巩固他们在华的势力，所以不得不续盟。现在俄德虽然没有力量损害英日在华的权利，然英国仍然依赖日本帮他压迫印度，日本也要依赖英国帮他抵制美国，所以第三次盟约本年虽要满期，英日都还有续盟的必要；但是美国、坎拿大、澳洲都极力反对英日续盟，英国此时固然不愿意开罪美国，至于坎拿大和澳洲底反对更足制英国底死命，英国处在两难，因此只有希望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解决之一法，所以太平洋会议有表面上虽由美国发起，内幕中实为英国主动之说，总之英日同盟确为太平洋会议一主要的原因。这种英日分赃的同盟，在几次盟约上不啻将他们压迫弱小民族的野心和盘托出：这同盟起源于英日合力排除俄德，垄断在华的权利，所以盟约第一条即珍重声明两缔约国之特别利益，即大不列颠国在中国之利益及日本在中国所有利益，这是不用说的了；其第二次盟约即将第一次盟约中维持韩国独立字样删除了，同时加入印度问题，开口即珍重声明该同盟以“保持两缔盟国在东亚及印度地域之领土权，并防护两缔盟国在该地域特殊利益等为目的”，第三条英国明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第四条日本明白承认英国在印度的权利；这种分赃的盟约是何等明目张胆！

以明目张胆的分赃同监〔盟〕为主要原因底太平洋会议，于太平洋弱小民族是幸事还是不幸呢？

太平洋会议底最近动机，虽由美国上议院议员 Borah 及众议院议员 Portes 先后提议，然所以能够成立此会议底原因如下：

(a) 英日续盟与否急待解决；

(b) 日美在中国在西伯利亚在前属德国底太平洋殖民地种种利害冲突；

(c) 美日海军竞争甚剧，有酿成第二次大战的趋势，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唯一的恐怖；

(d) 美国急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就是他的武器。

试看上列的原因，那一样是关于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利益呢？

美总统所发华盛顿会议之通牒，不是明说为了军备限制问题和讨论远东问题吗？

他们所谓军备限制问题，乃是图列强间均衡的限制，免得列强间相互竞争扩充，酿成列强间自身的不幸；并不是相约平均废除军备即废除压迫掠夺弱小民族底武器。因为列强底军备或是依现状加以限制，即或照现状缩减一半，拿这军备来压迫掠夺弱小民族也十足够用。所以野心勃勃的列强间，能否实行限制军备，固然是个大大的疑问；即或能实行限制，也只是列强间自身的利益，和被压迫被掠夺的弱小民族毫无关系。

至于所谓讨论远东问题，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而战争与弱小民族以自然解放的机会；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生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及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解放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呵！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我们揣测此次太平洋会议底结果不出三途：一是列强间利害不一致，尤其是限制军备问题互相猜疑，然又互相回避不肯决裂，至于无结果而散；一是列强间分赃不匀，势非武力不能解决，则此次会议即第二次大战底序幕，这是列强间底不幸，却是弱小民族大大的幸事；一是弱

小民族大大的不幸，就是列强间在此次在会议席上或秘密谈判中，分赃均匀，互相妥协，英日同盟扩充为英日美同盟，或更扩充为英日美法（英国战后虽嫉妒法国，但在中欧局势上又不能不利用法国防御俄德，因此法国虽与远东问题无关或者也要拉入）四国同盟。可怜被压迫掠夺在此同盟势力之下的弱小民族，在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成功以前，决没有一日能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铁蹄和算盘蹂躏的。

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1921年9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陈独秀启事[①]

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语，居然传诸报章，我此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传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此布。

1921 年 10 月 22 日 《民国日报》

① 本启事自 1921 年 10 月 22 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刊载三天。

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①]

张溥泉先生在广东某工会演说，大意是说工人运动应该以“诚实”为第一要义，这句话从表面上看起来很浅，里面的意味却很深长呵。广东底工人还算诚实，溥泉先生这句话对于上海底工会或者更是唯一的良药。

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工人之多，比起英、美、德各国工业大都会来也不算弱，俄、法更不待言了。然而工人团体底内容和组织怎样，我实在不敢说而且不忍说轻薄话开罪于工界朋友。至于现在发起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却令我不能不竭诚欢迎。

鄙人欢迎此代表团之点有三：第一，欢迎他们定名上海各业工会，不假冒全国、全省等名义，不愧“诚实”二字。第二，欢迎他们限定各业工会，大概无业游民所组织的招牌工会不便加入了。第三，欢迎他们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这一点更足表明他们诚实不肯欺人的道德。鄙人因此脱帽高呼：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

1921年11月7日 《民国日报》 署名：只眼

① 1921年8月中旬，中共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积极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并试图与上海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五大招牌工会联合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因招牌工会拒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而未能实现联合。

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

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觉悟，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对于他们的章程发生异议的是劳动联合会等，老实说，这些团体和各业工会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照章他们不能加入，他们发生异议也是人情之常。我们最不解的是：(一)劳动联合会等说，代表团的名称及章程与组织之初衷及上海之现状不符；他们的初衷不知是什么？不知代表团章程与上海现状不符的在那一条？(二)协进会代表何以竟令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退出团体？上海真正的工人呵！你们第一次见排于商教联席会议，“不许加入”；第二次又见排于全国工界协进会，“请即退出”了；你们真正的工人还不赶快团结起来和冒充工人反对工人的奋斗吗？前次国是会议不许工人加入，有人以为不平；我以为因此促起劳动界阶级的觉悟，正是一桩幸事。这此〔些〕机器工会等退出十团体联席会议，有人以为不幸；我以为因此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的工会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这两桩幸事都是上海工人运动日趋进步的现象，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都有记载的价值，鄙人因此第二次脱帽高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万万岁！

1921 年 11 月 15 日 《民国日报》 署名：只眼

工人与军人

从前军界本有“点名发饷”的规矩，现在可就不行了；现在号称一军一师的，其实多的不过数千人，少的甚至于数十数百人也称军称师，他们这样虚张声势，不外多得军饷及把持位置两个目的，可是中国底军政正因此闹糟了。

令人失望的中国军人已经糟到不可救药了，令人很有希望的中国工人怎样呢？现在上海有许多工会也是虚张声势的挂起中华中国全国总工会、联合会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实他们底内容不但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内中还有一个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你说可笑不可笑。军人虚张声势可以多得军饷、把持位置，工会虚张声势做什么？乃因为这班办工会的人本来在社会上还够不上绅士的资格，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所以工会的名义越大越阔越好；而且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比从前捐监生捐蓝翎五品衔还便宜多了。可是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工人底名誉闹糟了。工人、军人都是国家重要分子，现在都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希望有好的军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军队、工会为国人所厌弃，这才是国家底幸事呵！

1921年11月18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只眼

名　实

名实不符，也是中国社会紊乱不能进步的一个大原因。现在上海有正在分途组织的两个工团：一个称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是上海机器工会、上海电器工会、上海纺织工会、上海印刷工会、浦东烟草工会等组织的；一称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是中华劳动联合会、洗衣同业工会、中华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会、中华印刷联合会等组织的。这两个团体底内容姑且不提，单就名义上讨论，我们对于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在逻辑上有三个疑问：(一)他们分子六分之四都挂起中华全国的招牌，在名称上上海这个区域范围底问题如何解释？(二)六个团体中只有五个工会，五个工会中有三个没有标明行业，在名称上“各业”二字作何解释？(三)既称总联合会，上海各业工团是否都包含在内？他们倘不能明白解答三个疑问，我希望他们应该修改名称，免得名实不符，日后打起电报来要惹那两教联席会议的赵先生冷笑咧。

1921年11月19日　《民国日报》　署名：只眼



致罗章龙信

编者按：据罗章龙说：陇海铁路大罢工胜利结束[①]。过了些时，中央及国际代表先后派专人来考察此次罢工详细经过，并带有总书记陈独秀写给我的亲笔信，信中云：

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②]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之所及，作君后盾。

1921年12月初[③]

罗章龙：《椿园载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

① 1921年11月20日午后，陇海铁路线上的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铁路工人罢工开始。同年同月26日签订了复工条件，罢工胜利结束。——编者注

② 大汉即李震瀛。——原注

③ 据罢工胜利结束之日估计。——编者注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同人公鉴：

中央局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

（一）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 S. Chen①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① 陈独秀的英文签名。

《西游记》新叙

“……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这就是《西游记》作者之旨。这种南北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我们是无所取的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西游记》，那描写人情本非作者之意，固不当和《水浒传》、《金瓶梅》及《红楼梦》相提并论，即述妖状怪，亦欠深刻。

我们所取于《西游记》的是什么？

元、明间国语文蔚然大起，《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都是这时代底代表著作，在研究这时代底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独秀叙于上海。

《西游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年)

挽朱执信联[①]

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
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

2003年10月安徽教育出版社 《陈独秀诗存》 署名：独秀

①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祖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长期追随孙中山，为辛亥革命名流。1920年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1921年在朱执信遇难一周年纪念会上，陈独秀送上这幅挽联。

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指资本阶级)一手把持；国家底行政机关，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底一个委员会罢了。"

历来各国底行政机关都早已把马克思这段理论证实了，由眼前中国的几件事看起来，尤其使我们相信马克思底说话千真万真。这几件事是什么？

(一) 是香港水手罢工的事，香港政府不能始终居于调停地位，竟将海员工会封禁了；

(二) 是湖南赵总司令承华实公司意旨，杀害了劳工会职员黄爱、庞人铨。

……

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付这班资本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从马克思底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呵！"

1922 年 2 月 9 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只眼

“宁 波 水 手”

这次香港海员罢工，所以引起我们十分注意，有两层重大的意义：(一)是劳动界阶级的觉悟。香港海员罢工，何以长辛店、武汉的铁路工人都起来援助，这是因为他们觉悟到无论是路工是海员，无论在广东在他省，都同属一个劳动阶级，都应该互相援助，这就叫做劳动界阶级的觉悟。(二)是劳动界民族的感情。劳动者只有阶级无国界民族界，这本是团结世界劳动者为一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对抗的意思，并非说劳动者对于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应该分别国界民族界。这次香港海员罢工事件，船东方面，英日等外国船居十分之八，所以劳动界阶级的觉悟之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斐律宾的水手究竟工价贵而且在中国沿岸语言不通，资本家终不能长久利用，所以这次香港海员最大的危机，只有一班无阶级觉悟无民族感情的宁波水手贪利被雇到香港代替那罢工的广东水手。宁波水手诸君呵！你们都是水手都是中国人，万万不可学桂阿茂贪小利去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呀！

从前为了四明公所事件，你们是何等齐心何等名誉，现在的香港海员罢工团体，若因为你们破坏了，那时“宁波水手”四字，便成了破坏团体的恶名词了。

1922年2月10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只眼

平 民 教 育

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所以连贵族的教育我也不反对，而况且在教育极幼稚的中国。话虽如此说，而我们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的到平民的趋势。在工业未发达的社会里希望教育发达，自然是妄想；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但是在工业幼稚的资本制度之下能有少数的学校倾向平民主义，却也未尝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我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像是原料不是制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最盛的地方，教育也相当的发达起来了，但所有的男女教育是不是制造商品，却待大家扪心自思，我也不忍妄说，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

《独秀文存》卷一

基督教与基督教会

我们批评基督教，应该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两面观察。

基督教教义自然不是短篇文章所可说得详尽，但是他教义中最简单最容易说明的缺点就是上帝全能与上帝全善说矛盾不能两立。依我们的日常所见的恶事和圣书中所称的恶魔和耶稣代人类所赎的罪恶，这万恶的世界是谁创造出来的？人类无罪，罪在创造者；由此可以看出上帝不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我们终不能相信全善而又全能的上帝无端造出这样万恶的世界来。此外耶稣一生的历史像降生、奇迹、复活等事，都没有历史和科学的证据使我们真实相信，这也是教义上小小的缺点。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在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点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

在现在人智发达的社会里，一切古代人智蒙昧社会所遗传的宗教教义底缺点自然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必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缺点特别攻击；至于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

异教审判所（Inquisition）之暴烈的压迫人们思想自由，我们是忘不了的；在“信礼”Auto-da-fe 美名之下所烧杀的男女，我们是忘不了的（托尔克马达做异教审判所所长时，仅西班牙被烧杀的异教徒有八千人，财产被收没的九万人，荷兰加耳五世时，被杀者五万人，前后遭教会之嫉恶而牺牲的人在一千万以上）；修道院利用“隐匿权”Droit de refuge 为种种罪恶之巢窟，我们是忘不了的；西班牙官吏阿拉委大因信奉哥白尼学说收没财产禁锢修道院八年的事，我们是忘不了的；教皇仇视人身解剖学及教会指韦萨留斯（著有《人身构造论》，集人身解剖学之大成）为恶魔宣告死刑的事，我们是忘不了的。像此等压迫思想自由、压迫科学的事，细举起来，一大本

书也载不了，这都是基督教教会过去的罪恶。

现在怎么样呢？大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本国的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德国宣教师在胶州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我给你圣经，你给我利权"这句话，真形容得他们惟妙惟肖；无数的宣教师都是不生产的游民，反要劝说生产劳动者服从资本家；无一国的教会不是日日向资本家摇尾乞怜，没有财产的新教教会更甚；我们眼见青年会在中国恭维权贵交欢财主猎人敛钱种种卑劣举动，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当对他们痛哭；无论新旧教会都以势力金钱号召，所以中国的教徒最大多数是"吃教"的人；教会在中国所设学校无不重他们本国语言文字而轻科学，广东某教会学校还有以介绍女生来劝诱学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关系（而且是重婚）诱惑某教育家入教的，势力金钱之外，还要用美人计来弘教，是何等下流！

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且战慄，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

我始终总觉得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当分别观察，但是我的朋友戴季陶先生，他坚说基督教教会之外没有基督教，不知道教会中人对此两说作何感想？

1922 年 3 月 15 日 《先驱》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广东工人与上海工人的比较[①]

——在上海纺织工会浦东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

……上海底工厂比广东多，工人也比广东多，工会却比广东少。广东已有七十多个工会，都是真正工人所组织的；上海只有四十多个工会，而且“招牌工会”占了三分之二。广东底工人，已有二十分之十二入了工会；上海底工人，入工会的还不到四十分之十。上海工人比广东多，为什么上海底工会反不及广东发达呢？这因为广东工人对于工会都很热心；上海工人对于工会都很冷淡。广东如：建筑工会、机器工会、道路工会等，都很有势力，新近有海员工会、印刷工会，团体很坚固。现在广东底工人教育也发达起来了，工人学校已有数十处之多。虽说两个地方的政治权力有保护劳工与压制劳工之分；但无论如何，工人们总要自己去做的呀！……

1922年3月21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陈独秀（鼎元记录）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为三月十九日演说的一部分。文中删节号是原有的。

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象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日

1922 年 4 月 7 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附：周作人致陈独秀

仲甫先生：

我们宣言的正当，得先生来书面益证实，因为“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而且我们宣言也原是“私人的言论”，当然没有特别不准发表之理。我们宣言的动因，已在北京报上申明，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这个似乎杞忧的恐慌，不幸因了近日攻击我们的文章以及先生来书而竟证实了；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

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豫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我们以少数之少数而想反抗大多数，一定要被压迫而失败，原是预先知道的；因为世上是强者的世界，而多数实是强者，我们少数的人当然是弱者，所以应当失败。先生的“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一句话，倒还应该是我们对先生及其他谩骂我们的诸位说的。（下略）

4月6日　周作人

《晨报》1922年4月11日

附注：这私人的信我本来不想发表的，但是仲甫先生自己愿意公布，所以现在一并发表了。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

——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

吴廷康①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

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① 即维经斯基。

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纪念[1]

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的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趋使，居然胡胡涂涂，做到现在的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当日社中朝夕晤谈的好友，章谷士、曹复生，可怜如今都没有了！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惟彼此未曾做十分无人格的事，还可以对得起死友。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书此以志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纪念。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1983 年版)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1922 年是芜湖科学图书社创设二十周年，印行了一本精装的《廿周纪念册》。陈独秀、胡适、陶行知等都为这本纪念册撰写了文章。

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

——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演讲①

今天要贡献诸位的，不过把我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告诉大家。在座诸位都是学生，并且有许多女同学在里面，所以就把"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说说：

我国的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只有少数人可以受得到，一大部人简直得不到一些好处；就是国立的学校，也是如此。试想办学校的经费不是国民公共担任的吗？为什么要给少数人独占利益呢？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况且这种贵族教育，在从前看起来，确是没有什么希罕，到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行了；那是大家所知道的，所以引起一班人要高高唱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不但高唱，而且有一班人竟实施了。这种果然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不过据我个人想起来，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以下，一定办不出好的成绩来，他们底希望竟可以说是梦想。像江苏、直隶、广东、湖南几省，现在都已积极的试办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他们底计划，以为在六年或八年的期限里可以收效；可是筹备的经费，仅足供给教员的薪水和学校设备上的用途，却顾不到学生的伙食和杂费，那贫苦的人还是不能去受教育。况且这班劳动者，因为受经济压迫，每天不能不做十二或十四点钟的工作，试想他们还有什么时间去受教育呢？因此任你学校办的多，要是国民没有宽裕的经济，绝对收不到普及教育的效果。

所以要普及教育，先要设法减少劳动者工作的时间，使他们也有读书的机会；还要国家能担任各个人受义务教育的一切经费——连伙食也在里面——像现在待遇师范生的办法，才可以做得到。但是在现在

① 演讲时间为1922年4月12日。

这种经济制度之下，这是不可能的事实，所以要普及教育，唯有盼望社会主义的实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主张经济平均分配的，并且无论什么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事业，都握在国家手里，不许国民私有，那时国家自然有很大的力量，使个个人受教育了。照现在看起来，有钱的可以进学校，再有钱的可以进中等学校，再有钱的可以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做博士，受人家尊敬；没钱的呢？自然进不得学校，或者连饭也没有吃，看来好像都是愚蠢的人。所以现在国民的知识程度和学问的好坏，全看财产的多少为比例，可怜一班穷人中间，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正是贫富的分别，不是智愚的分别呀。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行以后，一般人都受得到教育，那时才可以断定智愚的程度。这是在普及教育一方面讲，是切望社会主义的实行。

再次，要讲妇女问题。妇女的地位总较男子要差一些，这在西洋各国也是如此，不过在我国更差一些罢了。究竟妇女的地位为什么要比男子低呢？大概是因为知识浅薄，经济不独立二个原因。但是知识的浅薄，也因经济不独立的缘故，试看社会上的习惯，总是只要儿子受教育，不大要女子受教育；即使要女子受教育，也必定较儿子少一些。儿子和女子不能受相当的教育，都因财产的承继权专属于儿子的缘故，所以儿子的教育费就像应得的，女子要想分沾一些，已是不正当的行为了；因此知识差，地位也差了。女子从初生，直到做人母亲，总没有握着财产权的时候，因为无论在法律、道德、伦理各方面讲，都是不允许的。所谓"三从"，在从父、从夫的时候，果然不要说起，就是夫死以后，财产权也要归儿子掌握，到法庭上控诉起来，也要用儿子的名字出面。因为伊们没有财产权的掌握，连带伊们的地位都降低了，这样讲来，要妇女得着和男子相等的地位，不能不使伊们有使用财产的自由权；要使伊们有使用财产的自由权，除了实行社会主义以外，没有旁的希望。因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国有的，也是平均分配的，到那时妇女自然也可以受平等教育，不受经济的约束，也不怕地位的降低了。照现在说起来，很有几个自觉的女子，知道经济不独立的缺点，要带累自己的人格，很想脱离家庭，或脱离丈夫而自立。这果然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总不是彻底的办法。因为女子脱离了家庭或丈夫以后，伊们哪里能经济独

立，受教育呢？女子受〔要〕经济独立，除非作工。但我们要知道，现在不是独立生产时代，像从前的人有斧就好作工，有锄就好种田的情形，是共同生产时代了；不是家庭工业，是工场工业了；不是手工工业，是机器工业了。那么，要去作工，逃不了要受资本家的压制。正是脱了家庭的奴隶，去做资本家的奴隶，合来有什么出入呢？所以说，要解决妇女问题，也要靠社会主义的实行。

今天讲的就是这二个问题，据我个人想来，都是和社会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旁的没有什么可以贡献。请诸位把我所讲的话，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普及教育和妇女问题，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去解决以外，可有更好的方法？假使有的，那么再好没有了。请诸位抱着学者的态度，仔细思考一下，不要一味的盲从才好。

1922年4月23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陈独秀（沈秉廉记录）

再致周作人先生信

启明先生：

接来示，使我们更不明白你们反对非基督教的行动是何种心事。反对非基督教的动因乃在宗教问题以外，真令人觉得奇异了。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末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像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先生们现在果主张基督教、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思想都有不许人反对之自由吗？若是反对他，都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吗？都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吗？先生们反对我们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算不算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算不算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呢？先生又说我们是多数强者压迫少数弱者，原来合乎真理与否，很难拿强弱多少数为标准，即以此为标准，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这笔账恐怕先生们还未清算。因此我现在仍然要劝告先生们——我平生最敬爱的朋友：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十一日

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马克思学说[①]

(一) 剩余价值

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斯密亚丹代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一样，在这一点无论赞成马克思或是反对者都应该一致承认。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复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斯密亚丹也曾说过："在土地未私有资本未集聚的最初状态，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全属劳动者自己所有。"(见《原富》一卷六六页)又说："劳动者自己享有全部生产品的最初状态，土地私有资本集聚之后便不行了。"(见《原富》一卷六四页)这两段明明说因为土地和资本私有底缘故，劳动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产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归了何人呢？照马克思底学说，这就叫做剩余价值，是归了资本家底荷包，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底剩余价值，做为他私有的资本，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话虽这样简单，但是要真实明白剩余价值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实现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烦难的事，现在不得不略略说明一下。

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斯密亚丹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

---

① 本篇是在吴淞中国公学的演说辞。演说时间为1922年4月23日。

(Natural Price)、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底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劳动所作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底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底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二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马克思的价值及劳动价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说，以下再说剩余价值是什么。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的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的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说详细一点，当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

剩余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这个意思十分重要，我们也千万不可弄错。此话怎讲？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虽然要在流通

过程中才能够实际归到资本家底荷包，但是夺取底方法和剩余价值底本质，都不是指流通过程中一件一件生产品的卖价，乃是指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做“剩余劳动”的价值。“剩余劳动”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近代利用机器，制造业底规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产品比机器的生产品货色不好价钱又贵，因此手工业一天衰败似一天。于是由手工工业时代变了机器工业时代，由家庭工业时代变了工厂工业时代，由独立生产时代变了共同生产时代，这就叫作“产业革命”。自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矿山、房屋、机器、原料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将自身底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费用。资本家给他们多少生活费用（即工钱）呢？照马克思的价值公例，一切商品之价值常与制造此商品时所费的劳力相等，劳力（也是一种商品）之价值（即工钱）也常与培养这劳力所需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作“剩余劳动”；生产品之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者做出来的，而劳动者所得只一部分与六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工钱，其余一部分由六小时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作“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和分配的呢？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产出一定价值的货物，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底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譬如一资本家费价值五成的劳动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这时剩余价值五成固然已经由剩余劳动五成在生产过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将棉纱卖给消费者，将价值十成的货物变成价格十成的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那时五成剩余价值才算实现了。这是因为生产者不能将货物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中间必须经过贩卖者之手，贩卖者须得一定资本及劳力之报酬，于是生产者不得不在价值以下的价格卖出他的货物。譬如用价值五成工

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因为贩卖者之报酬，价值十成的棉纱至多只能卖得价格八成的货币，因此五成剩余价值中，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余二成是归了贩卖棉纱的资本家；制造棉纱的资本家若是向他资本家借过资本，便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他资本家的利息；纱厂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地租。剩余价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种资本家分配所余才是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实际得着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

资本家底资本是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变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之价值变成的；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加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出产能力越提高，剩余劳动也越加多。所以资本家想扩张剩余价值，天天在那里提高出产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对增加工钱反对减少工作时间，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这就叫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营业底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底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加上交通机关一天便利过一天，殖民地新市场一天扩大过一天，精巧的机器一天增多过一天，大银行大公司便一天发达过一天，从前的小工业都跟随着这些制度之发展，逐渐被大工业吸收了压倒了。这种吸收压倒底结果，便是把全社会的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叫作“资本集中”。在从前小工业时代，资本不集中，因此产业不能发达，所以资本集中使生产能力增加产业规模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好过以前的生产方法只在这一点。但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会的财产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便自然发生以下各项结果：(一)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生产能力增加而无产佣工的购买能力不能随之增加，因以造成“生产过剩”的结果，生产过剩又必然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和“工人失业”两种结果。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

像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作"唯物的历史观察"。

（二）唯 物 史 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明过这项道理。综合上列三书中所说明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

其一　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　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涵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马克思底好友恩格斯曾述说马克思的意见道："在历史各时代，必然有他的生产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这种特殊方法造出一种社会制度，那时代的政治和文明之历史，都建设在那个基础上面，依据那个基础说明。所以人类全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即是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对抗的历史。这些阶级争斗的历史相连相续，构成社会进化之阶级，到了现在又达到一种新阶级，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即无产劳动者）要脱离掠夺压制阶级（即绅士、〔军〕阀、资本家）的权力，将自己解放出来；同时还要将一切掠夺压制和阶级差别、阶级争斗完全铲除，永远把社会全体解放出来。"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打成一片了。

（三）阶 级 争 斗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因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其中要义有二：

（一）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例如在古代有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这些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自来都是站在反对的地位，不断的明争暗

斗。封建废了，又发生了近代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新的对抗，新的争斗。

（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例如欧洲在封建时代的工业组织之下，生产事业是由同行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发见了印度、中国等市场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时候，便不能应付新市场需要底增加了，于是手工工场组织应运而生，各业行东遂被工场制造家所挤倒，接着市场日渐扩大，需要日渐增加，交通机关和交换方法都日渐发展。这时手工工场组织也不能应付了，于是又有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成产业革命，从此手工工业又被大规模的近代产业所挤倒，近代的有产阶级便是这样成立的。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的市场，有了这些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都跟着发达，这些发达又转而促进产业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这样发达，有产阶级也跟着照样发达，资本越加多，产业越扩大，将中世纪留下的一切阶级都尽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产阶级乃是长期发达和生产及交换方法迭次革命底结果。由此可知做有产阶级基础的生产和交换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生产和交换方法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即农业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适合，这种制度便成了生产力底障碍物，便必然要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竞争的制度代之而兴，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现，有产阶级底经济及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得到了。有产阶级得势以后，造成了极雄大惊人的生产力（像工业、农业、轮船、铁道、电报、运河等），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及交换的社会，将人口、财产及生产机关都集中了，建设了许多都市，将乡村人口移到都市，使乡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数人民脱离了朴素的乡村生活，使野蛮和未开化国屈服于文明国，农业国屈服于工业国，东洋屈服于西洋。但是到了有产阶级底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崩坏底征兆就是商业上的恐慌，这种恐慌隔了一定期间便反复发生，一回凶过一回，常常震动有产阶级社会底全部。这恐慌发生底缘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

度过于狭小，不能包容那过于发展的大生产力。有产阶级救济这种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开辟新市场，一面尽量剥削旧市场，这只能救济一时，终是朝着更广大更凶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有产阶级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这些人就是近代的劳动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同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能为新生产方法所压倒，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为大规模的产业所压倒，都不断的降到无产阶级，可是一方面产业愈加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不但人数愈加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因为生活不安，对于有产阶级渐次增长阶级抵抗底觉悟，发生争斗，始于罢工，终于革命。有产阶级存在根本底条件，是在资本成立及蓄积；资本底重要条件，是在工钱制度；工钱制度，全靠劳动相互竞争。但有产阶级既已促进了产业进步，便已经使劳动者从竞争的孤立变成协力的团结了；近代产业发达，使有产阶级的生产及占有之基础从根破坏；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马克思说明阶级争斗大略如此，我们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

(四) 劳 工 专 政

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 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得了政权，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

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

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

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为支配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

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兰西内乱》里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达纲领批判》里说：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1922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告做劳动运动的人

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不满足现状不盲从环境的人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在这个意义之下做劳动运动的人们，便有几件应该知道的事：

（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是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劳动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

（二）现在所谓做劳动运动的人，自然不必都是劳动者；因为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人热心从事运动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够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这种做劳动运动的人，始终总不可忘记了自己并不是劳动者，乃是帮助劳动者的人，更不可乌合一班非劳动者组织劳动团体，冒充劳动团体。

（三）做劳动运动的人断然不能不明白劳动组织底系统。劳动组织底系统有三：(1)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2)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乃是一地方底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的劳动者所组织，更进联合全国同业，组织全国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底联合会；(3)地方的组织，乃是联合一个地（市或县）底各种职业或产业工会而组织一个地方的劳动团体，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做劳动运动的人，帮助劳动组织的人，必须使劳动组织在这三种系统的轨道以内才好。这三个系统当中，第一个最适于阶级争斗，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倘勉强成立，不是无力量，便是无政见的冒牌团体；第二、三个都比较的容易实现，但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仅仅一个地方

底职业或产业的工会及一个地方的联合会，都断然不可假冒全省或全国总工会名义，仅仅一个省的联合会，也不可假冒全国总工会名义；又，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不可是个人的联合。换句话说，一个市内许多职业的或产业的劳动团体之联合，不是劳动者个人之联合。这都是做劳动运动的人万万不可缺的常识，若使缺少这个常识的人从事劳动运动，算是盲人瞎马了。

（四）劳动界，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做劳动运动的人也是应该研究的。劳动运动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这应该是注重实际运动的人所能了解的。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因为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为了这几种重要的基础，即在封建式的现政府之下，对于普通选举及废止束缚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法律的运动，劳动者也不能不拼命去干；万万不可空唱高调，把实际的劳动运动上重要基础忽视了。

（五）劳动者对于别的党派，应该取什么态度呢？对于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自然都应该反对；因为基督教拿灵魂升天骗劳动者好看轻肉体的痛苦，一生一世安心替资本家做牛马，顽固党都是没有表同情于劳动者的。劳动者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因为他们本来都讨厌劳动者，若是一旦低头来和劳动者接近，必定有所利用。对于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主张劳动者权利的，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党）的宗旨虽然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方法实不宜于组织不宜于革命，劳动者也不宜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太过看重个人的或小团体的自由，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

（六）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都不能得着教育、卫生、集会底机会。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因为若在资本家企业失败时或劳动市场供过于求时罢工，必然失败，罢工失败，是劳动运动最大的打击。

以上七事，都是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的。

1922 年 5 月 1 日　《先驱》第七号　署名：陈独秀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思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两个大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关系在哪里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但是今天只讲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精神，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和其学理，在马克思纪念册上叙述了，诸君都可见到。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怎样叫实际研究的精神！说来很为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怎么叫演绎法？就是以一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原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这便是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

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

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我望青年同志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我今天特讲马克思这两大精神，请诸君注意。

五月五日

1922 年 5 月 23 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

在劳动运动进步的社会里，都曾有劳动党或类似劳动党的工人政党出来担负指导劳动运动的责任。此时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俄国的共产党，大部分是觉悟的工人组织的，在党义上，在事实上，都不愧为最能够替工人奋斗的工人政党。

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象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但是国民党目前重要工作乃是对于北方封建军阀之战争，实际参加劳动运动的人还是少数又少数。

在这样世界趋势及中国劳动运动极幼稚的现状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本诸党义，对于劳动运动，比他党加倍的努力，自负的努力；同时又应该理解在目前中国劳动运动第一战线上，与他党真心做劳动运动者有同一的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

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

1922 年 5 月 23 日 《广东群报》 署名：陈独秀

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

在我个人的信仰，我对于孔教、佛教（大日如来宗及念佛宗）、道教及其他一切鬼神教、阴阳五行教（即九流之阴阳家、是中国最古的宗教，而且还是现在最有力最流行的宗教）、拜物教之疾视，比疾视基督教还要加甚，所以我对于非宗教同盟并非根本反对，但是从社会上群众运动及生活内容上看起来，不无怀疑之点。

我们现在第一要问的，宗教、非宗教底界说是什么？若以信神不信神为界说，那便未免过于简单了；因为信神不过是宗教性之一端，不是宗教性之全体，拿这个做宗教、非宗教底界说，简直是太不逻辑。若是以一切迷信甚至于以一切信仰都是宗教（我们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信仰到极笃的时候，便多少有点宗教性），这个问题便又过于广泛；试问主张非宗教同盟诸人，是否都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一概取怀疑的态度而无诚笃的信仰？研究及分析这样复杂的问题，是大学校研究室之事，若拿他做群众运动的目标，实在要令人迷惑。群众运动的目标，还是非基督教同盟可以使群众得着一个明了正确的观念。

从社会进化之历史观看来，自然有人类理智性日渐发展宗教性尤其是宗教制度及宗教仪式日渐衰微的倾向；然在这进化过程中，我们若不积极的发展理智性，单是消极的扫荡宗教性，是不是有使吾人生活内容趋于枯燥的缺点（基督教后面挟有国际资本帝国侵略主义的大隐患，又当别论）？这也是我们应该审慎讨论的。

我对于一切腐败的反动派随着时论攻击基督教，觉得很可笑；但是对于学生界非基督教运动，却十分赞同，其理由如下：

（一）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缺点，如原始罪恶说与上帝全善全能说不相应。

（二）因为使徒之虚伪，当危急时彼得尚三次不认基督，可见复活前无一真信徒。

（三）因为诞生奇迹及复活均过于非科学。

（四）因为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仍然因袭中世纪的恶风以残忍态度仇视压迫异己。

（五）因为教师说教以利害胁人者多，以理性教人者少，绝对迫人信，绝对不许人疑。

（六）因为新旧教在中国都有强大的组织，都挟有国际资本帝国侵掠主义的后援，为中国之大隐患。

（七）因为教会尤其天主教会，仍然在农村袒护吃教的恶徒欺压良懦。

（八）因为青年会有结托权贵富豪猎人敛钱种种卑劣行为。

（九）因为教会设种种计划想垄断中国教育权。

（十）因为教会学校对于非教会学生强迫读经祈祷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以上十事迫我们不得不赞成非基督教的运动；但同时又不得不警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诸君的是：教会学校办理虽不完善，而所以能得社会上一部分的同情，是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接近社会及纪律的卫生的训练这两点，实在比较中国公私立学校的学生都好得多。中国公私立学校的学生对于社会服务很少注意，学生和社会隔离甚远，学校门口高悬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两块虎头牌，便是学校与社会隔离的一个明白表示；校内的卫生与师友间的礼貌，学生在校外的动作秩序，都充分表现没有受过纪律的卫生的训练。教员只知道教书，学生只知道读书，绝对不知道训练是教育上第一重要的部分，这是中国公私立学校最可悲观的缺点。所以我敢警告非基督教的学生，若没有猛勇的觉悟与改革，在优胜劣败的原则上，我恐怕不但不能战胜教会学校，还要让他的势力蔓延全中国教育界，此事宁不痛心！

1922 年 6 月 20 日　《先驱》第九号　署名：陈独秀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 现 在 状 况

A. 党员及党费

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

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

B. 政 治 宣 传

1. 关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之运动如下:

Ⅰ、译印第三国际对于太平洋会议宣言(五千份)。

Ⅱ、译印山川均及堺利彦批评太平洋会议论文(各五千份)。

Ⅲ、印陈独秀论太平洋会议论文(五千份)。

Ⅳ、印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五千份)。

Ⅴ、在上海国民大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张)。

Ⅵ、在上海工人集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张)。

(附注)论文及传单内容,都是解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决无利于弱小〈民〉族。此外各地方都有此项运动,而长沙工人最猛烈,此为黄爱庞人铨被杀原因之一。

2. 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百余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贺年帖"(内载鼓吹共产主义的歌)六万张于上海市内,下午分散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传单二万张于"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结果一朝鲜青年因散"贺年帖"在法租界被捕。

3. 正月十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 Karl Liebknecht① 纪念会,由全部党员出席演说,分散纪念册五千本;纪念册内载 Karl Liebknecht 及卢森堡女士传及"斯巴达卡司团"宣言。此次纪念会广州最盛,工人参加游行者二千余人。

4. 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

5. 奉直战争后,由中央机关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五千份,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

6. 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下:

马克思全书二种

Communist Manifesto,②

Lohn Arbeit und Kapital,③

列宁全书五种

Lenin's Life,④

Soviet at Work,⑤

讨论进行计划书,

Erfo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cht,⑥

---

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

② 《共产党宣言》。

③ 《雇佣劳动与资本》,当时译为《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

④ 书名,当时译为《列宁传》。

⑤ 书名,当时译为《劳农会之建设》,列宁著,李立译,1921 年 12 月初版。

⑥ 书名,当时译为《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著,李墨耕译,1922 年 2 月初版。

共产党礼拜六，

康民尼斯特[1]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画（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evisk[2]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C. 劳动运动

1. 上海方面

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设分部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本年（一九二二）由书记部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各省工会代表到会者一百七十三人，由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开会六天，发表宣言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议决明年（一九二三）五月一日由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全国罢工援助等议案。

书记部在上海发行《劳动周刊》，至四十一期为会审公堂所封禁，发行最多时五千份，前后统计印行十六万五千张。

英美烟公司罢工，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机器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一种数百张；印刷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双十节"发布传单三千份，鼓吹工人革命思想；反对太平洋会议传单三千份；香港海员罢工时，发布传单五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一次罢工时，代其发宣言二万份，又代发传单六百张；邮差罢工时，代发工会章程三百份，又传单二种各四百张；本年（一九二二）"五一节"发传单二种，每种二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二次罢工时，共发传单九次，每次数百张；在杨树浦小沙渡（上海纺纱工人最多的地方，两处共有纺纱工十余万）向纺纱工人发传单三千张，劝他们都起来组织工会应援浦东纺纱工人，工人因散传单被捕

① 共产主义一词的音译。

② 书名，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当时译为《俄国革命纪实》。

者四人；黄庞追悼会发传单二种，每种一千张；发布《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五千份；《劳动周刊》被封禁发布传单三百份；发布《赤色国际工会告中国工友》二千张。

参加罢工六次：

英美烟公司二次

海员一次

邮差一次

浦东纺纱工人二次

有关系之工会五处：

烟草工会

机器工会

印刷工会

纺纱工会

邮务工会

参加工人群众运动五次：

反对太平洋会议

国民外交大会

本年“五一节”

澳门惨杀华工事件①

黄庞追悼会

因罢工运动受官场压迫三次：

因香港海员罢工书记部通知各省工界发起后援会并运动上海水手应援，李启汉同志及水手二人被捕拘留数日。

因为浦东纺纱工人罢工散传单，四人被捕拘留十余日。

因为参加邮差罢工，李启汉同志判罪监禁三个月，期满逐出租界，现在狱中。

---

① 1922年5月28日澳门葡萄牙士兵当街调戏华人妇女，被群众痛殴，葡军逮捕华工三人。华人宣布罢工、罢市。廿九日，葡军开枪打死打伤华人百数十人。惨案发生后，全澳门工人大罢工，澳门政府强行解散六十多个工会。广州、上海等地群众团体和海外华侨组织纷纷集会抗议、声援、成立后援会。孙中山主持的广州政府也提出强烈抗议。

2. 北京方面

《工人周刊》每期印二千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今犹继续刊行。

参加陇海铁路罢工。

参加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组织。

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

3. 广东方面

参加建筑工人大罢工，组织广东建筑工会。

参加机器工会改造运动，设立工人学校三所。

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三千份。

设立劳动通信社。

援助盐业工人罢工。

4. 汉口方面

参加粤汉铁路罢工，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参加组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参加人力车夫罢工及组织工会。

参加扬子江铁厂组织工会。

参加烟草工人罢工及组织工会。

5. 长沙方面

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

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6. 浙江方面

组织八十个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

(2) 将 来 计 画

A. 党　　务

1. 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

2. 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

3. 厉行中央集权制。

4. 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

B. 政 治 宣 传

1. 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

2. 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

3. 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

4. 联络各革新党派，作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

5. 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

C. 劳 动 运 动

1. 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

2. 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

Ⅰ、全国铁路总工会

Ⅱ、全国海员总工会

Ⅲ、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

Ⅳ、全国机器工人总会

Ⅴ、全国纺纱工总工会

3. 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

Ⅰ、上海总工会

Ⅱ、广东总工会

Ⅲ、武汉总工会

4. 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

Ⅰ、北京

Ⅱ、上海

Ⅲ、汉口

Ⅳ、广州

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T. S. Chen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陈独秀致吴廷康[1]的信

吴廷康先生：

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

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中国共产党能□[2]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中国政治仍无良好希望，北方吴佩孚思想甚旧，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曹琨〔锟〕等于张作霖，他和吴佩孚终不免决裂；黎元洪优柔无用，为左右小人所包围；国会议员大半腐败不可言；北方之乱将在目前。

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我们发表的政治主张，□[3]否适当，希望你指教。我很希望9月能到莫斯科一行，但内地工作实在离不开，恐不能如愿。祝你的健康与奋斗！

T. S. Chen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

---

① 即维经斯基。

② 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一"够"字。

③ 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一"是"字。

答黄凌霜[1]（无产阶级专政）

凌霜兄：

精研笃信安那其，在中国当推兄为第一人。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且极钦佩吾兄有自白思想变迁之决心与之勇气。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巴特金并没有主张即时就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澈，所以法国无政府党读此书后加入共产党的很多很多。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尊兄以为如何？

独秀

1922 年 7 月 1 日 《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

① 黄凌霜，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曾经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实社"，并出版《自由录》。在 1919 年 5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批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①]

人类社会因治生方法不断的进步，他们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遂随之不断的进步。在这不断的进步之过程中，保守者与改革者亦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断的争斗；每个争斗的结果，后者恒战胜前者，人类社会是依这样方式进步的。照前人依据历史的事实指示我们的：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即不断的争斗中，依治生方法之大变更扩大了他们的生活意识，他们利害相冲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两次最大的阶级争斗，第一次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第二次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所以人类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争斗，都有阶级争斗的意义含在里面。

今日，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方在猛烈的进行中，即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虽在最进步的国家若德意志若法兰西也还未曾完全终了。在产业幼稚的东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计外，即稍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都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之手；最进步的日本，也不过是一个半封建式半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已战胜封建的欧美资产阶级，采用帝国主义，利用产业不发达的亚洲、非洲诸国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商场，并且公然的或阴谋的运用他们政治及经济势力，钳制殖民地及商场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都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是非、亚两洲被压迫的民族之普遍的痛苦。

在这种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状况之下的中国，他也是被压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经济是自然要受环境支配的。

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

---

① 这篇文章在 1922 年 8 月 10 日《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五号发表以后，陈独秀又将此文寄至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胡适即于 9 月 3 日予以发表。

(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因为受了列强在中国所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本国军阀的扰乱,农民被物价腾贵驱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业渐为外国机器制造品所毁灭,新兴的工商业没有保护关税及运输便利,也不能够发展起来和外资竞争。

中国政治的状况,也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操诸外人之手,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二)是国内军阀的扰乱,帝制倒了,帝制遗下来的军阀却未曾倒,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权、财权,使全国中法律无效,舆论无效,财政紊乱而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军阀互斗之故,战祸遍于全国,金融恐慌,运输停滞,工商业莫由发展;(三)是政党之萎弱,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至其余的党派,都不过凑合数百个或数十个利害相同的官僚议员,依附军阀来谋一官半职,我们不敢妄说他们是有主义政策的政党。

以上所列中国经济的及政治的现状,凡是诚实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应该承认实是如此。

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潜势力,虽然是无限的伟大,但是他们阶级的形式及知识方在萌芽时代,所以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可以说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时期还未成熟。资产阶级的政治争斗,已经由辛亥革命运动爱国运动及护法运动表示他们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争斗,是中国人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劳苦群众也都应该加入,因为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

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现状之下，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应该以下列诸项原则为最重要的标的：

（一）倾覆军阀及卖国党，尤其首先要惩创勾结卖国党或希图割据的军阀，以实现国内和平与本部统一。

（二）废止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收回管理权，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绝对的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四）定保护农民工人的各种法律。

用如何方法达到上列各项标的，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的民主政治的标的，固然不是在维持现状之下，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达到，也不是小势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为一切国家都必然建设在权力之上，封建的国家建设在军阀权力之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人民权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在母国权力之上，无权力则无国家无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这种自然法则之支配，又是我们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若是人民的权力不能代替军阀的权力，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民主政治是不会成功的。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党，更是发昏之发昏。要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权力来代替军阀权力，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二个以上不可；因为有这么多的党员，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才可以实施刷新政治的各项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这件事若办不到，政党政治是不会成功的，民主主义是不会实现的，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军阀政治不倒，他们各霸一

方把持财政，法律无效，舆论无效，战乱蔓延，工商凋敝，教育废弛等现状，是要继续下去的；此等现状继续下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现在半殖民地状况更变到完全殖民地状况的。

我们知道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段争斗，不是人数〔类〕最后的争斗；我们更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下的政党政治是必然包涵许多腐败与罪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类阶级争斗亦即社会进步的过程上看起来，在中国政治的及经济的现状上看起来，我们势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败更罪恶的军阀政治之民主的政党政治能够成功。

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说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本不反对，但是要晓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的地方自治问题，乃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这种主张，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实上，无人敢说这样大的自治权马上就能够归到人民手里，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增长乱源的政治主张，我希望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

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1922年8月10日 《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五号 署名：陈独秀

为印刷《向导》事致信汪原放[1]

原放兄：

周报用最好报纸印四千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

弟重辅白

〔一九二二年〕九月八日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独秀文存》自序[1]

亚东主人将我近几年来所做的文章印行了。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既有出版的价值，便应该出版，便不必说什么"徒灾梨枣"等客套话。

一九二二年八月，独秀自序于上海。

---

① 原标题为《自序》。《独秀文存》由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1922 年 11 月初版，至 1934 年 3 月发行了十版，《文存》共三卷四册，汇录了陈独秀自 1915 年 9 月至 1921 年 8 月所撰写的论文、随感录及通讯。1934 年 3 月由亚东图书馆印行第十版。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①]

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本来不反对；但是我以为任何国家若采用这个制度，最圆满的理由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经济状况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语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须建设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扩大之上，这种合乎民治主义的进步制度，决不是武人割据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恶的"督军政治"。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

我根据以上的理论与事实，我断然不敢承认联省自治，能够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

中国本部人民的经济状况，都在由农业及手工业渐进到工厂工业时代，南北大致不甚相远；本部语言发音虽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语言构造则完全相同；宗教虽有佛、道、耶、回之分，而无分部聚居之事；至于说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已经扩大到联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谣外别无事实可以证明；在上列的事实基础上而提倡联省自治，简直可以说是无病而呻。

近来的联省自治论，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这个事实，我想无人能够否认。这种无病而呻的

---

① 1922年9月10日《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写的《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反对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的观点。陈独秀发表这篇文章批评胡适。

联省自治论,在这班军阀首领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说现时的联省论,隐然以事实上不能不承认已成的势力为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而且国内政论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的势力,遂轻假以自治之名,则希图割据的武人得了时论的援助,人奋其私,师旅团长都可以效督军总司令之所为,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一省之内又复造成无数小酋长的局面,更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诸君又将以他们"不能立时放弃自治"为理由,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他们已成的势力,来主张"联道自治"、"联县自治"吗?

联省制即联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们所不反对的,自治更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我们人民的政治能力,才发达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说已能勉强运用省自治制,此则为常识所不许;不能而强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据冒居其名,其结果,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因为人民真能运用自治制度的联邦,未必定有害于统一,而武人割据的联省自治却去统一太远了。

* * *

最近的《努力周报》上,有胡适之先生和陈达材先生两篇赞成联省自治的文章,我现在略写点不同的意见如下:

适之先生说:"我们总不懂孙吴二氏怎样能抹杀省的一级,我们至今不解国中研究政治事实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决省的问题,而能收军权于国,何以能希望不先许省自治而能使县自治!"我请问适之先生:怎见得不赞成联省自治便是抹杀省的一级?不能收军权于国,如何能够解决省的问题(即以安徽为例,不能除张马等人军权,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省内各问题)?据何理由县自治必须建设在省自治的基础上面?

适之先生说:"试问国宪制定颁布之后,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权奉给中央了吗?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广东,就可以自行取消他们的自治制度了吗?那些正在经营自治的各省如云南,如四川,就可以

立时放弃自治了吗?”我今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像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先生称许湖南、广东是已行自治的省,云南、四川是正在经营自治的省,原来时贤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诚惶诚恐这种进步的政治组织,关外胡帅也会采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恶将假汝名以行!

适之先生说:“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我要问:先生所谓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经营自治的省,都是军阀用兵力取得的,他们肯以军权换省自治吗?他们果真是为了省自治才拥兵割据吗?他们宁肯抛弃军权不肯抛弃省自治吗?先生这种公平交易的估价,恐怕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

适之先生既已称许明明是割据的军阀为已行自治或正在经营自治,为何又说:“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

适之先生力说: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时局,胜于武力统一;我们知道前此上海和会,费了许多时间及金钱,各代表各政客闹了无穷的笑话,结果还是吴佩孚两次放了几天炮,才解决了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陈达材先生主张联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二)是因为人民组织能力薄弱。我以为交通不便不是个永久不变的现象;他以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现他们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云南省长,须听命于数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们的意志感情怎么能影响北京政府?我要问:适之先生所谓正在经营自治的云南省长唐继尧,已行自治的广东省长陈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现云南人和广东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组织能力薄弱,不能监督政治,诚如陈达材先生所云。正为如此,我们应该觉悟在人民没有运用省自治制这大能力的时期,断然不宜妄行采用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因为采用联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运用,此时省政府,下无人民监督,上又无中央制裁,则军阀割据暴吏横行的现象其何能免!

陈达材先生又以为在国民无政治能力状态之下,欲求政治进步,必

先做到下列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权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饭碗支配权的分散,(三)是军人与政争之分离;这三个条件,与联邦制实完全适合。我要请问:照现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权力还要更分散到什么程度,陈达材先生才觉得痛快?此时中国政权是集中在一个中央政府吗?人民分途监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里?中央政府还有政治饭碗的支配权吗?各省在邻省在省内,因为地盘饭碗的自由竞争连年开枪放炮,像陕西、四川、湖南、云南、贵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权致启争端的厚赐,陈达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吗?中国政治饭碗总只有这样大,无论支配权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应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开发实业,不是饭碗支配权的分合问题。此时中国政治的实质,已经是联邦而非单一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军人与政争分离了没有?

我常说,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用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我以为任何好名词好主义好制度,而不为社会实际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济社会的病痛;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主张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断然不可怀苟且的心理,以为他是已成的势力,来承认他助长他。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候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所以我对于这种政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敢我敬爱的朋友们垂泣而道之。

1922 年 9 月 13 日 《向导》周报第一期 署名:独秀

本报宣言

——《向导》发刊词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

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中国为使永〔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1922 年 9 月 13 日　《向导》第 1 期



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

东荪先生：

发展中国实业，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两个途径。先生前文是否主张资本主义的发达实业，姑且不论，惟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私人资本主义这条路，决不是合作主义能够使中国实业充分发展的。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不知先生对此方法有所怀疑否？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弟万分怀疑；因为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后的进步，必然是两阶级平行进步，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弟亦以为必经过这个时代，但无很强大的力量，而且不久必生他种变化，先生以为如何？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吾辈反对联省并非主张废省。尊论谓“特所谓省者必非今日之省”，诚是诚是，苏、皖二省就是一个好例，何以主张联省者未议及此？老实说他们完全是苟且的心理，承认现状而已，乌乎可。算是武人狠，我们无法推翻他，让他们自去做皇帝，我们何苦要上劝进表！

独秀

1922 年 9 月 17 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造　国　论

以真正国民军　创造真正民国

我们中国此时在名义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比南洋马来群岛酋长割据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那里算得是一个独立的国！在经济方面：国家重要的权利大部分抵押给外国了，外国货充满了全国，全中国人都是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全国金融大权都直接或间接操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长分据了中央及地方，这班大小酋长之发号施令又惟公使团之意旨是从。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完全是这样，如何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殖民地状况之下，有何国会可言！有何法统可言！有何宪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什么恢复法统，什么速制宪法，什么地方分权，什么整理财政，什么澄清选举，对于时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对题，便是隔靴搔痒。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倘然决定了，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造国？

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

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在中国的产业状况看来，这种大群众决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商人说，在商言商不与闻政治，教育家主张不谈政治，

至今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的表征；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因此，我们敢说，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如果成立了，国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压迫我们的内外恶势力如果解除了，民主的全国（指中国本部而言）统一政府如果实现了，这时候才有宪法才有政治之可言，这时候中华民国政治上的创造才算成功，而真正的中华民国还只创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华民国经济上的创造；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

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

政治的创造及经济的创造都能成功，那时国民军创造真正中华民国的工作才算完结。

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叙〔序〕是：

第一步组织国民军；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1922年9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二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是什么

凡研究一个党派的内容是什么,必须将他的党纲和党员分子分析一下,才能够明白。要明白中国国民党是什么,也须用这个方法。

从中国国民党的党纲说起来,他起源于同盟会;同盟会的誓约中,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这就是从同盟会,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所始终主张的三民主义。第一、二句是民族主义,第三句是民权主义,第四句是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党纲之骨干。我曾亲听过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大意是说:满洲皇室虽然推倒了,而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仍有提倡的必要;民权是指选举权、复决权、罢官权、创制权等直接民权;民生主义,于平均地权以外,更加上土地国有,机器国有,少者归国家教育,老者归国家赡养等主张,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民生主义最近的解释。

从中国国民党员分子说起来,知识者(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军人等)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居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

照以上两点分析研究的结果,再参看他十几年来革命的历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

中国国民党何以成功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此事决非偶然,因为有两个重大的原因:(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进步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

思想界顿呈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我希望国民党党员和他党党员，赞成国民党和反对国民党或批评国民党的人，都不可忽视了这一点。

1922年9月20日 《向导》周报第二期 署名：只眼

致胡适信

适之兄：

十八日来信敬悉。你说《民国日报》不值得一驳，许多人说胡适之被《民国》骂倒了，《努力》销路也因此稍减(在南方尤其是上海)，你不睬他，他却要睬你。我们反对联治或者有人利用，但你们提倡联治也不见得无人利用，我也很替你着急。我骂发昏是指当年汤继武，因为他前曾正式宣言，反对组党。你曾明明承认政党，惟自居政党外之政论家，何以误会到我是骂你，实在奇怪。《民国》增改别人文章字句，我看了也觉难受，政党的罪恶，我知道的或者比你还多，我的脾气或者比你更不适于政党，因为我的脾气比你更急躁，比你更不喜应酬，我只喜欢结交革命党人，并无心于普通政党。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的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的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这是我牢不可破的迷信。单拟一个制度，所取建设这个制度的手段不同，结果亦必不同。譬如统一论与联治论，若建立在现状上面，都是不对，因为手段错了，所以这些问题很难分开来讨论。我所谓"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兄将"不啻"改为"即是"二字，语气之间，似稍有不同了；且这句话说在你主张联治以前，大约是指褚慧僧一班人，似也于兄无关。兄说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运用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我敢说这个暂时决不是很短的时期。兄是相信实验主义的，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都不应该轻视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回本省去奋斗！"也是一个很好的标语，吾兄何妨躬自实行为天下倡。我曾得着湖南一些报告，颇不似兄函所言。[1]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2]

《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又见《胡适日记全编》(3)，第 811 页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① 原信共 5 页，末页只存三行，据内容和笔迹推断，此信当是陈独秀所写。——编者

② 此日期为原信收入《胡适的日记》的日期，具体写作日期不详。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

自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华盛顿会议决定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有所谓退回青岛，英国帝国主义者有所谓退回威海卫之举。

退回青岛的结果如何？除日本帝国主义者估定那中国人民无力赎回的价格之外；青岛的矿业经营名为中日各投半资合办，实际将全落日人之手；青岛的管理，照日美帝国主义的爪牙王正廷所颁布的青岛市政条例看来，完全为国际共管！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顾问和机关报，不是天天吹华盛顿会议怎样有利于中国，便是说青岛从前在德日人手里怎样弄成了近代的模范都市，中国是否有承继这种伟业而不使之腐败，以辜负列强之盛意的程度……等等敲诈的鬼话，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要完成青岛的国际共管。

现在又看英国帝国主义所谓退回威海卫是怎样一回事呢？他要求将威海卫开放为他们的自由贸易港，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一说有五条）是：

（一）英国在威海卫原有军港不能废除，当作为夏季英人避暑之地。

（二）中国派警察保卫威海卫，其警士须素与英人有好感情及有经验者。

（三）中国如在威海卫境修筑铁路，须由英人首先投资。

此外，且申言英国不愿受不名誉的中国军警之保护，并说为防威海卫之"衰落"与"消灭"计，须任外人参预市政。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

1922 年 10 月 4 日　《向导》周报第四期　署名：独秀

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

九月廿七日《中华新报》载：据日人方面喧传，驻华英美两国公使，对于中东路之管理方法，业经议定五项如下：(一)根据一九二〇年之条约，尊重中国之管理权，劝告中国自动的整顿该路，以防日人之干涉；(二)对于沿线之土匪，希望中国组织特别警备队备之；(三)根据华盛顿会议之决议，要求关系各国共同援助；(四)废止海参威之管理委员会，缩小哈尔滨之该技术部之权限；(五)中俄会议对于中东铁路问题，不宜干涉。

国人试看英美帝国主义怎样"根据华会决议"掠夺中东路的，怎样蔑视中国的主权，他们竟说得出口，不准中俄会议"干涉"中东路；新爱〔卖〕国贼外交系对于他们主人的这项训令，一定奉命惟谨，不敢违背的。所以他们天天抬出外蒙问题以塞国人耳目。而把中东路问题抛在九霄云外。被蒙蔽的国人呵，你们须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中东路问题之重要十倍于蒙古咧！

1922 年 10 月 4 日　《向导》周报第四期　署名：只眼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①]

世界经济状况已指示世界无产阶级在对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作战之中，分出三种策略：(一)欧美资产阶级已于一世纪半以前完成了他们推倒封建阶级的使命，实现了他们阶级的政治，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经济条件也发达到急切推倒资产阶级而自己取得政权之可能与需要；(二)日本资产阶级只发达到脱离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羁绊而与本国之贵族军阀平分政权的程度，因此日本政治成了一种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之现象，目前日本的无产阶级仍有推进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战之需要，而且他们的势力已集中，已有与封建阶级作战之可能；(三)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配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达到势力集中，对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觉悟与可能，因此他们每每有依赖贵族军阀或帝国主义者而生存的倾向，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应采用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争斗过程中，才能够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

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

---

① 本文中文稿未标明时间和作者。俄文稿和英文稿篇末均标明“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于莫斯科”，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

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政 治 问 题”

A. 统一与分治问题：武人倚靠外力割据纷争的现状，为资产阶级势力及劳动运动得集中之大障碍，吾人应该反对军阀的分治主张，而赞成资产阶级的国民统一运动，并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而极力反对其互相分裂或反与军阀合作；然在国民统一运动未能集中时，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奋起反对一地方军阀统治的自治运动，及不压迫劳动运动不依赖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的省政府，则吾人亦宜赞助之，以消灭一部分军阀势力及减少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之侵略。

B. 对于国民党问题：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

C. 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加以攻击；同时亦可联合半民族运动的党派，向一派帝国主义者作战（例如资产阶级反对日本时）。

D. 国会问题：现有国会已经过十年，无论民八民六均未能代表民意，吾人主张用普通选举法选举而不为军阀势力所支配的新国会，同时

亦必须改组一新政府，而对于现有的国会及政府，亦仍要作劳工立法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之运动。

E. 对俄外交：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铁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

F. 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

“劳动运动”

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由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的争斗之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运动，除普通运动（如减时加薪，劳动立法等）外，应利导此倾向依次进行下列具体的计划，以增加其实际的战斗力：

A. 有系统的巡回政治宣传，此项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

B. 工厂委员会之运动：单是工会运动，工人的势力终于站在生产机关的外面，其运动之基础恒不巩固；惟有实现工厂委员会之制度，廓清工头，包工及一切居间人之障碍，才能使工人的势力达到生产机关以内。

C. 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及矿工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海员已有全国的组织，铁路工人及矿

工经数次大罢工，亦有全国的组织之可能。

D. 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在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劳动总联合中，尤其在工人组织幼稚的国里，若是没有几个大的有力工会为中坚，是不容易团结及持久的，所以在未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以前，必须努力先成此三个产业联合的三角同盟。

E. 为巩固及强大劳动阶级之战斗力计，应该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应该极力指斥无政府工团派以“独立”、“自治”等名词使劳动阶级之组织及运动分裂的阴谋；因此，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二〔三〕年五月一日），首先要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议案及议定关系全国劳动阶级利害的各种共同工作，并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筹画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上各项统一的策略，以防欧美资本进攻之余波或及于中国。

“农民问题”

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中国一般农民之痛苦如下诸端：

（一）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此事实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

（二）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一律受苦。

（三）兵乱及灾荒使农民大为迁徙，其迁徙所至之地方遂至佃农雇

工均供过于求，因同业间竞争，地主及雇主所要求的条件日加苛酷。

（四）因以上三种之结果，农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盘剥之痛苦，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甚。

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

（A）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

（B）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

（C）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

（D）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额租，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

（E）开垦荒地，应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

（F）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掩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之运输上亦有绝大的影响。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

最近几个月内，中国几家资产阶级的报纸，算是做了不少反对苏俄的宣传；这些宣传都是直接间接受外国帝国主义宣传员之支配的。有一些报纸论到“国际共管”的消息，便说中国自己弄到这样糟，外人为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计，已忍无可忍，怪不得他们有这种主张。对于诚心要与中国人民友善的苏俄，并不说中国军阀纵容白党扰乱苏俄和中东路，怪不得苏俄要说闲话；反张大其辞说苏俄侵略。最近中国报纸，替外国人传达关于苏俄谣言，也算不少。京沪各报甚至登载一篇《苏俄共产党最近之宣言》；内容是说苏俄不交还蒙古和武力对付满洲；我们一看便知道是假的。这又不知道是那个侵略家造的谣。或者是日本要夺取中东路，先造些谣言做借口的资料罢。但是中国报纸毫无鉴别能力，未免专供人利用。

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很知道俄国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由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苏俄，是绝不会“侵略”的。所有反对苏俄的宣传或谣言，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中俄人民的共同敌人！外国侵略家！时常使用离间计，或反会使中俄人民的关系日见亲密罢。

1922 年 12 月 23 日　《向导》第十三期　署名：致中

致蒋梦麟、胡适

梦麟
适之兄：

国立江苏自治学院，为张君劢所主持，此院名称不见于新学制，且北京教育费奇窘，焉有余勇本年即以七万九千二百元举此？究竟内容如何，京学界对此有无抗议，均求详示。

弟仲甫白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此事亦请二公注意。又白。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

本报对于山东问题，虽然发表过好几次意见，但是还有讨论之必要。这个举国注视的问题，虽已签约解决了，我相信我们的读者还会极端的注意。

山东问题的解决，官场中到极引为荣幸。有些官僚的报纸，如《京报》等，甚至赞美鲁案协定签字那天，是中国人民最堪庆贺的日子；并认定鲁案解决结果，是中国的胜利。在第一部协定签字换约那天（十二月一日），王正廷在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演说道："……幸对于各问题，均已圆满解决，此诚两国邦交上一大幸事也。"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些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前题的民众——也是在本国领土内享受外国侵略家的践踏和凌辱的民众，有什么欣喜的表示。不但如此，还有不少的人们，明了这个协定对于中国全体人民的真正意义。山东公民鲁案后援会等曾发表一篇反对这协定的宣言，福建学生且因此宣告抵制日货。中国国民的态度既然如此，怪不得《顺天时报》和其他汉文的日本报纸很愤怒的说道：为什么中国还不快快感谢日本呢？日本天皇这样很慷慨的把山东交还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民还不向日本天皇致谢恩的祝词呢？

但是我们只要把鲁案协定略略分析一下，便能发现国民为什么不满意鲁案协定的原因。

鲁案协定之第一部，于十二月一日签字，细目共分九章二十八条，细目之附件共十项；内容包括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之交还，公产、矿山、盐业等等。现在我们不妨把这协定之第一部中的要点说说。日本承认于本年十二月十日正午将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一切行政权交还中国，但是中国政府须承认青岛日本裁判所民刑诉讼事件之裁判，并诉讼行为、不动产证明、公证拒绝、证书作成及私署证书确定日期之效力。中国政

府并格外承认条约批准交换前日本官宪所许可出租之地，租期满后，以同一条件，准其续租三十年。中国政府更承认续租三十年期满后，仍得再续租；不过再续租之条件，须按照胶济商埠租地规则办理罢了。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却保留公产中最精美之房屋和地基共十九处。胶济铁路沿线公产，现被日本占领，本应即刻交还中国，却规定俟开埠地方决定时，另由两国政府协定。日本政府允将青岛、佐世保间海底电〔线〕之一半，无偿交与中国，却于附件中规定青佐海底电线之青岛一端，也委托日本政府代办，一切机器、线料、房屋、接线等费用，却由中国政府供给；电报房的主任和技师由日本委派，他们的薪金及其他职员的薪金和额数，均须由中日双方协定。甚至交还中国之四方及沧口各电报局日文电报之收费多寡，亦须由中日主务官厅协定。中国政府并须交付日本政府一千六百万日金，作为收回公产和盐业之赔偿费。此项金额内日金二百万元，须于公产和盐业移交后一月以内支付现金。其余日金一千四百万元以国库券交付日本政府，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税捐。此项国库券之偿还期限，定为十五年，但不论何时，经三个月前通知，须将本国库券之全部或一部偿清。日本所占领之山东各矿山，移交一个专为经营此项矿山所组织之中日合资公司。日本政府既将一切矿山移交这个中日合资公司，这个公司须赔偿日本政府日金五百万元。

青岛——这块中国领土——从前不过被日本资本家强夺去了，现在不过经过一度交还中国的手续，但是拿鲁案协定细目第一部一看，便知日本资本家夺得的利润真不少呀。此后日本资本家每年因此又要榨取中国人民几百万元的“赔款”。八年来日本占领之山东矿产，现在事实上是依然还在日本掌握之中。因为个个稍微明了一点中日合办事业之历史的人们，都十分懂得中日合资公司除了有一张中日合办合同做假招牌以外，事实上简直是个日本公司。因为完成这个“公平”的合办事业，日本又获得五百万大洋。日本资本家和商民人等，在由比司令〔此公司〕保护之下，当然视青岛为他们的极乐乡土，他们会尽量收买青岛商业繁盛区域之土地；等到这次鲁案协定成立以后，他们便变成有永远租借权的地主了，就是租期最短的，也不会短过三十年的期限了。不但日本领事馆永远占据八段大地皮和房屋，日本居留民团占得的土地

也是不少，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到租金和租期呢。那些让给日本人会、日本学校、日本医院的房屋和土地，将变成永远制造“中日亲善”事业的场所了。要是说到日本的神社、斋场、基地占据土地之多，简直令人咋舌。还有七八千亩的贵重土地，作为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既得权，在条约上说是再谋清厘，事实上再不会是中国的领土了；日本政府和商人经营之广大农场，不过附件上载了一句可以补偿赎回。倘若你再仔细看了附件中的公产项，你又可以找出许多地皮和房屋的损失，而且规定那些什么公学堂、病院等，还要维持而扩充之呢。这样看来，名义上青岛虽说归还中国了，但是除了名义上归还以外，恐怕没有归还旁的有价值的东西罢。不但没有归还什么东西，日本却为交还公产和盐业，又在中国人民身上榨去一千六百万的巨款。而那些公产和盐业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现在还是属于中国人民，不过八年前被日本军阀用武力抢在手里罢了。协定上还规定日本由青岛输入机器等货物，四年内(从本年二月四日起算)可免除进口税。中国却要在十五年内，每年供给日本一万万斤到三万五千万斤的青岛盐。就是像洗衣作这样的小企业，都被日本资本侵入去了，而且这次协定还规定中国政府要给青岛日本洗衣业一种保障，这便证明鲁案协定第一部的漂亮。这样一个协定与其说是交还山东的协定，不如说是一个第二次掠夺山东的协定罢。

现在我们再看看鲁案协定第二部罢，第二部是规定胶济铁路的移交事件，本月五日签字的。在这个协定第二部中间，或者我们还可以找出日本军阀的新阴谋。

按照协定第二部说来，日本将胶济路及其支线于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移交中国，中国以四千万国库券赔偿日本。此项国库券以胶济路财产及进款为担保，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税捐。要是不细心去研究这部协定，好像这些就是全部的内容；但是真正的内容比上面所说的，实在差得太远。鲁案协定并没有规定日本参加管理胶济路的条文，也没一家中国报纸提及日本管理胶济路的问题，但是日本管理胶济路的根据早就安排好了。这是怎么呢？我们要是翻开华盛顿会议中之山东条约看看，便能找出山东条约第十九条如下：

“前条所云之国库券未还清前，中国政府须选派日本人一名为运输

总管，又一名为总司计，与中国总司计会同襄办事务以国库券还清时为限。”这就是说这条中国的胶济路——这条额外花上四千万元国库券向日本赎回的胶济路——的全部运输事宜，现在仍然落在日本资本家和日本军阀手里。那些日本资本家和军阀还是可以和从前一样利用这条铁路的运输权，供给中国督军的枪炮子弹之类，输送鸦片吗啡的毒药。据最近的消息，说是这铁路的机务、车务、工务、警务等处长，仍由前任之日本人充当，任期二年半（恐怕不止二年半罢？），各处副处长，才由中国政府指派呢。

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实，便是鲁案协定值得叙说，值得赞扬的地方。我们虽然只把鲁案协定，略加分析，已足够使我们得到一个很确当的结论。我们的结论便是：日本一方面形式上将青岛和胶济路交还中国，实践华盛顿会议上的允诺，博得国际上的美名，他方面用他的巧妙的外交手腕，利用中国委员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依然保留他在青岛和胶济路之主人翁的地位。多年争持之山东问题，现在日本是得了名利双收的结果了。日本虽然这样胜利，他的军阀的欲望像是还没有满足。他们还在青岛及其附近招集土匪与以赞助，其用意实欲于日本军队退出青岛以后，还能暗中操纵和管理青岛，如从前一样呢。也是企图以土匪骚扰为借口，推迟青岛行政权的交付呢。土匪如何在青岛一带骚扰，土匪最近的行动和土匪历来被日本利用着做扰乱事业等事实，我想读者都已十分明了，用不着再去多说。现在日本领事又怎样在青岛设警察所等等额外侵略行为，读者也自能明了，也用不着再说。我们还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受日本政府侮辱的事实。当王正廷在青岛举行接收青岛行政权的仪式的时候（本月十日正午），日本代表演说，简直没有把王正廷放在眼睛里，差不多没有一句话不是侮辱他（此事中国报纸竟没有详细记载）。王正廷的好乖，又是一问题，但是至少从日本代表看来，他总算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代表，侮辱王正廷，是不是侮辱中国人民呢？

每当我们想像所谓山东交还问题和日本政府怎样对待中国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联想到日俄长春会议的经过和日本政府怎样对待俄国代表等情形。日俄长春会议虽然破裂了，但是俄国得到什么重要的

结果呢？其结果便是在俄国领土之内，现在是没有一个日本兵了。这个结果，只是由于俄国劳农政府之坚忍和伶俐的政策达到的，并没有得到什么“友邦”的“善意援助”。俄国民众的志愿和需要，是有那些俄国代表真正能够代表的，而且俄国代表团真能代表一个完完整整的俄国。但是中国人现在那里有这样好的命运呢！中国委员团那能比得上俄国代表团呢！中国委员团不过代表一个由顽固官僚组成而供军阀使用的政府。所谓“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不过官僚们欺瞒小百姓的话；惟有没有一个真正人民的政府，才处处损失国权。这就是为什么王正廷等的委员会丝毫没有作用和分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政府无论和那一国办交涉，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利权断送给别人。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快快起来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组织一个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将侮辱中华民族，压迫中国民众，掠夺中国富源等事实，一概消灭。

1922 年 12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十四期 署名：致中